脚印——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

谢英富

目录

宪徽：写在前面的话

《脚印》的作者谢英富是四川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他在文中所述的一切，尤其涉及历史重大关节处，几年来，已经多方征求意见并获得证实，目前尚有部分在继续求证和修改中。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年轻人读到后深感震惊，谢本人更是深感去日无多，昭示文革的历史真相乃自己的历史责任。受其委托，从今日起陆续将已修改过的部分发到文革研究网上继续征求各方意见，欢迎批评指正。也算是对那场伟大革命的纪念。（宪徽）

谢英富：尝试作“序”

说实话，本人文化程度太低，压根就不敢与文豪墨客们并提作“序”，更不敢像史学家们著书立说作“跋”。只不过亲身经历了那场被颇多“诅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且不谈它功过，但这毕竟是一段难以抹煞的历史事实，总想着要把自己看到的和经历的告诉人们。在当时那个年代，泱泱大国的七亿多中国人，除未懂事的幼儿外，可以说没有置身事外的。不管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的，只不过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观点罢了。

既然是历史，个人愚见有必要引用师东兵先生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在侯马寓所为《汪东兴传》作代序：《揭开神秘人物的面纱》中，对历史的一段论述：

从有专制统治封建王朝的时候起，某些历史就往往成为了人为的“禁区”，为历史的真实而献身者不乏其人。我认为，只要不是拿历史研究作为阴谋手段，都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所以从本质上讲，历史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全人类和整个社会，人们都有研究和探索历史的权利，都有对历史评说的资格。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歪曲和篡改历史，即使强权者能在一时的条件下强奸民意，伪造历史，但是这只能是短暂的片刻。得逞于一时和得胜于永远毕竟是两个概念。

个人认为这是对历史较为确切和公正的观点。因此，不管是“政客”还是“文豪”，不顾史实的杜撰或刀笔吏、文痞般鬼蜮伎俩的诋毁或标榜，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早在报刊上给我打下了烙印的一段精辟论语：“笔下有钱财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它使我在铁窗之内感受颇深，悟出了点“政治”的一些真谛。

但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三十来年了（中共中央对它还公开承担了责任），可各种报刊杂志、小说电影，甚至电视词典，要不对它捎带一段就绝无市场似的。同样，至今我仍不知文革“反革命”和“打、砸、抢”的内涵是什么？是否仍带有当时强权者的“派”字阴魂色彩？百思不得其解。我不再研究和探索历史，更无资质对历史进行评说。我没有涉足过高层，故对上层内幕无从谈及，更不能将道听途说拿来哗众取宠。我也不敢奢想当什么“家”，更不敢借什么社会经济来搞个“票房效应”什么的。说白了，至少我还懂得点点高尚与卑劣的真正含义。故仅仅只想将自己实实在在地走过的那段路展示出来（也许比什么了解和访谈更为真实和确切吧），以飨读者，也求点化，使之自己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而已。

历史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个人认为都有吸取的必要。正如唐朝贞观佳话中有：“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的精练之谈，也许我的《脚印》能给后来之人一点点启迪，或许还能免于一些“重蹈覆辙”，这也许不失为善举吧？！

谢英富于宜宾老宅

2000 年 6 月 5 日

一、 渊源：破四旧到红海洋

坐落在三江环绕，翠屏作帐的古城宜宾（即古时的戎州、叙府）是远古僰人的聚居地（现有僰人悬棺佐证），三国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城池。传说三国时有名的“七擒孟获”即在宜宾不远的金沙江畔。她还是云、贵、川三省物资的集散地，万里长江的第一城（即长江干流的起点）。她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也是旧时历代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难怪“清”乾隆年间有名的书法家华南顾汝修要书《西南半壁》四字于宜宾市城中心的古建筑、宏伟的大观楼上传世。

宜宾，虽说不上藏龙卧虎，人杰地灵，但确不失为历史文化名城之称。名胜古迹比比皆是：近郊有翠屏晚钟，真武山古庙群，古井流杯，丞相祠、双江映月；远郊有蜀南竹海、石海洞乡，夕佳山古民居等等。神话传说远及商周（现新修建的《哪吒行宫》甚得台湾同胞的敬仰），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中国抗日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的巾帼战将赵一曼的故乡，非一般之城镇矣。也许正是由她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在一九六七年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时，被领袖毛泽东亲自喻为“突破口”之故吧（这是被写进了中共中央文件里的事实）。宜宾虽然不大，在偌大中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是个不足为道的弹丸之地，但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风风火火经历，或许能折射出“文革”真实面的一些凤毛麟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宜宾城，天气一天比一天地热起来。人们根本没想到此时的政治气温比天气的变化更烈（即“四清运动”正接近尾声），只是人们还在朦胧之中。他们费解：何以“川剧团”的龙袍官服要在大十字（宜宾城中心）街中间焚烧？接着官家组织的“红卫兵”喊出了“破四旧”的口号。一时间，“地主”、“资本家”家中剩留下来的老古董——满铺牙床（即上等木材精雕细琢，分内外两层的大床）、龙凤图案家具、饰品等，被“红卫兵”们抄出示众。紧接着官家又一声令下，大街小巷的门面墙垣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红色。为此，商家的红油漆在那时俏到了无法再俏的地步，实在没有红油漆了，土红也滥竽充数地登上了门墙，总算是完成了“红海洋”的政治任务。因为这是政府下达的政治任务，民又何敢违抗之。但又不解其意。

不解归不解，毕竟这些都不涉及我这样的苦力们。照样生活，照常的干活，管它春夏与秋冬。这不失为当时一般人民的心境状态。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工地上听伙伴说“昨晚一夜也没睡好”。听后觉得有点愕然，干我们这种重体力劳动的人，可以说劳累一天下来沾枕就会鼾声如雷，何以会睡不着呢？问及其由，方知是外地“跑”来一些学生在“宜宾卫校”，招来不少机关干部和本地学生（即官方组织的红卫兵）们的围攻，通夜闹个不停，天亮后仍在继续。我活了近三十岁，还是头次听到这样新奇的怪事。

怪事归怪事。它影响不了我卖气力吃饭之人，听后也未深究，更不把它放在心里。第二天在工地上又听如是之说，我那伙伴到真有点抱怨了，说“天晓得搞出些啥子名堂，这些学生吃饱了没事干，跑到宜宾来闹啥子嘛？那些干部也是吃饱胀着了，和学生些闹啥子嘛？还分批轮流地去跟学生些闹（昼夜不停），吵得挨邻宅近没法睡”。伙伴们听了都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到底是个什么谜？说实话，我们班组十来个人，可大学生就有两三个，基本都是以前在学校“反右”时信口开河被逐出学府的，也有对工作安排不满来参加苦力队伍的。其中的骆纪刚是班组里喻为“小诸葛”的记分员，他说这种现象可能又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前兆，前段时期报刊上不是在文化领域里论战吗，其实这些都是上层的事，与我们平头百姓无关，何必去干着急。他曾在反右时被逐出了学校，故深谙政治斗争的一些奥秘。

要真是与我们平头百姓无关就好咯，事实却不然。

第三天的下午，坐办公室的陈业务，顶着似火的骄阳，汗流浃背地到工地上来通知班长何金才和我，晚上到队部开重要会议。当时弄得我满腹狐疑，我干吗了？踩扁了秤砣（生铁铸的砣，用来压秤杆称重量的，这里是指撞了什么祸之意，即宜宾的土语），还是撞倒了豆腐摊？因为一般情况下，除了队里开大会外，是从来没叫过一个白丁（即一般工人）跟班长同去开会的。而且看陈业务那个急像，决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再仔细想觉得也没啥，用我们苦

力的一句口头禅：我一非偷，二非抢，三没参加国民党，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好怕的，去了就知道咯（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要真是与我们平头百姓无关就好喽。第三天的下午，坐办公室的陈业务，顶着似火的骄阳，汗流浃背地到工地上来通知班长何金才和我，晚上到队部开重要会议。当时弄得我满腹狐疑，我干吗了？踩扁了秤砣（生铁铸的砣，用来压秤杆称重量的，这里是指撞了什么祸之意，即宜宾的土语），还是撞倒了豆腐摊？因为一般情况下，除了队里开大会外，是从来没叫过一个白丁（即一般工人）跟班长同去开会的。而且看陈业务那个急像，决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再仔细想觉得也没啥，用我们苦力的一句口头禅：我一非偷，二非抢，三没参加国民党，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好怕的，去了就知道喽（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队部办公室里灯光耀眼，一贯爱板着个脸的队长余志祥，坐在藤椅上带点（难得）友善的目光，注视着到会来的人。"工作组"姓陈的也坐把藤椅，用深沉的眼神在审视长木条凳（一块长木版上钉四根脚的简易凳子）上坐着的苦力。其他还有队上的几个行管人员。人到齐后，余队长首先讲话：

"今天队部和工作组召集各班的骨干分子（我的天啊，怎么我竟成了骨干了？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地这样想），到队里来开会，你们都是队里比较信得过的，所以先叫你们来开个会。目前社会上有点乱，特别是学生在制造动乱，散播一些反动言论，蛊惑人心，你们不能去听信谣言，参与学生些的胡闹，更要监督班上的人些，切忌不要介入，若有人去介入或打胡乱说，你们要立即向队部或工作组的同志报告，不能让队里的人出乱子，笼起了就不好说喔。既然队上和工作组信任你们，就先给你们交个底，打个招呼，再通过你们这些好的，去防止队里出乱子。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我相信你们能发挥作用，保证我们队里不出问题。好，我就讲这些，现在请工作组老陈给我们讲话。"工作组的老陈一脸严肃地说：

"余队长把总体情况都讲得很清楚了，我只想强调一下，大家很清楚的，我们运输队是个很复杂的群体，有管制分子，有劳教过的人，有右派，也有不少是其它单位调皮捣蛋才来当搬运的（其实他也是个搬运才被提上来当工作组成员的）。当然你们是好的，其他也有好的，总体来说是个复杂的群体。有文化的人也不少，只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刚才余队长给大家讲了目前的形势的严重性，希望你们这些骨干、班长些认真发挥作用，硬是要保住我们队不出问题，这样对大家都好嘛。这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各系统各单位都必须严防死守、环环把关，绝对不能出纰漏，宜宾不能乱。如果哪个单位出了问题，哪个单位都脱不了手，这是当前最重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工作组也是按上级布置的来要求大家，千万出不得乱子，出了问题大家都不会好过的哟"。

听了上述说教，大家心里都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难怪世人要将苦力视为低下喽。

真的是这些学生吃饱了没事干，大老远地从北京、西安、成都等地跑到宜宾来鬼胡闹？

为了完成"上峰"交待的任务，也带着点好奇，下班饭余也就上街溜达溜达。可在街上听到不少民众对围攻学生的不满之言。说：

"什么学生闹事，散播反动言论，那不就成了反革命？公安机关把他（她）们抓起来不就得了，还需要那么费事昼夜不停地轮番围攻个啥呢？"

"为什么要怕这些学生说话？是香花毒草让人家说出来不就明白了吗。"社会的舆论可真不小啊，说好说歹的都有，褒多贬少。

再说，我们单位随即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展开四大，重点是揭发问题。实际上就是叫群众互相写大字报。于是你说我眼睛瞎，我说你鼻子塌。甚至找不到什么来写了，就把平时开玩笑的话上纲上线地写成大字报，作为揭发材料贴出来，简直是一场糊里糊涂的混战。我被安排进工作组专门负责抄大字报，汇总存底。其实我也晕头转向，不知此次运动是什么性质，目的何在？要抄的又该是些什么样的内容的大字报？没头没脑昏昏然。这到底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心中一片茫然。后来听说本系统木器厂一行管人员，平时开玩笑将算盘挂在胸前说了一句"这是突出政治啰"，竟被人上纲上线受到审查，为此，他趁参加劳动之机甩脱监视投河自尽了。由此，

我更加觉得不对劲，弄不好是要整死人的呀！故凡事都敷衍着点，不能凭想象去办事，多抽点时间上街去听辩论，看希奇好了。

有组织的围攻队伍轮番的疲劳轰炸，硬是将一群南下红卫兵们赶出了宜宾城。就这样都还不放心，还专程“护送”（实际是一路的继续围攻辩论）拢自贡才罢休了的。其中最为得力的是宜宾三中红卫兵头周铁（革命烈士后裔），他是宜宾市委重点培养（接班人）的对象，这就不言而喻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由官方组派进京的“红卫兵”代表团返宜，以周铁（宜宾第三中学校的学生头）等为首的部分“红卫兵”赴京代表，竟打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惊人口号（即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分化）。周铁、陈良柱（宜宾第一中学学生头）焦健康（宜宾第一中学学生头）曾加兴、丁代君（宜宾农校学生头）及兰世全、周叙生等（都是中学的学生头）自发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式诞生。他（她）们冲上了大街，进入到人群中宣传演讲，一时间贴大字报的、公开辩论的比比皆是，特别是市中心的“大观楼”一带，是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古城宜宾，一下子就沸腾起来。

看了大字报，听了无数的辩论，从中我才明白了这是共产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关心国家大事而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党内的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南下红卫兵就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的急先锋，他（她）们来宜宾是煽风点火，为发动群众来的，不是反动，更非闹事。那么，宜宾官方的某些作为是对还是错，这不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了吗？

看多了，听多了，特别是学生们有根有据的讲出毛泽东主席都亲自写大字报，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看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准是错不了的事啰。（也许这就是“信仰”激化吧）

尤在我印象中最深的莫过于杨泽彬（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李锦凡（四川大学学生）对我的一些谈话：“你也是学过下历史的，纵观史册，历朝历代都是官反民，你见过执政者发动过民反官的史实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伟大又史无前例，就在于共产党中央、党的领袖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来搞这场运动”；“这是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场政治运动，为了反修防修和国家不变颜色，毛主席就敢于发动全国人民来搞这场运动，真是伟大之极，这不仅是种创举，它的意义和影响深远得很”；“一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工人、农民、乃至全国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真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人民能允许吗”？

人非草木，特别是当时，我正值血气方刚年岁之际，能没有触动和无动于衷吗？！于是我也就逐步地介入了进去。开初是帮学生们贴大字报，写大字报，编写批判文稿等，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旋涡”。

二、 潮流：炮轰省、地、市委

宜宾市区地图

在众多同观点的人中，由刘友源（国防工业七九九厂工人）、黄海浪（宜宾市铸造厂工人）等提头，我们组织成立了宜宾地区第一个工人群众自发组织的“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八八是取义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而命名的），与宜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和外地赴宜宾红卫兵联络站并肩战斗了（地址在市中心的“京剧院”即大观楼一侧）。紧接着，地、市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最先是“反修造反队”，一开始有地专机关的群众王世民、徐克明、徐明伟等，还有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李朴等为头的干部组成。地、市政法系统的刘传和、刘跃鋇、田光辉、曾祥和等也组成了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

各厂矿工人，最早的是七九九厂的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组织的“井岗山造反兵团”，宜宾造纸厂的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人组织的“铁臂战斗团”等。

农村农民，最早的有黄桷坪公社的全国劳动模范赵树恆、吴绪彬；附城公社的曹海清、曹治国；前进公社的雷从金；旧州公社的周仿之；古叙公社的王社长等，组成了农民造反组织。

这些，也许就是学生们来宜宾讲的：“国家改变了颜色，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涉及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故很能鼓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激情吧。他们（也包括我）坚信党中央的号召错不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尤其是地、市委的后院起火，如原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文革前期很受器重，曾是上京抓刘张的“抓人团”主要成员。人没抓回反倒起来造反了。党政机关揭露当权派腐化堕落、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问题，更激起造反浪潮的高潮。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八八团”也很快就发展到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不仅遍及宜宾的各行各业，甚至凉山州的雷波森工局林业工人，云南省盐津县的航运工人，均请求加入我团，成立了下属造反组织。宜宾的属县也纷纷行动了起来，全面拉开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县委”的局面。当时，因官办群众组织的经费是由官方直接承担，而自发的群众组织就没经费来源，买红布做战旗袖章、买纸笔写大字报等都得要钱去买，没得经费来源难以开展活动。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曾加兴为使官方承认群众（包括学生）自发组织和争取活动经费，在宜宾市委大门口进行了绝食斗争。在得到相当多数的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最后取得了胜利，真正打开了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面。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年底在杨泽彬、李锦凡、张大卫（北京化纤学院学生）、陈良柱、刘友、王景海等人的倡议下，宜宾的工、农、商、学、干各大群众组织头头们共商，宜宾造反派进行首次大联合，组成了“宜宾方面军”，其它县、市也组成了县市级的“司令部”参加。至此，宜宾地区的思想派和自发组成的主义派的区分就更加明朗（其实思想派的也组成了“宜宾红色总部”，故宜宾人称“红色派”，对主义派称为“红旗派”）。

说实话，当时加入造反组织也是比较严肃的，每个人都是要经过审查的，政治面貌基本清楚的人方能批准加入（如我参加造反派时，就有人攻击说我是伪保长的儿子，经调查证实我系谢家抱[收]养的，养父曾任过伪保长，但没作过孽，只是挂了个保长名，解放后没受过任何处罚，连传讯都没传讯过他，于 1956 年病逝，故没对我造成影响）。各组织均有专人管组织方面的工作。如当时在宜宾修建宜珙铁路的“四一五筑路总队”，其下属二十来个队，要求加入我们八八团的人很多，我们就坚持只吸收了十八县市“民工队”的部分人，成立了“宜宾八八团川铁分团”。后由张正源、刘某某等为首组成“川铁兵团”参加了方面军（因为“川铁”人太多了，我团搞组织的审查不赢，更怕稍有不慎会成为对立派攻击的把柄，故只好如此慎之又慎，宁少勿杂）。对另一些要求加入八八团的民工队的人，则劝他们除开原“4.15”劳动教养总队教育好后转为工人的“转工”，自行组织团体参加“方面军”。排斥“转工”，在现在来说，也许是形“左”实右形式的表现，因为，既然是教育好了并取得工人资格了，就应该有权参与四大，介入政治，他们也是有政治权力的啊！

正当此时，“四一五”筑路总队抛出了“转工暴动”的吓人新闻，一时间搞得宜宾城内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暴动”二字对过了十多年平静生活的宜宾人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其惊恐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宜宾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第一大事件。我受方面军勤务组和八八团勤务组的委派，去调查该事件。说心里话，当时决定我去调查还是很害怕的。“暴动”的实质含义就不善哉，弄不好就会有性命之忧。可是造反誓言就有“誓死”之词，我还身为一个勤务员，决不能被别人看笑话，认为我是一个胆小怕死鬼，故而接受了这重大托付。

我首先到江北“宜珙铁路总指挥部”，找到总指挥长邓自力（原宜宾地委书记，后面将提到的“三套马车”中“邓、崔、陈”的邓就是指邓自力）。他对我说：

“转工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转工暴动’的事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不甚了解，要问‘四一五’筑路总队的

总队长钱志均、李登茂才清楚详情。”

于是我找到钱志均总队长，他说：

“接到下面工区的报告，确有转工暴动。”

我听后首先亮出方面军的委派，然后提出请他和我前往暴动现场调查了解事实真相。他无法推脱和拒绝前往，只好带上警卫员和秘书坐上他的小车与我一同前往月江工区。

在一个山沟里，我见到不少带我团袖章的“战士”（当时的称呼），包围着一个很大的工棚，里面有很多人在有序地学（读）毛主席语录，全然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和动乱迹象。于是我当着钱总队长问我们分团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听到纵队通知，叫我们来协助干警镇压转工暴动，我们分团立即决定先调月江工区附近的支队好几百人来，围了大半天没看到发生任何事，晓得搞的啥子鬼哟？”

我问钱总队长，此事作何解释？

在铁的事实面前，钱志均总队长很难为情的样子，沉默良久最后只好说：“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我们没搞清楚，可能是公安工作长期养成了敏感的习惯吧。”

“下面汇报有误与否，不足为道，但你们作为总队领导，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对下级的报告不作核实，不加分析就向外公布转工暴动，闹得满城风雨。你们将如何向宜宾人民作个交代？就凭简单的一句汇报有误或敏感习惯能够了结得了吗？”我驳他说。

僵持了好一会，他说他很累了，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一下（因时系夜间了），并交代他的秘书安排一下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他是想缓冲一下好找对策来打发我，谁知道他竟然趁着黑夜悄悄的溜之大吉，此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么一件轰动全宜宾城的大事，仅凭一句“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能解释得了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罢。尤其是政法部门对“暴动”二字的孰重孰轻会不懂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岂不发人深省么？

这个时候，学生曾加兴在宜宾市委大门口几日的绝食斗争，直到市委圆满答复解决，自发的群众组织得到合法地位和对待，并由市委“文革接待站”发给活动经费，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大街小巷、机关单位都在写贴大字报，大辩论更是如火如荼，人们真像发了疯、着了魔似的，不分白天黑夜，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干“革命”。困了最多在长椅或地板上垫上几张报纸睡睡，简直是在全力以赴。有的大辩论竟然会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甚至激烈异常，由此可见这个运动的深入和普及程度，实属前所未闻之奇事。

接着扩大化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基层将当权者不分青红皂白都进行揪斗，特别是有一个较大点的群众组织，竟然将最基层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弄到市灯光球场进行批斗（这一或许是受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方面军发现了苗头不对，勤务组立即学习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等文件和资料，即使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蔓延和扩大，又集中精力批判地、市委的路线问题。

解决扩大化的问题，既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又要制止往夸大化的蔓延，确实是较难的，但我们终归还是做到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扩大化的问题刚解决，马上又刮起了“经济风”。它像消防车那样起到了“灭火”作用。这股风来自哪里，要达到什么目的？几乎全国都一样地在刮此风，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迷。“经济风”一刮，热火朝天的运动一下子就冷了下来（惟学生方面不受影响）。方面军勤务组立即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来开会，学习上海狠

刹经济风的材料和批判文章，统一认识，及时揭露和批判经济主义妖风，扭转了斗争大方向，使运动又能正常发展。据传，仅此一风给国家和各单位、厂矿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相当大的一笔数。

接着是红卫兵寇代铭（宜一中学生头）、周叙生（宜四中学生头）等小将（这是当时对学生们的一种尊称），首先在宜宾揭出了“刘、张、王、郭”的十三个案件之翻案与反翻案的实质性问题，开始了宜宾“三套马车”的大论战，即：“邓、崔、陈”；“刘、张、王、郭”；“牟、沈、贾”三套宜宾地区领导班子在路线问题上的斗争。由此也可见宜宾问题之复杂。

由于是史无前例，也正如有些文豪形容为“旷古未有”，也难免会有冒进或幼稚的毛病出现。如在长宁县的第一次批判原县委书记庞爱民。批判会是由泸州市京剧团的造反派“鲁讯战斗团”和宜宾地市文工团的造反派（勤务员是查成林、唐菊动）及长宁县本地的造反派联合召开的。他们把我作为方面军代表邀进主席团（因我团母某某擅自到长宁乱表态，一会说他是代表“八八团”，一会又说他是代表“方面军”的，使得长宁县闹得乱麻麻了，故我们组织及“方面军”委派我到长宁调查处理此事而去长宁县的）。事先泸州市（原隶属宜宾地区的一个市）“鲁战团”的勤务员沈君怀跟我说：

“会战一开始就宣布：将在长宁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走资派庞爱民揪上台来，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脚，让走资派们永世不得翻身。会议就正式开始，先由本地造反派头头唐世斌（长宁县邮电局职工）揭发庞爱民在长宁县是如何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实，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批判。”我也是此次到长宁才认识了唐世斌的。

当时，我认为沈君怀说的开头那段话，只不过是历次批判会上惯用的一句口号性质的套话，根本没去深究，所以对那段时髦的开场白无异议。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一开始，主持人刚说完上述开场白后，真的两名臂带“鲁战团”袖章的泸州人，一左一右地将庞爱民“揪”上了台，接着就像戏台上演戏亮相那样，一招一式都做得正儿八经的，将庞爱民“打翻”（推）在地上（即木板搭的台子地面上），而且真的就要踏上一只脚了。这一举动简直把我惊呆了，弄得我当时哭笑不得。当时唐世斌也被搞懵了，其他人更是莫名其妙，又不敢公开制止。我只好用眼神和手势来暗示鲁战团的头头，不能这样做。由老沈出面及时纠正了这演戏一样的错误作法。

又如：当时方面军为了避免两个组织同时安排批判一个当权派时会发生矛盾，就将冯振武、王建民、王志敏、梁尔吉等几个地、市当权派“控制”在我们八八团，即宜宾市东街原宜宾县联社，当时我们八八团的总团部所在地。其他的地区主要当权派就由方面军直接“控制”在宜宾专员公署内。哪个组织要批判谁，都得在方面军批条子才行。而宜宾市小教（即小学教师们）造反组织，经方面军批条来我团要王志敏去接受批判，由于王志敏（宜宾市委分管文卫的书记）的脚肿了，我和刘友源等考虑到王的这个实际情况，向小教造反派说明了原由，让王志敏休息，暂不接受批判（并非王本人要求）。小教会场都布置好了来没要到人，于是要造我们的反，说我们是在保走资派，当时搞得我们很恼火。要不是我一再劝住刘友源，当时就会干起仗来。事后方面军的王景海、杨择彬他们才说：

“你们八八团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王志敏因病不能接受批判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多注重政策”。或许这就叫不明朗的道歉了吧。

老实说，当时的头头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动辄就造反是造反派的个性。当头头稍不注意或检点点，就会被造反的，甚至被拉下来（当不了头头之意）。如我们总团有个头头（总团勤务组的一二号头头）就因为较长时间私自使用了冯振武（冯振武当时是“控制”在我团的原地委书记之一，因病住院，该头头也随之到医院守护）的高级半导体收音机（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刚问世不久，确实稀罕，比现在的大彩电都还金贵，特别是高级的半导体，实在是那个年代很希有之物），他被造了反，说他是被走资派收买拉拢了。为此，他被舆论压力无形地拉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搞得我们八八团都有点很难堪，团内团外影响都大。现在返回头来看看这个问题，有内因，更有外因在起作用，但要说被收买拉拢了，未免是言重了。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份，正当运动进入高潮之际，突然宜宾城内谣传四起。什么“飞机要来宜宾撒传单”了（这种情况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有过的现象），“方面军要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了”，“军队和公安机关要联合出动抓造反派

的人了”等等。一时间宜宾简直被笼罩在极度紧张和恐怖之中。人们不甘心，更不服气。为什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会成反革命？党仍然是共产党，怎么会出尔反尔了呢？这岂不是在愚弄人民么？要说是个人迷信那也在所难免，但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是中央政治局作的决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的，能说是老百姓在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确实是当时参与造反之人的一个活思想。进而人们想到了会不会是走资派们的又一个阴谋？这是当时街头巷尾，人们争论最激烈的一个主要话题。

人们被搞懵了，像热锅上的蚂蚁，全城都乱哄哄的，都在谋求对策。我们八八团几个头头研究，为应对这种突发事变，由我夜渡到白沙湾，到七九九厂的“井冈山”兵团，请他们进城声援（当时宜宾的长短航运基本上都是参加我们八八团的人，故调用轮船渡江是不成问题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一时许，一艘轮渡船送我到白沙湾码头。我到七九九厂“井冈山”总部，找到了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当时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他们说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军警还没动手，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若真开始抓人了，他们会组织进城声援的。天亮后我回到城里，这时气氛更加紧张，特别是民主路人民电影院一带，人头攒动，混乱不堪。我好不容易找到刘友源他们，我们几人站在街边上研究该怎么办？我说：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我建议刘友源带上傅文琪（原宜宾市木运社工人，我团搞宣传的笔杆子之一）到北京找党中央和毛主席问个明白。”刘友源则坚持要我带上傅文琪去北京，而且还得赶紧动身，晚了怕宜宾都出不去了，就算能走出宜宾，路上也会有哨卡拦截。时间紧迫，不容我们过于的争执。最终决定后，我作了些简要的安排就同傅文琪渡江到了上纸厂。通过纸厂造反派头头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的帮助，乘上纸厂的小吉普车，准备赶到成都后再换乘火车进京。

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我们的车刚拢自贡地界就被扣住了，因为自贡市已听到了宜宾传去的抓人消息。等扣我们的人带我们到了自贡市供电局后，经过简单对话，方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扣我们的人是自贡市造反派“红色电工兵团”的人。他们设卡是为了防止宜宾的抓人问题波及到自贡。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没察觉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绝非宜宾一地之事。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上京告状的后，考虑到其他地方也可能设卡拦截，火车站也会被控制，难以到达北京，经他们周密研究，慎密安排下，我们才顺利地登上了进京的列车，离开了四川。

三、 转折：首次入狱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

天冷心更凉。经过两天两夜多的车厢生活，我们怀着极度的伤感，踏进了全国人民敬仰和向往的首都——北京。

凄凄的北风、纷飞的雪花，再加上泼面的灰尘，对南方来的“客人”更增添了份心酸。尽管离开了才三日，可家乡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了、几十万“战友”能否平安？心情万分沉重。何以听共产党的话，反到落得个“反革命”的罪名？真的能是党中央作的这种抉择？北京之行责任重大啊！我们没有找地方落脚，就直奔打听到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此时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巴不得尽早尽快地将宜宾的一切向党的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清楚，求得正确的解脱）。

由于初次进京，人地生疏不熟悉，加上囊中羞涩，我们只好徒步从火车站向长安街寻进。幸好中央文革接待站就靠近宏伟的天安门，我们比较顺利地找到了。进得门去，里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人人面带愁容，好象霜打了的茄子，到处都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即“二月镇反”（即后被通称的“二月逆流”）。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是老天的捉弄还是人为的强奸？全国各地都是如此，突然之间产生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反革命”，简直不可思议，这岂不成了个“反革命”王国了么？无怪乎全国会有那么多的人上京告状了。

接待站内划分了若干个区域，我们找到了西南片区接待室。一男一女接待员接待我们。当我们向他（她）们汇报完宜宾的情况后，提出了“镇反是不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算不算是反革命”。接待员收了我们写的汇报材料后（即在进京的火车上赶写出来的宜宾文革概况），很圆滑地答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地向中央首长汇报，是不是反革命你们自己最清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遗漏的你们最好写成材料给我们送来，我们才好及时上报。”

出了文革接待站，沉重的心情没有一点松弛的感觉。是我们没把问题谈透彻，还是表达得不够清楚？文革接待员的话是否有所暗示？一连串的问号搞得我们头昏脑胀，老在天安门、长安街打转也不是办法，得找个地方住下来思考思考再说。

北京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寒风刺骨，冻得我们俩人直打哆嗦（我们哪曾经受过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衣服也只是南方御寒的着装，我看傅文琪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又冷又饿，这才想起大半天没吃过一点东西了（本来身上的钱就少得可怜）。好不容易才在偏街小巷（北京人叫的胡同）找到一个卖吃的小酒馆（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为了御寒，只好要了二两烧酒（北方人叫的“二锅头”），四个熟鸡蛋来增加点热能，提高下体温。胡乱地吃完，因有自贡供电局造反派开出的证明，我们趁势找到了水电部接待站住了下来。一床芦席，一张粗线毯，水泥地板为床，算是有了个安身之地。好在大屋子里有暖气，到是不觉得冷，只是一、二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又不通气（为保暖，窗户都是关严实了的），有股很难闻的气味，几次差点把我给熏吐了。由于是免费住宿，再难闻的气味也只好克服了。正由于经济的缘故，我们在京期间肚子饿了也只能吃烧饼（北京人叫“火烧”的饼子）、咸菜度日（其实水电部机关食堂里啥好吃的都有，只要有钱就能买来吃的）。我们整天几乎都是在地铺上不停地写材料，根本就管不了吃好吃歹喽。

一天从中央文革接待站出来，在天安门观礼台下碰到宜宾去的一群学生和几个水电安装队的工人，他们说宜宾抓人抓得很凶，不仅是头头挨抓，就是一般群众被认为是“造”得凶的人都被抓，到处都关不下了，就连军分区里都关起了人（因为我们上京后，总团部、分团部甚至支队部统统都被砸了，所以音讯不通，我们就完全与家乡失去了联系）。听后我们心情更加沉重，到底我们错得好凶啊？！我们一群人席地而坐，谈论宜宾的问题。其中有学生说宜宾造反派就是因为介入了“刘、张”的问题（即刘吉挺、张西挺等原地、市委领导干部，前面所提到的“三套马车”中的刘、张、王、郭也），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中还有人提出干脆找一些在京的宜宾人，将刘、张他们抓回宜宾交差，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时我才知刘、张等人在北京。我听后，尽管之前我们根本还没接触过刘、张他们，但还是认为学生的这种思维和想法是错误的。于是我发表个人看法，说：

“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宜宾一个地方在抓所谓的反革命，而是全国范围都在统一行动，难道刘、张他们能牵涉影响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看其中定有很深的奥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天真了。”

我讲完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后，他们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分析得符合现实，也就不再有此想法了。人群散后，宜一中认识我的学生问我想不想见一下刘、张？我认为见一下也好，不然为刘、张他们的斗争事劳神费力一场，他们像什么个样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于是就随宜一中学生到刘、张住的地方去见他们。

在商业部招待所一个简单而又不够宽敞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刘、张俩夫妇及他们的一些同志。宜一中红卫兵向他（她）们介绍说：

“他们俩是宜宾八八团勤务组的，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大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方面军的发起者之一。他俩也是来北京告状的，顺便来看看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特别是所谓镇反问题。”

刘、张他们听后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并作自我介绍（原来我认为他们肯定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头，见了面才知没有一个肥头大耳大肚皮的，特别惊奇的是张西挺还是个女同胞，她和刘吉挺还是俩夫妇呢）。

刘、张他们问宜宾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如实地将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概况作了介绍，同时谈了宜宾造反派很重视他们那十三个案件的实质含义。这时丁祖涵（原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对我们讲：

“刘、张的问题中央都知道了，也很关心，‘镇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需要的是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地方的情况，最后是书面报告。现在更需要在宜宾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用行动证明宜宾造反派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不是什么反革命。”

田禾（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对我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指刘、张等）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宜宾派到北京来抓刘、张的公安潘光西、温国良、赵瑞同三人，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奉中央之命抓起来了，刘、张也见过了他们三人（是中央文革安排的见面），你们可想而知宜宾问题之复杂、尖锐了。”

其实刘、张的问题早在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主席就在亲自过问了，并称他们俩为“革命夫妇”，由此不难看清刘、张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师东兵先生的《秦城冷月》对此节也有描述。

我们听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兴奋，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曙光，起码知道中央在关注着宜宾和全国的“镇反”问题了。同时我们在北京也听到了北京广播的某地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个造反派，为“救火”（大概是说他在进京告状的途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编者在结尾作了句反问：“能有这样为了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而奋不顾身的反革命吗？！”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应该尽快返回宜宾，告诉宜宾的同志们北京的这些情况，让“战友们”也吃颗定心丸。

回到住地我告诉傅文琪，我们该回宜宾了。走前我们得做两件事：一是给党中央、毛主席致信；二是再走访一次中央文革接待站。傅文琪觉得可以。于是我们就动笔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阐明宜宾造反派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人民群众，我们一定会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决不反对革命，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最后落款，不知傅文琪基于什么原因他不落名，故只好落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认为无所谓，大不了我一人对此信承担责任好了）。

第二天我们将信寄出后，再次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主要是想去探探口风。接待员仍然是那些套话和安慰（他们好象只会说这些套话样），“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只要不是在反对革命，就什么都不用怕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我和傅文琪离开北京返宜，准备将在京城的见闻如实传达给宜宾的战友们。因听说宜宾逃出来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走重庆这条线路，经商议，在内江我和傅文琪分开成两路拦阻上京告状的人，我就到重庆方向看一看，并说好晚几天我就能回到宜宾。在重庆没见到什么宜宾跑出来的同志，在壁山县我曾打电话给我爱人，了解到宜宾的情势很乱，仍在继续抓人，造反组织全被砸烂了，于是我决定立马乘火车回宜宾再说。

到宜宾火车站，我刚下车到站出口处，就被对立派宜红总的“政治兵团”的王明（是对立派政法系统的一个头目）“接”住了。他们好象事先知道我的行踪似的。他叫另一个公安将我押送到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裴家福亲自审讯我一通后，就将我关在公安局楼上的屋子里。一间小小的屋子，大约十平方米左右，关了有十来个人，几间屋子都关得满满的，还有女同胞，可外面还在继续抓人。公安局楼上实在关不下了，他们就将公安局对面的一个幼儿园（征用）腾出来关人。我们几十个“反革命”也“乔迁”了过去。听同囚一室的常玉友（宜三中学生）、陈云贵（市川剧团造反群众）他们说：宜宾被抓的人多得很，不仅是头头才抓，只要他们认为“跳得凶”的造反派（指参加造反派的一般群众）照样被抓来关起，到处都关满了人，就连军分区内都关了很多人。军分区里关押军外人士，恐怕确实是“旷古未见”过的稀奇怪事了。

我虽然到过北京，可是有些问题还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中央都不怎么统一？这个镇反到底是什么企图？为什么一下子全国竟派生出了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多反革命，反了什么革命？等等，等等。越想越觉得这里面的文章太深奥了，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干脆就不去想深沉很了，就听天由命罢，反正自己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言和行，怕它个啥，抓紧时机买些肉食来吃补补身子。因被关押，吃的就肯定是牢饭咯喽，牢饭吗肯定是极差的，全是素食，比在北京的生活差不了多少，但因这里又不完全像正规的监狱，只要自己身上有钱，每天中午都可以叫姓叶的干事（公安）帮买点肉食来吃（即中午公安伙食团没卖完的肉类食物），将这个多月的斋戒（指在京期间的艰苦生活）损失补起（好在同室的难友帮我垫些钱来买）。平时就与同窗们谈论宜宾和北京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听到抓刘、张的公安在北京反被扣押之事后，大家的心情都有所好转，总觉得有希望的一天。也好在那时关押的全部是我们这种"反革命"，所以随便怎么谈都无妨碍，甚至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都不会受到制止和干涉，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读书声、朗诵声此起彼伏，真有点学校（幼儿园）气氛，这个临时监狱竟成了特殊反革命"闲庭信步"的特殊场所。

在被公安局关押期间，我也思考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运动太高深莫测了。我一个工人能懂得什么政治斗争？故而想：只要这次能平安释放出去，当个好好工人算了，管他什么政治运动都不要参加，照顾管好自己的婆娘女儿才是正事，政治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一九六七年（大约）四月的一天上午，突然一个公安和一个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到我的囚室来，叫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来。当时全囚室的人都在议论（包括邻室的）、猜测，他们都认为我"升级"了，故要把我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单独关押，所以他们都给我打气（包括其它几个囚室被关押的人），叫我不用怕，并用毛主席语录上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为我告别送行。

出了幼儿园"监狱"，解放军竟将我押解到隔壁的军分区内去。当时我想同室的战友们估计对了，真的弄我来开单份了。因那时最大、最重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弄到军分区单独关押，专人看守的。到一花园旁他叫我站好，随即向我宣布：

"谢英富，今天提你出来，是要押你到北京去与反革命刘、张一伙对质，只要你去表现得好，我们就既往不咎，若表现得不好，回来你就会晓得是什么样的后果了。"听了这软中带硬威胁的警告训话，我觉得太矛盾了。刘、张是宜宾的，要对质也只能是在宜宾，何以要跑那么远到北京去对质呢？我以前根本不认识刘、张他们一伙的任何人，除进京告状在北京的那次见面，我与他们素无往来，要我去同他们对质什么？更何况他们早已通天了。不然宜宾到北京抓刘、张他们的公安会被公安部的扣押起来？真是笑话。当时我还怀疑是不是要弄我到哪个偏僻的地方去黑办？殊不知那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又押来一个瘦弱矮小的中年人，后来才知他是市级机关造反的干部，要说，他原来还是官方最早组织赴京抓刘、张的"抓人团"几十人中的一员，没抓回刘、张，返宜后反而起来造反才当了"反革命"的。这个中年人被叫站在花园的另一边，同样被训话（训话内容也许和我的相似）。最后又带来两个小女孩，当时我非常惊奇，难道这样小的娃娃都成了"反革命"？也被抓来关的？后来才知一个是刘吉挺的女儿叫刘明莎，另一个是李良的女儿叫李梅。李良是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即中共中央〈平反通知〉上刘、张、王、郭、李等的最后一个。别小看这两个小女孩小小年纪，她俩再加上李良的儿子李琪，早就是刘、张他们得力的联络、通讯员了，这样十来岁的娃娃早早地就卷入进了党内路线斗争，这在解放前不稀罕，而在解放后就实属罕见了。这俩女孩来到后，军分区司令部大楼出来一个军官，叫与我们训话的那个解放军：

"张汇燕！准备好了没有？"

"一切准备完毕"张赶紧将武装带和手枪整理了一下后立正回答。

这时开来了一部小吉普车，那军官说："把他们带上车立即出发"。

"是"张汇燕立正敬礼同时答道。

一路飞驰，天黑后才赶到成都军区，车在军区政治部楼前停下，楼里出来一个很像大官的人（这肯定是进门时，门岗就电话通报了），名张汇燕的解放军赶紧下车跑上前敬礼报告。

“报告某主任，奉命将谢英富、高玉文押到！”那位主任听后愣了他一眼，上前几步伸出手来推我和高玉文，并同时说：

“谢英富同志……你们受苦了。”哇！多么亲切和振奋的称呼啊。说实话，听了这样亲热的称呼，当时我感动得无法来形容那时刻的心境，我眼眶里的泪水在飞速地流转，差点就要迸发出来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好在我年青没有昏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顿丰盛的美餐后，我和高玉文被安排到政治部楼上的小会议室里休息。那俩小女孩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新华社记者王焕斗（新华社驻成都记者站的，后调驻西安记者站，所著《贞官佳话》颇受人们好评）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晚报的几名记者到来，寂静的小会议室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特别是记者们相互的询问，说笑）。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身着帽徽领章军服的人，一脸茫然地看着会议室里众多陌生的面孔发呆。那个主任接待完记者后，转身才对那个不很像军人的人说：

“诸平同志，你受委屈了。来，这是你的帽徽领章，针线也给你拿来了，你就自己把它钉上吧，”

诸平接过帽徽领章，双手发抖，两行热泪直流个不停，那种感动场面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真情流露啊。原来，他是成都市军分区的一名干部，也是“二月镇反”中被抓了的“反革命”。上述的几名记者同样是这种“反革命”，都是从关押地放出来的。等诸平把帽徽领章钉好后，那个主任才对我们说：

“大家受委屈了，也受苦了。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派了专机来接你们到北京去参加会议，明天早晨动身，今天晚上就要安排你们在军区招待所休息，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大家听了这番话就特别兴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差点就要大声欢呼喽。只有新华社的记者王焕斗，一副学者沉稳庄重的风度，安详地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好象是在思考着什么似的。

到了招待所住地，我被安排与王焕斗记者住一个房间，他问我一些宜宾的情况后，关照我要好好地休息，不然明天坐飞机会受不了。此时，与我们同来成都的那两个小姑娘来找我，说成都军区那个当官的叫她去问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她们回答“不清楚”，于是那当官的就叫她们明天仍坐宜宾军分区的汽车回去，其它什么也没给她们说了。我听后被搞懵了，为啥从宜宾把她们弄来，就只问了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一事后就叫她们回宜宾去，其它啥都没说？我看其中另有文章。于是我就把成都军区政治部楼上开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她们，重点讲了是党中央、周总理派飞机到成都来接我们上北京的。因那时郭林川和李良均在宜宾辗转躲藏和坚持斗争，官方找不到他们是实，但他们的子女肯定是知道他们的行踪的，只是不愿告诉官方罢了，故我要重点讲述中央派飞机来接的情况。我讲了明天早晨就要直飞北京的事，她们听后很着急，要我想办法让她们去北京。可我能想什么办法呢？刚获得自由的我，身上要钱无钱，要粮无粮（因那时的粮食是计划供应的，在外吃饭都得有粮票才能买得到主食），拿什么资助她们进京呢？那个政治部主任现在哪里？我也根本无法去找，更何况军区叫她们明天仍回宜宾，她们正好把这个重要消息传回去，正是个难得的机会呀！故我好言安慰，劝她们还是回宜宾为好，及时将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带回宜宾（肯定她们会首先告诉郭林川和李良），告诉宜宾的战友们，等待我们进京后的更好消息。她们被我说服了。

回忆这十多个小时来的特大变化，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无法入睡。一个人碰到这样重大的转折，从地狱走向人间，能不愉悦、兴奋？特别是想起我在汽车走过轮渡时我偷写的那张极其含糊的报讯字条（即：我已被军方押解从北门渡江、不知何往。），是否会被我掷向的那个船工拾起传送出去？现在有两个小姑娘回去面诉了，比我那张字条更清楚，更起作用，也不担心那船工会不会传递消息了。……大脑的运转还在继续，迷迷糊糊中“起床了，起床了，抓紧时间准备，汽车都来接了。”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我们都是些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特殊旅客”，除了毛巾、牙刷之类，均无什么行李物品可收拾的。

飞机穿越云层，飞过秦岭，越过黄河，专门载着我们这十几个特殊的“反革命”抵达了首都北京。这回没有人陪同，更没有武装押解。在机场早有国务院派的汽车停在停机坪旁等候了，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西苑宾馆”，我们受到了先期到达北京和原在京的战友们的欢迎，郭一民（原宜宾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农行行长，后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安排我们住处后，随即见到了刘吉挺、张西挺等干部，其中田禾（原宜宾地委中层干部）向我们介绍说：

“这次是周总理亲自点名叫派专机接你们来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我们（指刘、张等干部）与李井泉长期不懈的斗争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期）上已讲清楚了。并谈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前期的情势。”这时我才知道中央早就通知了宜宾当局，要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是宜宾当局把我关起反说不知我在哪里，后在一次会议上总理问：有个宜宾八八工人造反团叫谢英富的怎么没来？宜宾在京的当权者说没找到我。这时康生插话说：

“你们军管了吗，怎么会找不到？去查吗。”这样宜宾当局和成都军区才叫把我和高玉文从囚牢里提出来让进京的。

田禾最后讲：“现在中央要进一步了解的就是四川以及宜宾文化大革命和二月逆流的情况了（这时“二月镇反”才正式改称“二月逆流”了），所以要你们来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你们要作好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准备，要抓住重点和突出的问题，详细地汇报清楚。”

吃过午饭大家都在休息，先期到的同志把他们参加前期开会的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整个的会议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进行的）。从而知道了党中央肯定刘、王、张、郭等人是受李井泉他们迫害的、坚持原则的好干部，他们不懈的斗争精神中央很欣赏，并予以了肯定。还说“二月镇反”肯定是错的，违背了党中央的精神，实际是在阻挠文化大革命。

我们谈得正起劲，突然听见过道里闹哄哄的，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房门一看，人头攒动，雀跃非凡，欢声笑语不断。一问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今下午中央首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特别高兴，真没想到一拢北京中央首长们就要接见，真是太荣幸，也太意外了。

中央来车把我们接到了全国人民无不向往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登上这宏伟、庄严的重地，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比的紧张和激动，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和描述的。在一个宽敞富丽的会议厅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除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外）基本上都来了，一二十个中央领导人坐了一长排。我又很幸运地正对着周恩来总理坐。全厅人坐好后会议开始了。当周总理问及四川“二月镇反”问题时，我站起来汇报说：

“二月十九日，一架小飞机到宜宾上空撒传单，同时地面就开始大肆抓人，他们根本不把造反派当人看，打翻在地就捆，有的还用脚踩着人来捆，甚至有的绳子扯断一根又换一根来重新捆，比对有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还凶，同我一道来的高玉文同志的双手就是被他们捆烂了的。”（我用手指向高玉文，他也马上站起来卷起两只袖子，露出了道道被绳子捆烂的伤痕之双手，周总理看了表情都很气愤。）说到这里想起我们不幸的遭遇，我已泣不成声了。周总理急忙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慢慢地说。听到周总理如此爱抚而关切的话语，我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了，要想讲述的话全被卡在了喉咙里，实在无法再说出话来了。总理又慈祥地安慰我后，问撒传单的飞机是谁派的？韦杰、甘渭汉（成都军区的最高领导者）同时站起来，支支呜呜地回答，康生见他们含糊其辞的样子就发火了，在桌子上一拍说：

“到底是谁派出的（指飞机）都不好说吗？”

韦杰、甘渭汉两人楞了半天才说：“是林副主席叫派的。”话音刚落，坐在江青侧面的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要员），嗖的一下从坐椅上站起来，将椅背上的军大衣一甩披在身上，眉宇见一股煞气伴着军人威严的神色，转身快步走出了会议厅背后的小门，会议仍然继续。不一会叶群返回来坐下，两眼紧盯着韦杰和甘渭汉说：

“刚才我打了电话给林副主席，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派飞机这件事……”说完她仍怒目望着韦杰、甘渭汉。他俩望着叶群那冷峻的目光（也许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会议开了约两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追查“二月镇反”在四川各地的情况，也询问一些文化大革命在四川各地的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从总体来说，党中央是很支持刘、张、王、郭等革命干部（即原宜宾地委书记刘吉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郭林川，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李良等），支持四川的造反派，态度是很鲜明的。尤其是周总理强调说：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态度，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另次会议上，周总理小声地同刘吉挺夫妇谈了几句什么话后，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纸交给他的秘书周家鼎说：“把中央给刘、张他们的平反通知立即印发下去”一事，也可说明当时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了。

不由我回首往事：说真的，我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大多是受学生些影响和广播里的宣传，总体地说都有点道听途说之嫌，故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也只能说是出于布尔什维克信仰的忠诚表现，也有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知半解的成分。当“二一九”事件发生后（即“二月镇反”的另一个称谓），在囹圄中我曾暗地里发誓，只要洗清了这个“反革命”罪名出去，管它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了。三套马车也好，两套马车也罢，我哪都不管了。虽然我生性就有点什么都不怕的脾气，但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妻室儿女和从岁多把我养大的母亲想想，一个小老百姓管它什么国家大事不国家大事的做什么，还不是照样做工吃饭，上层的斗争是复杂而又多变的，时事难料啊。古人云“穷莫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从我的实践中，总是会看到那么点“有权就是真理”的阴影，我确实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于是想象鲁讯先生杂文中说的那样“破帽遮沿过闹市，管它冬夏与春秋”好喽。基本上可以说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之心冷了，死了。可是，参加了中央为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听了那么多中央要员一级的（出面）讲话，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鲜明态度，加之我一个小老百姓能被国务院派专机接到北京，更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地谈论国家大事等等，再次唤醒了我这个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信徒的赤诚之心，所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陷”得更深，更加卖命了。这些的的确确就是当时我的活思想，哪有丁点反对革命之心？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心想这次准定错不了。

在北京西苑宾馆，李大章省长首先表态支持刘、张和四川的造反派，四川分管政法的省委书记杨超认错，就连宜宾军分区的司令汪总勤、政委王富德都对我说：他们从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错了，对不起刘、张、王、郭、李等领导干部，更对不起宜宾方面军的造反派同志，今后他们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支持宜宾的造反派，共同搞好这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北京不少单位和机关要请我们去作报告。不过，对这些做报告 的邀请基本上我没去参加，因为自知文化程度低，说话的表达能力也差，何敢面对首都这个高层次的人些演讲。甚至全国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也专门发函邀请了我们去参加。就连西苑宾馆的服务人员对我们都倍加热情和尊敬。我好像是在做梦一样，由人间地狱一下子步入到人间天堂，从阶下囚到坐上宾，这种巨大反差，也许是人世间极难一逢的事了，特别是作为小老百姓的人。

初夏的五月，我们正在喜悦和欢庆时，宜宾的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西苑，宜宾情况紧张，磨擦不断。由于“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顽固分子“还在继续活动。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形势有所好转，被抓的革命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思想仍笼罩在囹圄的阴影里。有的出狱后还处在昏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只剩下少数学生们的孤军作战了。而红色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派）的组织，因系官办，故没受到任何损失，而且在我们红旗派受到极重大打击之际，他们的阵营当然就更强大了，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基于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挑起事端，封盖撕毁“主义兵”（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的大字报，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电不断飞来北京。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报告，一方面叫宜宾的同志们沉住气，千万不能上人家（指对立派）挑逗的当，尽一切力量避免发生冲突。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别人要怎么做是我们管不了的，你再忍也无济于事（说实话，不管是任何人，忍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难免有沉不住气的人之冲动），冲突越来越严重。在此种情况下，而我们多次研究解决方案也不得要领，最后刘、张他们接受在北京红卫兵的意见，由张西挺找我谈，说：

“目前宜宾已陆续放人了，可是群众组织受挫严重，元气大伤，你是宜宾最大群众组织的头头，是否你提前回去，一方面传达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抓紧恢复造反派组织，由工人、农民来保护红卫兵小将，制止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现在是只能求稳，而人家则可能希望乱，我们要是以牙还牙，搞乱了大好形势，只有阶级敌人和世界上的帝、修、反高兴。要好好地坚持这个原则来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这样并没违反党中央的意图，于是我甘当重任，准备提前回宜宾。离开前，李良同志又专门找我谈了次话（他和郭林川是随后赶到北京来的）。他说：

“谢英富同志，回到了宜宾你一定要告诉大家，立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避免冲突，要集中精力揭发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运动引向歧途的阴谋，叫在宜宾的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一定要文斗，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武斗，粉碎党内外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要化干戈为玉帛，你责任重大啊！顺便也代我们向宜宾的同志们些问好！”

四、祸胎：“五一三”始末 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抵宜

回到了家乡心情本该是愉悦的，可是走到街市上一看，到处都是冷清景象。

由于“镇反”造反派受挫严重，元气大为损伤，大家都有点灰溜溜的样子，互相见面都只有些垂头丧气的叹息。唯有主义派的“红卫兵”们，真像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二三人一伙，四五人一群仍在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报。可是人单势薄，他（她）们前面贴，马上就会有思想派的“红卫兵”在“红工联”、“桥工联”（思想派的工人组织）作后盾的支持下，不是覆盖，就是扯下主义兵的大字报，而街市上的群众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回到宜宾，一方面恢复我们“八八团”的基层组织，一方面将中央的情况逐步传达下去。这时北京的电报电话也不断发来宜宾。这当然是学生们的消息最灵通喽，也最敢说敢干，迅即将情况抄写传播开来。学生们的消息灵通是全靠邮电系统造反派的鼎力相助，电报电话基本都做到了畅通无阻，在最困难的时候，邮电造反派的同志都千方百计为我们传送消息。慢慢地人们知道了“二月镇反”是怎么回事。于是群众见到撕盖大字报时，也敢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了。

可是，事态越来越严重。由于有“红工联”（主体是豆坝电厂的工人）、“桥工联”（主要是在宜宾修金沙江铁路桥的工人）的撑腰（这也许只是表面的现象，而深层的实质在？），撕盖大字报竟出现了抓扯推搡的激烈情况。当然，吃亏的乃是主义兵喽。不少造反派的人都摩拳擦掌，大有对峙之势。此时，主义兵的学生们要求工人组织出面保护作后盾，同时造反派的人也群情激奋，要想以牙还牙地对着干了。我们认为过激会激化矛盾，在京的人也不断告戒：不要上“走资派”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当，因此不同意对抗的作法。于是有人建议用文的方法，即用示威的方法使对方有所收敛。当时我们认为也只有用文的游行示威方法较好。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我们也太幼稚了，真是有点异想天开。以为示示威就可以制止冲突和暴力，那简直是想与虎谋皮。我们一路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

派的人竟用道渣、鹅蛋石朝我们打来。本有一肚子气的游行人群，立即喊出了“桥工联，算老几，抬工伯伯不怕你”。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真有股不怕死的精神气概。我们不但没被打垮，游行队伍反而越来越壮大了（沿途不少人加入）。当行进到翠屏山底下，不知谁领头喊出了：“南瓜白菜算老几（即是省建筑第四公司的对立派组织“南征北战”），抬工伯伯不怕你！”可是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上，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我们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出好几百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我们袭来。为不扩大事态，我们一边劝大家忍气，一边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外地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对立派的人好象杀红了眼似的，不管见到谁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的（真实）起因（开始）。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十三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也就形成了宜宾大规模武斗的祸胎。

由于上述的野蛮、粗暴行径，激起了宜宾造反派（即后来称作“红旗派”的）和宜宾人群众的极大愤慨。为了自卫，这时才临时想起找棍棒，找铁条来作武器与之抗衡。但毕竟对方在某些人的授意、组织调动下，早就充分准备好了的，而且早就将大批农民调进了城来搞武斗。后从被俘农民口中得知，他们是“五一三”前就被有组织地调进了城，说是叫他们来保卫地、市委的，驻扎在翠屏山一带。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的驻扎在“杂技团”，城区的红色派人则集中在团结旅馆楼上。试想成百上千的农民有谁能调得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之口粮，在那计划经济年代，又有谁能办得到粮食敞开供给那么多人吃饭？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在人多势众，更加上修铁路大桥的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修房造屋的建筑工人，他们均是爬高上梯的高手，农民和一般人员从地面向我们发起攻击，而有高空经验的桥工、建工则由空中（即房屋顶上）攻击我们（那时宜宾基本都是些砖瓦平房）。他们在房背上如履平地，简直是打得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特别是这种“返祖”式的原始“战争”，我们也只在电影或戏台上见过，故我们根本就不适应，就连当过兵的也无法适应这种旷古冷兵器时代才有的肉搏战，要是对方再从水上开进，那就简直是一场“海、陆、空”的立体战争了。我们的抵抗确实就软弱无力（要武器装备没有原材料，要吃饭无粮食给），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战线长都还有人去抵挡，但要面对这些好像训练有素、方略得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谈何容易。

我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无组织和计划的决策者，所以哪里吃紧就奔向哪里去抵挡，真是乱得紧。就是我们“八八团”也不完全是在统一地抗御。尽管我们是杂乱无章地抵御，多少还与强大的对方抗衡了一周左右。如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相当激烈、悲壮。我们虽不是有组织、有计划谋略的抗衡，但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对方是有组织的饭菜供给，而我们则是由街道的居民群众自发地（一户或几户联合）将家中有限的粮食（那时粮食是凭票购买的计划年代）都拿了出来煮成粥，送到各个抗衡点来给我们吃，居民老大娘、大嫂子们竟然将家里泡的咸菜、豆办酱等也都尽数拿了出来给我们吃（而对方不少从农村调进城来武斗的农民说，他们吃的很好，比他们家里的生活好得多）。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我们在那缺医少食的情况下都没有一人到国家粮店、库去私拿或抢夺粮食。那种感人至深的场面是难以用笔墨可以形容得了的。很可惜那时我们没有摄像机，要是有摄像机将那时的陆空进攻与地面双方抗衡，加上居民老大娘、大嫂子们用桶挑起（手提）着饭菜来支援我们的动人场景拍摄下来，那将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历史真实写照的资料片。靠着这些微薄的支持，加上所谓的愚忠，我们以弱势竟能与武装较好的对立派打了好多天的拉锯战，尤以西门三倒拐、北门鲁家圆，北毫巷最为惨烈，互有死伤。到最吃紧的时候，不少没参加组织的人民群众也自动拿起棍棒、铁条，加入到我们抗衡的行列，很有股“保家卫国”的味道。因为对方的空中进攻，不少居民房被踏烂毁坏，激起了很大的民愤。如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一个叫张月华的工班长（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他没参加任何派别，就是看到不少居民房屋无辜被踏毁，特别是对立派人不分青红皂白（尤以那些不知情的被调进城搞武斗的农民）见

人就抓就打（杀），激怒了他，自动起来参加抗衡队伍的，结果被杀害。还有一个叫李某某的也是如此，结果也被杀害。我曾亲眼看见他从北门城墙上被对立派用钢钎戳杀掉下城墙的，而城墙下也是对立派人占领了的，我们极想救他，等我们费了很大力攻回城墙下时，连他的尸体也找不到了。甚至还有些赤手空拳的居民（没参与斗争的）也枉死在棍棒和钢钎之下。这是当时的宜宾市城区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绝非臆造。

人，哪有不怕死的。可是在那时的人，太单纯，也太忠诚很了，仅在一句"誓死保卫党中央、保护毛主席"的铿锵口号感召下，硬是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敢在强大的攻势下进行抗衡，并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由原来的被动挨打转换为主动反击。如：为了制服对立派的空中优势，学生们操起了孩童玩耍时用的弹弓朝空（屋顶）发射，使得房顶上对立派的人手忙脚乱无法招架。大人们从中得到启发，也用大的橡皮条将两端固定，中间夹上鹅卵石来发射制空"炮弹"。这一招还真管用，它有力地打击了对立派的空中优势，曾一度阻止了对方猛烈的进攻势头。

可是由于对方是有组织、有谋划的进攻，加之有强大的后勤保障（要啥就有啥），而我们别说后勤保障，就是要找点铁条来做防御武器都很难。于是对立派在空中失去势，地面又遇不怕死的顽强抗击的情况下，竟将履带式推土机焊上钢板作护甲，做成"土坦克"，从西、北两个方面，掩护大队人马又向我们冲杀过来，这样我们就招架不住了，东、西、北三个方面都无法抵挡住对立派如此猛烈的攻击，我们几乎被压到了宜宾城的一隅（南方），差点就被对立派的人赶下长江去喂大鱼了。好在当时邮电局的造反派还牢牢地掌握着通讯机械，我们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肯定是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在五月十九日我们即将全军覆没之际（即我们被打得来快下河喂鱼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使我们保住了这南方的一隅之地。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五月十八日夜，我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最紧张时刻，各抗衡点相继失守了，我们的"战士"从抓到对立派人身上搜出一支"毛瑟"手枪，眼看事态严重，他们就赶紧拿来报告并交给我，我立即意识到了这场武斗不那么简单。一般老百姓能(敢)有枪支带到武斗场上来吗？这恐怕不是单纯的冷兵器原始战吧？！当时我拿着那支手枪怕极了，主要是怕对立派打过来抓着我时发现这手枪，我有理也说不清了，那武斗升级他们就有了借口了，反过来罪名就该我背。于是我赶紧找到公安局的李祥禄等人，当众将这支毛瑟手枪交给他们并说明来历，请他们公安人员保管存放，以便今后能证明此次武斗的严重性和对立派潜在着武斗升级的证据。

由于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的到来，大规模武斗虽被制住了，但因来宜的该部队之态度不很明朗，只是将我们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我们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一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面向我们发动攻击，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熙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我们南方来打杀，我方拼死阻击，好不容易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两百名由常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因我们比他们熟悉城区的地形状况，从小巷道杀出分割包围了他们），严重挫伤了对立派进攻的锐气。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我们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于是我们反问道：

"难道我们就没有老父老母和妻儿吗？我们没跑到金坪、象鼻来打杀你们，也没招惹你们，你们为啥要跑到城里来乱打、乱杀呢？"

他们说是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当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骗来武斗当炮灰了。从这样农民的讲谈中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背后确有幕后策划、指挥者和真正的罪魁祸首了（当然，这幕后角色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一般干部能够担当得了的喽）。

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我们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我们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

吵得人们根本无法安寝，真是怨声载道，令人发指。我们没有大的高音喇叭，唯一一部宣传车都是宜宾供电局的李克勤弄一部货车改装而成，架上从公安局砸我们组织时收缴去的广播器材，由李克勤掌机，宜宾地区文工团的杨白渠作播音员（她也曾参加过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白天将宣传车开到鲁家园与人民路交界处（即当时两派停止武斗时的分界线），宣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平反通知”（即党中央为刘吉挺、张西挺、王茂聚、郭川林、李良等干部平反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要文斗，不要武斗”等说理性材料和对立派人反戈声明及揭露武斗真相的材料，劝说被“骗”进城参与武斗的农民返乡等等（实际就是用事实瓦解对立派的一个策略，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继后我们才在东街建了个固定广播站（即原宜宾县百货公司二楼上），从晚上七时到十时播音，主要宣传“红十条”（即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平反通知”等，从不深更半夜地闹个不停，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只要播音开始，广播站门前就是人山人海、拥挤不通的盛况。

而对立派那种“夜半歌声”的叫骂，确实烦人得紧，可以说当时是激起了城区人们的公愤，人们讨厌极了这种方式的广播。不知由何人倡议，由一些不怕死的小青年和部分群众，趁夜突发地将其捣毁，迫使红色派退到江北一线（是宜宾造纸厂的轮船从水路接他们过江的）。城区基本上恢复了安宁（当时我听到报告还不相信，我派那晚根本就没有发布反击命令，红色派怎么会乖乖撤退了呢？根本就没有想到群众的自发能量，这正应了古人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时，原宜宾的驻军部队，以团长陈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为首，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红旗派，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站到刘、张一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确实对我们红旗派鼓舞很大。

大约七月初，江北片区厂矿、单位及农村被撵出来的工人、职员和农民，纷纷吵着要返回江北。经我们多次劝阻无效，这才由城建系统、交通系统、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造反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硬是将红色派从根据地“宜宾造纸厂”一线撵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线外。这次我们的人又在金坪从红色派人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据说是体委被抢的枪支），不禁发人深省，何以群众组织敢于动用现代武器来打武斗（若那时“地专红旗”简报揭露的“5.13”前，对立派曾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内聚集有几十人，均带有枪支弹药一事属实的话，那明眼人就更加清楚宜宾武斗的实质和真实含义了）？！

《红十条》（即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的下达和宜宾地、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建立，宜宾的首场武斗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我们红旗派也陆续将武斗现场俘来集中学习中央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和讲话及文件的红色人员放回。集中期间，我们主要是让他们从学习中去领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目的，并且保障了他们的饮食起居和医疗救护。在放人时，不知是哪里派来的摄影师，专门拍摄了我们放人的场面。就是这些单方面的镜头，后来就成了刘、张、王、郭、李等（特别是王茂聚）挑动武斗的“罪证”，在北京还放给周总理看过。现在想起都很不理解。如果前面提到的陆、空进攻（指红色派）和地面抗衡，加上居民群众肩挑手提饭菜来支援我们的场景，也有摄影机拍摄下来，那该有多好、多全面、多真实啊。可惜那时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像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古往今来有之（以后也不可能绝种），也许不是“现代”文明的专利吧？！

五上、蹉跎：“武装支泸”始末

俗话说的“福无双降、祸不单行”，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宜宾大规模武斗刚刚停息，形势在开始好转，泸州的干戈又起（泸州原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区，辖七个县市，后与宜宾行署合并为宜宾地区，辖十八个县市）。泸州造反派告急电和专门赴宜求援人群不断。当时以成立了宜宾地、市两级革筹，主持宜宾地区文化大革命事宜，我们造反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便宜行事了，只能向两级革筹反映和提建议，却不敢随便越雷池半步。可是泸州造反派源源来宜求援，可以说宜宾各大群众组织是应接不暇。对此，宜宾地、市革筹均感头痛。一方面要安慰好泸州的造反派，指令我们各大组织接待安排从泸州撵出来的人，设法解决好吃住问题。另一方面还得说服宜宾造反派要保持冷静，切不可感情用事。怕我们看到泸州这批拖儿带女被撵出来的惨像难以克制冲动产生过激情绪。再一方面就是积极向省革筹和成都军区汇报反映，请求上级设法制止武斗。

在泸州造反派不断求援和宜宾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地革筹也迫于无奈，难以控制泸州的局势了。王茂聚、郭林川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王茂聚接到驻泸部队（解放军 7790 部队）电话，叫他立即到泸州有重要事商。他赶忙带着地专机关的造反派头徐克明一同去了趟泸州（徐克明原是地委机关政治教员，文革开始后几经辩论才站出来造反的，但在地委机关也算是造反得比较早的同志），回来后才同意了宜宾造反派提出的道义声援。此时，因陆路交通已中断，各大组织派少数人组成送粮送药的船队到泸州作人道主义式的支援，粮食和药品是地革筹调拨的。当时我们八八团调派了二、三十人，加上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等派出人员，共四、五十人，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组成“支泸”船队，向泸州进发。

船队走后我碰到徐克明，问他同王老头到泸州去干什么？他说是解放军 7790 部队叫王去泸州看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报，王的文化太低，故叫他同去，好帮王老头参详电报内容和记录与军方的交谈事宜。我问电报的内容知道否？他说：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就是早已传开了的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条枪自卫的事。”

于是他接着讲：王老头同他到了泸州驻军 7790 部队，董副师长拿周总理的电报给王看，王叫徐念的，为泸州造反派自卫，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支枪，这事由部队解决，但泸州造反派被围断粮缺药，部队难以解决，故叫王茂聚设法解决粮药，所以才同意我们派船队到泸州送粮送药品的。

船队将至泸州港时，对立派（即泸州红联站）立即出动船队来阻拦我们，由当时宜宾地区马力最大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拖轮领头，向我方船队冲来。尽管他们装备有现代武器，但是，面对我们支泸船队雄赳赳、不怕死的勇往直前、迎头而下的气势，特别是对方向我方船只掷出手榴弹，落到我方甲板上，我方当过兵的张德建见状立即抓起未爆炸的手榴弹反手掷出落入水中爆炸的阵仗，对方可能摸不偷我方实力（其实我们去的人全是赤手空拳，这也是按行前地革筹再三强调的纪律来执行的），见我方毫不畏惧地行进，大有以船撞船的拼命架势，泸天化轮带头转向飞快返往驻地，并立即着手用钢板焊装护甲装置。这也许是向宜宾红色派学习来的方法吧。这样一来，他们的船就成了比较完备的土“军舰”，攻防自如了。

我方人员趁对方退走搞装备之大好时机，将船泊好，抓紧时间起运粮食和药品，给泸州红司（造反派）。红司的人见状欢腾不已，非常感激宜宾“战友”在他们艰难的时候，临危不惧地为他们送去珍贵的粮食和药品。

正当泸州红司人高兴非凡之际，红联船厂广播传出了骇人听闻的噩耗：“今夜血洗泸州城”！欢庆火暴的场面顿时消失了，人心惶惶。

泸州联合会（即泸州红司的一个造反组织）、成工兵团泸州总部（也是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下属组织）相继给我挂来加急电话，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他们都经常与我八八团保持有电讯联络关系）。因我们到泸州的人都是赤手空拳的，而对立派则都有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对抗明显是要出大亏的。为避免冲突，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于是我请联合会和成工兵团的“战友”帮忙，立即通知我方船队（人员），火速返航，切不可与对方发生冲突。

住在船上的人很快得到消息，苦于无法及时找到上岸的我方人员。时间紧迫，船队没有等到住城里的人员来齐，就启航返宜了。这样迅速的行动也没能逃脱恶运。船队进入纳溪县（也是宜宾的一个属县）境“三号信箱”附近，大马力的土军舰“泸天化”轮领头追上了我们的船队，瞬即机枪声、步枪声不断，手榴弹爆炸声震天，打得我们的人些东躲西藏，有的竟跳河逃命，躲避在船上的人全被生俘。而住在城里没来得及撤走的人，更没逃脱恶运，一个个被抓来关起。宜宾地革筹与我们同时得到这个坏消息，加之跳河逃回来的人证实，地、市革筹领导和我们方知决非传言了。地革筹的王茂聚、郭林川，市革筹的李良，再三给我们打招呼，千万不嫩个轻举妄动，要冷静，相信省革筹和地革筹，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决不能冲动上当喔。还警告说，不管哪个组织哪个人，不听招呼惹出事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

后来地革筹按上级指示，派出当时在地革筹工作的刘跃银（原地区公安处干警，也是地区公安造反组织的头头）等代表地革筹到泸州与泸州红联站进行交涉，重点阐明了宜宾去的人都是赤手空拳，是出于人道主义声援送粮送药，也是在情理中事，并非到泸州参加武斗的。几经交涉，最后红联站才将张德建等（宜宾城区八八团的）、李培中（宜宾长航社八八团的）和交通、城建的人等放回。他们返回途经宜宾金坪镇时，又遭到宜宾红色派的拦截。可见对立双方的通讯联络都是很密切的。

送粮支泸的阴影，使宜宾造反派憋了一肚子的闷气，真是哑子吃黄连，可又无可奈何。我们始终想不通，泸州红联站怎么会有那么多现代化的枪支装备？一般百姓能随便拥有武器？甚至敢开枪杀人么？这个内幕至今我也解不开（实际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罢了）。

疑团未解，更大规模的武斗在江城泸州更全面展开。据泸州人告知，重庆“八一五”都到泸州参战了的，支持红联站。造反派被打得鸡飞狗跳的落荒而逃。一批批无家可归了的“难民”涌向宜宾。扶老携幼的泸州造反派人，博得了宜宾人的极大同情。泸州造反派也一批接一批地到地革筹求助，向市革筹求援。可以说，那段时间地、市革筹的一切工作都停顿了下来，为泸州“战事”忙得不亦乐乎。劝说无济于事，不接待更加激起怨愤。特别是宜宾市革筹所在地原市委招待所，泸州造反派涌在那里，围得个水泄不通，向市革筹要枪支援。后来不知谁通知地革筹的头王茂聚来到市招待所，泸州造反派一窝蜂地围拢去，七嘴八舌地说闹个不停。本就性格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的王茂聚一言不发，大概是想让人些发泄个够。在人潮推攘中，不料个别失去理智的人，还将王茂聚头上的戴的军帽（时因王茂聚已被正式任命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故穿的是军装）抓下来甩到地上用脚踩，问王茂聚：

“泸州造反派人的死活你管不管？”

“你这个地革筹的一把手，为何不制止麻联站（即对红联站的贬称）的暴行？”

“王茂聚，要是麻联站打到你家门口，你还沉得住气吗？”

“重庆的人都可以跑到泸州来帮着打我们，我们本地区的就不可以到泸州支援吗？”

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不堪入耳的过激语言。这其中有无别有用心之人煽动，惟恐天下不乱的居心？我是不得而知的。因泸州来的人很多，我也只认识个别较大的头头，其他基本都是生面孔，难辩真伪，只能从旁劝阻，好言安慰。闹了好半天，王茂聚才得以脱身上楼与李良谈事情去了。

这时由北京中央传出的“文攻武卫”已成为极响亮的斗争口号了，而且解放军 7791 部队的上级——师部（番号 7790 部队）来宜宾驻防，就住在军分区对面，支左态度较为鲜明，而且师部还专设了“支左办公室”，公开接待群众。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不知是中央还是省里领导有什么指示，当时传言说是周恩来总理批示军界发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条枪，到底是真是假？大都不得而知，反正宜宾是潮动了，至今仍是个谜。但军方应该说是清楚当时党中央的态度的。那时，大家都只能从迹象上看，认为是假不了的就是了。或许是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经受不住造反派的冲击，宜宾市革筹的某个人（因记忆模糊，故无法署名）带上罗太安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市武装部的范部长谈了话后，由罗太安（原宜宾市人民电影院职工，造反派临时协助市革筹工作的人员）具体与范部长联系，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即造反派参加组织的）。当时只准我们八八团组建一个精干连队，加上工业系统一个连，手联系统一个连，构成了一个加强营，花成果任营长（原市公安局教导员），我任副营长，市工业的杨某（名字不太记得清了）为教导员，市手联的陈某（名字也不太记得了）任副教导员。“民兵”领到的都是老式步枪（七九和三八大盖）和捷克式轻机枪。临到出发我还是空手。我到市革筹找李良，问他：

“李老头（当时对他的尊称），我这个副营长用拳头上战场啊？”

他听后露出一脸的惊讶，这才叫市公安局拿了支封存的驳壳枪给我。管他三七二十一，总算有了支枪，插在腰带上

就随队出发了（大约是一九六七年的九月五日晚上）。这就是出名的“九·五”武装支泸，即真正的第一次武装支泸。从这次的民兵组建和发枪等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某个由基层一跃而为市“领导”的人之潜在私心的大萌芽，好在我不计较。那时的我就那么简单，一切从大局出发。

这次武装支泸由于是地、市两级革筹领导的，故均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地专级单位民兵，经由南溪、江安两县境（均为宜宾属县）抵泸洲。另一路则由我们和市级单位的民兵，经由富顺、隆昌、泸县（三县均属宜宾辖县），从小市抵泸州城。我团的那个连是前哨，当时我虽不懂带兵打仗，但深知火器械斗是流血、死人的“战争”，决非儿戏。所以我要刘友源当指导员（他在解放军部队时，就是侦察兵尖子），任命当过公安侦察的杨立相（宜宾地区邮电局职工、烈士的儿子）和当过兵的黄海浪（宜宾市锻压厂职工）当正副连长带队，我也随前哨连行进。两路人马均由省汽车运输公司宜宾分公司的造反派头吴明高（抗美援朝时的英雄驾驶员）调集该公司30 队和 32 队的车辆担任此次运兵和后勤供给的运输任务。

连夜出发，天刚亮到达隆昌县城。因我原早在隆昌、泸县搞过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故对隆泸公路沿线的险要地形多少有些了解，所以趁在隆昌休息之机，我叫杨立相、黄海浪特别要注意界牌（即隆昌与泸县的交界处），白水滩（即泸县的加明镇和隆昌县的胡家寺交界处）和小市背后的大山处。因那些地方地势险要且居高临下，完全可以将公路封锁死，百余条性命，责任重大啊。我说，如发现情况，要立即停止前进、疏散人员并隐蔽，均不可硬闯。他俩都说明白，知道利害关系了。我也就放心了。队伍再次整队出发，杨立相、刘友源乘坐前面两辆车，我在第四辆车上。

一路行进到也平安，唯一反常的是公路上除我们的车队外，再也没见到机动车的影子。我想这也不奇怪，双方对立，交通基本中断了嘛。眼看就要到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了，已经看得到小市背面的大山，我正庆幸平安，突然前面的车紧急刹车。与此同时，枪声大作，公路上响起一连串的弹着地声。全部的汽车都停了下来，人员都纷纷地跳下车。我借车身掩护向第一辆车跑去。只见刘友源、杨立相正指挥车上跳下来的人原地卧下或找掩体隐蔽。不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时，我只能招呼大家找有利地形隐蔽待命。

山上的火力很猛，步枪、机枪像炒豆似地响个不停。我们的车队全在别人的火力网里，进退都很困难。更主要的是我们队伍中，有好多人都没见过这种阵仗（包括我也是，幸好在学校时搞射击运动听教官讲过实战经验，多少懂得点躲避枪弹的知识），听到枪声一响就乱了。好在有些当过兵的人当班、排长，都在帮助同伴到有利地形去躲避。可是仍有一小部分惊吓得慌乱了的人，则顺着对方方向朝大山脚下的山沟沟里跑，其中的曾玉文（宜宾市城区公社八八团的）连枪都是第一次拿，可能怎么开枪射击都不懂（这确实是当时的一大悲剧，民兵不懂得枪的使用），他一枪未发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命丧黄泉了（当然，也不止他一人）。

为了不让死难战友暴尸荒野，我们组织了人去枪口夺尸。我要以身作则，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刘友源、杨立相、张德建等有作战经验，冒着枪林弹雨向山脚冲去，我也将手枪上膛，跟着上。对方火力太猛，我们就停下来还击。我一扣扳机，枪不仅没响，反而枪栓给卡住了，真倒霉！要是用这样的枪打遭遇战，那非白送命不可。眼下顾不了那么多了，见冲不过去，就只好暂时返回去。下来休息时，杨立相问我板着脸干啥？我将那支破枪给他看。他毕竟是搞过公安侦察工作，枪也用过不少，接过去哗哗几下拆开来一看，就笑个不停地说：

“你真外行，封枪时上的黄油都未除去，你怎么打？”他接着再查看下去，撞针也是磨损了的（说真话，我确实是个外行，在学校搞射击运动用的是小口径步枪，机械构造与手枪根本不一样），幸好工业连带有个专修枪械的王师傅（他原在兵工厂工作过）。经他修理才成了一支真的手枪。几经反复，最终借着夜色还是将死难者的遗体给抢回来了。

我真搞不懂，当时我们这些人不知是啥迷了心窍，或许这就叫“信仰激情”？竟然用老掉牙的破枪去与新式武器抗衡？我们用的基本都是过时的，人称老套筒的枪，这些破枪的有些枪口，比子弹头大得多，尤其是汤姆式冲锋枪，射程最多有一二十米远，又易走火。这大概也是在学八路军、新四军的小米加步枪的辉煌事迹吧。

我们就这样被阻在 58 公里处好几天。那时虽已过立秋，但天气还是很热，无法洗澡，对方封锁特紧，白天无法找

水沐浴，晚上又找不见水，实在无奈，只好钻进公路的涵洞里，用公路排水沟流来的水马虎洗洗了事。对这种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窘境，我们真是一筹莫展，真所谓“出师不利”喽。

一天，天刚黑，宜宾市革筹的头李良来到 58 公里团部，跟着来的还有解放军。他们一来就叫各营营级干部去开会。经李良介绍一位魁伟的解放军，他是 7790 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叫张键。他和李良等听了我们的战况汇报后，李良问张科长有何建议打破这个僵局？张科长说他一来就将整个地形都看过了，要是由他们军人来打这种仗就比较容易点，由民兵来打就很难了。这不是等于说没有办法打了吗？

张科长看到大家愁眉苦脸的样子，很为难地说：

“不是没有办法，关键在于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不怕死的决心之人。”

大家问：“怎么个讲法？”

张科长说：“大部队硬攻肯定不行，人家占了有利地形不说，不单武器精良，还有明碉暗堡、工事掩体，是很有章法的打仗，唯一只有出奇不意的夜袭，或许还能凑效，而且只能是小部队的突发夜袭，打对方一个不防。但是，这支小部队要由稍有战斗经验、精干胆大、不怕死的人组成，趁夜色的掩护摸到山上各明碉暗堡下埋伏，拂晓前打响战斗就只管向前冲，山腰上准备的第二梯队跟即上去支援，第三梯队随后压阵和打扫战场，这样胜利的希望就大了。但是，危险性和伤亡也会大。”他最后表白：对我们这样的队伍打夜战，他不敢拍胸口。

他说完，几个营的干部都像得了哑症似的，一言不发。

要组成这样的突击夜战小分队谈何容易，特别是营的头头，不能不为各自营里的人的安危着想，弄不好是要流血死人的。当李良他们一个营一个营地“征求意见”时，其他营都说他们的人不行，比不上八八团的人精干勇敢、敢打硬仗。就这样一致将这个难题推到我们八八团人的头上（不知是否有人事前策划过的保存实力，以利后来）。花成果营长一句话不说（尽管他是老兵、公安领导，按理最有发言权，但毕竟对群众组织的底知之甚少，况且他的话造反派能否听得进也很难说），很为难地望着我，显然是想要我来表态。既然被推都推到刀口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回营去动员、组织力量罢了。但我们的武器最差，我把这个情况提出来后，张键科长建议李良在各营强行抽调一些稍好点的武器给我们。李良首先当众将他警卫员向其昌（原市公安局的公安）俩人的“五六式”冲锋枪拿出来给我们（这是我们民兵团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支新式武器，是专为保护李良同志配备的，张科长和他的警卫员都是空手），然后东拼西凑，总算给了我们十来支（挺）快武器。会议决定我营突击夜袭分队为第一梯队，我营剩下的两个多连为第二梯队，某某营为第三梯队。

散会后花成果和我留下，张键科长单独向我们建议说：

“最好是晚上两三点钟开始行动，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严格时间保密），就是参加突袭行动的也不告诉，只叫他们整夜着装待命，晚十二点饱餐一顿后原地休息，出发前给每人发点鸡蛋和肉食，三、四十人要精干，老兵有经验的最好，全配备快枪（哪怕是旧式轻机枪）和手榴弹，争取凌晨五时左右摸到对方阵地前隐伏，天麻麻亮（即晨六点左右）看到进攻信号弹升空，立即发起猛力攻击，先用手榴弹炸碉堡后，就开枪扫射一直往前冲。战斗一打响第二梯队立即跟上接应，速度越快越能减少第一梯队的伤亡，营的指挥位置应设在两个梯队的中间地段，行动的细节你们自己商定。”他说完后团部的信号枪也给了我。临行李良再三叮嘱小心行事，行前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回到营部，我和花成果将八八团连的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张德建等人找来商议，由他们提出人员名单后，又商量了一下行动细节，花成果传授了一些临战经验。幸好被选上的人来营部开会，一动员和说明突击夜袭的重要性后，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一致认为成功与否，都在此一举了。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准备，吃过加餐饭各人发了两个熟鸡蛋、一小砣肉食就集中休息了（营里其他战士知道有行动，但具体情况均不知晓）。到凌晨二时，命令突击小分队出发，借助夜色向山上运动。我和花成果带上警卫员、号兵随后出发，并向教导员杨某交待，两小时后带领全

营余下的人按原建制赶到营指挥所下面坡上待命。

夜袭行动开始前忙上忙下倒不觉得紧张，当突击小分队悄悄向山上摸出去后（基本上是靠爬行，月黑风高的郊野，后面的人只有摸着前面的人的脚行进），我的心情随着夜深渐渐地静了下来。这一静脑子里就像开了锅的水沸腾了起来，开始回味团部开会的种种现象和张科长在会上讲的那番话，再联系到突击小分队这几十号人的生死攸关问题，心里就有些后怕了。万一他们在运动中稍有不慎，哪怕是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对方密集的枪炮不知要射杀我们人的多少条生命？而夜间去爬一座完全陌生的大山而不发出任何一点声响，谈何容易哦，就是正规部队恐怕也难啊！其实，事已至此，后怕又有何用？还不如干脆不去想它，听天由命好了。

现在说得轻巧，但当时脑子根本不听使唤，反而把问题想得更深、更复杂。花成果到沉得住气，见我在黑夜中东走走、西望望，心神不定的样子，就劝慰我说：

“老谢，静静的休息一会儿养养神，呆会够你忙的了，我看你们选出的这批人都还可以，年轻精干不说，加上不少人是当过兵的，特别是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他们带队，都是搞过侦察的，你就放心好了。”

当时我口没好说出来：放心？你到放心，人不是你带的，出了问题也不干你的事喔。

凌晨四点多钟，营通讯员来向我们报告，第二梯队的人全部运动到了指挥所的坡上等待命令。我的心情稍平静了一些，因为两个多小时了没出现问题，也有相当的火力压压对方，给一线的人减轻些压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又一阵紧似一阵，想到呆会战斗一打响，几十号人不知有多少要倒在血泊之中，我回去将怎样向他们的父母、妻儿交待？我那时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山上，希望约定的暗号能顺利地在山头上出现。特别是黎明前的那段黑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行，生怕漏过那一瞬即逝的联络信号（正如老兵们说的，人最紧张的时刻不是战斗打响后，而是战斗未打响前的宁静时刻）。快到凌晨六时，山头上终于出现了微弱的三下亮光，使我放了点心，现在就不知打响后又是怎么一个状况了。

当山形在夜色中出现一点轮廓，进攻的时间到了。我急忙叫号手张登奎、唐某某等三人准备，见到红色信号弹升空就尽全力吹响冲锋号。我的信号弹刚一升空，山上手榴弹的爆炸声四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加上冲锋号的号角声，整个山体一刹那就热闹了起来。花成果和我都向山上冲去。跑了不到五十米远，突然山顶上还有一个暗堡开枪向我们射击，我立即在一个坟包后卧下，幸喜坟头大，山上机枪扫射下来打得坟头泥土翻飞，弹头铲出了一条槽，其泥土都打到我头上了，生痛生痛的。我见事不妙，就地一滚到了下面低洼处，警卫员没看清什么，哇的一声哭着叫喊：

“谢营长，谢营长，你怎么样了？”

我没好气地吼到：“你哭叫啥子，我不是好好的吗！”

好在轻机枪很快就变哑 了，不然照这样扫射，我的性命就真的堪忧了。枪一停我们就赶紧爬起来又向前冲，背后大队人马也冲上来了。到了山顶我只顾看地上有无我们的人躺下了（地上有好几具尸体），对身边炸烂的碉堡工事和满地的香烟食品不屑一顾。二梯队的人都冲上了山顶，我仍没见到一个突击小分队的人员，真担心得不得了。

前面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烟雾基本散开，这时才看到我们一梯队的人攻到另一个山头上去了（其实这不应是我们的任务）。我立即赶到对面山顶，黄海浪才向我报告，小分队队长刘友源负重伤，另有两名队员负伤不很重，均由救护队抢救并转送医院去了，但小分队无一人死亡。听到这样好的消息，我那悬吊着的心放了多半，但仍担心着刘友源的伤势。花成果和杨某、陈某正赶紧收集队伍，一齐向泸县县城小市进发。这次突击夜袭，我们缴获两挺苏制的新型重机枪（可惜没找到带轮子的机座）和一些五六式步枪、冲锋枪，这就使得八八团这个连的武器装备大大的提高不少。这次突法夜袭只伤无亡，确实是个奇迹，张科长得到报告后连声称赞：奇迹，奇迹，简直没有想到民兵会打得这么漂亮。它使我们八八团声威大振。不过，说句老实话，这次成功不能说明我们的队伍就完全过硬了，这其中或许就是相当的侥幸成分和对方过于麻痹等因素有机结合促成的，也正应了骄兵必败一说。而且，这也由此加

深了对立派对我和我们的怨恨，就连外地武装去支持红联站的组织都恨得我们咬牙，特别是对我这个头。

说实在的，那次突击夜袭可能有人认为在前面打冲锋的是去送死，走后面打扫战场才是捡 pa（火+巴，捡便宜的意思）和的美差，殊不知我们一、二梯队打冲锋走前面无一死亡，反而是认为捡 pa 和的还死了两三个人于黑枪之下。

由于 58 公里两山的重大防线被我们突破，小市的城防也立即溃散，我们无需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小市，这时才知另一路人马早就顺利进入泸州市城区，见我们攻占了小市后山，他们也猛力攻过沱江大桥与我们会师，对立派的人几乎全部退守二五厂（即泸天化厂对外名称）。我派多数人主张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攻下二五厂，免除后患（特别是泸州造反派极力主张如此）。部分人认为应从大局设想，怕攻二五厂会引起对方孤注一掷，引发特大爆炸，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正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传来宜宾地、市革筹指示：支援目的达到，立即撤回宜宾，泸州的事就由泸州造反派自己处理了。这也正是地革筹考虑到若攻二五厂恐发生大爆炸造成重大的厂毁人亡，故而强令撤回的一个策略。

听到这个指令，加之我很担心刘友源的伤情，我和花成果、杨某某、陈某某立即收缩队伍开拔返宜。

回到宜宾，在北门汽车轮渡码头受到宜宾"战友"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时我们觉得很荣耀，特别是缴获不少新武器，尤其是那两挺新式重机枪（说真的，开始发枪装备时，给我们的枪械比别人都差，就连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都不给我们一挺）使我高兴非凡，我们有了宜宾唯一的两挺新式重机枪。一回宜宾，就找懂行的师傅和部队转业的请教，如何给新式重机枪装备上带轮子的枪座，不然难以使用。工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如愿以偿，它成为了我们方面最新最强的武器了，也可见我们当时是处于何等的劣势。

重庆情况也不甚妙，大批"反到底"成员（"反到底"是重庆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之一，颇受当权者厌恶）由于武斗被撵了出来，大批涌向了宜宾。我的两姐姐，甚至在璧山的妹妹都举家逃到宜宾避难。由于人数众多，地、市革筹个方面军只好叫各组织分散接待（因为吃住问题不好解决）。还有更多的反到底的人在重庆坚持斗争，同样牵动着宜宾人的心。由因经受过"五一三"的困境，宜宾造反派（包括部分不在派的纯居民）自发组织募捐钱粮，然后集中到方面军和我们团部，用麻袋装好交给反到底总勤务组的一个头头背回重庆，支援重庆"战友"的艰苦斗争，其场面和情景，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保存着深刻映像。这种相互支援在当时是特别真挚和纯洁的，我们宜宾同样受到过成都、自贡、重庆等地的支援。当时大家只有用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和无缘无故的爱来高度概括了。

五下、蹉跎：地市革委会成立 抓革命促生产 清理阶级队伍和九大

由于知识浅薄，至今我都没能想通，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总是磕磕绊绊的，没有一点安宁，干扰一个接着一个，武斗犹似幽灵般总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进程。

一九六八年初，由于局势关系，长宁县（也是宜宾属县）造反派请我到该县座谈。通夜的会议下来，确实疲倦极了。好在那时我们已习惯了什么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瞌睡，休息也不择地点和形式，故一上车（因地革筹通知我回宜开会）就睡着了。当吉普车行至高县（也是宜宾属县）时，驾驶员停了一下车，我也随之醒来，见驾驶员满脸倦意，我对他说：

"如果困得很，就停车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他说："没关系，刚才是有点打瞌睡，现在好些了，你要赶时间回去开会，我们这就走好了。"

我听他说得很有把握，他又是个老司机，就同意继续开车。车行驶了一段路，过了符江镇（高县境内的一大镇），看来还比较平稳地行进，我也放心了。在车的摇来晃去中，我又睡着了。突然感到车"轰"的响，我也随之昏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的爱人和一些属下见我醒来都很高兴。他们告诉我，我坐的吉普车在贾村与来复之间（同为高县境内），从四十多公尺高的悬崖上翻下了河边，幸亏山腰的一棵树挡了一下，不然车就翻到河里去了。现在是一死四伤，长宁县造反派的头唐世斌脾脏破裂，还没脱离危险，并告知我已昏迷两天多了，但没有生命危险了，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出院。

经过几天的治疗和休息，我勉强能下床走动了。团部的工作我想有刘友源主持，不用我担心，但这段时间老不见刘友源的影子，不知他在忙些什么？一想到这些，心情有开始烦乱了。那天，我刚躺到上床，傅文琪几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要我派人去营救。我问是谁叫派宣传队到县区去的？傅不正面回答，只说是毋光汉带队去的。一提到毋光汉我就生气，知道这个人最爱出风头，喜欢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一副自以为是疯疯癫癫的样子，纯粹是个惹祸包。于是我叫傅文琪找刘友源商量此事，傅很不安逸地走了，并说这段时间很难见到刘友源。我叫他派人去找。不到半天时间，就有三、四批人到病房来吵着要去观音救宣传队，并说傅文琪接了好几个观音告急电话（一听就知是谁煽动这些人到我病房来闹的）。天快黑了，傅又带着一批人气冲冲地跑到病房来闹，并问我到底同不同意派人去观音解围救人？我问他找到刘友源没有？他说没找到。我叫他们不要急，等找到刘友源来商量后再说。傅一听就火了，说：

"你当然不急，要是打着你城区公社的人，你恐怕早就同意派人去救了。"并说毋光汉挨得最凶，被拖起在街上打。

旁边一些"战士"也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八八团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不能看着别人欺负我们的人。"

整个病房闹动了，乱轰轰地一团糟。就这样被某人画龙点睛一闹，我没经受住冲击了，更怕别人说我在总团部有私心，故只好同意某等人的要求，派部分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

不一会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在我住的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即宜宾地区一医院）。我深知造反派的"脾气"，总有股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犟性，为避免事态扩大，我听说人都在医院坝子里集中好了，赶紧从病房赶到院坝里，对集合好的人说：

"你们去（观音）的任务是接宣传队回来，到了观音一定要注意三点：一不准乱抓人；二不准打人；三更不准开枪。"

大家回答"清楚了"。可是队伍出发了却不见闹得最凶的某某勤务员，百多号人没有总团的头头带队，怕人些到了观音无人招呼得住，问题就严重了。情况至此，逼得我只好带病同去了。快到观音的途中休息时，我又重申了三不准的纪律。

然而，到了观音却没见看到宣传队的影子。这时毋光汉跑来说：人些都在镇子里。罗书林（分团勤务员）说他对观音很熟悉，就带领一些人随毋光汉到镇里去了。我行动不便，另一方面也为了防对方断我们后路，故我叫留一些人守住桥头，警卫员孔庆银和张德建就随我左右。看着我们的人进入了镇里，我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镇子里了，背后远处有人在吆喝："看你给老子还跑不跑！"此时我的注意力全在镇上，根本没管背后谁在吆喝谁。突然我深厚几十米处"乒"—"乒"两响枪声，当时我还认为是对方从后面打来的，等我回过头只看见远处两个我们的人端着枪楞在那里。我叫警卫员孔庆银过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张德建随口骂到："狗日的些又在胡搞了嗦。"一会孔向我报告说对方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我气极了撵过去，恶狠狠地问他们为啥子开枪打人的？孔庆银说老的那个叫张志荣，拿枪吆吓对方不慎走火（因老汤姆式冲锋枪潮了，轻轻一甩都会上膛的），年轻的叫周洪英，认为张的枪打不准（因枪响后人仍站着），就抬枪对着死者背心开一枪将人打死了。我气极了，非常冒火地将他们的头何国西叫来问是怎

么搞的？何是城区公社分团的民兵排长，他说他反复问了那两个人，确实是这样的。我即命令何将张、周二人的枪缴了，看管起来回宜请示地革筹处理，死者也抬上汽车送宜宾卫校保存。

镇里的人听到了枪声，也赶紧跑回桥头，当他们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后，都指斥张周二人。这时毋光汉跑过来对我说：

“谢团长，不要生气了。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写个声明，说是对方把人打死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我一听就更火了，吼着骂他：“你写个球，都是你狗日的闯的祸，现在明明那么多人看到是我们的人开枪打的，你哄鬼呀，滚开！”

随即我叫赶紧把我们的人收集拢回宜宾。任泽鑫（城区公社民兵连指导员）来对我说：

“老谢，不要着急，何（国西）排长已问清楚了，老的那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年轻的那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人打死的。”

我再问何国西（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工班长），他说情况确实如此。这时蹲在地上闷起的罗书林见我气的蹬脚，急忙走过来劝我不必着急，说死者是他弟弟，从小抱到田家去的，名叫田明贵，观音邮电所工人，他曾叫田不要参加县红司，田就是不听劝阻，死了活该。我叫他不能这样说话，赶紧把人些集中拢回宜宾，请示地革筹处理，该咋办就咋办。

在回宜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可能是上了毋光汉等人的圈套。他是个到处惹是生非、无事找事干的人，特别喜欢炫耀自己，仗势总团个别人纵容，爱到处乱跑不听招呼。这次肯定是他个人跑到观音去炫耀被县红司的人戳穿下不了台，就向总部谎报情况，再由某人编造宣传队被围攻毒打的事，煽动下面的人的情绪，到病房逼我调人到观音为他亲信出气(这就达到了毋炫耀能耐之目的)。不然为啥在观音根本没见到宣传队？为啥出动时某人突然消失？我真笨，后悔莫及。这也说明了自己的幼稚和造反派盲目逞强的弱点、怪毛病。

回到宜宾我即到地革筹找到王茂聚，他说他知道我们出事了。我将全部情况汇报完后，请求对我的处分。王茂聚没好气地对我训道：

“你呀，你谢英富脑袋太简单了，毋光汉说啥你都相信不出事才怪。好在你们不是真的攻打观音，否则就难以收场了。问题不在你，你回去叫人把毋光汉和开枪的人送来审查，你好好给我在医院养伤，我们会把问题处理好的。”

由于观音事件的发生，我的心情很不好。特别是造反派的不听话脾气和激进思潮，引发我很多反思。管束不严（也无法管严），纪律松散，老子天下第一，不冷静等等，是造反派的一个致命伤。自己表面是主要总勤务员，下面的人真正都会听我的吗？就是总团勤务员中也有个别明显在阳奉阴违。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就有人劝我要看大节、看主流，不纠缠枝节，我也就无话可说了（毕竟是群众组织）。我只想，今后只有多加注意，事事多分析，强调纪律性，否则将后患无穷。

正值我极度消沉，自责反思之际（我那时真想辞去总团长一职），地、市革筹领导找我商议我团进入两级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名额各一人。我首先推介刘友源，他是部队转业到军工厂的，又是我团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具备进入地革委的条件。至于总团其他头头看来都不大行。在他们再三追问下，我又推介傅某（是支笔杆子），当即被王、郭否决，问我了解这人以前干过些什么吗？我无言以答，进而又推介钟某。王茂聚、李良有点不高兴地问我，其他就没有人了吗？我说只有两个名额，就他俩人好了。李良问我懂不懂“毛遂自荐”的典故？（真不愧他是当过宣传部长的）我也装起不领会样，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你呢？怎么就不推介自己？”

我辩解说我进不进入革委不重要，只要有我团的人进入就算地市领导没有忘记八八团这个工人群众组织喽。我话刚说完，地革筹政工组的主要成员罗某就抢着说，上级要求以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为主，八八团虽大，但产业工人部分太少了，推介了两名就够了。我一听就知她的弦外音是什么，干脆就不开腔了。那次商议就在这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中，不欢而散，大家心中都有数就行了。

68 年夏，市民兵团调我团民兵营（那时我团被指令扩编为一个独立的加强营，指明我任营长，刘友源为教导员。），到隆昌县一线布防，名曰保卫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按指令我们在隆昌县的朝阳区（即原来的胡家寺）布防，后为了交通营的安全，我们又奉命推进到该区的金麦湾、云顶寨一线布防。按理我该在医院养伤，但地市领导再三强调我们这支部队不能没有我去领头和指挥，加上观音事件的阴影和某种深刻的原因，我也情愿带着伤病上前线，扶（杵）着一根木棍，告别刚出生的女儿和妻室，毅然走上了前线。由于我们基本上都是打硬仗恶仗，危险性极大，自身组建的医疗队仅有川铁分团从川铁总队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力量单薄，宜宾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适时支援，为我们调来了知名外科大夫和护士长，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战地救护医疗力量，成为当时全地区战地救护医疗最强，最完善的战地救护队。

幸喜我们推进到金麦湾和云顶寨布防（宜宾民兵团调令是要我们营部驻防朝阳镇，因该镇属平坦地形，四通八达，难守也不易反攻，故我们改变驻防金麦湾，前哨推进至白水滩和云顶寨山上），及时支援了交通营在隆昌县光荣场防区和泸县天洋坪泸县红司部队反击红联站的大举进攻。

就在隆昌金麦湾期间，由于我部个别头头放纵下属泄私愤（即用手摇电话机摇动生电来麻刺对立派人员之事）被我呵斥制止而产生矛盾，加之我发觉群众组织里的个别败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即在金麦湾一班长肖某与被查讯的对立派女子发生两性关系，我命令将肖某缴械了，押送回宜宾交民兵团处理，结果因不是强奸而退回，我即宣布撤消他八八团建筑支队支队长职并开除出我群众组织的决定，为此有人攻击我“太凶了”。再加上我有一次当众斥责某人的警卫员恣意虐待不同观点人员，即打“脑震荡”一事，他认为太失面子了，故用计挑动起领导层的矛盾的白热化，气得我伤病发作，又住进了富顺县人民医院。我部完成保卫地、市革委成立任务也即撤回驻市文化宫休整待令。

据说泸州红联站得到重庆“八一五”和某军界的支援，又大举向我方县市进攻，扬言要打到宜宾砸地革委。沿江数县告急，一时宜宾又沸腾了。就在此时，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的大儿子李琪，在众说纷纭之际语出惊人。他说：

“人家（指对立派，这也是宜宾地方土语）一打起来你们就赶忙应战，我看是明摆着让你们上当，流血流汗劳民又伤财，依我看就让他们打到宜宾来，大家就把地、市革委的牌子秚（lao，扛的意思）起跑，退到宜宾县，他打到宜宾县就退到屏山县，他再打到屏山县就秚起牌子进凉山（即西昌地区，与宜宾邻近），让他们充分暴露，那时党中央肯定会出面来解决的，这样党中央就能真正了解到武斗到底是谁挑起和支使的了。”

别看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娃娃，他这个独特的见解，确实震惊了不少人，也许连他的父亲李良都会惊奇不已，他的儿子竟然会有这么高深的见解（这或许也是他过早卷入父辈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增长的是见识之反映）。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已经上升到了顶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宜宾的地市两级革委会是毛主席、党中央和省革命委员会批建的政权机构，能让人说打就打，说砸就砸的呀？！那又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哪里呢？当然不可能。其实，当时若真像李琪说的那样去做了，很可能党中央和省革委会会追查王、郭、李“懦弱、无能”的责任了，可想而知当时的王茂聚，李良等左右为难的处境是什么程度。所以，总体说来大家都认为李琪说的是屁话，是幼稚的表现，根本无须理睬（殊不知他正好言中了后来王茂聚的死因），绝大多数人立足应战，拼着一腔热血不算数，拼了！我说句良心话（不是为王、郭、李等干部开脱），那时的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的处境确是如坐针毡，打也不好，不打又不行。泸州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在宜宾，单是吃住都得要一套班子去应付，更不要说成群结队的人到两级革委请愿求援的阵仗了。四川人有句俗话叫：“抱膀子不嫌注大。”唱高调的那时也不乏其人，反正打头阵，打硬仗有八八团的人顶着。不然，为什么对立

派的那么恨我们八八团？那时的口头禅叫：忠不忠，看行动。我们八八团是决不能落后的，打就打好了（也许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愚忠”很了）。

由于对方火器更加加强了，由轻型兵器进展到重型兵器，而我团的武器又老又少，我即向民兵团提出了这个实际问题。可能民兵团也考虑到要我们打硬仗、恶仗，确实火力太弱，经与某某军工厂联系，特殊地调发了一挺高射机枪给我们，但总体火力仍大大低于对方（对方基本上全是正规部队的新式枪支装备，而我们竟连班用轻机枪都没得一挺），地、市革委又无法增强我们的武器装备。民兵团一个头叫我去商议，说我们八八团不是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关系很好吗？以前我们支援过成工兵团，现在何不去成都找找邓兴国他们想法，支援点武器给我们。经他一说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就到宜宾地革委小车班给我调了台小车，专门送我到成都求援。

由于局势的恶化，我八八团人马提前出发了，等我从成都返回，八八团部队在刘友源的指挥下夺回了纳溪（宜宾的一个属县），进驻到了泸县的黄舣。刚归队就有人悄悄告诉我，我不在时，黄舣枪杀了个对立派的人。我问是谁干的？是谁敢如此大胆胡作非为？但此人不敢对我详述。我即着手调查，可下面的人都不敢说实情，都推口说不太清楚。我向民兵团前线指挥部汇报，朱文德（前线指挥）、邓跃光（前线政治部负责人）都说他们早就听到这个风声，由于我不在部队，他们也就不好过多地查问了。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凡事都想弄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是不甘心的。继后我打听到：有个被抓的对立派人，由副教导员和一个参谋弄来审讯，被审者东拉西扯，不承认是奸细，被认为是不老实，想吓唬他一下，营参谋许明清叫“拖出去毙了”，警卫员向国昌懵里懵懂地把人拉出去就是一枪（足见当时造反派里一些人的无知到了极点），等参谋后脚跟出来人都打死在地上了。许参谋、贺参谋就怪罪他，向国昌说：

“你们又没交代是吓唬他吔”。

然后，就有人专门给下面的人些打招呼：此事千万不准给谢 bai（足+拜，平声）子说这件事（人些根据我受伤后依靠棍子一 bai 一跛行走给我取的绰号。这也可见要正直之难），这是我归队后一时查不出事件真相的缘故。当我知道情况后，曾多次要求民兵团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分，严肃纪律。回宜宾后我又找市革委分管民兵的某某领导反映，他叫我不要再扭着这件事不放了，手心黑不要伸给外人看嘛。万没想到，后来该领导竟将此事对有直接责任的人讲了，更加深了我们内部的矛盾。

最后这一战，就以泸县（黄舣、中心场与高坝泸化厂）境隔江对峙十多天而告终。

又因我该不该进入地、市革委的问题，造反派内部也有纷争。说句心里话，我确实没计较过这个问题，也不知内幕，更没到任何一级政权去要过官、表过功。后经地区、省的革委干预并批准增补我进入宜宾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加深了我们内部的裂痕，经个别人的煽动和挑拨，相当一些人就说我没为八八团争取多进入革委会的名额；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才两三人进入地、市革委，都是谢 bai 子不力的结果。加之那时中央号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极力主张一支（枪）不留，被误认为“右”了。再加上中央又一指示，上级叫归口大联合，削平山头，即解散一切群众造反组织，为此郭林川代表地革委找我个别谈话，指明八八团是宜宾最大的跨行业群众组织，在文革中起了很大作用，有很大功绩，是老造反派，必须带头削平山头，回本系统抓革命、促生产。我说这样急，群众会想不通。他生气地说：

“什么群众想不通？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我看是你们中的一些当头的想不通，想抱着那个山头不放，你可不能怕别人说你的闲话就跟别人当尾巴，行得端、坐得正你怕什么？你得首先表态，回你城区公社去搞大联合，以后工代会将取代群众组织，这是大局，不顾大局是不行的”。

说实话，难啊。这么大一个组织说散就散没那么容易，思想工作难做，更加上团里个别头头没能进入革委很不甘心，到处煽动、中伤。我到无所谓，反正迟早都得回本系统，特别是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无可奈何，我只好找刘友源统一认识，作出解散决定后，我们召集八八团大小头头些开会，宣布解散“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尽管如此，还是引来不少非议，而且矛头指向我一人身上，真是有苦难言。我不敢越雷池呀，这是党的命令，忠不忠看行动不

是过说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革委“第二势力”。本来很统一的地区革命委员会，不知何时何故派生出了“第二势力”，最明显地体现在宜宾县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以严云正（老干部，刘张时期的县级领导）为主任的宜宾县革委，是经省地两级革委批准的合法政权机构，严重受到宜宾县红司自组的县革委（即人们称呼的“二革委”）之抗衡。“二革委”是县红司嫌在县革委得权太少而为，而地革委内的“第二势力”逐渐显露，主要是办事机构内的一些人而非领导层，暗里或公开支持县红司与县革委唱对台戏，严重到县革委不能正常运作不说，堂堂县革委主任严云正连在县里棲身之地都没有，要由另派的高学成（对方攻击的“高右派”）、毛玉堯等人保护到我住的医院寄宿，这可能算是“文革”中的败笔吧？我认为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宜宾市革委内也有第二势力的现象产生，只不过不很明显罢了。不管这种势力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形成的，我竟针锋相对地在各种场合公开批评和指责这种现象。这也说明了自己个性太强，认死理，毫无变通和委婉的斗争艺术，难怪我要得罪不少人了。这种势力的形成，也是宜宾红旗派大分裂的前兆和诱因。也许这也是“任人唯亲”的必然产物，以个人认识为标准划线或亲疏关系划线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反省，我又何尝没犯过这样类似的错误呢？

正因为这一连串的变故，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宜宾市工代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抱着应付了事的心态进入主席团的。其实，自削平山头那时起，我进行了多次深刻反省，我确实对群众组织和新生的政权机构中的若干现象感到缰叹和厌倦，故对工代会并不太感兴趣。谁知就在这个工代会上，有人通过精心策划，竟抛出一箭双雕、诽谤煽动性很强的论调：“谢 bai 子在二月黑风进京告状期间，曾策动在京人员想抓刘张回宜交差之事”。一时间整个工代会就笼罩在这一谣传的阴谋之中。此时正值工代会选举高潮之际，我没能进入工代会领导层无所谓，但承受不了这种恶毒的中伤。幸好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早知内幕，没有中计，王茂聚还在工代会闭幕式大会上讲话，指出这种错误论调：中伤同志，损害团结，并公开评价我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故一箭双雕变成了一箭单雕（因只我一人受点伤而已），但这种做法的出现，使王茂聚很为造反派内部的团结担忧。后在地革委主持的“宜宾地区工代会”筹备预会上，十八县市通过了王、郭提议，一致选举我为地区工代筹主要负责人。由此可见这个“权”字的双面性，它既可誉人也可毁人，要不是（私心）为了证实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话，我真想急流勇退，当个世外闲人算了。我连进入政权机构都不在乎还能在乎群众组织中的职务么？总结我在群众组织两三年来的经历，坚持真理难啊。但要我听之任之，不讲原则，我的性格和脾气就决定了我办不到。可是招来的攻击和诽谤竟伴随了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四年的所有经历。

为了少受攻击，安闲自在，在成立“宜宾市城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时，我坚持不再入“革”。为此，李良多次找我谈话，地革委领导也批评我消极避嫌的做法，问我这样做对不对得起（文革中）死难的“战友”？我被说服，又入主了“城区公社革命委员会”。

这时正是宜宾“红旗”大分裂时期，由此派生出“炮轰派”（即对地、市两级革委不满或指责的红旗派人），又在宜宾地区闹得沸沸扬扬。在此之前我早有耳闻和察觉，这是有人在军方和旧当权派的大力支使下，在全川精心策划制造的大分裂，就是利用一些人，抓住宜宾在权利分配中对学生某些领袖人物的不公正，挑动群众以“武装支泸”的问题为借口的大分裂活动，其间也有人曾试探作我的工作未遂。说穿了，根子仍在一个“权”字上（也许是我之愚见吧）。否则，有多少人敢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是在“为真理而斗争”吗？

在那多事之秋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真让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突然有人来向我报告“重庆邱老虎被一批军人抓走了”。如晴天惊雷，它震惊了全宜宾城，各系统、各单位原红旗派的人纷纷组织人员想分头拦截被抓的邱老虎。邱是原重庆反到底猛虎团的团长，打仗勇猛，又是该团的头，故人们都叫他邱老虎而将他邱开全的名号淡忘了。人们根据地形分两路追寻，航运单位拦阻水路，其余都涌向内宜公路追找，甚至有想得宽点的电告自贡，请求协助拦截。

事后收集的情况表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重庆方面出动数十军人——到宜宾的只有十来人——都是部队侦察方面的能手。他们经过一周时间的缜密侦察（肯定作有周密计划）跟踪方下手，能轻易让我们这些没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将邱老虎追回吗？真是异想天开。两路人马空手而回，大家都气愤不已，愧疚如阴霾的天气，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压

在宜宾造反派人的心上，都认为是宜宾的耻辱和叹事。

宜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大、中学校的学生是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在运动的前期和中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宜宾红小兵”，他（她）们都是些小学的娃娃，人们常称的“黄毛孺子”，可他们也自发地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宜宾红小兵毛泽东主义宣传队”的诞生，可说是全川的首创。尽管他（她）们没有像大、中学生、工人、农民、干部们那样轰轰烈烈地“冲锋陷阵”，可他们在运动中的作用毫不逊色，演出的节目有板有眼，招式到位，政治性也强，质量可不低啊（不比专业文艺团体差多少），不仅在宜宾地区深受欢迎，甚至还代表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赴外地（外省）慰问演出，评价极高。一群十来岁的娃娃，不要父母亲的呵护，走南闯北，自理一切，不淘气，有组织有纪律地活跃于宣传舞台，难能可贵啊！数十年过去了，他（她）们很可能都早成为国家的人才了，可他们稚嫩的笑脸和童贞的音容，至今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引发我情感中的不少联想，当初他（她）们也不知是什么迷了心窍？这也许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吧！

在城区公社下属组建“革委会”时，因该系统较大，原有小宜宾市之称，若干个工厂、运输队、小学和一所中学、医院、两个农场，我再三强调要尽量面面俱到，各组织推荐的人选只要政审合格都要考虑，不搞以我为核心（因八八团在城区公社的分团也是该系统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或以我为主的“任人唯亲”。尽管如此，在权大权小的问题上，也会有意见的，不尽如人意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许正是这使毛泽东的神话达到了顶峰。那时，他只要发表一个指示或讲话，不要官方组织或基层召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民群众都会自发地集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那股子拥护、爱戴之热诚，虽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总体说来是世间罕见的现象和空前之壮观，毛泽东真神了！是他开创历史之先河，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之伟大领袖。

归口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了，外面再怎么闹也管不了那么多，城区公社几十个单位的事就够干的了，不时还得管管市里的事，如审批基层革委呀，同李良到文艺单位抓样板戏的移植呀，审报市里的重大案件呀，搞农村抗旱供水等等，真是起早贪黑也干不完的工作，钱没多拿，管事不少，家里的事统统都压到我爱人及养母身上。工资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元，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说句笑人的话，堂堂一个大系统的主任还经常拖欠幼儿园应收我子女的费项，有谁会相信？

城区公社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它可是原宜宾市的小金库，可见家底之雄厚。由于被原地市两级“一平二调”，又在南岸为地市修一个高干医院（病房带卫生间，而且卫生间里都安有盆塘沐浴，这可是在 60 年代好多大城市医院都没有的设施啊），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小金库就快变成个大空库了。“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喊得来的，就拿两个大农场来说，即狮子山果园和黄桷山农场，农工吃饭要钱，买苗木和肥料、种子也要钱。那时的农工每人每月才几元钱工资（这也许是全宜宾工资最低的单位吧），就一个人吃饭都不大够（肚皮没吃饱怎么干活就可想而知了），还要穿衣，有的农工还要盘家养口。想给他们加工资，有刮经济风之嫌，不解决实际问题又怎么促生产？故只好划地种菜，农工只出饭（米）钱，其它进行补贴（蔬菜不付钱，另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三元伍角），这样才稍微解决了农工的基本生活。仅此一项，每月就得几仟万把元（两个农场）才摆得平。还要安排在城区新修一座医院，因城区公社医院是个空壳，遍布城区的十来个门诊部都是在破旧的老房子里接治病人，故全院职工干部都希望有一幢名副其实的医院，科室齐全，门诊、住院配套，建成一个完善的医疗机构。此外，这个时期还兴建了翻胎厂、变压器厂等。这些稍大型点的建设项目更需要钱（除医院自身有些家底外）。我们从请建筑工人，买建材，买机具到买原材料生产产品，全是本系统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特别是翻胎机，不仅需国家部委计划，还得地方提供铝、铜、钢材等原料。我们通过北京的关系，石家庄厂家才同意加班，计划外为我们生产了该机。总的来说，那个时期搞建设，城区公社全体职工（工人、农工、医务人员，中、小、幼教师及各级干部）都尽心尽力了。特别是六个运输队和水运队在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来各队是独立核算单位，均有保守本位主义的思想作怪，公社要调集款项非常困难。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新形势发展之需要和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各队均有联合组成大队统筹管理的要求。我们召开了公社革委全委会，一致认为这种形式很好：统筹业务，均衡收入，且财务高度集中，便于发展生产。在社革委副主任周秀华等的领导下，通过这种方式，为上述工业建设提供了较强资金支援，也使公社革委度过了资金难关。从此，城区公社才有了座象样的医院，即有名的“工农兵医院”，有了川南地区（四川除成渝外）

的第一个翻胎厂和宜宾的第一个能生产 50—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的工厂。

为解决干部问题，城区公社系统在狮子山果园办了个“解放干部学习班”，即有些人斥责的“牛棚”。办这样的学习班，确实是想执行好党中央指示的干部路线，原有的干部通过学习（也少量参加些劳动），基本上都解放了出来、分配了工作，陆续为基层补充了干部，包括城区公社最大的官爷赵联友都没挂起来不用。学习期间，有病有事均可请假回家，学习班从未发生过打骂等违反政策的事。在此期间，我们社革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比较重视对干部的解放工作，经常到狮子山果园与干部们一起学习、劳动，吃住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我则是长期住在该果园与干部们同学习、劳动（除到地市开会和处理公社系统重大问题下山外）。黄桷山农场则借给市里办“五七干校”，我受李良委托也得经常去过问检查是否按政策对待干部。

党中央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展开，迅速在全国雷厉风行，我城区公社也不例外，按市革委的部署，我们也成立了“社革委清阶领导小组”，由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李云福任组长，社革委办事组负责人卢兴隆兼“清阶”办公室负责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成立会上，我只强调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做认真仔细的调查了解工作，全面清理，不能只清一派，不能将派性带入“清阶”工作，清理的对象主要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已明确身份的（无隐瞒事实的）就不再纠缠。我想，有李云福把关，加之办公室有卢兴隆（他是个老公安，很注重原则性）负责，我就放心交给他们了。本身我也没那么多精力、时间亲自抓，除重大问题须向我报告外，其余问题都由他们处理。在此期间，除谢可双料特务案为城区公社系统大案一类，“清阶办”向我汇报，我过问过外，基本未染手其它案件。就是对谢可这样重大的案子，我也交代他们，这是个历史问题，早就定了性的，只要他进一步将自身问题交代清楚，积极配合外调人员，如实证明事实就行了，不能苛求他。运动最高潮时（因外调来的人多）也只是早晨谢可到公社一间空办公室写交代或证词，接受讯问，晚上照旧回家休息。尽管我主观愿望是按政策搞好“清阶”，但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是要发生的。

有天上午我刚从市里开碰头会回来，在东街，张德建（社革委人保组的副组长）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出事了”。我赶紧回到公社革委我办公室，卢兴隆他们也来了。我问张出了什么事那么慌里慌张的？他说是小五金厂的董永昌上吊自杀了。当时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个董永昌，干什么的，为何自杀，在哪里上的吊？这时张德建才说：

“董永昌是小五金厂的职工，漏划地主和暗地设赌被清出来的，在八八团留守处的楼梯间上吊自杀的。”

我问：“漏划地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怎么会跑到八八团留守处去自杀？”

张说具体情况他不很清楚，据说是董永昌很不老实，威胁厂清阶人员才被弄到八八团隔离的。一听我就火起，骂他们胡闹，我都不去八八团了为何要弄人到八八团去？张说不关他的事，是“清阶领导小组”李云福她们叫送去的。事情紧急，我赶紧向市革委作了汇报并立即给市公安局（即市革委人保组）打电话，叫他们派员到现场勘察验尸。经文国元（公安）拍照，毛玉峰（也是老公安）勘验，结论纯系自杀（全身无任何伤痕）。

从现场回来我就叫“清阶”办通知董永昌的家属来公社讲明情况，看家属是什么态度后再作处理。后李云福向我汇报说，董的家属不服气，要抬尸游街。我问她是什么意见？她说这是党中央部署的清阶运动，小五金厂清出他很多问题，他还抵赖耍横耍泼，死不认帐，群众意见极大才批判他，他要以死威胁是畏罪自杀，他家属要抬尸游街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当然不行，他们硬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写张“畏罪自杀”贴在尸体上，让他抬着尸体游遍全城好了。为了不扩大事态，我亲自找董永昌的大儿子，劝他心平气和地处理此事。他俩个儿子说他们不服，就是要抬尸游街。我耐心地说明这是“运动”，不是个人恩怨的事，更主要的是自尽身亡，不能产生抵触情绪，妥善安葬好死者算了，何必非要闹得二家不愿呢。我叫他们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非要闹着要抬尸游街，我才不得不说“清阶办”要写“畏罪自杀”纸条放在尸体上随他们游的情况，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也很生气地说：

“我是好心好意劝你们（因董的大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但那时谁敢说明这种关系），你们不听，硬要把事情闹大，我也就管不着了，造成后果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

两年多的风风雨雨，东奔西闯，可以说没得一天清闲。好不容易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新春佳节，心想两年多没有一家人团团圆圆，清清净净地在一起“欢度”了，老人和孩子是多么希望我能和他（她）们一起过节啊。

大年初一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最佳节日，一家人欢天喜地聚在家里或郊外公园，祥和喜庆地度春节（俗称“过年”），就是那些侨居海外的华人（不管到海外多少代了）无不普天同庆，再有多大的事都得放下来，欢欢乐乐过个年。而一九六九年的年三十晚，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亲自通知我：市革委主任李良同志指示，明天一早八时到翠屏山上植树，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得缺席，特别是市革委的领导同志，更得起表率作用。

我家老人知道后，极其抱怨地说：“风风火火的过了两年多不安稳的日子，一天到晚都在提心吊胆，现在刚平静下来，连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年都不行，那么辛苦为啥子？”

老人的抱怨，孩子们的极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年轻，想得开，将儿女托付给老人，我和妻子准时上了翠屏山植树。

李良带头挥锄，大家在说说笑笑中度过了难忘的大半天。别看李良是个矮小的老头，干起活来可一点不含糊，很有点农民本色。他边植树边摆“龙门阵”，经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植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你对它好，精心栽培，它也就对你好，枝繁叶茂，就会喜笑颜开地生长着。你要是对它不好，它就会愁眉苦脸地歪着个身子，耷起个脑袋，甚至就气死在地里。口中讲着，不时还纠正那些栽种不当的同志，真不愧是一个农村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实打实，还懂得不失时宜地植树喻人，即人们常说的“言传身教”吧。特别是对我们城里长大的人，可以说好些人怎样用锄挖地都不十分会，可是李老头（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称）不仅自己认真栽种，而且还教“老外”们怎样打坑，怎样浇水，又怎样放树苗，复土踏实，真是一丝不苟，全然不是走过场，摆花架子。中午收锄，他还叫常委们留下，逐一检查所种的树，对不够完善的栽种进行补作。说实话，当时好多人的肚皮都在“咕咕”叫了，可谁也没抱怨，等战场打扫完毕下山，都快下午三点钟了。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最难忘却、最受教育的一个春节了。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可以说全国都沸腾了起来。不用领导（上级）布置，下面都会自发地行动起来。有搞技术革新、研制新产品的，有创高产为“九大”献礼的，真是一遍热火朝天的新气象。我们城区公社也不例外。美术社不仅上了“礼花弹”项目，还自发地、由美工师黄莫及等人精心制作出雄伟的“天安门”景台，与真实的天安门一模一样，好几个平方的景台需八个人才抬得起走；木器厂也不落后，精选大元木（两方多一根木材）由该厂技术好的工人师傅，精心雕刻毛主席（挥手）全身巨像（高两米多三米，重吨多两吨）；刚建好的橡胶厂也拿出了新产品作为向“九大”的献礼。新建的变压器厂也造出了宜宾（产）的第一台 50 千伏安和 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向党的九大献礼（这也是在重庆造反派的技术支持下，在任泽鑫带领下，投资仅万元左右艰苦奋斗搞出这宜宾紧缺的变压器产品）。

一九六九年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宜宾市人民广场红旗翻滚，人海如潮。人们从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入场，主席台上的人更需提前入场。我作为地市两级革委研究确定的大会总指挥，跑上跑下，忙里忙外，确实劳累极了，但是心情特别舒畅。若大的个广场装不下了，不少人整队将人民路也站满了。

“全体肃静”

“唱国歌”

“鸣礼炮”！话音一落，我向天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后，二十四响礼炮震天轰鸣，宜宾地区十万人（实际大大超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庄严大会正式开始了。到十一点过，几乎人人都饥肠轱辘。正值此时，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指挥人由主席台下抬来几筐袋装糖果，准备发给主席台和观礼台上的人各一袋“充饥食品”，不幸被王茂聚、郭林川看到了，问李良袋子里是什么？是否李良指示搞的？李良也莫名其妙。这时

赵福元过来解释说：

“这是我们市革委办事组决定搞的，主席台上的首长和观礼台上的同志们，凌晨三、四点钟就来了，早饭都没吃，肯定会很饿，所以我们办事组才专门到糖果厂订制生产了一些袋装糖食，每人发一包填填肚皮。”

王茂聚听后火冒三丈吼道：

“谁叫你们这样搞？下面一二十万群众，他们就不知道饿吗？”

“他们下面的人可以自由地出去吃东西……”赵福元辩解。

话尤未完，王茂聚吼道：

“鬼辩，主席台上的人有什么权力可以搞特殊？抬下去退给厂里销售。”

赵福元还想申辩，李良叫赵福元：

“喊你抬走就抬走，哪来那么多话。”

眼看就要进口的食物被吼脱了，当时不少人都有点认为王老头太不尽情理了，一包糖果有什么大不了的，竟然上纲到特殊化问题上，与权不权的扯到一块。同时也有点为赵的“好”心有些不平。过后仔细一想，王茂聚作得对，主席台上的人都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有什么值得特殊？要一人一袋糖果坐在上面吃？这对群众的影响会有多大？不是明摆着的吗。别看是件小事，它的负面影响将无可估量啊！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刻，以后时时事事都引以为鉴。故除了拥军一次外，都没用公款搞过吃、喝的特殊，就是“九大”代表到狮子山果园来拜会我（因我到果园坐阵抗旱），都是私人掏钱买了少数菜品，家常性地招待了“贵宾”，无一不为顾忌影响考虑。

宜宾进京的“九大”代表，全是基层有代表性的工人和农民，没有一个是地市革委领导，也无宜宾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他（她）们是：泸县的农民李祥禄（原全国劳动模范），很朴实的农村妇女，泸州武斗期间被撵得到处跑（躲），还被称为双枪老太婆，实际枪她都没摸过一下的；省航道处的蔡某某（工人技术员）；军工单位南山机械厂的钟某某（老技工）三人，故全区上下对这次“九大”代表人选基本没有异议，除省级单位蔡某某外，就是泸县一农民，南溪一工人，谁还能有什么意见？！他们开会回来后就到各县市、各大单位作传达宣讲，宣传“九大”盛况和毛主席的指示。

宜宾地革委按省革委指示精神，专门组织了“九大”宣传贯彻情况检查组到各县市检查工作。我同 82 部队一营长到叙永县检查工作，强调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和团结。因为当时叙永两派闹得比较厉害，县革委主任王某某（县人武部部长）坐不平，批评哪派哪派就说他一碗水没端平。气得他不想干了。我们下去先找两派交谈，然后再一起坐拢来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暂时缓和了矛盾。

刚回到宜宾，地革委又要我带队进凉山慰问从宜宾调防到凉山的解放军 81 部队，这次有地革委搞外交的朱炳壁（外号人称“朱天使”的）同行，我就轻松多了。他能说会道，凡事都由他出面交涉安排，我只是在大小会上多说点我代表地市两级革委，感谢解放军对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代表宜宾地市革委向他们表示慰问之类的话就行了。就这样也让解放军感受到虽然调防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生活不便，但宜宾人民还记得他们，关心他们，全团官兵都很感激。一时间军民、军政关系都是不错的（当时王茂聚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分区第一政委，地革委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部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在全国普遍进行。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遵从省革委党组的指示，召集市革委常委及市革委各大组组长开

会，传达省、地党组织关于开展“吐故纳新”的指示及具体作法，要求与会者积极带头，搞好该项工作。会后李良找我个别谈话，问我的看法。我作为无党人士，能有什么看法？总体说来只能是回城区公社系统照本宣科，由本系统的党员研究怎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就行了。李老头听后很不满意地问我：

“这样说，你不是党员就置身事外啰？”

“不是我要置身事外，是我自身不是党员，虽说是革委主任，总不能非党员去领导党务工作啊。”我答。

“你本身就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你就该带头积极申请入党，你回去叫李云福（城区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领头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告诉她，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看公社还有谁作你的介绍人，赶忙将申请报上来，你那个公社系统就应该带个好头。”李良交代。

“我服从命令就是。”

回到城区公社革委，我前脚进我办公室，李云福副主任随即就进来了，她满脸笑容煞有介事地说：

“会开得怎么样？你对我们系统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吐故纳新有何打算？李老头是你的第一入党介绍人，我就甘居第二作你的介绍人，不要犹豫了，全市李老头还是主动出面首次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们公社系统要尽量多争取优秀人物进入纳新，我们支持你。”（这可能是事先就商量好的，让我到市里开会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让李良亲自动员说服我罢了。）

“谢谢，只不过我是否够格还很难说。”我答。

“你不够格谁够格？你都不够格了，我看我们系统就没有够格的了。”她说这话我感觉到了有恭维的成分，但她毕竟是老搞党的组织工作的干部，也许不会骗我？

说实话，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只不过为了崇高的信仰，相信党的英明。因我深知会遇到不少麻烦和刁难，坚信党的洞察力，于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二李签名后上报。为了对党负责，我还是向李云福提出建议：求稳，不要冒进，更不能滥竽充数，尽量做到报一个准一个为好，带个好头。她很同意这个意见。

最后报到市里，我们系统除我而外，第一批纳新对象还有陈叶和（社革委副主任，运输队工人）。政审时陈顺利过关，我的问题就麻烦了，盯着我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从我的各方面去找漏眼都找不到，最终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我爱人的继父曾当过“远征军”（国民党抗日时期派到东南亚去的部队），敌伪军的亲属入党恐怕不当吧？于是我的入党就搁浅了，这可能是谁也想象不到的结果。我岳父的这段历史，连我爱人都不了解，况且这个岳父是被抓去的，退役后就是苦力工人，解放后进入搬运公司，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从来党和政府及单位都没说过他有历史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都与“敌伪”二字挂不上钩，可有的人就能以此来达到目的。原来是抓我养父的历史问题发难，现在就抓我岳父的历史问题攻击我，真够麻烦的了！

六、变换：三次进京 准备临刑到活罪难逃

转眼就快到一九七 0 年春节了。整个城区公社系统的生产形势都比较好，看来可以过一个较舒心的春节了。就在此

时，宜宾地革委和宜宾市革委主要领导突然被召进京，一下子气氛又紧张了起来。炮轰派（是经过某军方策反从我们造反派分裂出去的）活动掀起了高潮，红色派（对立派）也在复活，又把平静的宜宾搅得乱哄哄的。主要攻击"武装支泸"，红色派甚至反咬一口，说宜宾五一三是王茂聚挑起的武斗事件。其实宜宾五一三大规模武斗期间，刘、张、王、郭、李等人均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宜宾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还不了解这些。因那时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还没下达，详情前第四章《祸胎》部分已述，这里不再重复。

红卫兵外地赴宜联络站的学生头李锦凡，从四川大学毕业后要求来宜工作，不知怎么搞的将他安排到宜宾造纸厂。按说李对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了相当大作用的，随便都应安排到宜宾的地市级机关工作才是。其实，早在建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时，就有不少人提出对杨泽彬、李锦凡等有功劳的学生应进入两级革委的问题。（据说）王茂聚、郭林川、李良是按省革委意见，这些外地学校来宜的学生不进入宜宾两级革委会，故未安排，为此不少群众还有意见。他们毕业了来宜，是应该安排好点才是，但当时领导是怎样考虑的我就不清楚了。为此，李锦凡都向我谈过几次（可能是想我传话到地市革委吧）。我想领导上也许是考虑让他到工厂里去锻炼锻炼后再提到机关工作，又因我们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好，故只好多加劝慰。

突然一天李锦凡同李某某两人一路来找我，说是有重要事情商量。因为公社机关繁忙闹杂，他们又要求在清静点的地方，我就安排到社革委人保组（大明伦堂内）去谈。他不愧是个说客，从全国形势谈到地方形势，从文革造反谈到革委会建立和炮轰派之所以形成，又是拉关系，又是谈感情，我们几乎谈了一整夜。书归正传，二李找我谈这番话主要是动员说服我"反戈"。可是，我有什么"戈"可反？宜宾的武斗，泸州的武斗是谁挑动的，宜宾七百万人民最清楚。要说支持刘、张他们，那也是党的中央叫作的呀。我参加过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中央的态度是我耳闻目睹的，怎么能叫受蒙蔽呢？这俩人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整得我熬了一晚上干夜。最后李锦凡就说我认死理，中毒太深，顽固不化，只有跟着刘、张他们一伙倒霉了，然后就气冲冲地同某某某走了。真想不通，原来那么卖力为刘、张等人翻案的大学生，一下子又变成了反刘张的说客。我以前本来不认识刘张，也无交往，更非亲非故，中央叫支持我就支持，我倒什么霉？！后来才知道，他和炮轰派都是经过军方叫到重庆密商，并透露王茂聚都"畏罪自杀"了的消息来恐吓他们，逼其转向，并让他们回宜宾展开全面攻势，策反分化瓦解造反派的有生力量，达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效果。

眼看就要过年了，突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爱人又要临产了，一摊子事都得要我做呀！但为要顾全"革命"这个大局，我也只好召集城区公社革委全会，安排布置工作。当时就有人提出，近来谣言四起、人心浮动，是否中央又有什么变动？我对大家讲：不管中央有什么变动，首先我们自己心中应有数，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干革命，心中无愧也没有鬼，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坚定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意念。正准备动身进京学习，幸得又通知延期半月，故在我小儿子出世后的第十天，才向家人告别，赴京"学习"去也。

北京学习班四川班的学员特别多，故分住在政治学院和总后勤学院两处，四川班部就设在总后勤学院内。所有学员未经批准不得外出（大门都有警卫连的解放军站岗），不准串联，不与外界通消息，简直是要与世隔绝。宜宾地区去的人被编成一个连队，班、排、连长均由解放军干部担任。宜宾连很特殊，专门从政治学院调个理论教员来当连长（该人后期竟调任宜宾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其余全是十三军的干部。我们班长都是十三军的一个连长担任。更加上听到王茂聚"自杀"身亡的确切消息，所有我们的人（除极个别外）都感觉得不正常（因为王茂聚性格虽然很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但文革前与李井泉等人的斗争，条件环境那么恶劣他都不想死，何以进京不久，又没为他定性，他为什么要自杀？很不符合他山东汉子的性格，人们只好用一个"迷"字来解释了）。

尽管大家都有不妙的感觉，但开始时均认为大方向没错、没有什么可怕的，照样活蹦乱跳的生活，甚至学儿时打蛇抱蛋、跳拱、翻墙外出去买酒和零食吃等。因院内只有个军人服务社，不卖酒和小食类食品、大门不让出就只好翻墙喽。那会我们真像一群小学生，可干部们却都忙坏了，一会儿找这个谈话，一会儿找那个谈心，硬是在分秒必争。

慢慢的气氛开始紧张了，学习班大凡小事好像都是黄、吴、李、邱说了算，即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明；总后勤部长邱作会作。那时学习班干部们口中的"首长"，基本都是这几人。

一九七 O 年的“五一”节，中央特准学习班的学员到天安门广场，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度节日，参观焰火，大家欢喜若狂。那天吃过午饭就忙碌起，因指定我们是下午四时进场，学习班特别给我们准备了鸡蛋等食品和水果，到时无数的军车开进学院，由各连依此上车向天安门进发，我们很有秩序地进入指定地点，席地而坐静等那一刻的到来。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参加过这么庞大的庆祝活动，几十百把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秩序井然，歌声嘹亮，全然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整个广场欢声雷动、红旗翻飞，“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毛主席满面笑容，到城楼两端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人们狂热的劲头，久久平息不下来，让外国来宾西哈努克亲王都大开了眼界，毛泽东的声望决不是个人崇拜和迷信搞到顶峰的，完全是七亿中国人发自肺腑的拥戴，正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古话。炮竹声声与火树银花交相辉映，多么壮观而伟大的场面啊！回到住地，我们的心潮都还在澎湃，毫无睡意，灭灯号都过了很久，在班长甚至连长的再三招呼下，人们才慢慢入寝休息。

说实话，按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话说，我们是中央请去的客人，学习完后回去还要工作的，故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很不错。但后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节一过完，就掀起公开批判刘张的旋风。但是大家心里都不服。比如：在省革委工作的洪运珊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揭发批判刘张，表现得有些过头，不少人都反感，说她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原来死保李井泉，后又自称死保刘张，所以被人瞧不起。晚上散步都没人同她一路。有次她散步被人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盘桃（因花园道路两旁都种的盘桃树，学习班也宣布过不准随便采摘），她走的又是最背静、少人走的地段，故有人就大声喊“洪运珊在偷桃子了!”一时间学习班就传遍了。她急辩是在地上捡的，不是偷。但大家硬是要说她偷桃子。这明摆着就是要贬她，实际“偷桃字”是寓意为政治扒手，我想她洪运珊也不至于去偷一个桃子吧。

由于政治空气的紧张，有些人开始“转向”，顺着上面意图批判刘张。也有个别想不通的人消沉（或有轻生念头）。古蔺县（原宜宾的属县）造反派头头窦某某有段时间老是单独到屋顶平台或凉台幽静的地方徘徊，大家都怕他想不开，问陈思英她也说不清楚，反正思想包袱背得有点重。有人建议我去做老窦的工作（因为我跟县区的头头都比较熟），不让他干傻事（轻生），我还真的找过他谈。他说真的想不通，为啥又错了？是啊，怎么又错了呢？结合党史来看，政治斗争真是错综复杂、千变万花，一会儿正确得不得了，一会儿又错登了（错到极致的意思）。可这次是毛主席发动、中央全会一致通过的运动，现在仍然是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全中国仍在他老人家的领导之下，何以出现今天的局面？真是费解啊。我也只好劝他相信党中央，更要相信自己，扪心自问有没有偏离斗争大方向是首要的，没有就不用怕。要讲名声，我比他大得多，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我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也许正因为此，没想到时隔不久，厄运就降到了我的头上，那时后话了。在北京学习班里，当时大家最想不通的是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刘张他们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干部（有 1967 年中共中央的两个红头文件可证），时隔三年情况就有那么大的变化？难道又是一个“王、关、戚”（即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再现？不可能因为刘、张、王、郭、李等是中央“平反通知”和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文件肯定了的干部，更何况刘张不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大家都深感迷惑。

在宜宾，在市革委，我对王学明（宜宾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印象都不怎么好（不止是我），可在学习班的一件事，改变了不少人对他的看法，觉得他还有点道理。那是：

学习班批判刘张在升温，学习班领导为分化（刘张）和树榜样，连部出面指明要王学明去揭发批判刘张，因为他原是张西挺在宜宾市当市委书记时的警卫员，平反通知下达后，他是刘、张、王、郭、李等中的一员，故进入市革委任副主任的。稿子是连部找“秀才”些写的，他没有文化怕念不好，就叫人教他，当教念到“死猪不怕开水烫”一词时（是比喻他紧跟死保刘张的顽固劲），他不干了，不愿去揭发批判了。连部领导再三给他作工作他就是不干。连领导拿他没办法，只好问他要怎样才去揭发批判？他说有些词要改过，比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比喻不对，他不是猪，要比喻只能把他比作老黄牛，故他只能念成“老牛不怕鞭子抽”。连部拿着这个“大老粗”真没办法，只好同意改（这也是连里的刀笔吏将此事当笑话摆出来，大家才知道内幕的）。由此，大家对他有了些好感，都说这个大老粗其实不“粗”嘛。

反之，曾在宜宾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李锦凡，在宜宾人们心目中是很受尊重的大学生，到了北京学习班却成了连部的红人。其实从在宜宾他对我策反时起，我就知道了他的转变，因为他与我关系较好，故我没外传他搞策反事，大家就不了解他的转变。在学习班，李锦凡到处当说客，尽说些违心的话，故很多人都对他产生反感（当然也有听他的），有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李麻烦（其实他和杨泽彬以前在宜宾，人们对他俩的印象相当不错，他毕业回宜进了造纸厂，还有不少人为他打抱不平呢。他的转变并没给他带来好运，学习回宜后照样被囚禁反省，终于魂消魄散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了）。

话又说回来，“功夫不费苦心人”。经过连部大做“分化瓦解”工作，是有一些人“反戈”了，跟着违心地写所谓揭发检举材料，甚至不顾事实，捕风捉影地编造事实来窝里斗。丁绍云（省轮船公司工人，造反派头）和我就成了挨整的重点。于是，学习班将我俩“隔离”，并由所谓有“转变”、表现好的人组成互助组来“帮助”我们认识“错误”。这样一来，气氛更加紧张了，人人自危的空气笼罩在整个后勤学院。但我没有违背中央指示，没有做过违条犯法的事，心不虚，无所顾忌（特别是他们将宜宾谣传的，又是属于我在追究的什么“盗卖军筏”这些事来攻我，就知道他们是在欲加之罪，是在懵着整，我能怕？怕得了吗？）。这时，我们有相当一些人就在猜测，中央可能出了什么变故，即像“二月逆流”的情况再现。当时大家估计问题就会出在“黄、吴、李、邱”身上，造反派可能要受压一两年的时间，短期内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看来，问题严重性的时限估计比较正确，但根子就不是黄吴李邱那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根本没想到林彪、陈伯达身上。因为林彪是被确立了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做梦都没想到是他为了抢班夺权的问题上。黄吴李邱只不过是他前台的干将（四大金刚嘛），真正幕后是林彪、叶群，故没两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人们才认识到了根子的所在，这是后话了。

由于相当一部分人的“顽固不化”和抵触情绪的加深，四川班就搞了个“公捕”大会，将某某某和丁绍云宣布“逮捕”，押回地方判处，以此来打击不受“感召”人们的嚣张气焰。这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丁绍云在宜宾没有很大的名气，除他本单位省轮船公司外，就是在宜宾市区知道他丁绍云的人也不多，更不要说全地区了。此人不多言不多语，一副朴实忠厚的样子，谁会想到学习班要拿他开刀呢？说他是解放前长江河下的双枪土匪，有名的“丁罗汉”，人们听后都吃惊不已。我也升级为“隔离反省”（没有任何上级指示和批示，只在连里宣布的，想必是宜宾的别出心裁了），单独住一间屋，由多人轮流值班，昼夜有人守侯，拉屎拉尿都有跟班。后来才知道报捕人中还有我，可能是中央发觉报捕我的材料不实，姑不予批准。丁绍云是因泸州沿江曾有一个叫丁绍云的双枪土匪头，年龄、身段、体形与他较符，故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才批准逮捕，押解回宜查实后处理。由此，学习班内气氛极度紧张，人心惶惶，一些人在高压下“转向”，如余某（宜宾三江机械厂造反派头）等，不得不按连部指示和编造的事由来“揭发批判”，只要自己能过关，谁还能管违心不违心了。事后余某不止一次向人表白，他是逼不得已才按某些人的意图（指使）来“揭发批判”我的，真有点对不起我，很感内疚。

可能党中央有所察觉，因为即使在连我被隔离反省起，都在不断秘密向中央反映学习班内不正常之情况，通过某种渠道发呈中央，其他未被隔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总会有些材料传到党中央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对学习班作了专门（重要）指示，大意是：两派武斗，你抓我的人，我杀你的人都是派性在作怪，只要不是阶级敌人杀我们的人，就不要再追究个人责任了，这些人（指学习班的）学习结束后，回去还要工作的。这是周总理在学习班领导会议上宣布并令在全学习班开大会传达的。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于八月十三日发出的中发（1978）48 号文件，基本就是周总理七 O 年在中央学习班四川班代表党中央作的重要指示的内容来制定的这个文件（有据可查）。这样学习班内的压力才稍减缓了一些。可我的问题在下面并未解脱，一切照旧，只不过没像从前那样逼我和进行公开批判了。为此，中央还特意安排我们学习班首批参观刚竣工的北京地铁工程。这是我国第一条地铁修好后接待的第一批参观人群，这在当时是相当荣耀的大事，可见当时党中央对我们这批人还是很重视和关心、寄有希望的。

在北京妄图抓捕我的图谋虽然未遂，可宜宾的有心人并不甘心，仍然严令要互助组的积极分子们（特别是班长，即解放军那个连长）跟随监视我，我的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得随时报告。我想我借写检查给中央写材料报告学习班情况的事，多少也会被告密了一些，反正我不反党，我怕什么？告就让他告去好了。

一九七 O 年九月学习班学习结束，放假三天外出购物和观光。

其实，我有要挨整的思想准备，但估计不足，大错特错了。原以为在中央他们都抓不了我，回宜宾大不了弄我来批斗一下，撤职了事。仍然回去当工人还好点。当工人单纯，少动脑筋还能照顾家庭。当干部钱没多拿，相反增（加）大开支，得不偿失，一天到黑地忙这忙那，很不容易回趟家，有时板凳还没坐热又有事、找来了，弄得一家老小都不得安逸。想着回去当工人，以免老是要与一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人争斗，这想法未免显得太幼稚、太简单了。政治斗争要有那么简单，无数革命先驱就不用抛头颅、洒热血了。

在京休假都有两三个（暗中）跟班“保卫”着我，我进商店他们也进商店，我入厕所他们就在门外站起了“岗”，我吃涮羊肉，他们就得守侯一两个小时，看着他们怪辛苦的，我真不忍心了，只好少去耍点，早早返回后勤学院。

返川是专列，坐位由解放军安排（美其名曰“军事化”）。不少人肚皮头都憋着一股气回家，碰巧被列车员撞上了。由于是京列，大部分列车员都是北京人，说的都是京腔。他们打扫卫生习惯叫过道上的人“靠边”，四川人听到就不顺耳，回敬一句“老子晓得要靠边了”（川人理解的靠边就是靠边站，寓意为下台之意）。由此还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争执。过了秦岭列车进入广元车站，不知是回家心急还是另外的什么原因，有人跳车了。这一下把我们班长吓坏了，赶紧跑到我坐的那排座位来换位子。他是红军的一个副连长，云南人，宜宾连的班长。他到我对面位置上就坐，生怕我飞了似的，好不紧张。相反我还觉得好笑，眼看就要回到家里见久别的妻室儿女了，我干吗要飞（跳车跑）？

美梦毕竟是“梦”，严酷的事实才是最现实的。回宜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随着火车进站拉响的汽笛“呜”——“呼”了。人们极度高兴地争相清理行包准备下车，坐我对面的班长却拉起我直奔车厢出口，这时人们正在忙乱中，根本没人注意到此举。他将我带到站台上停的一辆吉普车旁，推我上车，门一关就启动冲出了车站。警笛呼鸣着一溜烟开进了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叫冯占云搜我的身后，将我关进了公安局里的黑屋子，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更没（手续）宣布理由，不明不白地被关进了牢中牢（就是牢房中的牢房）。因为该黑囚房是公安局修来关押临时被抓来的犯罪分子的，一进三间，外面是大间，里面还有两个小间是关案情重大的人的，我就被关在最里面那间小号，等于是双重铁锁把我“锁”住了，故叫牢中牢。里面臭气熏天不说，臭虫多得来起串串，晚上一沾铺就会被咬得你根本无法睡觉，随便用手一抓就是拾来个臭虫跑不掉。吃的是公安人员卖剩下来的饭菜，随便赏点给你算一顿（餐）。其他被关的人可以家人送饭来吃，惟我不行，因为我特殊呀。

自打被关进这个笼笼，没有任何人来问过我一句，只是叫那些小偷扒手把里间小号盯紧点（即我这个人关的那个小号）。我想，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不是黑整又是什么？！党中央明确指示：（我们）这些人学习结束后回去还要工作的。我就这样工作吗？看来，在天子脚下他们不得不收敛着点（因为北京是首都，在党中央领导的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回到宜宾就是他们的天下了。正如古人云：天高皇帝远了。中国有一句最形象的话比喻这种情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只有看他们是把我炒来吃还是煮着吃了，听天由命好喽。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我要是真的有罪，他们上报的逮捕材料早就批准了，何苦要煞费苦心地等回宜才动手？中央不批捕，说明他们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我有罪。我不是坏人，为啥宜宾还要这样对待我？不难解释了吧？！

七、煎熬：“九一三”抓大小鬼 新刑法实施前的急判，申诉无门

黑牢里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外面的阳光特别吝啬，总不肯照进这个阴暗的角落，潮湿腐烂的气味，笼罩着这几平方米的石砌牢房。外面关的小偷扒手不是吹嘘“手艺”，就是讲如何享受吃和色，没得吹了就逮虱子混光阴。我一个人在里面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恶心事。而且，我自关进去后就无人过问了，好象是人间消失了样。三十来天独守“空房”呀，无聊至极。他们真的把我遗忘了？不可能！别人处心积虑地找我的岔，能轻易放过我么？

经过月余的精心策划（不知他们耗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八方收集，编造、罗织罪名，一台精彩绝伦的好戏开场了：

一九七0年十月底的一天早晨，天气晴朗，早早地公安就给我送饭来了，与往常不同，一个馒头一碗稀饭，外加几片咸菜。我正想今天怎么对我这样好？送饭的公安就发话了，叫我赶紧吃，吃完后将我私人的东西收拾好。我边吃饭边想，既然叫收拾东西，说明这个黑牢我不坐了，但不会放我回家的，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来对付我（从北京学习班开始），决不只是关我个把月了事了的，唯一只有抱定逆来顺受的思想准备，看他们到底要搞啥子名堂。

吃过饭不到十分钟，一队解放军全副武装地进到公安局的坝子里，门外的嘈杂声也越来越大。在一个军官（军管会的）的命令下，公安才将两重门锁打开，叫我只身徒手出来。我走出来一看是“市中队”的解放军，领队的是原市中队的司务长李某某（是在我进京学习期间被提升为中队长的）。我问他是带手铐还是要捆？他露出很难为情的样子，叫我上车坐下就是。公安局大门外停着一部大货车，我向货车走去。

突然听到我最熟悉的声音在喊我，我急忙打量四周，寻找分别近年的妻子，我朋友的妻子李淑芬接着喊：

“谢英富，你爱人和娃儿都来看你来了。”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泪流满面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差点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但我不能哭，硬着心肠叫她们回去，带好我们的儿女，不要管我。

上街一看，到处都牵有横幅——“打倒反革命分子谢英富”——贴着标语。看来他们太抬举我了，为我一个人兴师动众，召开万人大会来公捕我。捕就捕吗，有什么了不起。趁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到晴朗的天空，兰兰的，真美呀，心中在想，要能自由地飞翔该有多好啊！

“将反革命分子谢英富揪出来！”随着这声吆喝，一个兵抓我一支手，我被弄来站在台下后，听到台子上宣布：由城区公社系统的工农兵医院的徐文都上台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谢英富的滔天罪行。隔了好一会（冷场），才听到徐文都发言。原来他是上台后竟当众在向当时宜宾的当权者作严正声明：稿纸是你们事先写好硬要我上来念的，我是党员，只有组织服从，但不是我对谢英富的揭发控诉，今后概不负责。这可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奇闻吧？！哪有揭发控诉罪犯的人不仅不愤怒，反而当众声明他是被逼上台扮演揭发控诉人的，也许这场闹剧的编撰和导演做梦都没有想到的负面效果吧？！

徐文都发言后，就宣布对我的“逮捕”。解放军给我带上手铐，押到台子底下坐着。我刚被押进台子底下，外面就开始念“逮捕通告”，即给我编造的“十大罪状”，并发至全川张贴公示。此时，天色突变，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将参加万人大会的人群淋得铺山的跑，我在台子底下差点大哭狂呼“老天有眼啊”！心想，连老天爷都知道我冤枉啊，真是应了“天怒人怨”的老话了。原来听说过《窦娥冤》，老天爷为抱不平发怒，夏日六月竟飞大雪示愤。难道今天能是“巧合”？深秋近冬的天气下雪没什么惊奇，可瓢泼大雨的景象则不多见了，而且，早不落，迟不落，叫把我押下去，进入淋不到雨的台子底下就大雨倾盆，人世间的事就有那么怪，不然为啥这泼大雨把会场冲散后，一会就雨过天晴了呢？过了若干若干年，至今我都没想通“公捕”我时出现的天象（也许冥冥中……）。万人公捕大会“胜利”结束了，在押我进宜宾市看守所的途中，看到满街被雨淋得稀烂的横幅和标语，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天爷也太不给人家的面子了。

一进看守所就见到我的老对头，红色派“政法兵团”的头头王明（对立派的一个头目，看守所所长）。他一见我就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地说：

“谢司令，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啊，可惜在这种地方见面，真是难为你了。”

我深知此人仗势有点文化，做事说话都很刻薄，人到矮檐下了，你能把他怎样？要依我以前的脾气，我肯定会回他

一句“龙游浅水”什么的来反唇相讥他的，现在，则只有忍气吞声算了，不搭理他是最好的无声抗议。他见我不理睬他，一下子他的幽默感也没了。

我被关进了“东三仓”。里面先就有七、八个人，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屎尿味，我没理睬原来关的人些，对直就走到最里面的角落，倒头就睡。听到有人发音了：这人（指我）咋个不懂规矩，一进来就跑到里面去睡了，喊他出来挨着甑子（即便桶的俗称）睡。另有两人（可能其中一人是仓头）叫发音那人少屁话，叫其他的人不要惹我，说我是造反派的大头头，原来还管过“群专”，对进闷子（这是黑话，泛指关押人的地方）的人比较讲理，不乱打人的。我仍闭眼憨睡，根本不理睬他们。人就是这样，没被定性前心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加之恶劣环境，再困也睡不着，一旦被定性了，心里反倒平静不少，毕竟知道人家要用什么罪名来整你了，既来之则安之，干脆好好睡一觉再说。

不知睡了多久，正在云里雾里酣睡，突然有人在推我，说叫我出去。我翻身起来，看见牢门大开，任某某（也是红色派的公安人员）横眉恨眼地吼到：“30 号出来！”（那时进了监牢的人，不仅失去自由，就连姓氏名谁都失去了，又号码来代替）

一时我还没弄清楚他在喊谁，坐着望着他。他用手指着我吼到：“喊你出来，听不到呀！”

这下我明白了，“30 号”就是我，他在喊我出去。于是我穿好鞋，几步就往外跨，突然牢门迎面向我砸来，好在我反应得快，两步避开，不然脸部或脚就要被砸伤或夹住，这可比以前传说中的“杀威棒”还厉害，根本就不把人当人对待，我也没好气地吼到：“做得那么凶干啥子！”

“进出仓门要喊报告你都记不到啊？这是什么地方？不是茶房酒店，你给我弄清楚点，哼，你还那么嚣张，我看你还嚣张得到好久。”他边说边又把门打开，叫我出去。

在看守所办公室对面的一间提讯室里，又遇到一个对头罗由海（也是对立派的）。他一副严酷的面孔怒视着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性别，年龄，民族？”

“谢英富，男，30 岁，汉族。”我一一作答，他也逐项在记。

“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他又问。

“我就是还没搞清楚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逮捕通告上指的那么多罪，你还敢说没搞清楚到底犯了什么罪，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从前那些派头给我坷倒（收拾的意思），你的罪行严重得很，为啥子要开那么大的会来公捕你？你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你只有老实交代，低头认罪，可能还保得住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是专门办你案子的，是受军管会指派来办案的，你要搞清楚。进了看守所，就得好好反省自己的罪行，办案人员来提讯你，就得如实交代，不能像你刚才那种态度，连犯什么罪都说搞不清楚，你确实嚣张（可能任启富把刚才我与他对吼的情况告诉了他），还以为你是司令、常委？老实告诉你，你是罪犯。你不要认为不交代就定不了你的罪，我明确告诉你，你不交代，没有口供我们照样要重判你，我们可以认定，懂不懂？就是不一定要你承认，我们认为有就是有。今天看来你的态度还没端正，先要把你的态度整端正再说。下去好好想想，过了此店无好酒，过了此渡无好舟哟。”（看来他的诗性发了）审讯序幕就此拉开。

回到“仓”里不少人问我挨打没有？我说他们敢吗！（其实他们有什么不敢，好戏还在后面呢）有人给我说，刚才来提我那个叫任干事（其实我连他的名字都早知道）恶得很，千万别惹他，其实他是个监内管伙食的，他来提人要特别注意，谨防手脚被铁门夹伤。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个没完，都表现出一种关心我的样子，俗话说：道不同，不相

为谋。他们说他们的，听不听由我，反正不伤害别人就是了。

第二天就弄我回城区公社系统去批斗，这次押送我的兵动真格的了，用绳子捆得我像五月间的粽子，痛得我钻心透骨，不一会手就肿起很高。事情到了这一步有啥办法呢？只有咬紧牙关硬撑着。至于批判斗争我些什么，一概不知道，随便人家说去好喽。一声"打倒反革命分子谢英富的嚣张气焰！"把我从恍惚中唤醒，啊！原来是在打我的嚣张气焰，看来他们配合得还可以吗。

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宜宾市川剧院开的，由于捆得太紧（前次捆破皮的地方再经绳子一勒，就伤上加伤了），痛得我尿都快流出来了，到了川剧院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向押我的兵哥讲，我的尿憋不住了。有个战士向另一个战士说让我去解手好了。可另那位战士都不准我小便，我硬是憋不住了，再向他们说明，再不让我解手，尿就要流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先同意我解手的战士才带我到厕所门外，将两手交叉处的绳子解开让我去小便。由于手被捆得麻木了，行动很是不方便，差点尿就真的洒在裤子上了。解完小便那个战士又用绳子捆我，另外那个战士嫌他捆得不紧，他就来捆。他真下得了手，绳子在我手上勒了又勒，交叉好后还用肩顶着我两手往上抬（紧绳子），直将我手提到后颈窝下为止，痛得我钻筋透骨极难忍受，真恨不得地下有条缝让我钻进去。特别是绳子解开后又捆，血液刚流通又阻断是最难受的，那个痛比死还凶，要不考虑到"不明不白"，我真想一头碰死了事，免得受这些活罪。更可恼的是他边捆边骂"老子看你有多嚣张"。解放后从我当儿童团长起，看到的镇反、肃毒杀人不少，就是对执行死刑的犯人，也没有这么狠心对待的，这肯定又是罗某某造的孽，我和这个军人无冤无仇，他真会那样恨我？天才晓得。

所谓批斗，都是些不伦不类的东西，甚至有人将社会上江湖艺人编唱的"百子歌"拿到批斗会上批斗我。该人是我原公社革委的一个办事员，为表示他与我划清了界限，竟搜肠刮肚，无中生有地编造"百子歌"来批判我，尽管他搞笑了会场，由于"反戈"有功，他竟从一个不学无术之人提升为某单位的领导（不少饱学医务工作者骂此人是靠假文凭当官的）。他编的歌词大意是：头戴瓜皮帽子，身穿绸马褂子，架副墨眼镜子，杵根文明棍子，腰上插支盒子（枪）……惹得全场大笑，连我听了都差点笑出声来。这哪是在揭发批判，明摆着是在折磨我的肉体。凡后，只要审讯我我不承认或顶撞了他们，第二天肯定挨捆出去批斗或游街。而且每次游街我总是被捆来站在第一辆车的车头方，简直成了游街的领衔人物。

"一打三反"运动一开展，罗由海更加紧了对我的审讯，内容几乎概括了社会谣传的一切，什么盗卖军筏呀，枪杀人命呀，贪污浪费呀，强奸杀胎呀等等等等，"通告"上十大罪状罗织的"罪名"翻来覆去的逼我承认，目的就是要把我造成一个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杀人不眨眼的十恶不赦的魔王，进而需株之的反革命。我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会被某些蛀虫们毁灭掉。

"盗卖军筏"，这本是我在追查的事件，怎么会反扣到我头上了呢？1968 年底（或 69 年初），我城区公社水运队承接了涪陵某军工厂木材的水运业务，即将原木扎成筏子从水道放运，由刘某某负责承运。在运途中由于晚上停航打扑克消闲，刘某某与组员李某某结了怨，当木筏快到涪陵时，被"红贸军"（涪陵一派群众组织）劫持，说木筏由他们接收了（因当地武斗，他们都带有枪来劫持）。工人们找他们讲理，说明我方要将木材运交到厂方返回单位才能结算工资，否则脱不了手。结果"红贸军"打了张收条（盖有大红印），发了点路费叫工人返回宜宾。这些交涉均由刘某某出面办理的，对方有枪有炮，又是武斗非常时期，刘当时也只好同意。回宜后，李某某为报复刘某，就造谣说是刘某某盗卖军筏。我知道后即到水运队调查，为慎重起见，我还亲自找李某某调查了解，包括全组放筏到涪陵的工人。调查证实确系李某某因输了钱（打扑克牌）还遭刘的奚落，为报复编造的"故事"。我只说了李某，私人恩怨不能乱造谣言报复。为此，又得罪了李某。在别有用心人的唆使下，他就到市里到处告状，进而说我是刘某某的后台，袒护了刘某某。此时正值市革委人保组有人要找我的岔，竟以人保组的名义直接插手此事，名义是办"学习班"审查此事，实际就是隔离逼供。当时革委就有人提醒我，这中间有阴谋，有人想加害我。心中没鬼，我很本不怕，有红贸军的收缴证据，事实胜于雄辩，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挖空心思好了。故我根本不理睬，把人些交给人保组审查了事。没想到现在要变成我的罪行，真是岂有此理。

"枪杀人命"，在《蹉跎》章节已详述，这里不再重复。

“强奸杀胎”更为离奇。重庆有一大学女生，因参加“反到底”（重庆最大的一派群众组织），被对立派抓去关时，遭看守强奸怀孕，眼看要毕业分配了，若校方发现不仅不予分配，还有被学校开除的危险。为此，她在重庆引产不成（因那时引产得单位开介绍信证明原由方可引产），到内江医院同样因无证明遭拒。正在她走投无路准备自杀时，护她同行的妹妹找到重庆反到底的头黄廉求救，老黄了解情况就叫她姐妹俩同他一起到宜宾想办法。因为我与老黄关系很好，听了他的介绍我也同情那个女生，于是我找我下属医院革委设法解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医院革委听我讲明情况后，决定免费为其引产，为某某同学解了大危。哪有我做好事反成罪过之理？咄咄怪事。

“贪污”更为可怕。那时候的人对贪污二字是讳莫如深的，哪怕是贪污几十元都不得了。我在八八团时，曾到市委工人接待站领有六百元钱的活动经费，用来买纸墨笔等文革用品开销，实际开支超出过大，一时没地方报帐，故票据全保存在我家里（因我垫了几百元进去），叫罗干事到我家去取来对质他又不干，这就是贪污罪行？

总之，他们是尽量在搜旮旯角角里对他们有利的东西，置我于死地是他们的宗旨。特别是要借助死刑权力下放到地方（不再经中央部门批准）的有利时机除掉我。后据政法部门内部田某某曾某某等人对我透露，宜宾曾两次向省报批我的死刑，即一九七一年借“一打三反”之势，一九七二年借镇压“五一六”分子之机，皆因省党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解放西藏的名将领、十八军军长）不同意而未遂。

那时的犯人被判死刑事先不得告知，要到判处（执行）那天在会场上宣布才知道确切生死命运。不过事先也有迹象，那就是先被叫出去，捆得最凶、大扎加小扎绊锁喉绳的，甚至打倒在地上捆的，基本都是死刑。故到开公判大会那天，全监狱的气氛特别紧张。有两次公判大会前晚才抓进监的人就议论过：明天要枪毙谢某某了(这是因为全城头天晚上都会嘈动，连我家里听到消息都作好了收尸准备)。

我也深知，他们下那么大的工夫来整我，不外乎是想要我的命（即杀鸡吓猴罢了）。就连罗干事都左一个罪不容诛，右一个想保命都难喔。不是明摆着要把我往死里整吗？特别是自贡市杀王某某的布告在监狱中学习，就是一种开杀戒的讯号。事以至此，怕是怕不了的。古人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抱定了“成仁”思想，虽不说要慷慨激昂那样视死如归，但也不能死得窝囊，所以我常准备了一套干净衣服放在枕边，一旦喊到我赴刑场，我就要穿着整洁、精神而干净地上路。

好不容易捱过了七一、二年的镇压高峰，我算逃过了一劫。可是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啊。一天吃过夜饭我在监房内踱步，值勤的武装兵突然叫我到仓口，问我在监房里闹啥子？我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明我腔都没开在静静走动，怎么说我是在闹呢？但我还是好言回答，我没开腔，更没有闹。武装兵一反常态，大声吼到：

“你还狡辩，明明我亲自听到你在闹，你不敢承认？”

“我真的连一句话都没说，怎么会闹呢？不信你问仓里的其他人”我说。

“我亲耳听到的，要问哪个，你真嚣张，你等着，看我不收拾你才怪”，武装兵边说边向外走（真是欲加之罪喽）。我以为他要去喊公安来体罚我，心想公安来了会有理说得清。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一会儿这个武装兵又跑了进来，把冲锋枪（可能是个班长）往背上一背，用手中提的（一串）钥匙把门打开，恶狠狠地叫我出去。我想我没做错什么事，出去就出去怕什么。走到提讯室外的坝子里，没见到一个公安，只有两个空手的武装兵在坝子里站着。我刚走进坝子不远，背后就是一拳打来，伴随着“老子就不信你有多嚣张”的叫骂声。我仍忍气吞声地说我真的没有闹，连话都没说一句。他又从后踢我一脚后，将冲锋枪取下来拿给站着的一个武装，并叫另一个把绳子拿来，二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捆我，我就大声责问他们：

“我犯了什么？你们讲不讲理？你们凭什么捆我？”

“就凭你这个嚣张劲就要捆你，还要好好收拾你一下，看你今后还敢不敢嚣张。”主罚我的那个武装兵说。

真没想到两个武装兵不分青红皂白，边打边扭我手杆，把我五花大绑起来不说，还把我吊在房檐横担上，拖到我脚尖着地的程度，再将他们练武用的石锁（好几十斤重）穿上绳子吊在我脖子上，最后用从我身上脱下来的棉衣蒙到我头上，再用冲锋枪托把打我头部，边打还边骂"看你给老子还敢不敢打人家的脑震荡了。"

开始我还吼叫抗议，与他们论理，后来竟然话都没气力说出来了，这种上拖下拉的刑罚怕是旷古一绝喽，三魂七魄都跑到天堂去了。

天多两天后我醒了转来，只知头昏痛得要爆了样，满脑袋像浆糊、昏昏然然又恶心，全监室没有一人开腔，都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可能是仓头（即牢头，每间仓房都由狱方指定有一个）写条子出去报告我醒转来了。看守所头王明，提着一串钥匙，面带让人捉摸不定的特殊微笑，打开监房门叫我出去，我不知所措地昏昏然然跟他走进了办公室。他叫我坐下，然后假猩猩地给我倒了杯水，递给我后坐回藤椅才开腔：

"你是咋个的吗？你谢英富都是顶聪明的人，你咋个要去惹武装啊？那天碰巧我们不在，你何苦吃这种眼前亏呢？我已给狱医说了，拿点跌打损伤的药给你吃。"……

他这一番挖苦带讽刺的拙劣表演，猛然引发了我的深思。王明一定是这场恶毒剧的总导演。其一，我与武装兵无冤无仇（只有对立派政法兵团才视我为死对头），他为什么无缘无故找岔（造岔）来狠毒收拾我，还开口一个嚣张闭口一个嚣张地叫骂，这不摆明了是派性的仇深似海么？！其二，看守所是严禁看守武装拿钥匙提关押之人的，武装兵的钥匙从何而来？其三，看守所是严禁公安善离职守的，必须二十四小时值班监控，何来王明说的"碰巧我们不在"？按规定任何时候都有公安值班，能碰巧吗？其四，即最露骨的武装兵怎么会知道罗由海提讯我时，曾张冠李戴指责我打对立派的"脑震荡"（可能什么叫脑震荡这个武装兵都不知道）？

他们真狠毒，明的判不了我死刑来整死我，就用这种假手武装兵来整死我。要是我命不大死亡了，就连伤形都勘验不出来，他们就可用正常（病）死亡四字结论通知家属，灭了他们心腹之大患。

好在我命大，活过来了，但头顶被打凹下去的一块骨头至今仍在，那是法西斯专政的罪证，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消除不掉的铁证。难怪一九七四年（大约）周恩来总理视察监狱后严正指示：废除一切法西斯专政手段；要把关押的人当人对待。说明了党中央还是能洞察秋毫的。（阎）罗王所造之孽虽然狠毒，但只能说明他们无能，故才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方法整人，也是他们在道义上的灭亡！我在看守所关押长达九年多，看到听到的都不少，但他们对真正的反革命也从未像对我这样残忍，这是为什么？？？至今难解！就此，我也落下了经常头昏痛和晚上做恶梦的后遗症（这种刑罚也可能是"空前绝后"吧？！）

王明管看守所确有一套，尽用那些刑事犯罪人员来监督我们这样的人，而且挖空心思来整治人。一会开展监室挖"妨碍改造的绊脚石"；一会发动监室"找大小鬼"（每间监室都要找出一两个人出来批判），反正要弄得被监押的人心神不安，睡卧不宁他才心满意足。当然，他最终的整治目标始终是我们这号人。"9.13"事件在外面传达都公开了，他还在监狱里大搞追"谣言"大学习，明确追查谁在监内造谣说林副主席叛党、叛国投敌？这是严重扰乱监狱秩序的、最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必须严肃追究。其矛头同样指向我们这号人。

到一九七四年，他们在看守所大搞法西斯专政，不仅给被监管人员的饭菜质量低劣，而且经常克扣。看守所经常养着些猪，杀后好的猪肉全由他们三、四个公安管监员分走了，剩点头和脚爪子及烂心肝五脏，才杂烩来给囚徒们吃，而且有时还要抵"牙祭"。他们美其名曰：猪本是他们凑钱来买的。那么，人工和喂食又从何而来？那时，我们也无法同他们计较这些，我们要的是人之待遇，要的是看病就医、废除体罚、学习政治等权利。当时看守所有病很难找医生看，大不了给点小伤风感冒的贱品药了事。报纸是想给就给，而且是过期的，凡有重大时事的报纸就休想看到。查仓更是霸道，毛主席语录、诗词乃至毛选，均属没收之列，整个监舍被造（抄）得乱七八糟，比鸡窝不如，他们的皮鞋可在被盖上乱踏一气，加之环境恶劣等等，在周总理视察监狱后严正指出要把犯了罪的人当人看待，严禁采用法西斯手段虐待犯了罪的人之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宜宾的所谓"闹监"。

开始是由罗太安等人要求看病就医，将文革人员与刑事犯罪的分别关押，实际是反对用刑事罪犯监督我们（我是一直被监督的重点，甚至王明专门培训伪县太爷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反对体罚等非人道待遇。看守所老工人王某某（厨工，三八式的革命者，新四军转业）人尊称为王伯伯，是专门给我们送饭送水的。由于他在社会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很多，也对看守所一些做法不满，于是他常去买些报刊杂志，趁中午休息拿到监内训话室大声朗读给我们听，使与世隔绝多年的我们这些人，了解了党的新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指示和时事政治，加之个别武装兵看报学习和听辩论，了解了党内路线斗争和宜宾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也将一些带政策性的或时事政治的报刊摔进我们监舍来给我看和学习。这时王明早已溜之大吉，让周会祥所长来收拾这个摊子。周是个比较本分，只知执行职责，不懂整人害人的老实公安员。其实，所谓“闹监”我们也从未乱闹，大部分问题都是有理有节地向看守所、公安局反映。后周所长将我们十多人集中到两个监室，允许学习书报和家属送来食品药物及唱革命歌曲，就是不让到医院检查治病。主要是怕我们与外界接触，据说那时外面的战友与当权者斗争非常激烈，主要是为我们长期羁押得不到公正解决的问题，要求当局严格执行党的英明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于是，罗太安和一些人商量用绝食来力争。可能出于尊重或原职务关系，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病重（近四年的残酷斗争整得我死去活来，非人待遇将我关 pa 了的），认为只要不影响监所正常秩序，要求合理（因为大部分人都被关了多年，肯定病痛不少、不轻，不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后患无穷），大家都认为有必要，我随大流好了。

所方为稳定我们的情绪，特意弄很多肉出来（不是对全监，只是对我们），大家就是不吃。后来公安局任逢畅局长出面，说我们要求正当、合理。人们才恢复进食。白天放我们到外面大坝子学习或适量劳动，爬房检漏，帮武装中队整墙添瓦，定时看病或会见家属。这个结果与外面的“战友”同张敏、冯振武、张玉清等地市书记的谈判有一定的关系。但看守所仍在正常运作，秩序井然（提审犯人照样在进行，从未受我们的干扰）。久押不决，本身就不合法不合理。我爱人曾找到地委冯书记反映我的问题，他当众公开表态：我了解谢英富，就凭那个“逮捕通告”就该给他平反。

由于地市委的介入，宜宾市由公安局卢德铭局长担任组长，再由宜宾两派干警参加成立复查组，全面调查因文革问题关押的人员，并陆续放人。我的问题经过认真仔细复查，到毛主席治丧期间，才由公安局领导深夜到看守所释放我，当时对我讲我的问题已查清，没事了，因为操办毛主席丧事太忙，来不及办正式通知，让我先回家养病，等候正式通知平反。

因被长时间羁押，身体极度虚弱，回家中后就卧床不起，医生到家里来看病，我自己是四门不出并谢绝来访，算是静养了个把月。可能是我劫数未尽，打倒所谓“四人帮”，又由公安局秦秀中局长带队，半夜三更来家将我从床上又抓进了看守所关押（既不说理由，也不出示任何手续）。

这一关又是三年多（合计九年多了）。奇怪的是我的罪名在九年多的时间里，随着政治气候在变化，开初是“反革命”变成“五一六分子”，又变成“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再变成“四人帮爪牙”。到一九七九年底，所谓涉嫌“四人帮”的人都判完了，眼看新刑法要实施了，罗由海跑到看守所过问了我一下，就急急忙忙以“打砸抢”罪名内判我有期徒刑十五年。罗称他是代表宜宾市法院宣读判决书的。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个判决三不像：新刑法要一九八 0 年才实施，按新刑法就得公开开庭审理，庭辩质证，何以能内判？为何罪名竟是新刑法新增罪项？当时不懂什么叫法律溯及力规定，只晓得原来打虎无罪，总不能等十年后保护野生动物法颁布了才将以前打虎的人弄来判罪的道理。更主要的是定罪事实莫须有。所谓的三条人命（前面“蹉跎”章节已详叙述，此不重复），仅就判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冤。什么“下令张志荣看守，致田明贵被张枪杀”，叫看守与叫枪杀有天渊之别，况且田根本不是被张杀死的；什么“下令孔庆银非法抓捕……付万全……致使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纯属欲加之罪。事发时我远在几百公里远的成都出差，从何下令？既然判决词都载明了“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那罪责也在他人而不该罪我；什么“指使钱某某刑讯逼供宜宾市小五金厂董永昌……活活将董逼死”，完全是不实之词。钱某某（实际叫钱兴华，公社革委委员，不管“清阶”事）根本就没审讯过董永昌，何来受我指使？如此等等，通篇判词都在玩文字游戏，何来事实依据？

我是无罪之人，只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参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了个造反派头头，这是党的路线斗

争使然，为什么我要受那么大的冤屈和摧残？我当然不服，我要据理上诉。

可是，那个年代，哪里有真理？谁还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在那两大阶级大搏斗的阴影笼罩之年代，有权就是真理。个月左右，罗由海摇身一变又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代表，宣布"维持原判"。看守所立即将我解送劳改队。

喊天天不应，喊地地无声。冤枉呀！青天何在？哪有申冤之门！！！

八、结局 劳改队岁月 牢底坐穿及贫困生涯 无法了结的了结

一辆破烂的货车，两名武装兵加上公安任某某（对立派的）荷枪实弹将我押送到离城几公里的"宜宾矿山机床厂"（劳改队的对外名称）。几公里路虽不长，由于是老式公路，再加上又脏又烂的大货车，我又被强迫坐在车厢地板上，甩过去甩过来的摇晃颠簸，似要将我的五脏六腑翻转来一样难受，明摆着是对一个长期关押在牢笼里的人的一种折磨。可是，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咬紧牙关忍受着，看他们下一步又将以什么方式来折腾我了。

在矿山机床厂的"入监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由于我行走都困难，犯人头（组长）去向管教（公安）报告实情，希望管教同意我留队不参加劳动。负责管我的管教姓高（也是对立派的），他向犯人头吴某说："我晓得这个谢英富，不要管他那么多，发把锄头给他，叫他杵着锄头也要给我上工地，叫他坐在旁边看劳动总可以嘛，不能松活（便宜之意）了他。"吴某回来很遗憾地对我说高管教不同意我留队不上工地，看来很恨我样，叫我要多加小心，谨防挨他收拾（整的意思）。于是，每天劳动我就杵着锄头到工地，在旁边坐着看那些人平整地基什么的。一天收工回入监狱，我杵着锄头走得慢，总是掉在队伍的后面，犯人头吴某就专门跟着监督我，一路上姓高的管教都要吼我几次"走快点，脚杆还没断吗。"我也不理他，让他吼个够。又一天收工刚进入"入监队"围墙，姓高的就叫住我，指着我的鼻子叫骂"谢英富，你跟我放明白点，这里是劳改队，不是你当主任、常委的革委会，你还在吹嘘周总理接见过你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你说这些就是违犯了监规……"他这是明摆着无理找茬借势教训我给大家看的，我没等他叫骂完就火了，同样大声武气地给他吼了转去。我说："吹嘘？我吹嘘什么了？对谁吹嘘的？周总理接见我那是铁的事实，宜宾哪个不知？你否定得了吗？何况我自进你'入监队'从不与人些多谈，除吴某跟我说过话外，我没同其他任何人有过交谈的事，你身为劳改队的管教干部，你得讲究点实事求是，少拿这一套来吓唬我。"当时他没想到我敢当着百多号人顶撞他，气得脸青面黑，无言以对，最后只好吼着骂道："你太嚣张了，你会倒大霉的，走着瞧嘛。"我也想横了，鬼门关我都去过两次的人，还有比这更大的倒霉吗？大不了他把他腰间的手枪抽出来一枪把我打发了，但我量他不敢！事后有人主动悄悄地给我说："你咋个要惹他哟，他是机床厂最出名最凶的管教，听说是红色派的一个干将、红人，你以后要多躲着他点，多加小心，谨防他要想方设法来收拾你。"这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走到哪里都会碰上冤家对头想收拾我。也有人给我说：写信喊家属来接见，悄悄告诉家属回去找关系与机床厂头头疏通疏通，走后门留在机床厂，离家近，有啥事家里也好照顾着点，这样就吃不了什么亏。好些留在机床厂的都是通过疏通这个办法的。可是，我偏偏不吃这一套，相反，我是想离家远点，远离这个喧嚣的是非之地，越远越好，到远点地方免得拖累家属。九年多的磨难已经把我爱人拖得精疲力尽了。她在家上要照顾老人下要拖扯几个娃儿，够惨道的了，我还能给她增加负担吗？更何况家里根本无钱，她也不是那种走歪门邪道的人。俗话说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最好的办法是认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他们要把我怎么个吃法好了。

其实我也应该想得通。自"12・25"批示一出，一夜之间所有革委会都被推倒重来，在"上了林彪贼船"的四川梁陈谢（即四川军方巨头梁兴初、陈仁琪、谢家祥）枪杆子的支持下，换成清一色的一派掌权，下面有权的都是清一色对立面人物，造反派的统统被镇压，一个不留，这不正应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吗？尽管它严重违背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是"党指挥枪，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有时，我也想不通：在中共中央两个文件（即"平反通知"和"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红十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为

啥别人想干扰就干扰，想反就反？在我们掌权期间，从未动用过专政工具来抓捕或审判过对立派的人，包括武斗期间杀过我们和平民百姓的人。而一个“12·25”批示下达后，一夜之间起来的一派掌权你想反也反不了？当然，他们掌握了强大的专政工具后，在对付造反派时，只要觉得你不顺眼或有点私怨，那是绝无宽容的，即便是在他们本派之间，对那些因权力之争而不听招呼的，如宜宾县红色派思想兵的头罗某，也会遭受随便动用的专政工具而被整垮整倒的厄运。这些人简直是把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变成了保护当权者，镇压“刁”民的工具了。

幸好，我在矿山机床厂只呆了一个月。一九七九年快年末的一天，凌晨四五点钟，突然通知我们开饭，并宣布念到名字的吃完饭就收拾好自己的所有物品，听候通知，我也是其中一员。大约过了一小时，天还未亮，我们被念到名字的在坝子里集合，狱方宣布并强调若跳车逃跑，一律开枪击毙、格杀勿论。接着我们就被押出“入监队”，在荷枪实弹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监视下登上了汽车。

在前后均有架设着机枪的武装军车押运之下，我们直达了兴文（县）劳改支队，即对外所称的“新华硫磺厂”。新华硫磺厂的公安再将分给各自管教的劳改人员带回自己中队。我被分到六中队。这个中队地处半山腰，是新华磺厂地理位置最低的一个中队，又是就业人员与犯人混合的中队。看守中队大门的都是就业人员，其他中队则是武装兵看守大门。我们被带进中队坝子里坐下，听中队长训话和管理干部分配工种。我被分在锤矿石的组里。这时老有一个面容严肃的干部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的看我，当时我很反感，为什么老在我身旁晃来晃去的好象看稀奇样？心想：难道在这偏远山区都也遇上冤家对头了？过了好一会，他转到我侧面问我是否叫谢英富？我听了心里立时一惊，我与此人素不相识，何以他会知道我是谢英富？想来我肯定猜对了，要遭！不过，反正该来的都会来，躲是躲不过的。我回答道：是的，我是谢英富。他听了二话没说就走了。不一会，来了个拿听筒的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干部）叫我跟他走。没想到他带我进入了中队医务室。进去后，他很客气地叫我坐下，并自我介绍说他姓刘，是就业员，中队的医生。然后他说，刚才问我话的那个干部是中队指导员，叫张维舟，在全厂都很有威望，为人很正直，是个很重政策的干部，就业员些都佩服他，是他叫给我好好检查一下，看我有些啥子病，并惊奇地说：“你在看守所就被关了九年多，真不容易哦。张指导员说了，若有啥病就立即送你到厂医院住一段时间再说。”我介绍了我的伤病，目前最主要是身体虚弱痔疮长期流血。他说仅凭这点就该住院治疗了。随后，他叫我就在医务室坐着，说完开了张住院通知单到中队办公室，张指导员提笔就批了，并叫刘医生喊个犯人帮我挑行李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小老头给刘医生打了个招呼就指着我说：“你是谢英富吗？看守所就关了你九年多，命真大。现在好了，到我们医院好好住一阵子把病养好。”我觉得很奇怪，在这偏僻的高山上也有人认识我、了解我被关的情况？不过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在看守所一关近十年的确实叫奇闻，我创造了宜宾的吉尼斯记录，当然会出名。刘医生见我很诧异的样子，就给我说：“这个老头是我们厂医院的孙院长，善菩萨，医院管行政的，他肯定接到张指导员的电话才到门口来看你这个程咬金的。”孙院长叫刘医生送我到四病房去住就是了。

第二天上午，由袁院长带两名犯（人）医来查房。到我床前，袁院长就指着我鼻子说“好你个谢英富，咋个跑到我这里来住院了？”我又很诧异，怎么又有人认得我了？他见我迷惑就直言道：“我们是中学时的同学啊，只不过我比你矮两班，你当然不记得我了。你在学校还是点名人，当然我还认得你。我出学校就读医士校，毕业后分配到新华来了。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你在宜宾的情况我都清楚。”他虽然也是对立派的，可能因为是中学同学，故他与雷医生（泸州名医雷济川的大儿子，不知何事在此劳改）交代先让我养十天半个月后再动手术。我这也算是得到了同学的一次“恩赐”了。

我手术后刚拆线不久，张指导员找我谈话，他说中队正缺一个荒棚记录（即井口锤矿的工棚），就业员些闹得凶，说张某某（就业员）老昏了，经常记错他们的账，反映好久了，昨晚就业员开会时向他们表态说要调个好的记录来管，他们很高兴。为此，张指导员要我提前出院回队，他说这个工作不重，也不怎么劳累，就是记记算算进度、产量、填写报表就行了。我说我懂不起呀！他说，“有什么能难倒你的？井下出来多少车矿、多少车煤，炼磺炉日产多少硫磺统计出来就行了，肯定你能干好的。只不过这些就业员很刁，经常会找你扯皮，只要你做得公正就不怕。张某某搁不平，我想只有你去镇得住，这才叫你提前出院，帮助把下关。”我想我一到新华磺矿就受到他的恩惠，现在他需要我了，我能不同意吗？

回到中队，蒲干事（原是管教，很有文化，文革被贬成管生产的干事的）带我到记录室叫张某某与我办移交。张确实很大年纪了，故我称他张老师，请他多关照着点。他见我尊重他、有礼貌，也就很客气地把记录每天应做的事给我交待了，他还告诉我特别是就业员每月完成生产任务的数据要搞准确，否则找你扯皮闹得头昏。

第二天一上班我拿上记录夹子到荒棚里去看，轻轨两旁倒满了矿石，外面坝子里有两堆煤炭。在矿石堆里显然有两堆小很多，我找班长（就业员）问那两堆矿是谁运的？班长问推车斗的就业员都不承认。我就只好对班长说："你清不出是谁我就很难记是谁短少的矿石，那就只好在你们班的总车数里扣除一车矿上报中队（因那两堆矿石合拢正好一车左右）。"班长叫我马虎点算了，我说不行，大家都是人，人家炉子上拖进不够数量的矿石，就炼不出那么多硫磺，你们任务是完成了，可别人的任务呢？这样公正吗？班长被我说得哑口无言。他们车班的人聚拢悄悄议论起来，我只听到有人说，这个记录眼好尖喔……最后班长对我讲，他们多打一车出来补起。这样，我算是闯过了一个杀着（刁难之意）。

那个荒棚不仅有判刑的人锤矿石，还有些干部的家属也在计件锤矿石。我在记录之余也自动拿起榔头一边检查改小一些不符合规格的矿石，一边帮一些年纪大的敲几块，静坐在荒棚里也很无聊，活动活动筋骨反而会有好处。但对待干部家属我一视同仁，不管他家的干部大小，我不去巴结她们，但有难处我照样能帮就帮，只要她不盛气凌人、歧视于我。几月下来，我与人们都相处得好，特别是经过李某某（就业员）与我闹事之后。那是李某某有一次半车硬要我记一车，我不答应他就与我闹，还骂说"你这个劳改犯有什么了不起？"我反问他："你怎么叫就业员的？"他无言以对，就要横来吓唬我，抓起一块煤炭要来打我，我也火了，骂他太不懂事了，一点不讲道理，要动手不会现学？我也从矿石堆上抓起一块矿石向他走去，他一见状就怔住了，其他几个就业员赶忙过来两边劝，拖走了李某某了事。至此以后再没人敢来欺负我了。后来这个人反而对我很好，冬天到了还帮我选挑好煤到记录室生烤火炉。

有一天，徐管教到荒棚检查，他把我叫到一边路上对我说："谢英富，你知不知道你是因祸得福才到六中队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楞住了。他说："你们没来前支队研究从矿山机床厂来的人分配问题时，介绍了你最不服管，很刁，一点不认罪还敢与管教对嘴。新华知道你谢英富的人不少，所以各中队都不想要你（包括严管中队），张指导员就看中了你，原来他只在宜宾看到过你一两次，你一来他就认出你来了。晓得你吃了不少苦头，看你走路都恼火才叫送你进医院。支队有领导讲了，你的问题我们是清楚的，但我们是执行机关，管不了你的案子，只要你遵守我们这里面的规定，协助维护劳改队的秩序，你是不会吃亏的。你到我们六中队是全厂最轻松的一个队，好好干，平安度过这几年算了。"

我不甘心。为什么响应共产党中央的号召参加政治运动还要被同为共产党的专政？我要是反革命、刑事犯罪分子，就得有我犯罪的确凿证据呀，仅凭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证言判我的刑，于理于法都是讲不通的吧？！我据理向党中央、省委、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无人问津。正在百感交集之际，宜宾市公安局的王家声到新华六中队找我调查李良的问题。我问他要调查什么样的材料？他说要实事求是的材料。我问他："你们还要讲实事求是啊？"他说："当然要讲实事求是的。"为了表白他的实事求是，他竟以我案的黄舣事件作佐证说："比如你那黄舣事件就是我亲自到黄舣（泸县）作的调查，确实你到成都去了不在黄舣事发现场，我就如实结论黄舣事件与你无关。"他不提此事还好，一提黄舣我的火就串上来了。我一边起身一边指着他说："你等倒。"我跑进记录室拿起枉判我的"判决书"回到中队办公室，"乓"的一声将它拍在他面前吼道："请看看，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实事求是啊，为何你亲自调查我不在案发现场的罪名非要安在我身上，这是哪门子实事求是！"当时却吓了他一大跳，站立起来满脸滥贱出声不得。我见状就缓和了一下，叫他仔细看判决书第二款主罪是怎么定的。他看后做起很吃惊的样子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回去一定向市委反映，问问罗由海是咋个搞的。"说完转脸向杨管教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我们再来。"随后就急急忙忙提上皮包走了。他走后杨管教对着我说："看不出你谢英富平时都文文雅雅的，一气得来发火就吓人，把来调查的都吓住了。"我说："我哪能吓住公安干警哟，是他们做的伤天害理之事被暴露出来太丢面子了而逃之夭夭的。"至此，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这讲"实事求是"的人来找我调查了。其实这个来调查的王家声也是对立派的骨干，宜宾地区改市后，他还升迁至翠屏区检察院（司法局？）的主官了。

荒棚工作搞好了，可是中队新的矛盾出现了。据烧炼硫磺的班组反映，产量下降的原因在煤的质量和数量上，火力达不到就炼不出磺来。原来，煤班的记录也是就业员，在就业员之间打不开情面，有人就用矸石渗进煤中抵数量，

严重影响了硫磺产量。张指导员反复考虑后又找我作工作，要我下井作煤井记录，一定要把煤的质量数量抓上去，不然完不成生产任务。

说实话，到新华磺厂我最怕的就是下井。矿井还好说，因巷道和行间都比较高，煤井就霸道了。以前常听人说煤洞里的人是埋了没死的，一不小心就会死在煤洞子里。可是想到六中队上上下下对我都好，特别是指导员和管教些，反正我也是几次差点就死了的，何必把死看得太重？为保六中队的先进，我答应了。

由于做荒棚记录就跟煤炭打过交道，基本分辨得出煤和矸石的区别，故大部分就业员和我相处得比较好，一旦我发现煤中夹带了矸石，他们都会捡开过磅，总的来说工作是顺利的，就是从主巷道进入煤井就得弓腰或爬着行进，是有点不舒服，若要到采煤行间掌子面那就更低了，不过我过磅记录的平台是在几个行间的总出口处，虽站不直身子，但坐在小凳子上还是满可以的。

这样干了有月余，一天，我正收捡记录夹准备出洞，突然灯灭了。我又没配备矿灯，看不到走路，只好坐在地上慢慢往下滑行。好在我平时比较注意矿井的走向和岔道的区别，大约公里多的坑巷道，我竟花了个多两个小时才摸拢洞口，喊了很久黄师傅（就业员看守矿井的）才来给我打开矿井的大铁门。他说煤班的人都说井下没人了才关的电灯锁的铁门，咋个你还在里面呢？

我回到中队都快成煤黑子泥人了，跟采煤的没有两样，大家看着我都在笑。指导员问我咋搞的？我将情况如实给他说了，他断定是有人故意收拾我搞的恶作剧。这天晚上，他集合就业员开会，黄师傅就是不敢说是谁跟他讲井下没人了的。指导员只好训斥了一顿，严正指出：若再出现这种情况就将停产追查，严肃处理。因为这不是对哪个人的问题，而是对整个中队不满，破坏生产的问题，所以不管花多少时间（指停工），都一定要追查到底，但任务一斤不减。事后，他又通知保管室每天都发个电瓶矿灯给我，以防万一。由于他在就业员中威信很高，向来说话算数，故这种事情后来就绝迹了。

一九八二年全厂大调整，犯人必须进入大围墙（新建成的，将各中队小围墙也圈在内了），严格与就业员分开。我被调到八中队。由于是紧急调动，八中队将我编入掘进工班，新开巷道。好在班长王殿扬叫大家关照着我，班上的人都对我不错，推斗车都另分配一个力气好的与我一道，除上坡我要帮着推斗车外，基本上都是站在车上滑行至倒渣处。全班都是年轻人，对我都很好，那时我也比较开心。

没干多久，中队的胡管教找我谈话，说他们了解我的情况后，决定调我到内保管室，专门保管犯人的财物。每天下班后两个小时犯人些来存放或取东西，顺便登记帮他们在外商店的购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出大围墙到厂部家属区的邮政代办所拿报纸取信件和寄信（主要是犯人经审阅同意发的信件和干部们的信件）。回队后就将报纸信件全交中队部。胡管教还交待我说，由于我要经常进出办公室办事，就不必依那些犯人到队部要喊“报告”的规矩了。其实，喊声报告也并不失格，军人进队部也得先喊报告嘛。不过，既然胡管教交待了，我就照办好了。

不巧有一天，我拿报刊信件回来进办公室，厂管教科丰大科长正与刘中队长谈话，因有刘中队长一封信，而干部的信件按要求是必须交到本人手中，我就喊道：“刘中队长，有你封信。”不料丰大科长借势发挥（因他也是对立派的），吼道：“你谢英富好嚣张，难怪不少人都说你是特殊犯人。”我也没好气地反问他：“我怎么嚣张了？”他说：“你进办公室为啥不喊报告？”我也懒得给他解释，反问他：“嚣张，你懂不懂什么叫嚣张？”他被我问住了，气得脸青面黑说不出话来。这时刘中队长赶忙打圆场说：“仅倒说啥子，快出去。”既然中队长出面招呼了，我也不想太让人家下不了台，只好闷声退出办公室。但心里明白大科长会记恨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没过几个月，厂部决定设专门严管队（即集训队），由八中队杨指导员负责（他是少数民族干部），和其他抽调的三名管教组成队部。杨指导员指名调我到集训队和其他中队调来表现好的值星员（犯人），由我当组长负责给集训人员送饭送水，掌管大小监房的钥匙。办公室要提讯某人，我们就开门将人提出送到办公室，完事后又将人从办公室门口接回关进监室内，晚上轮流值班，保证监室内不出任何问题就行了。除每天两次在监门外监督他们学习讨论外，就是到各中队去收集训人员的伙食费、粮计划（我们的工种粮是 40 多斤，根本吃不完，一礼拜两次肉，每次半斤。

而集训人员只有基本口粮 20 多斤，半月吃次肉）。

一晃半年多过去了。我在集训队也干得不错，指导员和管教都满意。一天，集训队某管教对我说，队部根据我在六中队、八中队、集训队干得很好的情况，现在又是年终总评的时候了，他们准备给我写个减刑材料上报。我一听就急了，忙说："某管教，你们千万不可这样做。我从未犯罪需要减什么刑？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会铭记在心的。"某管教也急了，但还是耐着性子劝我："你脑壳怎么转不过弯？早回去一两年在外面也好找法院申诉呀。你在这里面写了那么多申诉人家不理你，你也无法亲自去呈述嘛。"我说："没关系，大不了我把牢底坐穿出去再找法院扯。我就不信共产党的英明政策得不到落实。"后来，不少干部都为我叹惜。

由于我的性格爱打抱不平，为一次抱不平加之从前与某些人结下的积怨，厂部强令退我回中队参加劳动。中队只好将我分到拖运矿石的班组下井拖矿。那里的行间巷道是上坡，拖个空船子在滑行的泥道上行进不难，难的是装好矿石出来一路下坡，从船子后拖不住船子下滑的惯性，人只能在船子前撑住船架子后退着往下滑行，若力不能胜就有翻船打伤压伤自己的危险。开初一个星期我每天是 1000 斤矿石的任务，按单船 200 斤计我得跑五趟，其他人是一吨多的任务，放双船还得堆尖也得跑五六趟。我一身伤病哪里挡得住上百斤矿石在溜滑的船槽里的滑行冲力，几次差点压我在船子下。班长张老幺看我真的不行，每次拖矿叫我拢下坡就等他来帮我放下去，有时还帮我往船子里装矿，这样才勉强完成了任务。一星期后给我的任务加到一吨，开初两天张老幺还能帮我完成，但俗话说的"长工无力汉"，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万一再给我加码他也就无计可施了，特别是张老幺看到我为了不拖累他，竟不在下坡处等他，直接取下背带（拖板）从船子后面将船子推下滑槽，让它自行滑下，由于无人掌控，有的在转弯处、大部分到了下坡尽头就翻了，我又慢慢将矿石装进船子，尽全力拖到平台。我这样干确实太危险，他只好将实情向张干事汇报（张干事很重视张老幺，多年来他带班完成任务出色，所以在干部面前能说得起话）。其实张干事也有难处，知道张老幺讲的是实情，一时他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只好叫张老幺让我再干段时间再说。由于我的原因，班组任务完成得不怎么好，张老幺又不敢强令别人帮我。其间也有好心人帮我拖过，但这都是不可能长久帮的，唯一的办法还是只有找张干事。由于张老幺反映强烈，张干事就叫张老幺让我在平台上计数和堆码矿石，我的任务班里每人增加一船就摆平了。有了干部的指示，张老幺就好办了，班里其他人也没意见。可是不到一个月，一次，有个小青年的矿石拖不上堆子去倒，我见旁边有根拖带就拿起来勾在他船子的挂钩上，他在后面推，我在前头拉，快拢堆顶了，我想鼓口气将矿拖上顶，不料此时拖板（带）却突然断了，我的身子一下就向后倒去，正好掉进平台下等装矿石的斗车里，屁股先着斗底，一下就摔晕了。小青年吓呆了，不断大声喊"出事了！出事了！"张老幺等人赶来二话没说将我抬出了斗车，他背上我就往洞口跑。在中队门口碰到陈指导员，听说是我出事了，叫赶紧背进中队医务室。刘医生（就业员，医术较高的）一检查就断定是尾椎骨的问题，又叫人赶紧抬我到厂医院。经徐医生照片证实是尾椎骨骨折，住院治疗。每天给点七厘散或止痛药之类的，名曰"保守治疗"。后某医生透露，凡被判刑的人出了事故，都不可能花很多钱给你动手术认真医治，所以只能美其名曰"保守治疗"了事。住院月余，我基本能扶着拐子走路了就叫回队休养。

回队后无人管我，我就在饭堂一角打了个地铺，拿饭用水上厕所都方便。此时，劳改队又来了新犯人，其中有一个小青年见我打水洗脸、倒水都有点困难，就主动在吃完饭后帮我打水倒水洗碗等。和他交谈得知他是宜宾食品厂的子弟，因斗殴被判刑的。我觉得这个娃儿单纯，没啥文化，为了不让他在大染缸里染上更多恶习，就以教他写家书开始学习文化知识（这个小伙确实是连家书如何写都不懂，可见文化程度之低）。由于没有外因干扰，他静得下心来学习，不久他亲笔写出了第一封家信。劳动之余他就看报，不认识的字就问我，或抄练写字或我教他学查字典，这也算是我们的互相帮助了。他学习文化知识很努力，进步也就很快。

这时，全厂脱逃人数上升，厂部要求各中队成立监督岗，以防范逃跑。陈指导员叫我领两个伤病不能劳动的犯人成立监督岗，由我负责，并在中队坝子上方讲台上搭个小房房，安张床我住。这样，不管刮风下雪都能监视到坝子两旁监舍的动静。三人轮班，每班值四小时，基本制止了越狱逃跑事件发生。

数月后的一天，小曹（就是我教他文化的那个小青年）跑来对我说，陈指导员读报（即由省劳改局主办编印出版的"新生报"）并宣讲一个青年犯就是因为哥们义气走上了犯罪道路，在监狱很抵触，不愿参加劳动，认为他这一辈子都完了，经过干部的耐心细致的教育，认识了犯罪根源，振作精神积极劳动，最终由于表现出色，立功减刑，提

前获得了新生。小曹认为这个人就很像他，别人做得到的事情，自己能不能作到呢？他将这种思想向指导员汇报，陈指导员很高兴，鼓励他向好的榜样学习，认真改造，争取早日回去与家人团聚。我听他讲得很生动、诚实，就鼓励他把给我摆（讲的意思）的真实思想写出来，投到“新生报”编辑部去。开初他认为我嘲笑他，说自己是“连封家信都才学会写不久，怎么能写文章投报的哟。”我对他说，“刚才你就讲得很好嘛，就照你给我讲的用笔写出来，一次不行两次，直到你写来与你刚才讲的差不多了就行，有什么弄不懂的来问我，写不起的字就按我教你的方法去查字典，多学多练，没有学不会的。”于是他照此办理，写了改、改了又写，不几天就写好了。我再次给他作了修改和讲解，最后抄写好来给指导员看。陈指导员看了也很高兴，鼓励他向“新生报”投稿，开创新华磺厂服刑人员上报的记录。半月左右，小曹的文章在“新生报”上发表了，厂部为他发了奖金和表扬稿；中队为他记了一功。指导员问他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竟照实说了“就是那个谢老者慢慢教我写作的。他还说要写真实思想和想法，咋想就咋写，并照想法去做就行了。”

没多久，陈指导员找到我，说曹某某投稿的事他很受启发，特别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更应多学习、多研究，抓活思想教育人，感想颇多。他说他也想写点东西，就是组合不拢，又有点怕，新华磺厂还没有干部上过报，自己文化不高，怕没被采纳人家会笑话。我说“你在部队就是带兵的，转业到劳改队也是作思想教育工作的，你只要确立一个典型事例为主题，逐步展开，把你见到的、听到的和你的感想及做法归纳拢来，用文字真实地反映出来就是一篇文章了。眼下你可先将教育曹某某转变这个实例，联系上你对改造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今后的想法（打算）照直写出来，可能就是一篇好文章。首先不要考虑人家采不采用，只要功夫深，没有做不成的事，更不要去考虑别人笑话不笑话的问题。”后来他真写出了稿件发表，成了新华磺厂干部上报的第一人。他特别高兴，同时也很感谢我对他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八中队的地形关系，矿渣必须要运到大围墙外倾倒，故在大围墙上开了道门，由专人看守，监督倒矿渣人员的进出。上班则将铁门打开让矿车进出，并看紧推矿车人员，严防脱逃事件发生。晚上则从墙外锁上铁门，住在大围墙外修的一间小屋内作监督岗哨，有情况得及时报警。所以下班后没有干部命令是不能开启这道大铁门的。为此，看守铁门的也必须可靠、有责任心才行。由于原看门的满刑了，经中队研究让我去顶替看守铁门。这样，我就搬出了高墙过独立生活了。有天张干事、王干事到我处来察视，张干事（其实他也是对立派的，但一直对我都比较好）喊着我说：“你谢英富在集训队干得好好的，何苦去惹啥事嘛，你得罪得起哪个？厂部严令下来要我派你下井劳动，我也是没办法护着你了。你看，这下安逸了，在井下摔来杵着拐子走路，你这可怪不着我喔！”我说：“怎么会呢？你对我关照得够多的了，我感激都来不赢，咋个还会怪你呢？”从此，他和王干事经常到我岗棚来坐坐、喝喝茶、聊聊天，总带有种亲和感。

* * * * * * * *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我坐穿了牢底，回到了宜宾城。家，已破败不堪。我爱人含着泪将我蒙冤后家中的变化如实告诉了我。

一九七0年我被抓后，家庭遭灾不浅，一家人生活只能靠我爱人微薄的工资，难以养活四个娃娃，故只好将老二谢艳抱养出去了。老大很争气，几岁的娃娃看到家中困难，自动背上背篼到灰包上拾煤渣。可是，房 产公司又趁势抢夺了我家住房一间(约 30 平米)，甚至最亲的亲戚也落井下石谋夺我家房产。娃儿些受歧视遭欺负成了家常便饭。我爱人还被下放到工班参加重体力劳动。为了不增加我的思想负担，这些重大变异她都不敢对我讲，为的是要我坚强地活下来还申冤雪耻。她这才叫真正的爱人、贤妻良母啊！

出狱后，为申冤，我找了枉判我的罗由海，他说他现在管不了我的事了，叫找他领导。我找了覃淑珍院长，公安局秦秀中局长，她（他）们都说管不了我的案子，甚至说什么就是宜宾地市委的领导都没有哪个敢解决我的问题。这不就表明了问题的症结还在上面吗？于是我就不断地给省委、高院、党中央、最高人民法院写信投诉，每月一次都石沉大海，无人过问。找房产公司还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王炔子一呼二赫，说落实政策早结束了。他说的早结束是指 1982 年落实私房改造政策还我家的五个多平方的房一事。此前因我家见一孤老婆子住街边可怜，故将一小间房无偿给她居住，房产公司由此断定为出租而将房屋划入经租房而收走了。而所谓落实政策还我家五平方房一事也

是一纸空文，房产公司照收房租不腾还，恨着（霸道之意）我吃，我也把他无法。以后，为求生活去帮工无人敢雇；做生意办不到执照，也无资本（连基本的生活费都没有哪来资本）。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全家仅靠我爱人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负担十分沉重。

尽管生活十分困苦，但从一九八五年到二 00 二年，我一直都在申冤的马拉松跑道上艰难地行进着。成百上千的申诉信件，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石沉大海。中央和省里的官员们知不知道一封信将是我一家人一天或多天的菜金？这是我从全家口中抢夺来的邮资啊！申诉喊冤无人过问，但一有政治风波他们是决不拉下我的。一九八九年的"六 •四"事件，政府动用公安八方调查我是否介入或外出，经居委会主任陈友良（老公安退下来的）证实我确实在家中，四门未出，才没能把我怎样。但是，即便这样，他们依然不放心，叫陈主任对我要严加防范。此后的"法轮功"流行，官方又搞忙了，到处调查我是否加入了"法轮功"，结果他们又瞎忙了一场。我饿肚子官方从不过问，一有政治风波他们就会第一个想到我，我简直成了个"特殊"而又最低等的公民了。政治上的歧视充其量当个下等公民，但它渗入经济生活领域时，其能量比硬刀子还凶。

二 00 一年至二 00 二年宜宾市的政府工程"拆迁"（逼迁），差点要了我的老命。拆迁刚开始时，我看了布告还想主动积极配合政府这一为民办"好事"的举措。可是，接下来打着代表政府搞拆迁的"拆迁公司"在我问了一句是执行国务院拆迁条例还是执行地方的拆迁政策后，他们就给我这个曾经是"政治犯"的低等公民来了个下马威。他们声称是代表政府来办差的，只按政府出台的政策办，并处处为难我，扬言要叫法院来把我房子给我推（倒）了就是。这伙人蛮不讲理，一心只想霸着吃我。我在政治上受压是大气候所致，为啥这么多年了还要在经济上打压我？党的"实事求是"到哪里去了？气极了，也想横了，反正我也是差点死过几回的垂暮之人了，我能要求依理依法办事还怕你强权逼迁不成？反正都活不下去了，何苦在"人民的国家"里过非人生活呢？！我抱定了与房屋共存亡的决心。当他们动用推土机退垮我屋下堡坎时，我自巍然不动。几晚上屋后堡坎跨塌将我爱人吓醒起来坐着哭到天亮，几成精神病了。我到市里几大班子告状无人理，只有管段民警站出来说过公道话仍不起作用。想到老伴为我吃的苦太多了，跟着我没过上几天好日子，让她与我陪葬，我实在于心不忍。加之她劝我"老头子算了，古话说得好，民不与官斗，贫不与富争嘛，脚肚子拗不过大腿的"。管段民警徐加金、国保警官张某某也劝我"先保住命再说，只要人活着总会有讲理的地方来解决，要是你与房屋共存亡了，谁去找人评理去？"最后我想也有道理，于是将我蒙冤和房产被占等写信向党中央汇报。这次中央发函并将我写的材料批转给宜宾，南城街道也只得叫居委会来过问一下了事。我找到居委会，王主任说他们已向上级写了报告，冤案问题只有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实在有生活困难社区可以帮助解决，从此居委会就不管了。

既如此，我开始找证人取材料。有人说法院不会承认你私人取证的，但找律师人家又都不敢接我的案子。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联系到一家法律事务所的执业法律工作者帮我调查取证，费用上千元给我降为数百元。我借贷六百元缴费后，两名法律工作者展开了调查取证。正在此时，任泽鑫告诉我说张志荣很早就在找我了，尽管他也蒙冤，但他顾不了那么多，只就要出面来为我洗清冤屈。我问任，张为何不伸冤？任答："张志荣说他都快 80 的人了，家也没有了，孤身一人在民政的养老院里，申了冤还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何必费那个心，但不能因为他而让我蒙冤一辈子。"听他这一说，我才想到以矛之子攻彼之盾，以法院的判决上定的主要当事人的证明材料来否定法院之判决。为此，我要求法律工作者以主罪定的三个主要当事人和相关的知情者为我作证，形成证据锁链来推翻枉判。正好此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2002）13 号文"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意见"。二 00 二年取证结束，我写出申诉（附全部调查取证材料）到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要求立案。可是姓郑的法官（据说是立案庭关火的）连诉状都不接不看，一听说我是申诉三十年前的冤案就开吼："都几十年了你还扭啥子扭！"我也有点起火了，问他共产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怎么解释？"你们是人民法院就得为人民作主，主持公道为民申冤是你们的职责，有的省市解放初期的冤案都可以申，现在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2002）13 号文件，难道惟独你们就能因年限久了不能申冤吗？"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问什么最高法院文件？幸好我复印有该文件，立马将该文件给他并讲明我是按文件第十条一、二、三款之规定才申诉的。他看后语气才缓和点问："你有没有新的证据材料嘛？"我说当然是具备了才申诉的，并将判决两份、申诉状、调查取证材料一并交给他。他说放在那里看了再说。后来我再去找他时，他又说要把我的案卷调出来看了再说。又过了段时间再去找他，他说："你那案卷那么厚几摞，我们搞都搞不赢，哪有时间来看哟，准备给你转到审监庭，你回去听候通知。"

一晃就到了二 00 三年下半年了，审监庭才通知我去面谈。开始是姓何的法官和另一某法官，说是作个了解性的谈话。当何法官问我家庭成分和父亲伪保长身份问题时，我自然得把我和养父的关系讲清楚，涉及我是何年被谢家抱养，养父是小商，和善多病，是挂有伪保长之名，从不作恶，实际是副保长唐炳高在行使该职务，解放后党和政府实事求是，镇压了唐而没理麻（追究之意）我养父。1956 年养父病逝，从未受过党和政府任何处分，等等情况。这时，在我讲述中进来的一个人（可能是个头，不然何以敢在法官与我谈话时蛮横地跳出来训斥我呢）凶暴暴地对我大吼大叫起来："没喊你说那么多，你只答你父亲是还是不是伪保长。"一看就知他们不是真的在司法，他们只是想在我养父身份上作文章来维护他们对我的枉判。于是何法官只好草草收场，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问题今后再找你谈。"

时隔两个多月后的二 00 三年十月，中级法院竟以判我的依据是中共中央 1978 年 48 号文件，因此说我申请再审立案不符合"刑事诉讼法"204 条规定的再审条件。他们的解释是，新刑法实施前的案件按当时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或不是犯罪的，就按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处理。简直荒唐至极！明明判决书载明是一九六八年，那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均无"打砸抢"罪，十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 48 号文件规定的是四种人，即"清查和打击的打砸抢对象应是：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搞阶级报复的地富反坏分子；一贯搞打砸抢、情节恶劣、累教不改的分子；搞挟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我哪种都不沾边，更何况该文件的头子就标明"慎重处理"，何以该文件都出台一年后来判我此罪？于是我问何法官，这样拒绝我的再审立案是他的判定还是别的什么意思？他被我问呆了，过了很久他才难为情地说："你可以行使法律赋予你的权利嘛。"

我找到省高级法院，仍是劝我息诉服判。明明白白的冤案，党中央三令五申叫复查平反文革中的冤案，何以四川和宜宾就敢拒不执行？甚至最高法院（2003）13 号文件规定的他们也敢不执行？症结何在？我看还是四川省和宜宾派性的根深蒂固，阴魂不散呢。例如，原中院丁院长就说，造反派是斗争过他的；翠屏区法院覃院长就扬言造反派要申冤，她首先就通不过，除非"四人帮"平反了，否则休想。从这些，不难看出我的认为是有依据的。

说白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央发动的，也公开表明承担责任。我是响应中共党中央号召，中央也三令五申复查平反文革冤假错案；最高人民法院也以（2002）13 号文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了的，宜宾不解决，那我就只有上北京告御状了。

二 00 四年在无数好心人的支持和捐助下，我北上进京了。在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室，接待人员听了我的口述后，要我回地方找省市委和法院解决。我问中央关于文革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文件是否作废了？他们回答说中央没有出文件宣布作废的都是有效的。我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法官答复只要（2002）13 号文件规定的，地方法院都得受理，还说"最高法院在接待大厅就高悬着大字抄写的该文件，就是叫你们对照自己是否符合再审立案条款规定，用不着非找到北京来，你回去找地方法院解决。"我认为四川和宜宾不执行党的政策和最高法院的规定，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为此，我应向党中央纪委汇报。后来我又写了封信准备告四川和宜宾当局，径直找中央纪委去了。

人山人海的访客，几天都将我从前排挤到队后，再起早去排队，一开门我仍被挤到最外面去了。一天，一个像离退休的老人见我年岁大无法挤进中纪委接待大厅，就过来问我是哪里来的。他说他都观察我两天了，问我反映什么问题？我说我是响应中央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三十多年了，党中央三令五申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四川和宜宾就敢不执行。我都快古稀的人了，连饭都没得吃。综观党内路线斗争，从没有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范例，只好来向中纪委反映了。我要求不高，还我清白，给我饭吃就于心足矣。他问我有无文字材料，我说只有这封短信，想等接谈后请接谈人帮我转给中纪委的最高领导，使中央了解民情民苦。他说："原来你冤情太深了，我劝你不要再在这里来排队了，你挤不赢，挤进去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若你信得过我，把信给我，我会有办法帮你交上去的。"一听就知是好心人，我能不信这样的老年人吗？于是我就拜托他帮助我了了心愿。第二天专门去毛主席纪念堂拜别回川。

到省高院仍是爱理不理，叫把材料给他，回家等待。找宜宾中院，钟副院长竟称文化大革命申诉的是一批人，只有中央专门指示或发新文件下来才好解决。我再找中院要求按国家信访条例召开听证会，法院只要能拿出我犯罪的铁证，从此我决不申诉了。若拿不出铁证证明我犯了罪，而我能拿出证据证明我根本就无罪，法院就得给我平反昭雪。

骆副院长说：“老同志你何苦要这样将我们呢，你的目的我清楚，何必这样嘛。只要上面同意我们就着手办理你们的案子就是了。”

二 00 四年十月，正当我一筹莫展之际，接到宜宾市翠屏区法院电话，通知我到法院有要事找我谈。当即我就赶到区法院，刘姓法官和姓向的法官接待的我。刘法官很客气地倒杯水给我后说：“你给中央的信批转下来了，我们院领导非常重视，命我们先找你谈谈，了解你的诉求，好向院领导汇报，看领导最后给你怎么解决。”我将怎样蒙冤三十多年及申诉无门被逼进京上访等详情谈了后，他们要我重写份申诉连同判决书交给他们，他们好向院领导汇报请示解决。说来他们也就是奉命接谈，就跟医院的挂号室一样，最后解决问题那就是院领导的事了。当时我还是很高兴了一番，以为不枉北京之行，中央还是重视老百姓的问题的。同时我也非常感激北京那个好心人，毕竟是他帮了我个大忙。

同年十一月，我再次到翠屏区法院，范院长接待我并亲口对我说：“你的案子是经过中级法院二审的，应由中级法院解决，他们硬踢给我们区法院简直没道理，所以将督办函退还中院了。你直接去找中级法院，要中院给你解决。”我又去了中级法院，钟副院长竟说她没见到过中央发来的督办函，叫我找区法院。就这样中院叫找区法院，区院又叫我找中级法院，我竟成为了皮球被他们踢过来踢过去的玩弄了两个多月，后来竟不知中央那个督办函到哪儿去了。

每月 15 号是宜宾市中级法院院长接待日，我们这些被钟副院长划成一批特殊的“反革命”，不管刮风下雨或烈日当头，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接受院长接待。最终我们越聚越多，真的成了一批了。我们要求见正院长阮世伦，无数次的寻找或登记约见，最后找到了阮院长。他只接见我们派出的代表，在接见时竟问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是不是该他们解决？代表们举例由中级法院在八十年代复查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案例，甚至宜宾中院不愿纠正的在宜宾与泸州分家后，别人回泸州申诉就得到了正确解决的案例后，阮院长叫我们收集几个宜宾中院解决了的文革冤假错案案例（法律文书），只要有几个样板他们就照样解决我们的冤案问题。我们听了还是高兴的，大家随即分头去找“样板”，有的人不顾长途跋涉到百里之处的区县寻找。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哪，月余，我们收集到了十多个案例材料，即法律文书复印件，而不是阮院长说的只要几个。可是，等我们拿着这些材料到中级法院，就再也找不到阮院长的影子了。托郑法官转交并亲投法院内阮院长信箱无回音。再托钟副院长转交同样得不到答复。问郑法官，他说院长到哪里去了是不会给他们小办事员说的。我们又找钟副院长并讲了阮院长的承诺，钟副院长则说，“阮院长怎么表态的我不清楚，阮院长也没给我说过。既然是他表态有样板就给你们解决，你们就找他好了。要我表态我还是那句老话：要等中央新发文件下来指明具体该怎么解决我们就照办。否则我无能为力。”郑法官（此时已提升为法院信访办负责人）给我们说：“老实说我们法院是很同情你们的遭遇的，大家都愿意帮你们复查纠正。平反并不难，难的是善后事太多，如补发工资、国家赔偿、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问题就来了。我们法院只管断案，没有经济来解决善后事宜，所以拿着你们的问题很难办。”

这就是人民的法院；这就是法院办案的原则！

三十多年，对一个个人而言，是个多么漫长的概念呀？！可是，我们的国家机关，根本不考虑蒙冤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怎么生存、怎样个过法！

其实，我们的冤屈早在一九七二年经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1972）14 号文件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的报告中业已指出：这是一些人利用“一批双清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混淆了阶级阵线，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的冤案。按照党的政策我们应是共产党的忠实臣民，是跟共产党走的革命群众，而不是反对革命的罪犯。按照法律，没有事实根据（铁证），仅凭逼供信得来的材料出入人罪就是枉判。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审视，我都是清白的。

法院不讲理，申诉无门，冤情难申，看起来简直成了无法了结的了结了……

二 00 四年修改稿

谢英富：刑事申诉状（2006 年 9 月）

具申诉人：谢英富，男，67 岁，中学文化，……

申诉事由：因原宜宾地市两级法院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致其判决事实失真，且适用法律不当，造成我蒙冤 15 年（含冤三十六年），致我生存权丧失之严重后果。现依据“刑诉法”204 条提供新证据，按最高人民法院（2002）13 号文件之规定提出申诉，要求人民的法院本着党的“有错必纠”原则，以“实事求是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治国大纲，再审立案，还我清白，给我饭吃！

理由及事实

一、“刑诉法”204 条之规定，如有新的证据应立案再审。故贵院于 2004 年以不符合“刑诉法”204 条之规定拒绝立案再审是不合法的。

二、我依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2）13 号文“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即司法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之一、二、三款，第十条：“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申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申诉的应当受理；超过两年提出申诉，巨头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受理”之一、二、三款规定的申诉，是依法有理的。

三、贵院 2004 年拒申以“新刑法”实行前的司法解释：“新刑法实施前，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是牵强的托词。判决书载明的事情是 1968 年的事，而 1968 年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均没有打砸抢犯罪。1970 年是以“现行反革命”公捕我的（有军管会出的十大罪状的“逮捕通告”可证）。到 1979 年判决能叫当时？更何况用十多年后出台的文件治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之罪，严重违反了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则。好比是从前打虎不犯法，总不能等若干年后“保护野生动物法”出台了，把从前打过虎的人弄来判罪啊？！事隔十余年能叫当时？这个“当时”的概念难道无限期么？

四、贵院 2004 年拒申通知称：判我的罪是依据了中共中央 48 号文件是站不住脚的无力辩解，其理由不能成立。中共中央 48 号文件标题就有“慎重”二字提醒不说，文中还明确（第三条）“清查和打击的打砸抢对象应当是：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我没行凶更未杀人）；搞阶级报复的地富反坏分子（我是工人，学生成分）；搞挟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我无嫌可挟，与人无仇怨可报复）；一贯打砸抢，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我打过谁？砸过什么？抢了何物？谁有屡教过我？）。”我根本不属上述的四种分子，何以要断章取义、生搬硬套来强词夺理？

五、判决严重失真，就事论事足以说明我无罪。现仅就判决定的三大主罪而论：

1、观音事件：判决书认定的主要当事人张志荣证实，我不仅没下令他看守田明贵，而且我根本不在事发现场。有张德建、任泽鑫等相关知情人证明，构成证据锁链是铁证。

2、黄舣事件：判决书认定的主要当事人孔庆银证实，我到成都出差去了，根本不在泸县黄舣，也根本不是他带人去抓的付万全。有付文琪、邓跃光等相关知情人证明，构成证据锁链。更别说两院判定时间竟相差一日和判决已载明了“致使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的，也非我杀人，事实根本就不清。

3、董永昌事件：判决书认定的当事人钱兴华证实，他从未刑讯逼供过任何人，根本就不存在受我指使逼供致死董永昌了。相反，为此事军管会和对立派为了逼钱承认此事，竟弄他到水上派出所船上，刑讯逼供了他七天七夜，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过。此事有相关知情人张德建、卢兴隆证明，构成证据锁链为我作证。由此也可见到底是谁在搞逼供信。

六、我被判罪，据原宜宾市法院判决书称是宜宾市公安局公诉我的，根本不是事实。2005 年 4 月宜宾市公安局成局长在他办公室公开否认说："说我们公安局公诉你是不符合事实的。众所周知 1979 年检察院早已恢复，公安局的公诉机关资格早已取消，何以硬要说公安局是公诉机关公诉的你？"成局长说的这点，我个人认为是有道理的。办理我"案"的主要人是罗由海，据说以前是法院的书记员。而且，判我一案自始至终直至终判，基本都是他在审我。其间也曾有个叫王家声的办过我案，调查过黄舣事件。1981 年他到新华磺厂找我调查李良时就承认是他亲到泸县黄舣调查我的，而且他自己也说当时我在成都出差，确实不在事发地，故他的结论是黄舣事件与我无关。不知为何罗由海要定我此罪。因此，说公安局公诉我是没有道理的。

综上，敬请人民的法院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党的英明政策，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立案再审我三十六年之冤案，还我清白，给我饭吃，维护党纪国法之尊严！

此呈

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冤民

谢英富亲笔

后附法律事务所执业法律工作者调查取证材料 17 页

二 00 六年九月二十日

原宜宾法院一、二审刑事判决书法刑（78）字第 59 号

宜宾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78）字第 59 号

案由：打砸抢

公诉机关：宜宾市公安局

被告：谢英富，男，38 岁，宜宾市人，汉族，家住本市上走马街 52 号，现在押。

宜宾市公安局公诉谢英富一案，业经本院审理终结，现查明：

被告谢英富 1968 年 8 月 24 日调动四辆大卡车，一百多名武斗人员去宜宾县观音场，指挥抓捕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蓄意挑起事端，其武斗人员周洪英将观音区邮电工人田明贵抓来交给谢犯后，即遭枪杀。事后谢犯又指使母光汉等贴出数张所谓"通告"，企图嫁祸于人，同年 7 月谢犯带领武斗人员在泸县黄舣时，谢犯听从诬告，22 日非法下令武斗排长孔庆银代人抓捕了泸县黄舣公社第四生产队，正在田间劳动生产的共产党员，生产队付队长付万全和贫农社员罗永祥。由此，造成付万全被枪杀。同年 10 月 28 日谢犯指使城区公社的钱××刑讯逼供小五金厂的董永昌，将董逼死后，谢犯又策划、制造董畏罪自杀的舆论，企图掩盖罪责。同一时期，谢犯还先后在泸县、隆昌等地纵容个别坏人大搞打砸抢、刑讯逼供、假枪毙、残害无辜群众。恶劣的是谢犯被捕，在审查期间，仍不思悔改，竟而在 1974 年参与在押的现行反革命犯罗太安等人破坏监规，"绝食"威胁，策划闹监，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故由宜宾市公安局起诉来院，要求惩办。

本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谢英富品质恶劣，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疯狂进行破坏和捣乱，大搞打砸抢，残害无辜群众，造成付万全、田明贵二人遭枪杀，董永昌被逼死。恶劣的是谢犯参与策划闹监，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其罪行是十分严重的。本院为严肃国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维护社会秩序，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特依法判决如下：

判处打砸抢犯谢英富有期徒刑拾伍年。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四川省宜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

四川省宜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刑上（79）字第 34 号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谢英富，男，38 岁，汉族，工商业出身，学生成份，初中文化，宜宾市人，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八日逮捕，捕前住宜宾市上走马街。

上诉人谢英富因打砸抢一案，宜宾市人民法院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以法刑（78）字第 59 号判决，判处谢犯英富有期徒刑拾伍年，宣判后，谢犯不服，以事实不符为理由，上诉我院，本院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由刑事审判第一庭付庭长朱划启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赖大森、杨联华组成审判庭，书记员陈学茹担任记录。依法进行审理，现查明：

上诉人谢英富一九六八年三月带领一批武斗人员，前住宜宾县观音区，指挥抓捕革命群众，当宜宾县观音区邮电局工人田明贵被非法抓捕后，谢犯下令张志荣看守，致田明贵被张枪杀。同年七月谢犯带领武斗队住泸县黄舣时，于二十三日下令孔庆银带人非法抓捕泸县黄舣公社第四生产队正在田间劳动生产的共产党员、生产队付队长付万全和社员罗永祥。致使付万全被他人非法审讯后枪杀。同年十月谢犯指使钱××刑讯逼供宜宾市小五金厂董永昌，并下令将董扣留反省，活活将董逼死。同时，谢犯还先后泸县、隆昌等地，私设监狱，刑讯逼供，残害群众。谢犯被捕

关押期间，仍不悔改，继续进行犯罪活动，一九七四年多次参与在押犯罗太安等人破坏监规，闹监“绝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后果严重。

本院认为：上进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谢犯在上诉中所提理由不能成立。为严肃国家法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刑，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宜宾市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法刑(78)字第 59 号判决，判处谢犯英富有期徒刑拾伍年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二、谢英富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再上诉。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宪徽：《 脚 印 》后 记

读完（录完）全文，深深地为老谢的经历所震撼。那场伟大的运动虽然为宵小污蔑诽谤，一时曾甚嚣尘上。但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时间越久，我们就越深刻地领悟着这个伟大的真理。老谢希望给他的《脚印》写个评论，我也以为，读完了怎么也会有些感触的。但读后却似感慨良多，头脑里总是萦绕着这样几点，说不上是评论，只能是通过老谢的经历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认识罢了。

启示一：老谢在文革前只是一名普通工人，然而，经过大革命的洗礼，经过监牢的磨难，他对自己这个阶级的命运却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而且，正如他对劳改队的陈指导员所说：“只要确立一个典型事例为主题，逐步展开，把你见到的、听到的和你的感想及做法归纳拢来，用文字真实地反映出来就是一篇文章了。”当他把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按照这个“典型事例”叙述方法写出来，也就成为了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在人民创造的历史长河中，以往的历史叙事大都由剥削阶级代言着，只有在那些民间流传的古老的故事中能够窥见到劳动者创造世界历史的印记。如今，尽管官方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下编纂了文革史，像几千年来的历史叙事一样抹黑了人民群众和他的领路人，抹去了劳苦大众，但毛泽东交给人民的道理却已在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人民群众不仅用他们的劳动创造着历史，而且，曾经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还要用笔、用键盘，记录下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录下他们奋斗的艰辛，记录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气风发和辉煌，以及那艰辛、那辉煌对未来的启示。历史的风将随着千百万群众的加入而越来越猛烈。

启示二：读着老谢的叙事，例如武装支泸的发生、造反派不断受到的打压、把牢底坐穿、上访申诉等等，不禁想起人们对某些人的评价。人们不会忘记，1976 年后发生的大倒退，同时也伴随着对某些人的歌功颂德，而且至今也不容批评。在复辟者给大小四人帮定罪时，也给他们安上了反对某某人的罪名。可是，三十年来的实践却告诉我们，复辟者在反毛非毛的同时，按照他们在五十七年前就想走的路，走上了一条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已堕落成为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此，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在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面前，我们完全有必要按照毛主席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重新思考一些已成定式的问题。

启示三：在残存着社会主义因素的法制框架中，学会运用各种有利手段，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长远利益而斗争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的同志认为，被复辟者打成“反革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的光荣，复辟者已经通过他们自己的行为把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决不能向反动派投降。我很钦佩这样的同志，我们当然不能向反动派投降。但同时也要看到，正如老谢写道的：“我们这些被钟副院长划成一批特殊的‘反革命’，不管刮风下雨或烈日当头，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接受院长接待。最终我们越聚越多，真的成了一批了。”我想，有无数这样一批一批觉醒的人们，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兴就是大有希望的。而产生无数这样一批一批觉醒的人们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必然，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也毫无疑问是会必然发生的。

宪 徽

二〇〇六年十月二日

宜宾文革史料

为有牺牲多壮志——北京红代会张玄杰、王俊英烈士宜宾遇难记

雨更大，风更紧。黑云翻滚压戎城。

在四川地区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直接指使下，五月十四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 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猖狂的反扑，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多少红旗派的战士遭到石块的袭击。多少红旗派的战士受到木棍、铁棒的毒打；多少红旗派的战士死在暴徒的砍刀下。刚刚抵戎的我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战士心血在沸腾，怒火在燃烧，为了制止事态的发展，一批批红代会战士走到 x 分区要求接见，却遭到门岗的无理拒绝。

制止事态的发展是 x 分区的起码的职责。要求 x 分区制止事态的发展是我们红代会每个战士的责任。经过我们充分地讨论，统一了思想，十二时左右整队到了 x 分区门前，再次要求接见。但是 x 分区某负责人百般刁难，始终没有答应我们提出的起码要求。

四点五十分左右，桥工联、红工联、32111 野战兵团等暴徒数千人从翠屏山上冲下来，直冲到 x 分区门前，一些无组织的群众边撤退，边阻击，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伤亡十分惨重。面对这种情景，“与宜宾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伟大誓言在每个战士的耳边回响。我东方红战士主动把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站在 x 分区门前，防止群众与 x 分区发生冲突；一组高举着“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的大旗横排在马路上，组织群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重伤躺在马路上，躺在暴徒队伍的前边，能不抢救吗？不能！不能！张玄杰同志把东方红的大旗交给了其他同志，第一个走出了队伍，毅然地向暴徒走了过去，接着其他三个同志也跟了上去。未经交涉完毕，

穷凶极恶的暴徒一棍打在张玄杰的头上，接着又是几棍，张玄杰头负重伤，倒在地上。

在 x 分区门前的王俊英同志，领着群众流着眼泪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冲到分区门口的暴徒在群众中乱打、乱砍，人们躲闪着，后退着，王俊英同志的一只脚刚刚退到 x 分区门内，就被一个人猛推了出来，暴徒看见王俊英带着红代会的臂章，狠打起来，王俊英同志倒在血泊中。

暴徒们退走了，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分别被送进了第一、第二医院。医院的大夫们，为了抢救红代会的战士，千方百计优先给他们医治，但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次日光荣牺牲了。

大夫们，红旗派战士们，含着眼泪传送着张玄杰、王俊英牺牲的消息。岷江在翻滚，金沙江在咆哮，整个宜宾爆炸了。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实现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伟大誓言，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张玄杰、王俊英和其他牺牲的红旗派战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鲜血，唤起了千百万人民的觉醒，他们拿起了武器，战斗了。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1967 年 7 月 17 日《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宜宾专刊>》第 3 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宜宾专刊>》pdf 下载：

10.3M 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宜宾武斗调查专刊.pdf

已经成功地保存在 Mofile

文件提取码： 8618589412031553

当您的朋友需要提取此文件时只需:

匿名提取文件连接 http://pickup.mofile.com/8618589412031553

或登录 Mofile，使用提取码 8618589412031553 提取文件

或者到下列地址下载：

http://www.lswx.org/doc/index.php?dirpath=./文化革命/各省文革资料/四川&order=0

李井泉荒淫无耻腐朽不堪的生活

生活上的腐化是一个革命者变质的重要原因，生活上的腐化和政治上的堕落往往联系在一起，就从李井泉荒淫无耻腐朽不堪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作风是何等的下流，灵魂是何等肮脏，就可以看出李井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而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一、花天酒地臭气熏天的舞场生涯

李井泉之流是一个老舞迷老戏迷。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经常为李井泉这些“首长”们演出，举行交际舞会。

所演的戏曲都是些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什么“祭棒捶”“画梅花”“化子骂馆”等腐烂发霉的黄色戏。李井泉等看戏时，不站也不坐，而是躺在沙发上看，演员们愤怒地说他们跟解放前那些看堂戏的旧官僚一样。

跳舞厅不算大，但是布置特别华丽，厅内设置各种彩色灯光，地板每隔一天就得用蜡抹一次，地面弄得象镜子一样光滑。厅的周围有沙发，厅外有供打麻将、 打扑克，休息的场所，后面还设置电影院。这一切是专门为李井泉这些大官们准备的，他人不得入内。

“首长”者，成都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廖井丹、公安厅秦长等人是也。重庆的李井泉、任白戈等人是也。人数虽然不多，可是为“首长”们伴舞的人可就多了，在成都有来自省歌舞团，省人艺，市曲艺队，市歌舞团，市杂技团等单位的女演员，在重庆主要是来自重庆市歌舞团，交际处等单位。条件是“高个子”，“漂亮”，“年轻”，凡是要开舞会了，就派小汽车去接，有时女演员下乡了，但只要这些“首长”们舞兴大发，还得派小汽车去接回来。李井泉等还恬不知耻地说是“完成政治任务”。伴舞者全是化妆，抹口红，穿奇装异服，头发梳得泡泡的。

舞会开始，顿时灯光绿暗，军乐齐响，这时，“首长”们就一个个找着舞伴，首先是怪声怪气地用半通不通的普通话下流的问：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在哪个单位……”呸！真是令人发呕！

乐队奏的是黄色情调，如《天涯歌女》之类，同时外加伴唱，唱的也不外是《天涯歌女》《九九那个绝阳天》、《谢曼拉达》……。

一曲奏完就得休息，众女服务员手托一个小盘子，上面放着热毛巾，递给每一个擦手，下曲开始就要换一个舞伴，每曲都得换人。在这中间，李井泉总是要找最漂亮的。……

跳累了就休息，“首长们”多半一手拉住一个女演员和自己挨坐在一起，其中以廖井丹、李井泉为最典型，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休息时演戏曲，什么清音《小放风筝》、《青杠叶》。真他妈的腐朽发霉！臭气熏天！跳够了，又可以打麻将，玩扑克，看电影，电影上映的大多是香港片，如《豆叩年花》，（全是跳扭摆舞）《美人计》，《雷雨》（全是谈情说爱）……。

在重庆，跳舞之后，“首长”们还要女演员陪他们到温水游泳池游泳！

李井泉不仅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的舞场生涯，而且还企图以此来拉拢腐蚀年青一代。一九六〇年五月刘××来四川，李井泉专为他举办了一个国际舞会。并以“刘××接见省市青年积极分子”为名叫交际处，团市委到各高等学校物色大量的女同学作舞伴，整个舞会荒淫奢侈到了极点。

玩乐的方式也是五吃八门【析世鉴：“五吃八门”，原文如此， 】。除跳舞看戏游泳外就是打牌，麻将扑克乱戳，

样样都会。最感兴趣的是英美的桥牌，他在南充蹲点时用专机从成都把“桥牌专家”，省委统战部的×处长接去打桥牌；醉生梦死地玩乐直到深夜而清晨常常是十一，二点钟了才起床。

二、几则典型生活事例

1．吃：

⑴ 李井泉在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白天睡觉，晚上跳舞。一天，李井泉想吃仔鲢鱼。他的专门办生活的人找人四处去寻，找不到，就打电话到成都买了，急忙用当天的飞机从千里之外的成都空运到重庆，李井泉方才吃上了仔鲢鱼。这就是众人知道的用飞机千里迢迢送鲜鱼。

李井泉还想吃长寿湖的鱼。当时市上的鲜鱼极少，多是冰冻鱼。又专派人到离潘家坪招待所二百多里的长寿湖去，捕得鲜鱼，送回招待所，专门的厨师做给他吃。

⑵ 李井泉想吃麻雀肉。李井泉住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鱼肉吃厌烦了，还想吃麻雀肉。就叫人给他捉麻雀。准备由高级厨师做成名菜，好请客。于是派几名工作人员拿起气枪去打麻雀。可是，一打呢，逃的逃了，飞的飞了，打了一整天，只打了百多只。麻雀又小，太少了，莫奈何，李井泉大失所望。这一百多只麻雀只好由工作人员自己处理了。

⑶ 李井泉吃鹅脚皮。李井泉的厨师朱自诚说：吃鹅脚皮是富有营养的。吃法是这样的，把活鹅的脚板洗干净，鈇板放在火灶上烧红，把鹅放在上面。鹅就跳来跳去，就这样烫熟了再吃。他又说．这种吃法太残忍了，在这里（峨嵋机械厂）就不吃了。

2．住：

李井泉住的是富丽堂皇的洋房。一九六二年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困难大修“书记院”，为此赶走二百多户居民。每幢楼房都有高级特制的设备：暖气，专为各家洗澡的小型锅炉，提花地板，地下室，高级地毯。每年烧暖气由国家开支，六二年开支一万六千二百四十四元，一九六三年，又开支二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元。他们出去住的是高级招待所。在南充“蹲点”时因地委招待所没有暖气而从成都专门运去了电暖气炉。他要到哪个公社去，事先得用火把屋子考热备用，甚至外出“视察”工作也是坐暖气车船。

为了专供李井泉等人享乐，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和重庆潘家坪招待所专门修了室内游泳池：长三十五米，宽十五米，平均深二米九分容水四百九十七立方米九百立方分米，用人工加热，李井泉在那里住时，每星期换一次热水花十一、二吨左右煤（加热七吨八百公斤保温一吨三百公斤）用去人民币上千元以上。

3．医：

李井泉等人生病，要专家诊治，而且随叫随到，迟到一分钟也不行，必须提前等候“病人”就医。只有“高级”护士才如他们的意。

李井泉等专搞的“省三门诊部”是只为他们少数特权阶层服务的门诊部，几年来一直是这样里边有专门的医务人员，护士，甚至还有“备用医务人员”，在那里等候给“首长”们看病，使医务工作不能很好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

这些护士也不过是一群佣人，任其摆布、刁难，护士整天就是给他们料理衣服的加减，饮食营养调配，擦汗、洗澡、洗脚、擦脚、捶背、按摸，甚至给他们洗庇股等等【按：“洗庇股”，原文如此。】，李井泉却说这些都是他们（护士）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而他们自己却成天游山玩水，打麻将，玩扑克，吃喝玩乐。（按：这完全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官僚贵族）。

李井泉等人大搞特殊化，经常吃稀有的高级补药，营养品，我国自己造的还嫌低级，要外国的，而且就是一般药品也喜欢外国的，此如一般感冒片也要日本的，青毒素、链霉素都指定要美国的、英国的。（按，李井泉完全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奴才！一个崇洋的家伙！）治病服药根本不由医生决定，而由自己选择。他们每月医药费不少于二百元，仅五年（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就花医疗费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七元共超支十万四千三百八十元，超过应开支的百分之三百。　（按不知他们糟踏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劳动结晶啊！）另外，再看下表

这还不算，他们把进口的（有的是全国只有一、二的）医疗器械作为自己的专用品，随时使用。

“一人当官，九族同荣”。李井泉等人的家属和他们那些“高级首长”的医疗待遇，并且还要报销其费用：这和过去的封建地主官僚贵族、资本家还有什么两样呢！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特权阶层有什么两样呢？！

4．工资

李井泉拿国家财产当儿戏，挥金如土，可是李井泉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却是有空必钻，有便利必占，部队实行工资制后，李井泉就不在省委领工资，而跑到军区领工资了，原来工资四百多元仍不满足，见部队工资高，就赶快挤到那边去领工资。

三、挥金如土、骇人听闻，半个月就吞掉上千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至十八日，李井泉和李大章为了避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逃难”到峨嵋机械厂过安乐生活，大肆消耗人民血汗，过着极端腐化奢侈的生活。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偷偷地来到成都峨嵋机械厂招待所。借开会为名，进行“避难”。李井泉和李大章害怕被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看见，经常调换自己坐的小汽车。由伏尔加换成长沙，长江，红旗牌，有的车子把牌照都取了。他们坐的小汽车停放的地点经常变，今天停在这儿，明天停在那儿。车开到招待所的门口，一下车就有很多人护拥着他们上楼去。如果过路的人看一下他们停的小汽车，峨嵋机械厂的副厂长叫王寿玉科长和李长英所长跟踪监视这个人的去向。有一次跟踪一个人达三小时之久。

十一月三日，峨嵋机械厂的领导，说“有紧急任务，要开重要会议”，就把食堂里的人调到招待所食堂担任管理员，会计员和采购员。并且规定几项纪律：第一，各食堂调来的炊事员及其它工作人员不回家，不通信；第二，休息时间不准外出；第三，不准暴露首长的秘密（指李井泉和李大章等）。这样影响了炊事员和他们家庭的和睦关系和生活，炊事员不能对家里人说明情况，家里人耽心。李井泉和李大章教育下面的人说，只准把伙食办好，就是完成“政治任务”，也就是学好了毛主席著作。

2．仅仅是为了服侍李井泉和李大章过舒适生活的高级服务人员就有四十多人。其中有秘书，汽车司机，高级厨师，警卫员和漂亮的医生，室内服侍员，室外服侍员和护士等。李井泉和李大章每个人就要五、六个高级厨师给他们作饭。

3．李井泉和李大章吃的是最高级的营养品和很难在市上买到的东西。例如鸽子蛋，上等虫草，干贝，海参，竹笋，鸽子和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在冬天（十一月过了），李井泉和李大章还要吃新鲜海椒，新鲜丝瓜，嫩江豆，四季豆，新鲜黄瓜和水果等。除以上那些外，李井泉和李大章还要吃活的大沙鱼的嘴皮，弄得采购员昏头转向，四出奔跑。还要吃鸭舌头，鸭舌头要抽筋，买了三斤，只作一盘菜，吃了几口，就倒了。李井泉和李大章要吃狗肉，要食堂的给他们买七、八斤重的小狗来杀，这件事还没得及办他们就溜走了。李井泉和李大章一顿吃十几个菜、一个菜挟儿筷子就倒了。李井泉和李大章吃的大白米也是讲究的，厨师对炊事员说：“煮饭前，要把米一颗一颗的选过，不准有一颗沙子、稗子和一个米头子。如果发现有这些，怕说你们有政治暗害，弄得你脱不倒手。喝豆浆用的黄豆，必须把黑豆子一颗一颗的挑出来，不挑干净就不得行。当管理人员看见两个人每天吃那么多的东西，

吃一点就倒了，很可惜。他们的厨师说："浪费这一点算什么，每天每餐除你们这里以外，锦江饭店，金牛坝都是同样的准备，不管吃不吃，都要准备好。钱吗，反正是实报实销。"

李井泉和李大章每人每餐要吃五个小锅荤菜，三、四个素菜。每只鸡只炖一小碗汤，要厨师做得吃鸡不见鸡，吃鱼不见鱼，吃肉不见肉，吃豆芽去两头，吃青皮豆要剥皮，三、四斤重的大白菜只要一两左右的嫩心心。要吃"赖汤元"的汤元，"陈麻婆"的豆腐，"朵颐"的泡菜。买这三样东西要到西南局和省市委去开介绍信，又怕暴露他们的住处，不敢去开。硬叫采购员去买，买不到不行。最后只好叫峨嵋机械厂运输科派两部小汽车拉着采购员满城奔跑，才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吃特产"张擦"的鸭子，玉龙餐厅的白米糕，广东的"蜜珠"（驼背子肉），浙江的哈马油，十一月间的鸡蛋大的南瓜，要吃两斤以下不上粉的冬瓜，十一月间的青蛙、泥鳅，买不到只好派五、六个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到水沟里去摸。李井泉和李大章还吃雄鸡的鸡肾子，公羊的羊肾子，牯牛的生殖器，牛尾巴等。

李井泉和李大章要吃名产水果，沙田的柚子，合川的雪梨，市上买不到，采购员从水果店内部给买回来，他们还说"要不得"。李井泉和李大章他们吃梨子时，先削去皮子，只削下四片，其余丢掉，再把四片切成小方条，一条上插一个小牙签，摆在盘子上，端给他们吃。

李井泉和李大章在峨嵋机械厂期间，想吃灌县的名产豆腐，用长途电话通知灌县的县委书记，叫他亲自督促。厨师说："我看见县委书记用头顶着送来的。"还说；"几次老头子想老四川的名产'江团'，用长途电话叫合川的县委书记，限他三天送到成都"。有一次，李井泉和李大章想吃有种新鲜蔬菜，跑遍了西南区各个地区都没有找到，最后把商业厅厅长叫来训了一顿，后来，厅长不惜一切代价，派五个采购员乘飞机到广州去买，买到后又用飞机把蔬菜运回成都。后来周神气十足的说："还不是按这里的市价几分钱一斤买给老头子吃的。"周还说： "李大章今年叫我去买核桃，在省委内的服务社里买来后，我锤给老头子吃，发现其中有三个坏的，老头子大发雷霆。马上打电话给商业厅厅长，把他叫来训了一个多小时。"

"老头子要吃斑鸠"。管理员说："这个好办，晴天我拿鸟枪去打。"朱致诚说："死的谁要？"管理员说："活的那能搞到"朱说："到动物园那里去，只要说是西南局和省委要，他不敢不给。"李井泉要吃活斑鸠，不惜到动物园去把仅有的一只都弄来了，价钱是一元二角。

4.揭开秘密会议的真相。十一月三日深夜一点钟左右，峨嵋机械厂的赵继下令有关单位开了一个万分紧急的会议，扬言这个"'重要"的会议是什么"秘密，秘密"。

会议布置了吃饭，住宿，搬住房的任务，事后还说要收集下面的反映……。峨嵋机械厂的杨惠英、罗永发等二十人是这次"秘密"会议的执行者，他们是清楚的。十一月八日，他们科的很多人到房产科搬了几十张床，桌子、凳子到一一五幢三楼，大家忙了一个下午。十一月四日厂里的星期天，还有二十多人加班，一部分人布置一一五幢三楼房间，一部分人到招待所打扫布置，军方代表也加班写毛主席语录。为了开这个"秘密"会议，不顾一切把原来的客人赶到一一五幢去。在布置一一五幢吋，变化无常，朝令夕改。一会儿从这间屋搬到那间屋，一会儿从那间屋搬到这间屋．一会儿把蚊帐取下来，一会儿又挂上。一会儿叫把床安来朝东，一会儿又叫安来朝西。二楼有几个套间，都只安一张高级弹簧床，海绵垫子，缎子被盖，地毯铺满，外面还有沙发，专用电话（通北京），一间专用餐厅，一间"秘密"会议室。

十一月十日起，又换成了新的花样。几十个人把原来的被子换成崭新的缎绸被面、被子、床单，枕巾换成新的。把原来给苏修专家用的东西都拿出来供这些老爷们。地板上铺了价值一千元的民族地毯。又在晚上进城拉回了六十张藤椅。汽车到招待所，赵继忙说："别人已经来了，你们轻点！"于是赶紧悄悄地把椅子搬上楼去。在布置的过程中，三机部专门派人指挥。

在开"秘密"会议的过程中，不准点灯，路灯也不能点，开水房的灯也不能点，门前设两名精干的岗哨，白天昼夜都不能离开，上厕所也得找人顶班。行人在招待所前面路上，立刻就询问：你是什么单位的？干什么的？这些人半夜来， 一会儿又走了。

峨嵋机械厂的工人揭露，开“秘密”会议布置所用的东西有贡缎等四十多种，物资总共花钱二千零七十元零五分。

5．十一月一日晚两点钟，召开会议的罗佛云通知三食堂的某工人到招待所开“秘密”会议。并且说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不要拿出去说就行了。工人问他（罗佛云）是什么会，他说有很多远方客人要到厂来开会。赵继还一再叮嘱三食堂工人，任何人都不许进来，就是职工来也要叫他们在门外等倒。特别是红卫兵更不要他们进来。专门派人在招待所巡逻，门也有人把守。会计员算账都不准外面算，要到保管室里面去算。屋子周围的窗户完全用窗帘搭着，不许任何人揭开。

赵继不但亲自为李井泉和李大章作保卫，而且把一切餐具更换一新。李井泉和李大章等人要吃猪冲嘴，新鲜的腿子肉，火腿，吃团鱼要边边上的一点点，吃鸡肉要吃翅膀下面的肉，吃鸽蛋汤等等。李井泉和李大章在峨嵋机械厂十多天，伙食费就是亏本一百多元，还说没有什么关系，到西南局报账就行了。

6．从黄明和赵继等看李井泉和李大章等究竟是什么货色？峨嵋机械厂工人黄梅英、冯达中、杨立权等四十余人揭发。十一月初，峨嵋机械厂福利部门的当权派赵继，接到他主子的命令，马上叫会计员抽两名到招待所，帮助工作，并说：“三机部要开一个重要会议”。把招待所原来住的人全部搬到一一五幢。福利科全体人员出动来了一个大搬家。膳食科也把食堂的人员全部调过来。三机部的孙部长到过厂，同样是与外来客人住在一起，同样吃便饭，并没有那样的特殊化。

当时，对工人们来说，不知是什么高级官员，就不能让群众看见。

赵继把人民的钱拿来大买特买，买的家俱有瓷碗、江西花心盘等二十一种，共花钱四百一十七元九角三分。这些都是新买的，加上食堂原有的，那数字和金额就更大了。这些东西都是开几天会搞的大排场。

厂里工人邹永开等四人揭露，安装取暖用的电箱，电灯，除包括招待所公布的外，由房产科拿去的器材供李井泉和李大章他们用的就达二十种，共计一百五十三元。

7．李井泉和李大章怎样从峨嵋机械厂溜走的，十一月十五日，听说十六日成都市红卫兵要来厂串连，李井泉和李大章闻讯后，于十五日晚上深夜，派随从组长×××悄悄找食堂管理员（并告诉管理员说，不要告诉别人）到食堂索取了富强粉五斤，特二米 3 斤，白糖一斤，菠萝果酱一简，长方大面包一条，钢筋锅一只，就偷偷地溜走了。

十七日晚上十点钟左右，峨嵋机械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厨师朱致诚、周纳良，王××在宿舍吹牛的时候，看见中央马路来了一辆小汽车，当时大家以为回来了。朱致诚马上出去看。一会儿，朱致诚回来说：“这是回来打听消息的车子，看厂里有没有红卫兵，首长的车子还在路上等。”随后这辆小汽车以最快的速度由原路开走了。当天晚上，李井泉和李大章就没有回峨嵋机械厂。

十一月十八日中午，派来一辆长江牌小吉普车把他们的厨师朱致诚接走了。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又派朱致诚从峨嵋机械厂取走了团鱼、鸽子蛋，牛生殖器，海参，蜜珠（干贝），珍珠，泥鳅，青蛙等二十六种珍贵食品，合计花钱六十九元一角二分。还有二十多人的伙食费，既不打欠条，又不留下地址、姓名和电话号码。只是说以后结账，并叫食堂和招待所保持现有装饰，以后再来住。又再三叮咛工作人员，千万注意保密，任何时候都不准说什么人在这儿住过，在这里开过会。赵继还规定党员不得向支部汇报这里的一切情况，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参加科里的一切会议。王寿玉同志还追问每个人：“你向书记汇报了吗？”

8．李井泉和李大章等人在峨嵋机械厂隐藏期间挥霍的铁证。从十一月二日到十八日的十六天内，李井泉和李大章四十余人，耗费一百五十来种食品（具体名称未列出），根据发票初步统计，共计采购食品总值一千五百元。十一月十九日晚止，剩余物资盘点折价五百四十五元六角。实际李井泉和李大章等四十余人在半个月的时间总共挥霍九

百一十五元九角五。

9．据随从和厨师朱致诚说："有一次首长（李井泉）要吃雅鱼，（雅安河里出产，以细嫩鲜美出名。）于是当晚派了一部小汽车住返跑了七百二十里，第二天早上做给他吃。"

10．李井泉和李大章是怎样对待炊事员的呢？例如吃饭，早上十点钟才叫吃早饭，下午一，二点钟才叫吃午饭，饭上十二点过才叫吃晚饭．炊事员的肚子饿了也不敢吃。厨师朱致诚说："首长还没有吃，你们就吃，你们比首长还大吗？这是规矩，一定要首长吃了你们才能吃"。

有一次李井泉要吃香肉，香肠，腊肉，合川桃片。采购员邓治山跑遍了全成都都没有买到。后来朱致诚对邓治山说："这些东西你们都没有买到，叫我怎么向首长，交代啊！"邓治山很感到委屈，在精疲力尽的情况下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朱致诚又对邓治山说："你吃得的，睡得着，还不晓得焦哩！"

峨嵋机械厂工人刘绪谦、黄维业等二十人说，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左右，厨师朱致诚由厂内打来电话说："叫你保密，不要说！你们为什么说出去？为什么写大字报？为什么还要写出我们的名字？弄得我们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你们怎么对得起首长呢？叫我怎么向首长交代？！"

对于李井泉和李大章等人，服侍他的人另外还要为他们备好饭后的漱口水，牙签，香皂，毛巾，洗脸水等。十五六个人整天忙到黑，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都挤掉了。把炊事员的头熬昏了，眼睛熬肿了，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还嫌人家的工作太慢，向工人同志发牢骚。

正如邹永开同志揭发的那样，十一月三日晚上有一盏电灯不亮，四日早上厂长还追查原因。为了避免给招待所惹麻烦，所长才说是"电灯坏了"来支唔过去了事。

服侍李井泉和李大章的四十多人，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一元。本人每月只出六元。而实际上是实报实销。连他们自己也说："就是县委书记的生活也比不上我们。"原来的长板凳全都不要，全要小圆凳。管理员给他们买几次都不合他们的心意，最后由他们的厨师到百货公司去买。桌布也要买新的。……

以上这些，仅根据革命群众和峨嵋机械厂的革命职工初步揭发的材料不全面地概括出来的。这里还未详尽地列举实例。但是，就根据这些事实，革命的群众已经可以判断，李井泉和李大章的生活已经糜烂腐化堕落到何等地步！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呢，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呢？！

本文原题《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载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大红卫兵团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资料室编之《打倒西南的赫鲁晓夫——李井泉》。

江海云：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

——在热烈欢迎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

〔原编者按：江海云同志（女，二十一岁，共产党员，工人子女）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是坚强的

八·二六战士，是革命的硬骨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江海云恨之入骨，他们把江海云打成“反革命头目”，“罪魁祸首”，非法监禁，残酷迫害。

保卫毛主席，何罪之有？江海云同志在狱中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能有这样的“反革命”吗？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红心忠于毛主席！能有这样的“反革命”吗？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革命为光荣，生死置之度外，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冲锋陷阵。

江海云同志的讲话是对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愤怒的控诉、无情的鞭挞！公安局中一小撮充当镇压革命小将刽子手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欠下的账我们是一定要清算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亲爱的同患难共甘苦的战友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战友们：

你们辛苦了！狱中的战友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重新回到可爱的川大，我无比高兴，无比幸福！让我们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要控诉省公安厅黑司令部对我的迫害。

二月二十三号晚上，下着大雪，我就是那晚上入狱的。公安局的人是从十九中把我带到公安局的。到了后，一个大胖子对我说：“你人小野心大，干的坏事多！”我问：“我们啥子罪状？你们凭什么抓我？”他说：“你的罪状多得很，我要杀了你！”我说：“你杀了我，毛主席饶不了你！”他说：“你还凶，还猖狂，好反动！”叫把我的衣服剥下来，另一个人不叫剥，就把我捆了起来，送到××监。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他们说我在狱中闹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闹了什么呢？就是这么几件事：

狱中一个孕妇快小产了，情况很危急，我就哇啦哇啦地叫，要医生快来，他们就说我有意煽动，这是一条罪状；《红旗》五期社论发表后，听到街上在游行，就向他们要，不给，我们就叫：“我们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他们说这是又一次有意煽动，就是第二条罪状；同学送来了毛主席著作和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我向他们要了十二次，都没有给我，说语录上批了字，不利于我反省。我问：“你是相信那钢笔字呢？还是相信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答不上来，却说：“对于你们，没有民主。难道人都可以拘，书就不可以拘吗？”我就说他害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登载郭嘉宏英雄事迹的前一天，公安局一个啥子科长来训了一次话，说，你们的性质已经定了，你们就是反革命！群众把你们抓来，就要好好反省，交待才是唯一出路。我在下面笑，冷笑，他说：“你笑什么？站起来！”“站起来就站起来 1 ”他又要我立正，我就昂起头，挺起胸，偏不立正。他没法，就恶狠狠地说：“江海云，这笔账是要跟你算的！”果然第二天就算账来了。也完全是冤枉塞进来的一个难友，明明是贫农出身，证明上也是贫农出身，他们却偏说成地主出身，我就跟他们辩论，他们说我就是反革命，没有权利管。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管！”后来另一个人就用脚踢我，我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说：“什么文斗武斗？对于你，就是要斗，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什么是乱说乱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才叫乱说乱动！你给我分析，我哪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分析不出，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啥要闹。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闹！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就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哪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反对他！他说：“你好嚣张！好反动！”他又讲不清我有哪一点反动，说日本帝国主义那时比我猖狂得多，我当即指出，他立场根本错了，我要他跟我到中央首长面前辩论，他说，你算得什么？我说，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说：“你还是红小兵啊！把她拷起来！”就这样，把我单独拷了五天五夜，连书报都看不成！这还不算，又组织扒手、小偷到监狱来斗争我，斗了两个半天，我说：这个监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这也是一条罪状。我说“八·二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一条罪状。我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也是罪状。他们说我专门煽动，勾引人家往火里跳，说：不要看我年纪轻，其实坏得很！说：“你反对我越起劲，就说明我们干得越好，我们就感到越高兴！”我们唱语录歌、朗诵语录，他们就来镇压，就骂我们，要揪头头！他们出去

后，我又唱“下定决心”，他说：“你的决心还没下够哇！共产主义监狱还存在，你就顶嘛，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但是，毛主席救了我！

放出来时，他问我：“你打算怎么样？”我回答说：“老子就是要造反！准备第二次进监狱！因为马克思说过，我们要经过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国内国际冲突嘛！谁晓得资本主义还会不会复辟呢？”不久前，保皇狗还在骂我：“江海云闹嘛，枪毙还不够条件吗？”资本主义复辟，就有可能。搞革命就要有这种思想。

在监牢里，很多难友斗争得很英勇，很坚决，别人来镇压时，他们就唱语录歌，高声朗诵主席语录。

难友们还在战斗，我们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定能胜利！公安厅、公安局这个黑司令部一定要砸烂！一定能砸烂！

这次还是要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教育，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我懂得了以前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我也饱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不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是拼下这条命，也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让我们战斗到最后，不管产业军，不管大大小小的黑司令部都要彻底砸烂！

胜利一定属于顽强战斗的革命人民！

（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改，原载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出版，４月２２日再版。）

◇　附消息：江海云病逝

近日得到成都朋友电话告知，江海云于今年（２００６）元月１６日（星期一）上午１１时４３分去世，享年不到６０岁。

江海云，女，１９４６年生，江苏无锡人，“文革”时为四川大学数学系学生，中共党员。“文革”爆发后，这个出生于工人家庭的女学生，热情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到“文革”造反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政委，在四川“文革”舞台上是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因其个子矮小，被人取了个数学味的外号：根号２。在四川“二月镇反”中，因其领导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参与围攻解放军成都军区，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入狱。后获释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与被镇压的四川造反派一起得到平反。１９６７年底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主任。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１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７日任重建的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文革”结束后被清查，被撤职并开除中共党籍。后在四川省科技情报所从事技术工作。担任数据中心主任及两个高科技公司董事长，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学术带头人等。其工作成就及优良作风得到各方好评。

因在长期辛勤工作中积劳成疾，江海云已患肝癌多时，但她从未对人说起，一直像焦裕禄那样带病埋头工作。直到元月１２日还在工作。当她终于主动提出去医院后，已经病情十分严重，住院不久就处于昏迷状态，终因抢救无效，永远卸下了工作重担。

今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江海云的骤然去世，给“文革”历史的总结与研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余　樵）

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1967 年 9 月 2 日《新贵州报》

川西平原红旗招展，长江两岸凯歌高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走访了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同志和筹备小组成员张西挺同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是原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一九六二年以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南地区"土皇帝"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分别写的《李井泉是西南的赫鲁晓夫》和《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新贵州报》上发表和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祖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纷纷来稿来信，说看了这两篇革命文章，是上了"一次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课"，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表示"一定要好好向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学习，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

同时，广大读者也很希望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宜宾问题的斗争，是全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李井泉之流为什么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什么能够坚持这样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等。我们根据读者的这些要求，从贵阳到成都，从成都到宜宾，访问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以及红卫兵革命小将。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一)

"忆往昔峥嵘岁月调"。

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风云突变，一时乌云翻滚，掀起阵阵黑风——

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劳改场所跑到城里，住进招待所，出没于地市委机关，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地叫嚣："现在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翻案写材料了。"

在我们的专政机关里，一小撮混蛋竟公然和四类分子开座谈会，胡说什么"你们的案件是谁处理的?谁批准的?有意见都可以提!"

看!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何等的嚣张!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是何等的猖獗!这是一幅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画图啊!反革命复辟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谈到这里时，愤慨地说："那个时候呀，硬是右派翻天，资产阶级专政，宜宾已经改变颜色了。"

水有源，树有根。宜宾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绝不是孤立的，它是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反映。

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神圣同盟"，更加疯狂地掀起了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余部的那班家伙们，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便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刮"翻案风"，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大西南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和他的黑后台一唱一和，大刮特刮"翻案风"，策动了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郭一案件就是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集中、露骨的表现。

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党的庐山会议以后，宜宾地专机关革命的党员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出混进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可是，时隔二年半后，当资产阶级司命部的总头目公然替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时，李井泉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密锣紧鼓，亲自登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涂脂抹粉，赞美他是什么"好党员、好干部"。

被李井泉吹捧为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的郭一是什么货色呢?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六年的肃反运动中，公然包庇反革命分子，并恶毒地攻击、诬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九年底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党内传达后，他公开跳出来与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唱对台戏，同意并赞扬彭德怀的《意见书》，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喊冤叫屈，并且明目张胆地散布什么"跟着彭老总走没有错"。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造谣言，放暗箭，胡说"共产党就是厉害，说你这个人好就是好得很，说你这个人有问题，把材料一整就够了"。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借机攻击总路线"要多快就不能好省。"

李井泉那样狂热地吹捧郭一，郭一又那样卖劲地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说明他们是一根黑藤上的瓜，是一路货色!郭一正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就是否定庐山会议的伟大功绩，反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的成果，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要坚决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

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下定决心要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他们一方面赶写控告材料，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罪行；另一方面，再次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写报告，提出了对郭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李井泉施展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伎俩。他将宜宾地委的"报告"原封不动地退回，并强令"重新讨论"，更恶劣的是李井泉竟然利用他窃踞的职权就在这时给郭一提级、升官。

李井泉耍出的这一系列反革命伎俩，大大激怒了宜宾地区的广大革命干部。大家认识到，这已不只是什么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了，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不出所料，一场怵目惊心的事件爆发了。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九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案，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歇斯底里大发作，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下毒手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坚贞不屈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在炽热的阶级斗争中愈战愈强了。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他们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下定决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谁替阶级敌人翻案，就和他决一死战!

狼，终究还是狼。狼子野心的李井泉，紧密配合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刮起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以百倍的疯狂和卑鄙手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但把反右倾斗争的伟大成果一风吹，而且还进一步把翻案范围扩展到反右派斗争，扩展到肃反运动。

无限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彻底戳穿了李井泉之流妄图全盘否定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阴谋诡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制订下的政策、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成绩伟大，好得很!好得很!李井泉之流替阶级敌人翻案，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就是把矛头指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于是，这场阶级斗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了一个反动透顶的理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

"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逻辑又是什么?！这不是中外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理论又是什么?!这句话彻底暴露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但是，阴险毒辣的李井泉，竟然把"罪名"强加于人，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看!李井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何等程度!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地专机关许多革命干部，人人义愤填膺，肺都气炸了。

怎么办?刘结挺、张西挺和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他们根据毛主席指出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的教导，反复研究了李鹏案件，坚定地认为过去处理李鹏，没错，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李井泉要为，右派翻案，坚决顶住!

就是这样，从反右倾运动到反右派斗争，从郭一案件到李鹏案件，李井泉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拼命地替阶级敌人翻呀!翻呀!前后翻了上百个案件。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激动地对我们说："通过郭一、李鹏等案件与李井泉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认清了他的本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霹雳一声震天响，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英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陈济民、李良、田禾等同志听到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后，兴奋得雀跃狂跳，奔走相告，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还立即通知在成都治病的刘结挺同志赶回宜宾。战友们久别重逢，集聚在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家里，兴高彩烈地畅谈：

"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号召，字字说在我们心坎上！"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伟大战斗号召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您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斗争到底!"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大家齐声朗读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举国上下欢呼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时候，李井泉之流对公报的发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凭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李氏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了。他绝望，他挣扎，变本加厉地、不择手段地对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进行打击、陷害、斗争。公报九月底发表，十月二十三日就宣布对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停职审查"；非法剥夺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对他们开展大规模的"揭发、批判、清理"；甚至违反党纪国法，限制人身自由，无理进行抄家；到十二月，竟公开派人监视、盯梢……。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压迫越厉害，那里反抗越强烈。在那乌云笼罩着天空的艰苦斗争中，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抱病夜以继日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写了一份关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宜宾大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材料，一针见血地指出李井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五年以前，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就能认识到李井泉这个"庞然大物"的反动本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他们不愧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不愧是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

(二)

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对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种种打击、陷害还不满足，竟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以"省委找去谈话"为借口，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骗到成都关进秘密监狱。

"李井泉把我们抓起来，想达到几个目的"，张西挺同志指出："第一，割断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联系，第二，割断我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特别是把我们和王茂聚、郭林川等战友分开，妄图各个击破；第三，通过关押我们，把宜宾革命派压下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第四，一旦时机到来就进行杀害。因此，关押我们的地方非常秘密，在狱中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被关在什么地方，附近群众也不知道这里关着人。因为比较秘密，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为了逃避革命群众斗争，还把这座监狱改作他的'避风港'，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张西挺同志接着说："关我们的时候，戒备森严，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夜间比白天还亮。十几个人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连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在去厕所路上的片刻停留，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关我的房子有五个窗户，被钉死了四个，只剩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刘结挺患有严重的风湿脊椎性

关节炎，他们是知道的，却偏偏把他关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

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被李井泉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相反，敌人的疯狂镇压使他们更加坚定。他们把阴森的监狱当作战斗岗位。

李井泉妄图割断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联系，这是痴心妄想!毛主席的好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揭发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每天写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深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狱中写作条件极端困难。缺少纸，刘结挺同志就把香烟盒翻过来写。有一次，看管他们的"组长"的孩子在院坝拉屎，用几大张纸擦屁股，张西挺同志就把他擦第二次的纸拾起来写材料。晚上，关押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还是装在天花板上的，又昏又暗，和室外照得通明的警戒灯形成鲜明对比。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灯光暗算得了什么，照样写!

凭着忠于毛主席的赤诚之心，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写的揭发、控诉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有两百万字左右。两百万字啊!请同志们算一算，如果广播，整整要八天八夜才能播完。如果登报，整张报纸都登它，要连续登五十天才能登完。

这些材料，深刻地、系统地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控诉了李井泉为地富反坏右翻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射向李井泉的子弹，每一句话都是一把投向资产阶级司命部的匕首。

对这些揭发、控诉材料，李井泉之流害怕得要死，根本不许他们往外寄、更不许直接寄给毛主席、党中央，每个字都要经过看押他们的小组、省委监委、甚至李井泉检查，层层的检查，材料也层层被扣下来了。但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停止斗争，你今天扣，我明天写，你扣下来不往上转就增加你一条"扣压给毛主席的信"的罪状，总有一天要新账、老账一齐算。

当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所写的材料，也根据斗争需要作了多种准备。刘结挺同志说："李井泉这样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他几手。" 当时，他们曾经估计，李井泉可能杀害他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李井泉之流确实写了杀害他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但是，他们仍然作了牺牲的准备。刘结挺同志曾经专门写了两封给毛主席的信，一封带在身上，准备在被杀害时，把它丢在刑场上，他说："我相信执刑的人不是铁板一块，忠于毛主席的同志看到这封信，一定会交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和李井泉的斗争仍然可以取得胜利!"另一封信，反贴在抽屉的板子上，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交给毛主席，李井泉的罪恶终久会得到清算。

狱中斗争是多方面的。李井泉为了软化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分散他们的斗争精力，曾经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最小的两个孩子送到狱中住了两天。但在阴谋未得逞时，就在半夜下令把已经睡熟、正在发高烧的两个孩子抢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在孩子身上还有一场斗争。五岁多的女孩岷沙，一到张西挺身边，就急急忙忙地把裤带解下来递给她，她仔细一摸，从带子中摸出一张纸条。这是十二岁的大女儿写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完条子，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李井泉之流发觉这张条子没有?孩子只穿了一个背心，一条短裤，这种条子是很容易被惯作特务工作的李井泉的爪牙发觉的。如果发觉了，为什么又留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据当事人揭发，他们很早就从孩子身上搜出了条子，估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会用同样的办法和狱外战友联系，让它带进狱中，是为了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反党新罪证"。但是，李井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同时，他们也没有失掉这个和狱外战友联系的机会。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女儿，作为回信，叫看管小组转。这封信被扣下来了，但也起了麻痹敌人的作用。张西挺同志把另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小条子)精细地缝在岷沙的鞋袢里。这封信是给宜宾战友王茂聚、郭林川等同志的，只有一句话："只要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希望注意身体。"岷沙到了宜宾，急忙找到郭林川同志，把鞋子脱下来给他。这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里送出去的唯一没有受到

检查的信，也是直接写给战友的、对方亲自收到的唯一的信。这封信把狱中狱外战友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造反更知北京近，斗争倍觉毛主席亲"。这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体会。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被李井泉关进秘密监狱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更是时时刻刻想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可以搜走我们的毛主席著作，但是，太阳的光辉是挡不住的，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心情是隔不断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我们就增加了斗争的必胜信心。"所以，尽管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种种折磨和摧残，仍然那样乐观，那样信心百倍。当他们从看管人员的收音机里听到电台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派人来》这些革命歌曲时，也忘记了自己是四十岁左右的、平时又很少唱歌的人，兴奋得象小学生一样，跟着收音机一句一句的学，千遍万遍地放声歌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一唱这首歌，心里感到无限幸福，好象就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乘风破浪前进!"

有一次，凌晨四点多钟，刘结挺同志突然从床上摔下地来。原来，他又在梦中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入狱以后，他们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在梦中见到毛主席了。这一次，刘结挺同志又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伸出巨大而温暖的手要和他握手，他赶忙迎上前去……。他从地上起来，还久久地回味着这幸福的时刻，激动得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带着这种深厚的感情，他动笔写了想念毛主席的长诗《向往北京》。可恶的是，李井泉却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句当作反党材料。李井泉罪该万死!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唯一的学习材料，是一份经过多次斗争才准订阅的《人民日报》。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每天给他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舌，鼓舞着他们前进再前进。《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他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特别是报上刊登的每一幅毛主席的照片，每一则报道毛主席的活动的消息，每一次毛主席的讲话，他们都反复学反复看，越学越看越亲切。

一九六四年元旦的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十首诗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欣喜若狂，读啊，背啊，联系狱内狱外、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推敲啊，领会啊，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在那阴暗的监狱里，不时传来洪亮、有力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朗读毛主席诗词，听：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这不正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流的写照吗?!

"蚍蜉撼树谈何易。"

李井泉及其后台和爪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正是蚍蜉撼树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决心在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湖震荡风雷激"的时代，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以"

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扫除一切害人虫"，"敢教日月换新天"，攀登无限风光的险峰!

(三)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从斗争一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他们并肩战斗，和他们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孤立过。就是在两年关押期中!也有许许多多战友在狱外坚持战斗。他们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秦。"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大规模地给地富反坏右翻案时，宜宾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就被李井泉的爪牙篡夺了，整个宜宾一片白色恐怖。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揭发、控诉材料是寄不出去的。有一次，张西挺同志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那一段时期先后寄给中央的十几份揭发李井泉的材料收到没有。不久，在斗争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时候，李井泉之流竟把这封信拿出来，作为他们的又一"反党"罪证。

宜宾寄不出信件，许多革命同志就冒着危险，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带到自贡、内江、泸州等地去寄。有一份揭发材料，是由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的一个亲戚坐火车带到内江，然后步行了十几里路，在一个小场上寄交的。另一份揭发材料，是张西挺同志的母亲在被抄家时急中生智，把材料缠在腰上带出来，交给一个同志带出宜宾寄出的。

象这样的事，不是一件两件，不是一人两人。还有许多同志，不仅帮助他们寄信，还直接向中央控告李井泉。据张西挺同志回忆，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的白色恐怖时间里，先后给他们带信到外地去寄的达二三十人。这些人中，有干部、工人、公社社员、学生、街道居民，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同决心和坚决打倒李井泉的共同意志，使革命同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四年夏天，李井泉之流用药物使狱中的张西挺同志中毒，头昏眼花，周身痉挛，在短时期内头发大部分脱落，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李井泉乘人之危，派了省委监委副书记带了十几个人闯进牢房，把张西挺同志拉下来斗争了三天，企图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骗取他们需要的口供。经过刘结挺同志的多次抗议，李井泉才不得不把张西挺同志送入医院，而她在医院里的一切行动都有人监视。

从宜宾到成都学习的一个护士长，在医院里偶然发现了张西挺同志，她十分关心张西挺同志的病情，但很快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觉了，不许她再进张西挺的病房。一天，护士长训练班的学员集体查病房，她借给张西挺同志掖被子的机会，摆脱监视，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送到张西挺同志手中。上面写道："我们相信你和刘结挺不是坏人，我们心里明白。宜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你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给你送来。"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在李井泉欲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时刻，在层层监视下的医院里，出现这样的信，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多么难忘的战斗友谊啊!张西挺同志现在谈到这件事还很激动，她说："只有在艰苦斗争中才能体会这种阶级感情的重量。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条，它代表千千万万革命人民和李井泉斗争到底的决心。"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及和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许多同志，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较长期的斗争，要作好各种准备。特别是在李井泉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秘密关押起来以后，大家认为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狱外的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商量，决定作斗争十年到二十年的准备，这一代斗不完，下一代接着干!直到彻底取得胜利为止。

为了适应长期斗争的需要，大家决定要很好地整理揭发材料，妥善地保存原始材料，并在生活上节衣缩食，把钱积聚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王茂聚同志和爱人每月的收入不少，从这时起，他们就把大部分工资存入银行，一家六口每月生活费控制在四十元左右。连王茂聚同志抽了许多年的香烟也戒了。他说："这是斗争的需要！"

王学明同志一家老小十口，每月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本来开支就比较紧，但他们把生活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到文化革命开展时，在银行已存了三百多元，他说："为了国家不变颜色，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生活苦一点算什么!"

象这样的同志，在宜宾有一大批。去年八月，当王茂聚同志把历年节衣缩食的存款两千元从银行取出来，到北京告状时，把宜宾地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吓得要死，马上通知银行，冻结了和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人有联系的七十多人的存款，不许这些同志提取，并诬蔑说这是"反革命活动经赞"。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经费"，是真真实实的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

李井泉之流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卑劣的伎俩都能够使出来，他们的面孔千变万化，手段阴险毒辣，但在革命者面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刚入狱，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就找生病住院的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谈活，动员他们"起义"，揭发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同志大怒，指着这个家伙的鼻子大骂。"你叫我出卖同志，办不到!"不久，省委监委一个副书记也找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谈话，更露骨地对他们说："把问题推到刘结挺身上，也不是个人主义。"多么无耻。当然，他遭到的是严厉驳斥。刘、张、王、郭这个战斗的集体不仅没有被分化瓦解，反而在斗争的风暴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批准了李井泉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党籍的报告。李井泉抓住这个机会大造舆论，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定这个案子是中央书记处中和彭德怀有关系的人批的，绝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因此，他们的态度很鲜明：要告!一要告!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宜宾的战友对这一问题又是什么态度呢?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反复作了研究，也得出结论：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坚决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共同斗争到底!

那时候，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的战友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为了共商下一步斗争大计，住在医院里的王茂聚同志以到成都检查病情为名，设法找到了刘结挺同志。当时，李井泉不仅开除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党籍，还分别降了七级、八级，调刘结挺同志到一个边远县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两个老战友认为必须坚决抵制，决不领工资、不去报到，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李井泉的处理。再说，到了边远地区后，李井泉更容易控制，到北京找毛主席更加不方便。两人商定：一定要冲破重重阻力，不惜一切牺牲，到北京控告，向毛主席报告，誓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斗争到底!

(四)

一声霹雳惊天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了。

当时，还被李井泉软禁在成都罗家碾招待所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着报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日盼夜盼的这场反修斗争，在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比我们设想的大大提前来到了。毛主席呵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知道我们这些年来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就一定会大大支持我们的。

"到北京去!到毛主席那里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回忆当时的心情说：那时，我们什么都不顾了，只有一个念头：离开成都，到北京去，越快越好。

"到北京去!"这是李井泉最怕的。为了阻止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到北京，他们不是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关进了私设

的监狱吗?不是要把他们分到离北京更远的县里去工作吗?现在，不是又把他们软禁在这个招待所里吗?

面对眼前的处境，刘结挺和张西挺同志经过一番商量，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北京去。为了防止万一，张西挺同志留在成都作掩护，由刘结挺同志一人先去。走前，他们写好一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揣在刘结挺同志怀里，如果在半路遭到不幸，他们相信其他革命同志一定会把这封信转上去的。六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刘结挺同志想法摆脱了监视，翻墙、过河，坐上火车只身往北京去了。

在宜宾，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道战斗多年的王茂聚、郭林川等许多革命同志，也是一样的激动，他们从心底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茂聚，这个木工出身、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倾诉呵!自己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身体又多病，但他和郭林川同志一道，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地写呵!写呵!一直写了两个月，修改了八次，最后向中央写了将近四万字的报告。当他知道刘结挺同志已经到了北京，立即派他的女儿亲自把材料送给刘结挺同志，再转交给党中央。事后查明，这些材料都落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

不久，张西挺同志回到了宜宾，他们一起商量，决定王茂聚和李良同志再到北京去，其他同志则留在宜宾坚持斗争。王茂聚把他和郭林川同志写的揭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罪行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出来后，便于八月中旬，和李良同志先后离开了宜宾，到达西安再会合。他们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则由李良的弟弟秘密带往成都，在火车上转交给他们。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一开始，我们这些同志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李井泉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司命部里的人也十分敏感。他们深知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这样说过："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是李井泉的导火线。"李井泉也说："西南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宜宾是关键的关键。"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上也写着："西南的问题，宜宾是突破口。"

是的，宜宾是突破口，是导火线，是关键的关键。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突破了，这个导火线一旦被点燃了，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抓住了，那么，上至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至他们的黑爪牙，一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统统都要完蛋了。他们在西南多年苦心经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就要宣告彻底破产了。宜宾问题的斗争为什么这样尖锐、激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这就是宜宾问题的实质所在，

就是四川问题的实质所在。"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批黑线上的"大人物"，什么彭真啦，彭德怀啦，李井泉啦，等等，不断来到成都、宜宾，互相勾结，密谋策划。千方百计要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置之于死地，想方设法要把刚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妄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

还在去年三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他们炮制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刚刚出笼后到了成都，李井泉就指定他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向彭真汇报了刘结挺、张西挺的案件。人们不禁要问：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案件"一年以前已经处理，他们的党籍早已被开除，他们早已不掌权了，为什么此时此地还要拿他们的"案件"向他们的主子汇报呢?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更加慌了手脚，更加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运用还窃踞在他

们手里的党、政、财、文大权，疯狂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镇压、大围剿。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串通一气，四处游说，大造特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刘结挺过去处理轻了，要重新揭发，要重新处理。""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的问题很多，过去只处理了一个问题，而且他们不服，还在那里闹翻案，有必要组织人再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开。"他们曾经作了"小乱、中乱、大乱"的准备。所谓"大乱"，就是"刘结挺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当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后，他们吓得脸发黄，心发慌。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把他们（指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打成反革命，他们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他们白天黑夜，紧张地召开各种会议，阴谋策划进行疯狂反扑。为了先下手为强，他们通过自己的御用工具——原宜宾地委旧文革办公室，把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一封信和三十张大字报，加上按语，发给地、专、县、市级机关全体干部。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这三十张革命大字报说成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宣布"刘、张、王、郭"是"反党反革命集团"，是"宜宾地区最大的黑帮，最深的黑线，最危险的敌人。"要"彻底揭发、坚决打倒。"一时乌云滚滚，黑云压城，宜宾地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对于他们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所谓"反革命头头"刘结挺同志，更加恨之入骨。一方面，他们组织了大批的"专案"人员，抬出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刘结挺、张西挺"打击陷害"的十三个"冤案"，一再叮嘱要把其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郭一、右派分子李鹏等主要案件搞"扎实"，还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大量的所谓"其他问题"。单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所谓"作风部分"，就搞了三十多期大字报，并且印发给各个单位"学习"。这些所谓的"其他问题"，极尽造谣侮蔑、丑化之能事。比如他们造谣说：张西挺同志家里存有很多麻油，吃不完，生霉倒掉了。麻油会生霉?这确实是天下奇闻。可见这般资产阶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另一方面，由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亲自出面，组织庞大的所谓"缉拿团"，分别到成都、北京"追捕"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同志。"缉拿团"到了成都、北京，都得到了李井泉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分"关心"这件事，他通过他在中央接待站的爪牙，极力"安慰""缉拿团"的人，说什么"待刘结挺把申诉材料写完后即要他回宜宾"，因此，他们十分"热情"接待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再催促他们赶快写材料。所以，李井泉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缉拿团"绝对服从"中央"。所谓"中央"，就是指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成都，李井泉的一小撮同伙，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把刘结挺同志的照片传真到北京，送到边防；一会儿又打电话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老家，询问他们的下落，等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留在宜宾的同志，无一幸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家和在成都的住所，被他们一抄再抄，甚至连小孩的尿布都抄走了。更加命人气愤的是他们抄家时，把毛主席著作到处乱丢，任意践踏。他们恨不能把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斩尽杀绝。给张西挺同志看过病、打过针的医生、护士，教过他们小孩的老师，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警卫员的爱人，爱人的亲戚，等等，凡是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多少有过来往的人，都要遭到他们的怀疑、监视、直至抄家、斗争，甚至送进监狱。仅在宜宾一个地区，就有三百多名职工，被他们打成"张、王、郭反党集团"的成员、"爪牙"、"爪牙的爪牙"。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孩，因为学着大人，在街上说了一句"刘结挺是受迫害的好干部"，也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取消了上幼儿园的权利!心黑手毒，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事实正是这样。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革命同志的迫害越残酷，越使更多的革命群众看清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凶恶面目。在许许多多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斗争信念。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同志冒着坐牢、被斗、被抄家的危险，响亮地提出：敢不敢为刘、张、王、郭翻案，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很多同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走在斗争最前列冲锋陷阵的，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直捣李家王朝。打得它落花流水，打得它人仰马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正是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处在斗争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是红卫兵小将帮助他们找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找到了毛主席司命部里的人。没有住的，他们找，没有吃的，他们安排。刻印传单，搜集材料，许多红卫兵小将熬红了眼，跑酸了腿。不少红卫兵因此被无情斗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关进了监狱。

我们在宜宾，就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革命组织名字前面都要加上"红旗"两个字，或者干脆叫做"红旗"派。这是什么原因?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说：原来一中有个红旗红卫兵战斗组织，他们成立以来，就遵循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集中火力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在李井泉之流掀起的"二月黑风"中，竟丧心病狂地宣布这个红卫兵组织为"反动"组织，把一些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什么"罪名"呢?仅仅一条，就是他们坚决要为所谓的"刘、张、王、郭反党集团"翻案。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革命的红卫兵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敌人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办公室被砸了，算什么?到街上搭起个棚子照样干。你不准贴大字报，偏要贴。早上撕了，晚上贴；黑夜撕了，白天贴。你不准用"红旗"的名字吗?休想!什么"红旗漫卷"、"红旗如画"，越用越多。你要抓吗?好吧!四五十人一起，要抓就一齐抓。他们问："谁是头头?"小将们齐声回答："我们全都是。"弄得那些家伙瞠目结舌，难以对付。

革命小将们这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种，深深教育和鼓舞了广大无产阶革命派的战士，他们以红旗战士为榜样，以当一名红旗战士为荣。大家自豪地说："红旗战士抓不完，吓不倒，一杆红旗倒下了，千万杆红旗立起来。"就这样，宜宾城内红旗林立，红旗招展!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李井泉之流这批蠢人。这些年来，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李井泉之流的"庞然大物"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全国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的大力支持下，由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刘结挺冤案，党中央亲自平反了，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接见了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对他们的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们"是坚贞不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事实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尽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猖獗一时，尽管斗争有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在访问结束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十分谦虚地说：我们只不过起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应该起的作用。成绩和功劳完全归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归于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宜宾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我们四川的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李井泉之流，他们还不是"死老虎"，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四川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坚强阵地!

(原载 1967 年 9 月 2 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wengewang.org）

刘结挺：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 刘结挺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前言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西南局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前还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这是他的表面，他的实质是什么？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西南的"土皇帝"，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实力派，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井泉有极大的政治野心，阴谋把西南变成他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独立王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李井泉狡猾的狐狸尾巴越露越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貌再也隐藏不住了。我发现李井泉的问题，是在一九六二午。那一年，国内阶级斗争异常紧张，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进行疯狂的反华勾当，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窜犯大陆，阶级敌人气焰嚣张，妄图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这个时刻，李井泉配合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了。

一、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四月，毛主席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信，广大干部、社员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李井泉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出了黑指示，这个黑指示说，"对毛主席的信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消极的理解。"致使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贯彻，造了极端严重的后果。

一九六二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井泉又借机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指示信。他胡说什么：一九五九年之所以在毛主席的指示信上加批语，是想多打点粮食，与修正主义斗争争口气，怕毛主席的指示信下去起消极作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他对李井泉明目张胆地诬蔑毛主席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副主席有一个极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对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作了批评。林副主席还从我党各个革命历史阶段论述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号召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这篇讲话，对到会的同志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可是李井泉在林副主席这个讲话后，专挑了一份大会简报叫四川各小组传读。这份简报刊登了有关向林副主席提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又属于一般性的工作意见。李井泉不让传读中央各部局对四川提的意见，借以教育四川到会同志，却专挑那么一份对四川干部毫无特殊意义的材料，而且选择在林副主席发表上述讲话以后。很明显，这是一个反党阴谋。尤其恶毒的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井泉的亲信、反革命分子张黎群配合李井泉的活动，针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写了一篇"不是八九不离十，而是离十太远"的极端反动的杂文，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李井泉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二、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再次指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在重庆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同志，热

烈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正确的指示，并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但李井泉却以各种借口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拒绝同志们的要求。他散布说："四川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问题。"他指责、压制坚决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说："有些人为什么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那么感兴趣！"他醉心于在四川继续推行自己搞的"三包一奖"的"经验"，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直到一九六三年，李井泉的追随者×××，还在大肆攻击、诬蔑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是"右倾"。李井泉之流就是这样顽固地对抗最高指示。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一九六一年李井泉搞了一个大划田边地角谁种谁收的"指示"，把大量的集体土地变成了私有，大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李井泉对六个专区的六个重点公社干部介绍他"点"上的"经验"，鼓动"退回去"。他吹嘘说："第一，公社和大队干部都要压下去，凡是过去老社的一律归生产队。第二，退回去，按高级社办事，现在看来退了一步，还没有退够。第三，把生产队的副业班子搭起来，凡一九五八年建立起来的副业建设一律归生产队。第四，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不是年年增产了？(众答：是年年增产了)如果是年年增产，这样退下去，没有问题，搞它几年再说。"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又积极鼓吹"退回去"。×××等在他的鼓吹下，大肆进行"退回去"的复辟资本主义阴谋活动。

在×××的"点"上，自留地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在××直接指挥的宜宾市：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下令解散全民所有制的渔场，叫工人搞单干。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又下令并限期解散宜宾市国营运销单位。他说什么："划若干小组和调配站，由需要工人的单位挑选雇请工人。"这样没有几个月，全市就出现了二十多个把头。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叫嚷："仔猪市场干脆全放。"助长富裕农户走资本主义道路，影响贫下中农养不起猪，给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为了鼓动单干，他规定，国家机关下农村的工作组干部，每人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规定家住农村的公社干部除本人在家划一分自留地以外，还可以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

——他大肆提倡中医"随父学艺"，说什么："只有随父学艺才能把老医生的本事学到手。"

——他公开叫嚷"要向资本家学习"，说什么："人家做生意能赚钱，我们不行，赚不到钱，应向人家学本事。"

李井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选了一部分大会简报让四川省小组传读，其中有一篇大意是，今后工厂可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很明显，李井泉这是配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报告，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李井泉及其追随者，一方面勾结阶级敌人大搞反攻倒算，一方面大肆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他们说什么："在医院、文化艺术、科学团体搞政治运动是错误的。……以后不搞了，你们放心吧！只要搞好本行业务就行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初，李井泉在自贡别有用心地说."有人说我们这几年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在

理论上应该如何回答？”李井泉这是有意识地借别人之口诬蔑党“犯了路线错误”，以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煽动。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运动中，批判斗争××时，×x 说：“彭德怀等只不过是议论了一下，就成了反党集团了。”××说，这句话是李井泉说的。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一口一个“彭老总”。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又散布这么一个反动言论，可见他早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刮起了“翻案风”，他拼命地替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地、富、反、坏、右翻案。在翻案中，他捏造了许多谎言，制造了种种借口，私设监狱把我和张西挺关押长达两年之久。李井泉在一九六三年八月，派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到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劝我同意替××翻案。他说：××那些问题，你们不要老坚持说什么反党、反毛主席。还恶毒地说：“对毛主席是怎么看，现在有许多新情况，你们不了解，反对毛主席不一定就是错误。”省监委副书记××也向王茂聚同志说：“×那些问题(指××反党、反毛主席的许多罪恶言行)，我们认为不是错误，你如果认为是错误，你可以写信问毛主席。”李井泉让监委主要负责人进行这样的“劝说”，不仅是为李井泉的反党言论辩护开脱，而且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活动。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他还别有用心地强调“甄别”问题，为替牛鬼蛇神翻案制造了许多荒谬的理论。他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行的，只要没有背景，就不算错。”他还以总结工作为名，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我们现在是这样总结，总结不够的以后还可以总结，十年二十年后可以再认识，就是将来我们死了，还会有人替我们总结的。他这里不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为大“翻案”埋下伏笔吗?在他的煽动下，大刮起“翻案风”、“单干风”，一时乌云满天。

李井泉紧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发起的翻案，公开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一九六二年他专程赴宜宾，策划布置后，又亲自组织了两股翻案力量。

一股由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到劳改农场、茶场、四类分子集中劳动的菜场以及两个劳改煤矿，以登记询问、个别谈话、座谈、调案审查等方式；发动劳改犯、现管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等反攻倒算。.，

另一股由××X 统帅，在地专机关以座谈会、个别谈话动员、批示翻案、调查审查、提供反攻倒算材料、打印反攻倒算材料等方式，发动四类分子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反攻倒算。

李井泉等所执行的翻案方针是：只要本人有申诉，组织上认为有必要，或者有其它人提出，就可以进行甄别(甄别二字应用作“翻案”)。他们的口号是：“甄别”以后，应该得到组织上重用提拔。

有翻案方针口号的鼓舞，又通过他们内外发动，五类分子的反动气焰异常嚣张，有的右派分子说：蒋介石不反攻大陆，我就不写申诉，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我就要写申诉(看，李井泉与蒋介石配合得多么密切，右派分子与李井泉配合得多么密切！)。有的右派分子公然拍桌子公开大骂积极分子。翻案加倒算，大批革命同志遭受到种种的迫害和镇压。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翻案风”，强调了阶级斗争。李井泉竟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继续上下勾结串通，坚持翻案。他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私货，说什么对外斗争是地富反，对内斗争是刘结挺、张西挺。事实上，则是把对敌斗争转移在革命派头上。一九六三年还把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推行到江安县和宜宾县。

在宜宾的反革命复辟事件中，翻案涉及的案件达、几百件，直接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革命同志达百人，受牵连的人数则更多。

李井泉之所以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倒算是因为有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屏障，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依靠，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和配合。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等，一不准我到中央控告，二把我和张西挺等揭发李井泉的材料转给李井泉，三扣压宜宾革命同志给党中央和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信。他们从一九六二年起这样干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仍然把我和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材料扣在手里不予转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串通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等批准了李井泉的修正主义报告——即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里所批准的，不是刘、张二人的党籍问题，而是批准了李井泉勾结敌人所干的全部翻案加倒算。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李井泉的亲密关系是很多人很早就知道的。平时李井泉在中央开会期间，每天晚上不是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家里，就是在××家里。李井泉在中央开会回四川传达会议精神时，常常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何说，如何讲。从李井泉的话里听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会外对他还有特别指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串通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除了他们本来就有这种亲密的勾搭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案件上直接牵连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说;“跟着彭老总走不会错。”这句话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说的。李井泉起劲地替××翻案就是为了替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的反党言论翻案，从××的案件里抹掉这笔账，以便得到长期掩盖，以达到进行隐蔽反党活动的目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的秘密就在这里。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李井泉在南充搞“点”，那里的地富子女对李井泉寄予很大的希望。社教中，他们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要解决入党入团的问题。李井泉竟作为重大问题，加上批语印发全省。批示的大意是只要经过考验是可以入党的，说“重在表现”嘛!

李井泉在干部路线上也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大小会都传达讨论贯彻“重在表现”的干部路线，根本不强调和不讲阶级路线。

李井泉的“重在表现”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他是重在反党的表现。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因为写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被李井泉提拔为省委委员、西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

反革命黑帮分子张黎群，恶毒地攻击和百般地咒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李井泉把他安排到绵阳地委任副书记。

有的阶级敌对分子和右派分子最恶毒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李井泉不但替他们翻案，而且都提到重要岗位上去了。

家庭和美国有关系，反革命分子的女婿×××，因为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有功，而被提拔为省监委的兼职委员。

李井泉就是这样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把翻了案的牛鬼蛇种，地、富、反、坏、右都作为他的基本力量，把许多坚持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一个一个地打下去。据我了解，李井泉迫害这样的干部是不少的。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三月，彭真到成都与李井泉、×××进行反革命的密谈。李井泉为了抬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身份，拉着彭真与四川贫下中农代表一起照像。此像经印刷后发到各县、市、地委。宜宾地委还把他挂在地委会议室里。

李井泉为了扩散彭真的毒素，一九六六年四月，还布置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抛出的反革命《二月提纲》。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多年来，李井泉、XXX 等结成巩固联盟，发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是大叛徒×××安插在西南的钉子，深受李井泉赏识。一九六五年，李井泉便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位子让给他。从此，×××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置于领袖的地位。他经常讲："李政委如何如何，一再教导我们。"对这种肉痲的吹捧，李井泉自以为得意。李井泉自己也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说什么我也算个小国务院嘛。因此，他在中学读书的儿子也常以李井泉的话作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压制革命学生。

南充是李井泉的常到之地，那里居然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像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李井泉的画像还高出毛主席画像一个头。李井泉泰然置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李井泉排斥异己，把既无能力又无干劲的亲信和旧人一个一个地都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如协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启允镇压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在晋绥的旧人，虽毫无能力，但也成了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协助李井泉镇压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从晋绥带来的老部下，越级提拔当了西南局的宣传部部长，散布大量毒素的四川日报总编辑 XX 也是李井泉的亲信；在贵州大刮翻案风，镇压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贾启允，因为是李井泉的老部下，就当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与黑帮祖师爷周扬也挂了线。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周扬称赞他，李井泉就马上重用他。任白戈是周扬的吹鼓手，李井泉提拔重用他在前，又包庇他在后。

李井泉为了勾结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黑帮分子×××，对彭真和××双方表示尊重，还常给他们送礼品。

李井泉上下串通，对党中央进行封锁。一九六三年八月，中央监委的一个同志在成都找我和张西挺谈话，李井泉害怕暴露了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竟派公安厅一处的干部公开监视。这个同志对案件表示有某些疑义，认为不应该关押，被李井泉和×××告到黑司令部那里。××为此无理地批评了这个同志。李井泉的追随者，在宜宾大张旗鼓地宣扬，对我和张西挺的案子，中央监委来的同志都受了批评，都作了检讨，以此炫耀他们的反党势力的雄厚。

李井泉与黑帮联系之密切，勾结之紧，从下面这份材料里也可以看出。

宜宾地委招待所长写的材料说(摘录)。

1、一九六五年十月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等人悄悄地来到泸州(宜宾专区所管的泸州市)。当时有×××陪同。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些人来干什么？

2、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突然来宜宾，当时×××接待，住地专机关第一招待所，×××与之密谈，这其中有什么鬼？

3、一九六六年大约六、七月份，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井泉等人突然到自贡，在自贡开了会。这些人来干什么？

4、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到了自贡。

5、一九六六年九月份省公安厅厅长突然来宜宾，住地专第二招待所。是专门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是带有任务来的。他还去泸州了解情况。

6、一九六六年十月份，×××(副省长)突然来宜宾，×××等人接谈。

7、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也突然来宜，突然而去。

8、一九六六年十月份至十二月份前一段时间里，李井泉的女儿常来宜宾，×××亲自与她密谈。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宜宾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如此多的"大头头"先后"光临"此地?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九六六年九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指一九六二年搞翻案倒算)是李井泉的导火线。对了！宜宾问题如被揭发出来，李井泉的问题就包不住了，李井泉的问题包不住，当然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也就会暴露出来。李井泉这道防线如被摧毁，那么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个大西南的后方就存不住了。宜宾怪不得有这么多黑线上的人物往来，怪不得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关心李井泉派来捉我们(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四人)的人的安全问题，害怕他们被北京的革命同志扣留下来，因而给他们通情报，叫他们走，说如不走，安全有问题，问题就会闹大。......wengewang.org

***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李井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大黑帮分子，是镇压西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把李井泉批透、批臭，斗垮、斗倒!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张西挺：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张西挺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首先，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

寿无疆！

（一）

一九六二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合伙，猖狂地进行反华；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于 1962 年初抛出了他的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思想的报告，为“翻案风”“单干风”制造了理论依据。“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而猖獗一时的。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四川省宜宾地区发生了一个阶级敌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在这个反革命事件中，翻案范围涉及地富反坏右及右倾机会主义等，翻案的案件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到 1955 年的肃反、1957 年的反右斗争和 1959 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镇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左派则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那时起，五年来宜宾地区笼罩着白色恐怖，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

在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 年 10 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无数次地给党中央写材料，揭发李井泉等人的罪行。我们无数次地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去谈李井泉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给中央打过电报。但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我们写给中央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李井泉。我们写给中央的信，他根本不理睬，给中央打的电报呢，他就回电说：刘结挺呀，不必来中央，有问题可向中央监委写材料。在这个回电之后，我和刘结挺就被秘密逮捕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和刘结挺正在按这个回电，写揭发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刘结挺突然省委要找他去谈话的通知，说是两天就回来。刘结挺没有带任何东西，当天就离开了宜宾。到成都一下火车，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送进了等候在车站的汽车，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关起来。他们把这种非法关押，美其名曰“对党负责，防止意外”。防止什么意外呢？刘结挺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的话，那就是你们没有想到目前我仍然坚持要到中央去揭发你们的问题。”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就讲：“我们不是怕你这个意外。”刘结挺就说：“你不怕我这个意外就好哇！那就请你给我自由，让我到北京去，或者你们押送我到北京去！”他们对刘结挺要到中央去的正当要求，狼狈地答不出话来，只好拿中央不许去来堵他的嘴。

在非法关押刘结挺的第五天，我也被骗到成都关押起来了。和刘结挺一样，照例受到侮辱性的全身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许多材料底稿。

（二）

我和刘结挺被骗到成都关押后，宜宾地区谣言随之四起。李井泉等也乘机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刘结挺、张西挺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每天光吃好的，不干好事。”

我们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坐的普通监狱，而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私设的一个秘密监狱。

我们进监狱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晓得我们被关押了，以便通过他们在外面的斗争把我们营救出来，或者由他们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我们解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办到。因为我们给外面写信，要经

过三道关口检查：要经过看押我们的组长检查，要经过省监委检查，最后还要通过李井泉检查。信中话说得明白了，他们不给发；用隐语，自己人又看不懂。例如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在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几尺布票，本想给你买件衣服，现在我不好买了，由你自己买吧！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孩子，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想孩子一定会把信交给宜宾的战友，可是他们没有看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李井泉会把我们秘密关押。第二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清楚我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弄清这一点，我们心里很不落实。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听看管人员谈话，看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来。很明显，看押我们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或严格训练过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写信，了解回信的地点。我对看押我们的人讲："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事先对孩子未作任何安排，想给孩子写信，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回信，不知回信该寄到哪里？"看押我们的组长回答说："回信就寄到省委或省监委。"我说寄到省监委要转，很麻烦，是不是直接寄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不行，你嫌麻烦就不要寄！"第三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寄钱，我心想从邮局的回条上可以知道关押的地方。但是他们把钱拿到城里寄去了。邮局收条邮戳盖的是："成都"两个字。李井泉所设的这个秘密监狱，不但对我们两个人保密，而且对群众也是保密的。

（三）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整整两年。后来了解，这就是成都西南郊红牌楼镇的那个派出所。但是那里的群众，不管是居民，或是机关干部、工人，没有一个晓得红牌楼的原派出所里曾经关过两个人，而且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因为这里对外的名称是个"机关"，具体名称叫"成都市委工作组"。可是看押我们的人都是省公安厅的人，没有一个是成都市委的人。这和解放前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有什么区别呢？

李井泉关押我们，为什么对内对外都这样保密？很明显，他这种秘密关押是想搞秘密杀害。为什么他又没有搞呢？这里面有个很偶然的情况，打破了他秘密杀害的计划。当时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杀害我们。例如说什么张西挺畏罪自杀了，刘结挺又如何如何。他们正在制造舆论的时候，中央监委有个常委到成都来了解四清运动的情况。因为刘结挺给中央打过电报，要求到中央谈问题，因此这位常委顺便问起了这件事。李井泉就叫西南局监察处、省监委和审查刘结挺、张西挺专案组，向这位常委汇报所谓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这位常委到成都没有这个任务，但他想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几次要和我们谈。都被李井泉拒绝了。最后他要求和我们见一面，李井泉才被迫同意。但是见面的时间却安排在他的飞机票已买好，准备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一天，十几个人把我们两人押送到这位常委的住处。这里不仅门口有几个秘密岗哨，而且还公开派了一个干部作记录。我们进去以后，他很奇怪地说："我找的是两个人，怎么来了三个人呢？"他还不晓得派了一个记录。当时我们向他提出来，要求单独谈情况，这个"记录"就被撵走了。"记录"被撵走后，我们首先向他谈的就是李井泉对我们的秘密关押，揭露秘密关押的目的就是想搞秘密杀害的阴谋。我们要求在没有开除我们党籍以前，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还提出如果需要关押的话，就请他把我们带到中央去，关在北京。他听后同意把我们放出来，他说他向西南局、省委谈一谈。他跟西南局和省委谈后，西南局、省委不同意放人。他又要求放一个，问是否可以把刘结挺放出去呢？他们说：把刘结挺放出去他要杀人！他又问，是不是可以把张西挺放出去呢？女同志嘛，回去照顾照顾孩子，他们说也不行，把张西挺放出去，她要翻案。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放我们出去，相反在监狱里对我们的监视更严了，对我们的咒骂声更是不断。而这位常委也因此被李井泉等人告到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去，受到了批评。就是这件意外的发生，打破了李井泉秘密杀人的计划。

关押我们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批准的，是李井泉亲自掌握情况决定的。李井泉把我和刘结挺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关押我们的地方戒备森严，围墙很高，四面有警卫把守。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黑夜比白天还亮。十几个民警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例如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去厕所的路上的片刻停留，他们都有记录。李井泉原来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安窃听器，据说研究了几次，最后说不安了。窃听器虽然不安了，却派了一个公安厅侦察处的技术科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搞什么技术鉴定。

（四）

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四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革命派，把四川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不仅私设监狱，而且还在监狱里施

行一整套法西斯政策。我们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过的是不折不扣的李井泉独立王国里的犯人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刘结挺害有严重的风湿性脊椎关节炎，却偏偏把他安排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我住的房子有五个窗户却钉死了四个，只剩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夏天也不许打开另外的窗户。

关押期间，我们两人不许接近。我病了或者刘结挺病了，也不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看望。李井泉还采取断绝水源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不管是冬天、夏天，每天除了给小半盆脸水外，其它任何水也不给。所以，我们在狱中两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被子，连女同志卫生用水都不给。平时，我们只能接点雨水洗洗衣服。看守我们的人中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当他值班的时候，我找他要点水，他还是给的。他假装自己用水，提了半桶水放在我的门口，我趁别人不注意就把半桶水拿到屋里去用了。就这样两次，被他们发觉了，借故把这个同志斗争了两个月。他们还常常逼着我们吃已经烂了的臭肉来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吃，他们骂：你们连肉都不吃，还要吃什么？有一天，刘结挺被逼吃了一盘烂肉，结果病了十几天。即使关在监狱里边，他们还不放心，经常进行突然检查和搜身，哪怕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材料被他们扣下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在监狱里我们的材料被他们没收了几次。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过的几岁孩子写的信也“不许毁坏”，他们要随时检查。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母爱和父子之情来折磨我们，妄图使我们念及儿女情长放弃阶级斗争。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突然看见我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四岁多，一个五岁多）站在院子里。我很奇怪，就问“组长”：孩子怎么进来了？“组长”说：是上级叫来的，你叫他到屋里去嘛！我就把孩子牵到房子里来。孩子见了我不哭也不闹，连声“妈妈”也不喊。我问他们：“孩子，你们怎么来的？是哪一个送你们来的？”孩子们不说话。我说：“不认得妈妈啦？你们怎么不说话啊？”孩子张着两个大眼睛到处看，我说：“你们到处看什么呢？”孩子说：“我怕叔叔。”我说：“不要怕，妈妈在这儿。”大一点的孩子这是就哭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折磨孩子，在孩子进监狱的当天晚上就发高烧。孩子只在监狱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孩子都已经睡了，突然接到通知：刘结挺、张西挺的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我要求孩子病好了以后再走，他们说：“不行！”我说：“孩子病了，是不是明天再走？”他们说：“不行，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没有办法，我就把孩子喊醒，给他们穿好衣服。大点的孩子听了不愿意走，最小的孩子叫爸爸妈妈跟他一块回家。这时候，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说什么呢？我只好说：“不要哭。你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吗？毛主席的好孩子在坏人面前是不哭的。你们看妈妈都不在坏人面前哭。”孩子讲：“我害怕，怕叔叔。”我说：“不要怕，没关系，他们不会整你们，你们都是孩子，如果他们整你们，毛主席知道了不会答应。”这时，孩子就不哭了。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当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坚贞不屈进行斗争的时候，敌人会突然把你的亲人推到你面前，妄图软化你的斗志，分散你的斗争精力。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堕落到这种程度。

他们还常常用死来威胁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一些无法捉摸的话，预示我们马上就有被杀害的可能，妄图使用这些手法来搅乱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安静的写揭发材料，分散我们向他们斗争的精力。李井泉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我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写材料，把我们要向当说的话，要向毛主席说的话，在没有被杀害以前全部写出来。李井泉为了骗口供，什么可耻的手段都使用了。1964 年 5 月，他们用药物使我中毒，我头昏眼花，浑身痉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头发大部分脱落了，连续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靠点开水维持生命。正在这样的时刻，李井泉派省监委副书记带领十几个人乘机闯进牢房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整整斗争了我三天。他们斗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不断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勾结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罪行。他们说：“你们不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说我们替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翻案吗？”我说：“是写过。”他们说：“你现在怎么认识？”我说：“我现在还这样认识。”他们就说：“那么就请你谈谈，替哪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翻俺了？”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仅在宜宾地区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及涉及的案件就有三百余件，他们好象不知道似的。当时我举了两个案例之后说：“你们不仅替他们翻了案，而且还升了他们的官，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中的骨干分子进行倒算。替右派分子翻案，就是右派行为！”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药物中毒以后，我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刘结挺就给他们写报告，要求把我送到医院里，他们就这样讲：“你不是要求住院吗？我们同意你住院，不过我们得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统一认识以后，才能住医院，不然的话就不行。”他们妄图用住院来换取口供，想在我临死之前，趁我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捞点稻草。可是，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可耻地失败了！

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李井泉还常常使用资产阶级的政客手法，对我们打、拉、逼，软硬兼施。1963 年 9 月份，李井

泉派省监委书记找刘结挺谈判。那个监委书记对刘结挺说："老刘啊，你不要老是扭着那个问题不放好不好？翻了就翻了，你不要管他，承认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就行了。"刘结挺讲："不是我扭住问题不放，是你们非翻案不可嘛。"wengewang.org 他又说"你老刘是个聪明人嘛，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过去的都不算，重新来好不好？只要你和省委合作，保证不给处分，这话李政委早就说过了嘛！"当李井泉这个阴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又派西南局监察组组长找我们谈。那个监察组长说："你们不要再扯这些案子了，越扯越复杂。你们说真理在你们手里，这个问题就算真理在你们手里也难办得很啊！你们的档案有几十箱子，以后哪个去看呢？"刘结挺讲："你们编造的材料再多，问题再复杂，但是用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来考察，再复杂的案件也能搞清楚的。"李井泉看软的不行，又派省监委副书记对刘结挺进行威胁："你一定得按省委的决定检讨，不然的话，你想捞根稻草也办不到。"话里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杀害我们。

在革命同志之间挑拨离间，也是李井泉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叫王茂聚、郭林川和我们划清界限，揭露我们的所谓问题，一方面又找刘结挺谈话："老刘啊，我看你相当孤立呀！你以为宜宾还有人支持你，其实，我看除了张西挺外再也没有人支持你了。"又说什么："那十几个案子，根据我们了解并不都是你搞的，有些是王茂聚、**搞的.......。别人搞的你不要都担起来。我也当过第一书记嘛，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嘛！特别是处理案子有专案人员，第一书记哪能管那么多。"刘结挺说："即使不是我搞的，甚至也不是宜宾的案子，只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要你们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我就不能不管，我都要进行揭发。"

(五)

在监狱中，李井泉对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他既骗不了我们，也没有压倒我们，相反，我们对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造他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在监狱里，我们怀着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我们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摧残。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写了许多检举和揭发的材料，揭发李井泉从一九六二年起，顽固地推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李井泉所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露和控诉他们勾结阶级敌人大规模地替阶级敌人翻案，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滔天罪行。这场翻案反翻案，倒算反倒算，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面进行了两年。对敌人的阴谋和罪恶必须进行充分的揭露才能够在政治上压倒他。李井泉私设监狱关押我们已经是他的一条大罪状。他在监狱里对我们进行折磨和摧残，这是他的又一条大罪状。对李井泉这些罪状必须进行揭露，必须把它一桩桩、一件件记载下来，以便在我们被杀害之后，革命同志和他清算。"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存李井泉这些罪状呢？用日记的形式可以记载下来，但不容易保存，因为他们可以毁掉它。那么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想，通过给他写信这样一个合法的形式才能记载下他的罪状。于是我们就不断地给他写信。例如，为了揭露他让我们吃烂肉，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刘结挺因为吃了烂肉已经病了几天了，请"李政委"批准不要给我们吃这样的烂肉，给我们吃青菜白饭。我住的房子五个窗户不是给他们钉死了四个吗？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李政委"，我住的房子五个窗子被他们钉死四个，只留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窗子。女同志在里面活动不方便，这个窗子我不愿意打开。现在天气热了，请允许我多开一个窗户。或者拿这个窗户换另一个窗户。是否有当?请"李政委"批示。我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两瓶药，一瓶是眼药，一瓶是治疗肾脏炎的药。但都被他们搜走了。为了要这两瓶药，我给李井泉写了好几封信。本来一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几封呢？我有个想法，给他找点麻烦！我要眼药给他写封信，要治疗肾脏炎的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要药要了半年都不给我，结果药都坏了，他们就告诉我药已经坏了，你不要再要了。以后，我又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说：就是坏药也请"李政委"批准发给我，因为我现在连坏药也没有吃的。他们不准我们两个接近，说是一个案子的不能接近。我们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人是一个案子，究竟有没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在一起谈谈才行，不然的话，我们不好写检查。刘结挺离开宜宾时，只带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我离开宜宾时，连毛巾也没有带一条。我没有毛巾洗脸，就给李井泉写信，要求"李政委"批准我每天向刘结挺借洗脸毛巾。

总之，我们和李井泉保持"密切联系"，随时"请示报告"。一事一报，进行充分的揭露。写不写"综合报告"呢？写！在一九六五年放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给他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报告"上讲：我们被放出来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过去在红牌楼，不管写信、吃饭等等，一切都有人具体管理。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应该和谁联系'由谁

管理，我们不清楚。这些事情请“李政委”给明确一下。另外，我们给孩子写了一封信，过去这种信都是交给“工作组长”，检查了以后送到上面代发。现在这封信该交给谁检查呢？是不是送给“李政委”检查了以后请“李政委”代发呢？刘结挺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年没洗澡了，准备进城洗次澡，是否恰当，请“李政委”批示。我们还抓住他非法对我们逮捕、拘留这一点向他展开进攻。因为，他对我们关押没有拘留证，又没有逮捕证，这不能不是他的包袱。抓住这一点，我们又要求他准许我们到外面来活动。我们知道他不会答应，但这是斗争，也是揭露。布票发下来以后，我们就给他写信说：我们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发给了我们多少布票。既然发了布票，我们要求“李政委”批准我们出去买布。夏天来了，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出去做一件夏衣穿。“七一”来了，我们要求出去参加党的生日的庆祝，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国庆节来了，我们要求参加国庆活动，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公民。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三天，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他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放我们三天假……。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后来给李井泉发觉了，就把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力下放给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叫人来骂我们：“你们怎么经常给首长写信？你们写信还写什么[李政委亲启]，亲字下面还划个圈，好象很重要似的，其实就那些小事。比如打开窗户这种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不就行了？”我说：“怕你们为难，给李政委批了，你们照办不就行了？”他说：“你们写封信，我们拿去给收发，收发要登记，登记了交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又交秘书室，秘书室再转交李政委秘书，李政委看了要批，李政委一批就成文件了。”我说：“用不着麻烦李政委，他可以不批嘛。”他说：“就是李政委不批，只要写上[李政委已阅]几个字，这就成了省委文件了，就要作档案保存。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你们不懂啊？”我当时心想，就是懂得这个才这样干的啊。

李井泉把权力下放，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你这个李井泉领导，只看得起你李井泉。所以，我们不下放，我们有什么事还是直接向李井泉打报告，向李井泉请示，就是要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就是要扭着你不放，揭露到底。

(六)

五年来的迫害并没有把我们压垮，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我们也过来了。每当我们回忆这段斗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斗争的紧张，也感到斗争的幸福和愉快。

我们出来以后，特别是到北京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来看，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顶十天八天还可以，顶一个月两个月问题也不大，时间再长一点我们就怀疑所坚持的是不是正确，对斗争能否胜利就发生了怀疑。你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整整五年，你们动摇过没有?你们对斗争的胜利发生过怀疑没有？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坚持了长达五年的斗争呢？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的，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十天八天和二个月两个月是可以顶住的。坚持不懈地顶上几年，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李井泉的来头很大，他不仅控制着从宜宾市委到宜宾地委、四川省委、西南局这样一个四级组织，代表着“党”，而且他又是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进行斗争，顶住这样一股长达五年之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在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坚持的不是什么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动摇过，我们从来没有按照他的决定写过一个字的检查。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进行长达五年之久的斗争呢？是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宜宾的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着我们，宜宾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和我们心连心，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从一九六二年起，宜宾的革命同志就常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揭露李井泉等人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从宜宾我们又想到全国，全国的革命同志也会支持我们斗争的。

在五年的斗争中，我们总是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时时回忆着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反对翻案风。毛主席的教导，不仅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而且给了我们斗争的智慧。李井泉等可以搜走我们的“毛选”，但是，太阳的光辉他是挡不住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就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心。

对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我们作了充分估计。一个估计是，他可能杀害我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他们的确写了杀害我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他们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从当时关押我们的情况来看，要么就是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投降，和他们一起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一起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这样，不但可以保命，而且可以保官，说不定还可以升官。要么，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保卫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向他们的资

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这样就有杀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后，刘结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以后，就把抽屉打开，反贴在板子上，以便在我们被害之后，一旦有同志发现，就会交给我们的亲人毛主席。第二个估计，他可能判我们徒刑。当时我们估计可能判二十年徒刑。我们计算了一下，二十年出来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有毛主席在，我们的斗争就一定会得到胜利。我在监狱里写的日记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的。这些日记早就被他们抄走了。抄走以后，他们从日记上摘抄了一些片断，安上了一个题目叫做："反革命分子张西挺的罪恶记实"。红卫兵小将抄黑材料时抄到了这份材料，看了以后非常奇怪。他们说，这明明是一心向着党，向着毛主席的日记嘛，怎么叫"反革命罪恶记实"呢？然而，在李井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谁就是他的"好党员"、"好干部"。这就是李井泉对"反革命"和"好党员"的定义。下面是几段日记摘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十多年来，党把我培养成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过党的任何处分，历次政治运动，党把我作为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使用。母亲养育我十三年，而党把我养育成人，党比母亲亲，党对我的恩情，我无法计算。亲爱的党啊！我永远不忘您的教导：记住阶级和阶级斗争，挺身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我们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她不能允许牛鬼蛇神翻案，绝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即使宜宾专区这么一个小地方，发现以后也会立即粉碎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永远不会得逞，革命同志有一天会揪出他们来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九六二年配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需要大搞翻案，终究要遭到可耻的下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苏联《真理报》捏造谣言攻击我们党的材料以后，写了一段日记。)

《真理报》为什么使用希特勒和戈培尔使用的伎俩呢？......出于一个原则，就是造谣重复三次，别人就会相信。怪不得这两年几十个"演唱家"到处演唱。(这里讲的"演唱家'是指李井泉专门组织搞我们的所谓专案组，他们编造材料，到处作报告，制造舆论。)他们是深深懂得这种伎俩的效果的。不过我相信谎言终究是要暴露的。在毛泽东时代，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必将被揭露。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热爱进行斗争的。虽然我们与世隔绝，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但是我们的斗争既不孤立也不盲目。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领导的国际原修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读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等消息时，我们激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当时我们想，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究会被人民赶下台来，扔到垃圾堆里去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我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很紧张，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几百万字的揭发控诉材料，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秘密监狱里写出来的。因此，两年的监狱生活，我们从来不感到寂寞，我们

所感到的是斗争的幸福和愉快。当时我们想，李井泉既然把我们“调”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就要在这里和他斗争，就要在这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身体健康是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要有能坚持斗争的身体，就必须加强体质的锻炼。一九六四年八月份，我们发现由于活动范围小，活动少，我们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走路不大方便，如果不采取措施锻炼身体，就无法坚持斗争。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属于党的，我们有责任把它锻炼好，和李井泉斗争是长期的，尤其需要一个能够坚持斗争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每天做二十分钟的腿部活动，做四十分钟的腿部体操，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列入到和李井泉斗争的议程。

(七)

一九六四年六月份，李井泉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的报告，就是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在李井泉亲自主持改写的这个修正主义报告中，他不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我和刘结挺横加罪名，而且大肆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竟然被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批准了。这就是批准了李井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全部活动！这个报告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省监委向我们宣布。宣布以后就把我和刘结挺送到省委罗家碾招待所去了。在罗家碾招待所里面虽然有人监视、盯梢，但活动总算有点自由了。这个时候李井泉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刘结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甚至还捏造说，毛主席都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是全国的典型。和我们一起斗争的个别同志听了这些消息后，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还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们，不要再斗争了，胳膊总是扭不过大腿，刘结挺你这个小小的地委书记能斗过有权有势的李井泉吗？李井泉上面有上面的人，下面有下面的人，你不要再找麻烦了。还有的同志讲，你过去是个地委书记，属于中央管理的、现在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干部，进一步给你一个什么处分，要杀要关那就用不着报中央，他就处理了。还有的同志提醒我们：既然中央都批示下来了，那就不是李井泉的问题了，你再告那就是告中央了。叫我们考虑考虑后果。甚至还有人劝我们，受点委屈算了，想不通吗，看看《修养》，就会想通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争个什么嘛！有碗饭吃就行。你看你们的孩子四、五年没有跟你们在一块，你们要对孩子负责，不要丢下孩子什么都不管了。等等。我们把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斗争中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加以考虑，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斗争，决不能不相信党，决不能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是批了，但我们对这种批有怀疑。当时想可能是一个什么书记批的，这个书记可能和彭德怀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案子里突出反映了××的问题，而 X×是拥护彭德怀的。我们想，决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毛主席批的！几年来，我们坚持的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斗争一定会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因此我们回答这些同志：“要告！一定要告！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为了使毛主席了解四川问题，为了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想办法离开四川。而李井泉紧紧地控制了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四川。于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开始了。这个斗争是 1962 年斗争的继续，也是 1962 年斗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刚放出来不久，李井泉就分配我们工作，把我们分到万县专区一个县里。我们算了一下，从那个地方到北京要十天的时间，一动身，李井泉马上就晓得了，马上就可以抓回去。这样就可以给你加罪名，说你畏罪潜逃，甚至说你潜逃外国，判你的刑。所以我们就是不去，劝说不去，打也不去，就是不听你的摆布，不服从你的分配，不让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牵着鼻子走。我们提出要求回北方工作。他们不准。我们就给中央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没犯任何错误。我们是因为热爱毛主席、坚持毛主席的路线而被开除党籍的。我们要求把我们调到北方工作。这封信结果被转到李井泉那里去了。省委组织部就找我们谈话，说中央组织部长看过信了，要我们服从四川省委安排，在哪里犯错误就在那里改正嘛，我们不听从。这时，刘结挺接到他侄子一封信，说他哥哥病得很厉害，叫他回去看一看。刘结挺就去请．假，请假也不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提出回乡搞农业生产去，回到农村作一个普通的社员去。我们分别写了报告，又、合写了一个报告。李井泉就派省

委书记处书记×××找刘结挺谈话，他说：你的报告我看到了，你要劳动，你不革命啦？刘结挺听了发笑，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老红军，不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第一线参加劳动吗？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业第一线，这怎么叫不革命呢？你们想叫我们不革命是办不到的。二十三条上讲得很清楚，不能当干部的可以当社员。"×××讲，"二十三条不适合你刘结挺。"刘结挺就开了他一个玩笑，说："×书记，我看到中央只有二十三条，是不是还有二十四条说，以上二十三条不适合刘结挺？"这位书记说不出话来。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让步，没有接受他们的工作分配，而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妥协，也没有让我们离开四川。在这一年多中间，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给中央寄发了不少材料。

(八)

下面我谈一谈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在北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关怀。

一九六六年六月，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激动得热泪盈框。我们下定决心，冲破这个黑框框到北京去。我们商量后决定刘结挺先去，我留下来掩护。刘结挺走，就怕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了封信，刘结挺自己带着。信的大意是：我到北京揭露李井泉的问题，不料在半路上被抓回去了。张西挺还在成都，宜宾还有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晓得李井泉的问题，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些同志调到北京。刘结挺带着这封信，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夜晚，翻墙、越河离开了成都，在六月底第一次到了北京。刘结挺离开成都以后，忙坏了李井泉，他一方面派人对我进行了几次审讯。问我："刘结挺到哪里去啦？"我说："到中央去了。"问："到中央干什么？"我说。"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呀，""到中央哪里丢呀，"我说："到中央嘛！"他说："中央单位多咧！到中央监委，还是中央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还是到中央文革？"我说："那他没有说，他说他找毛主席去了！"他一方面用省委和公安厅的名义，打电报给党中央和公安部，要把刘结挺抓回去。省公安厅还用传真把刘结挺的像片传到公安部，要公安部寻找刘结挺。刘结挺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写了两万多字的材料，交给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这个接待室里有个组长，他看了材料后说．"这几年来，我们经常接到宜宾来的很多信，和你谈的差不多。我们准备把这些材料和你写的材料汇总一下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你是不是到中央监委谈一谈。"经过他的介绍，刘结挺到中央监委谈后，他们劝刘结挺回四川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也要刘结挺回四川，说材料已经转报给中央了，回去听后处理就行了。刘结挺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一谈，都遭到拒绝。正在这个时候，刘结挺听说江青同志经常到北大去，就到北大去找江青同志。但是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公安部门查出了刘结挺的住址，勒令他在七月底以前立即离开北京。刘结挺在八月一日回到了成都。

(九)

刘结挺回成都后，我们一方面给李井泉等人写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特别要求回宜宾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我们写小字报给他，揭露他的问题，并且要求他转给毛主席。当然我们晓得他不会转，不转就是他扣押给毛主席的信，这又是一条罪状。大概因为我们要求到宜宾麻痹了他，或者因为北京红卫兵小将南下串连，对他们有威胁，他们对我们的监视不是那么很严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城里去对付学生。这时，我们便决定一起走。八月二十五日一个大雨的夜晚，我们翻墙跑出来了。二十七日到了北京。在北京和宜宾的革命战友王茂聚、李良同志会合了。因为我们到北京揭发李井泉等人的问题，加上王茂聚、李良他们来北京以前写了揭发李井泉等的大字报，我和刘结挺写了揭发李井泉的小字报，李井泉等便把我们打成了"反革命"，打成了"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李井泉还故弄玄虚，把我和刘结挺的照片用传真传到北京和国防边境上，捉拿"越境逃犯"。我们四人住在一起，和那个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取得了联系。他对我们很热情，叫我们打破顾虑，把李井泉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并对我们说，据我们了解，李井泉的问题不少，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李井泉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就不好办了。我们四个人很受鼓舞，就连夜赶写材料，边写边送，边送边写。到九月中旬，我们就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材料。那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了解到我们所写的材料基本告一段落后，态度马上变了。他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看了我们写的材料，叫我们要相信四川省委是革命的，李井泉是革命的。他还要我们把掌握的李井泉的原始材料都交给他，以便中央办公厅转交四川省委保存，说这些材料个人保存不安全等等。这个人的面貌完全暴露了。我们要求把我们所写的材料交给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看，并请求这些同志接见我们一次。这个人怎

么回答呢？他说："接见不可能，他们忙得很。材料嘛，既已交给我了，给谁看，由我来安排。"他并下令限期要我们离开北京。

(十)

在我们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那个组长联系的这段时间里，李井泉布置他的忠实打手宜宾地委书记×××在宜宾、成都大造"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的舆论，把他们捏造了五年多的谣言一古脑儿倒了出来。他还下令动员各级组织给中央书记处打加急电报，要求把我们送回四川。他们给中央书记处打电报的同时，还给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以及中央文革打了电报。几天的电报费就用去将近一万元的样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我们还在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联系时，李井泉就派了二十八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捉我们。这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极右分子和一个劳改犯。这一天中午，同志们都休息了，我想出去买点东西，刚到门口就发现被包围了。我赶快退回来，叫刘结挺他们快点起来，想办法把材料转移出去。我和李良同志就往外冲，门上有十几个人把守着，冲不出去。我们就找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说，他们不但不理，反而把招待所工作人员监视起来了。幸好有一个湖南的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是来上访的，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一定要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把信和材料交给毛主席。这个同志是革命的同志，革命同志心连心，他接受了我们的委托，还建议我们向北京的革命同志呼吁，要他们来支持，他主动表示要替我们去贴呼吁书。我们就赶快写了一个十二万分紧急呼吁书，呼吁书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搞独立王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正当我们向党中央揭露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捉拿我们，这是破坏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呼吁革命派声援我们，制止这一现行反革命活动。这个紧急呼吁在北京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贴出不久，就有几十个红卫兵小将和上访的革命同志赶到我们的住地，把那二十八个人赶跑了。但是这二十八个人并没有离开北京，他们在商业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即九月九日，他们把带来的打印好的小字报和他们连夜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大字报、小字报中说什么"刘张王郭一贯反党"。反什么党呢？那上面没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事实，说的全是反李井泉的事。他们甚至把刘结挺不和李井泉握手。都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写上去了。说什么刘结挺傲慢，"李政委'伸手去和刘结挺握手，刘结挺把帽子一拿就走了，等等。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对我们横加阻拦，说什么"你们都是作过领导工作的，应该懂得解决你们的问题要靠组织，而不是靠群众，不应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面前"。我们不答应。他就威胁我们说："现在每天有几十万学生到北京，象李井泉这样的大字报一贴出去，不到两个钟头就传遍全城，就会引起大辩论，如果引起大辩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在九月十日我们贴出了十二张大字报，揭露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大字报贴出后很受革命同志的欢迎，尤其是四川学生，很快就把大字报抄回四川张贴。而李井泉派来的人写的大字报则受到革命群众的指责。革命群众质问他们："反对李井泉怎么叫做反党？李井泉就代表党吗？"革命小将质问他们：十六条公布后，来北京抓人，对吗？他们非常狼狈。同时，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上访的革命群众酝酿斗争他们，计划斗争后把"代表团"团长和那个右派、劳改犯扣下来，其余的撵出北京。斗争会安排在九月十二日。不料在九月十一日夜晚，有人叫他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第二天到中南海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有两个人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安全表示非常关怀，劝他们离开北京。并透露说："你们的安全已经有问题，再过两天就不行了。这个事情某某某(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晓得了，希望你们赶快走。再不赶快走，问题就要在北京闹大了！"这样就在当天把他们掩护走了。由于这样掩护了一下，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如果把他们扣下来，那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鼓舞就大了，他们很快就会行动起来。

这以后我们就中断了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宾的那个组长的联系。我们觉得原住处也不能呆了，因为有危险。到哪里去呢？当时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及清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还处于困难时期，新北大的形势还比较好，我们就决定到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没有找到，只找到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说不好安排住宿，因为我们不是学生。叫我们到北京市委开个介绍信，才好安排住处。但是到北京市委，他们不给办。后来，经过一位上访同志介绍，到联合接待站去登记，联合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还分配一个接待员和我们接谈。这个接待员第一次跟我们接谈就向我们发脾气，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我们明明是来揭发李井泉的，怎么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呢？双方谈不下去了，他便要材料，说看了以后再确定时间谈。我们给了他一份材料，请他转送

给江青同志。于是，他走了。后来了解，这个人原来和李井泉派到北京去做情报工作的一个联络员有密切联系。

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正以各种途径寻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商业部进驻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一个人经常来找我们"聊天"，说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去？该回去了吧？在北京住着不是个法子，等等。有一次他干脆对我们进行威胁："你们住在这里群众有反映，你们都有工作岗位，住在这里不工作，不搞文化大革命还行啊！"又对王茂聚同志说："你是个地委副书记吧。还是个当权派，你应回四川受群众监督，接受考验嘛！"又对我们说："刘结挺、张西挺，你们都是开除党籍的，是不是？开除了党籍应该找中央监季嘛！找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从来不谈个人党籍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李井泉的问题。"我们把李井泉的问题大体给他谈了一下，他听后说："不会吧，李井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了解他嘛！"原来这个人过去是李井泉的老部下。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晓得李井泉的黑手已经从四川伸到北京来了。他派他的警卫员在北京建立了反革命组织"红旗军"，而且还通过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控制我们。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经常受到检查，也无法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后来，成都地质学院有五百多人到北京告状，告他们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便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只有先打倒西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学院党委书记的问题才好解决。他们材料不多，我们就供给材料。不久，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他们，我们便请他们带几份材料给周总理。不料到接见那天，周总理没去，材料交到××的手里去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写给毛主席的材料，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材料，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最后都落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没有一件送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

(十一)

十月三日，三司开了个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且讲了话。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有个第三司令部。在这个大会上，北航《红旗》谈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学习了这个发言，认为这个发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我们认定了北航《红旗》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并想法和他们联系。我们找到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同志，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我们谈的问题很重视，也很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样，在十月十一日，我们便把材料交给他们。十月十七日，王力同志就接见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欣喜若狂。十月二十日，王力和关锋同志一起接见我们。十月三十日，周总理又接见了我们。十二月三十日，王力同志告诉我们有关四川的情况，并叫我们回四川和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于是在今年一月份，刘结挺、王茂聚和李良便回四川了，我留在北京整理和印刷李井泉的材料。

(十二)

今年二月份，四川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又重新被打成了"反革命"。刘结挺被打成"反革命头头"。说刘结挺不仅控制了宜宾，而且控制了大西南。凡和刘结挺、王茂聚联系过的造反组织和个人都受到追查和斗争。他们还抄我们的家，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小孩换洗的衣服、被子、鞋袜都抄走了。在这次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造反派的头头，无论大小全都被抓，造反派的战士一个一个被斗争受迫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斗争过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他们大叫解放了，有的在背后出谋划策，镇压造反派，有的赤膊上阵，指挥抓人。他们还控制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以及首都来的记者，封锁消息。有的到北京去，在车上就被抓回送进监狱。这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特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保守派组织，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大镇压、大逮捕。这时，刘结挺、王茂聚等在成都不能呆了，便在二月底离开成都，到了北京。他们刚离开成都，便有人去抓他们，晚走一点就不能脱身。我一直住在北京，但他们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并派了三个人带着手铐到北京抓我，但未得逞。

(十三)

刘结挺等来北京后，就把成都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肯

定了宜宾革命同志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和李井泉等人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国两条路线斗争在宜宾的一个典型反映。决定召开会议，以解决宜宾问题。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并给我们平了反。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宜宾问题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可以实一些同志受到迫害，斗争中虽有某些困难和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一定取得彻底的胜利，宜宾问题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今后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这个教导千真万确，宜宾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造反派的同志在毛主席和中央关怀下，从监里放出来了，但是回到本单位又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去斗争，被限制自由，单位上不发给工资，使这些同志的家庭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他们还威胁革命造反派"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平反，他们扬言不承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轻易放弃他们这个西南大后方的。而宜宾这个地方，李井泉是这样说的："西南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而宜宾则是关键的关键。"关键他们是要抓的，关键的关键他们更要抓。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仍很艰巨。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团结在一起，继续斗争，彻底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大西南！我们一定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黑《修养》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斗垮，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王力戚本禹对廿二省市来京小学教师的讲话

王力 戚本禹

1966.11.19

〖上午 10：45 到下午 1：15，在政协礼堂。〗

王力：今天开座谈会，一个是看望各位小学教师同志们，听取大家的意见。小学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全国小学教师提出小学要求搞文化大革命，小学究竟怎么搞法，我们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我们看过一些材料，还没有系统地想。有谁想讲？

（重庆代表发言，讲了重庆的情况，其中提到他们已经开学，说是抓革命促生产）

王力同志笑着对戚本禹同志说：这也叫抓革命促生产？（戚本禹同志也笑了）

戚本禹：你们开学了吗？（答：开学了！）那你们怎么出来了？（众：都是跑出来的）你们都主张不开学？（答：不开学）你们都是一个意见？

王力：主张开学的有没有？（旅大同志回答：可以开学，但就是不能批判反动路线了。）

戚本禹：你是成都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回答后，戚本禹同志一一记下来了。）你们学校有多少教师？有多少“反革命”？有多少“政治扒手”？（这个同志具体答复了，又讲了斗争情况。）他们斗争你们怎么斗法？

（兰州代表讲了兰州的情况，说打成“反革命”的剪头发等。）

王力：你们那里被剪头发的有多少人？（答：一百一十七人）都是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吗？（答：不全是。现在还有被关在小屋子里的，我们不能回去。）什么人在那里搞的？（答：工作组）

一位请示团代表提出几个问题：

1、小学搞不搞文化大革命？

2、关于开学问题；

3、关于小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以谁为主的问题；

4、关于小学教师的串联问题；

5、关于小学师生红卫兵问题。

王力：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搞不搞？（众答：必须搞！）今天反映了很多情况，提出了许多问题，今天跟同志们交换意见，需要带回去研究。

戚本禹：全国大势所趋。

王力：肯定要搞，一定搞好，搞彻底。究竟怎么搞，还要靠大家，靠小学工作的同志，靠小学革命师生。开学不开学，我们还要研究，开学也不能按老一套开学，如果开，不是这样开法。你们都“集训”过吗？“集训”这办法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要研究，你们不承认人家叫它文化大革命？

（这时有很多人插话，有人说，不要乱插，要尊敬首长。）

王力：我们都是老百姓，大家都是一样，我叫王力，他叫戚本禹，他叫曹轶欧，加个同志也行，不加也行，名字就是叫的嘛！（热烈鼓掌）

（大家提出小学生是否可以一至四年级的另搞，五、六年级和中学一样。）

王力：要研究，如果这条可以，是这样的话，那红卫兵可按这条办。串联的问题我们要研究。（有人讲本市也不准串联）本市不准串联肯定不对，是错误的。

戚本禹：这时违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这不象社会主义国家嘛！

（有一位同志说：我们搞了，他们说，合理不合法。）

王力：革命还犯法呀！你们都有文革委员会？文革委员会是不是在工作组操纵下成立的？（北京、辽宁教师说：学

生打老师的事，有教师谈，看到了也不敢说。）

戚本禹：这点都不敢谈，你们还造什么反？

王力：操纵的不行，指定的不行。（关于是否重新选新革委会的问题，有的教师提出，要先破、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要斗争，先破，先批判。

（有人提到中央批转军委指示是否适合小学。）

王力：完全适用于小学，凡是给工作组、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都适合。不是因给工作组提意见，本身就有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不包括在内。凡是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都适用这条。（有人说：他们说工作组没作结论不算！）没有作结论，他们就这样干的都不行，都要平反，要说没有结论，都没有，那就不该有这个指示了。原则是提了，还靠你们自己去斗争。

（有个同志说：有人说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因而被斗三天，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有无依据。）讲得完全对，还很不够，讲得太轻啦，工作组走了，换了一种形式，你们说是吗？又来另一种形式，路线还是原来的路线，人还是原来的人，还有这种形式吗？（答：有！）因此，有联系的小学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众答：要反！）对！要反！反到底！工作组操纵文革不算数，违背十六条的也当然不算数。

王力：小学教师队伍怎么样，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众：复杂，一定要整顿。）小学教师队伍不纯，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人说：要整顿，增加新的血液。有人说，还有和尚当老师的呢！王力、戚本禹同志都笑了。）

（一教师提出：有人说十六条不适合小学，对吗？）

王力：不对！十六条全国都适用。（一位同志问：我们企业的学校怎么办？）不要等中央，你们要起来自己闯！中央还要靠大家。（有人提出对《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看法）你们可以写材料，“抓革命、促生产”是对工业、农业生产说的。

（有人说：运动一开始就在教师中划类，定框框，这样对不对？）

王力：运动一开始，就背着群众来个排队，排一、二、三、四类就不对，对群众不信任，这是错误路线的产物，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相反。毛主席是相信群众的，依靠群众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毛主席提倡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

（有人提出关于黑材料的处理问题）

王力：把运动中的黑材料，五月十六日以后的材料统统一律当众烧掉，本人的检查材料，交给本人。送到区里的也要退回来。材料处理，中央刚发了指示。（西南区的同志们问：林副主席提出，有些坏人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歪曲利用来压群众。）

戚本禹：不准整群众。

有人：西南区提出炮轰火烧，有人说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戚本禹：（站起来大声果断地说）西南区可以炮轰。（大家热烈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王力：象重庆那样的市委当然该轰，而且轰得还不够。（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

西南同志：成都还算好的。重庆、南充、宜宾、贵阳还要严重。

戚本禹：南充是很严重的。

西南区同志：我们西南区革命群众非常想念毛主席。

王力：西南区是够艰苦的。

（会议结束时合肥一个教师请戚本禹同志签名留念。）戚本禹：四旧，不签了。

周恩来和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纪要

周恩来

1966.11.26

〖参加单位：成都地质学院（廿八人）、重庆师专（三人）、西南民族学院（四人）、唐山铁道学院（二人）、红岩二中（一人）、自贡培红中学（一人）、自贡釜溪中学（一人）。总理从六点零七分开始和代表们座谈，一直到九点四十五分。总理一进会议厅就亲切地一一和代表们握手，然后就和代表们开始座谈。〗

总理：来的有工人没有？

同学：没有，重庆工人造反军都走了。(然后总理开始依次点名)

总理：……王典兴（自贡市培红中学学生，十三岁）

王：有。

总理：呵！就是这个小同学！(另一同学插话，才十三岁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

王：我与父母都断绝了关系。

总理：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多大岁数？家中兄弟多吗？

王：我父亲是工人，四十多岁，共产党员。我是老大，如果我父母不和我断绝关系的话，要被扣工资，开除党籍！

总理：不要怕，我保你！（同学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你们是唐山铁道学院的，什么时候搬走的？

同学：今年五月。

总理：你们是几年级的？

同学：四年级的。

总理：你们学校的问题怎么样？

同学：要回唐山的那一部分人已动身回唐山了，有一批今年路过北京。

总理：你们看一部分人回唐山搞文化大革命，一部分人留在娥眉搞，行不行？

同学：现在他们已动手把牛鬼蛇神押往唐山，把筹委会、党委的一些材料已运往唐山！

总理：你们是什么观点？

同学：我们是留在西南干革命，炮轰西南局的。我们是“争朝夕”战斗队。

总理：在哪里都可以干革命，你们六月份以后有多少人在峨嵋？

同学：将近一半。

总理：我看在哪儿都一样，西南不是三线建设吗？你们不是有人参加了三线建设，那儿搞的热火朝天！我说在四川是闹革命，在唐山也是闹革命！大连铁道学院的同学，他们绝食，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同学：不好！

同学：不好！

总理：对嘛！毛主席叫我们吃饱饭干革命，绝食，把精力都用完了！中央文革给你们谈过吗？

同学：没有！那次王力主要是和重庆中学生谈过。

总理：你们和哪些工人有联系？

同学：主要和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革命造反军的一连（现在已改名为“八·一五”战斗团）、大专院校工人“硬骨头”战斗团有联系。

总理：你们地质学院现在在北京还有多少人？

同学：四百六十人。

总理：民族学院呢？

同学：一百九十人。

总理：有一个四川告状团不是你们一起的吧？

同学：（生气地说）不是，是“二·七”战斗团的。前次我们开告状会时，他们还冒我们的名。

总理：今天主席接见，四川告状团在天安门不走，怎么说也解决不了。我们把他们集中在旗杆附近，他们还把我们三个执勤人员的袖章，一顶军帽……都抢去了，（周荣鑫插话：这些人还骂我们的执勤人员是“宪兵队”）我准备叫你们去劝一下，结果又不是你们一起的。

同学：他们都是工人，不是学生。

总理：昨天，他们在王府井一百多人睡在马路上不走，同学们又是劝又是拉，最后才睡在马路侧边。

（周荣鑫：他们闹了三次了。）

同学：我们要坚决摧毁这些保皇组织！

总理：我还以为是你们，真把我们搞得紧张的很！

同学：不是我们的，他们冒充我们告状团，就是那次冲金水桥的那些人。

总理：重庆“八·一五”战斗团是与你们合作的吗？

同学：对的，他们就是重庆工人造反军的一连。

总理：搞了三次，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们造你们的反，怎么不告诉我们接待站呢？

同学：我们与中南海（接待员）讲过，他们打伤一连的人，抢走了我们的照相机，工人的手套……。

总理：你们查一下（指接待员），他们为什么造你们的反？

同学：人很少。

总理：魏子楷现在在哪里，这个阶级异己分子。

同学：是宜宾地委刘结挺揭发的。

总理：刘结挺他们在哪里？

同学：现在在北京×××……（总理把刘结挺、张西挺、王长骤、秀良的名字，职业，现在在哪里都一一记下来。）

总理：他们来多久了？

同学：他们八月份就来了，已三个多月了，他们不敢回去了，李井泉要抓他们。

（总理仔细阅读我们给他的告状信件，我们当面向总理递交了全部告状材料，以及刘结挺等人揭发李井泉等人的材

料。）

总理：你们成都地质学院的同学谈一谈“十一·二”事件是怎么回事？

（同学叙说成都地质学院的“十一·二”事件）

总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哪个学校为骨干？

同学：以我院（成地）“东方红”公社为骨干，他们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看错了人，帮他们建立起来的。

总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现在怎么样？

同学：造他们的反了。

总理：“八·一”红旗战斗大队（指成地）是什么人组成的？

同学：是由中上层干部、科长、党委委员组成，专门对付革命学生的组织。

总理：你们是什么组织？

同学：我们是各个战斗团组成的，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院筹委完全支持我们的观点。

总理：你们院筹委会是何时选的？

同学：八月八日。

总理：行政谁管？

同学：院党委。

总理：你们院党委没有取消吗？

同学：没有，他们还要加强领导呢。

总理：你们怎么进驻到西南局去了呢！

同学：我们去造反，他们就乘机搞我们。

总理：你们没有多少人在家，吃了亏，你们的斗争、策略成问题，你们没有准备。那时你们电话不能打，你们地质学院在哪里？（同学：十里店）西南局在哪里？（同学：红旗街）不在锦江饭店！你们地质学院离城多远？（同学：二十多里）你们有没有自行车？你们没有联系好，没准备，他们把材料抢去烧了，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他们有多少人？

同学：他们有八百多，我们在西南局有八百多，家里的人很少。他们从下午五点开始打人，打到第二天，当时还抄了很多人的家。

总理：文件被抢走了吗？

同学：都被烧了。

总理：他们烧东西，你们见到了吗？

同学：见到了。他们到楼顶上去烧的，打了人后，他们就到省委去了，有的跑到南充、北原…等地去了。他们还打了外地同学（北地“东方红”，南京等地的同学）他们把枪拿走了。

总理：枪没有保管起来吗？

同学：没有，是他们的人在掌管，李井泉曾调动军队来向我们示威，在成都、重庆、贵阳都调用了军队。李井泉坏透了，我们要坚决打倒他。

（总理详细阅读了我们揭发李井泉调动军队的材料）

总理：那还了得！你们不要看得那样严重，现在调不动了。

同学：调得动的，他们到处造谣我们要制造匈亚利事件……的舆论。o 二八部队的几个战士还给林副主席写了血书？

总理：现在说民族学院。

同学：七月七日工作组把三百多名毕业生给放走了。

总理：是少数民族多，还是汉族同学多。

同学：少数民族多。他们都不愿意走，他们最了解院党委的情况，现在还剩四百多人工作组说什么这些毕业生都是在职干部，要服从党的分配，要留下，必须要原单位出证明来。

（此时总理离开座位，走到西南民族学院同学的身边来了。）

总理：这算一个问题。

同学：我们学院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学生斗学生，学生斗家属（教职员与工人家属，说他们是黑帮），很凶。

总理：工人家属怎么是黑帮呢？工作组是什么时候撤的？

同学：工作组是八月份撤的，现在还留有联络员。

总理：联络员还没有撤？教职员没站在你们一边吗？

同学：没有撤，有两万教职工都来！我们每开一次斗争会都要经过上级批准。

总理：你们十一月一日那次会议没经批准？柳云参加没有？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同学：没经批准，柳云参加了，我们要求罢李井泉的官，撤柳云（民族学院第一书记）的职。

总理：地质学院的要求是什么？

同学：罢李井泉的官。

总理：院党委把你们打成反革命的有多少？（指民族学院）

同学：没公开，暗地里给我们排队，秘密掌握。

总理：是暗中排队，没有公开围攻你们。

同学：柳云与西南局关系密切，原来在西康时，柳云是寥同志的秘书。我们来告状的目的，是撤李井泉的职，罢李井泉的官；撤柳云的职，罢柳云的官。

总理：地质学院有一个赵铮，八月份停职反省。任白戈现在在哪里？

同学：被“八·一五”抓来斗争，住在重大，在重大扫地，劳动改造。

（此时，总理找来一个人，指示：军委今晚就收回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八·一五”战斗队库存的武器，今晚一点钟回电，任何枪支全拿去，军委负责清查，少一个子弹都不行。）

总理：重庆的同学谈谈重庆的情况。

同学：重庆的“八·一五”事件，重庆很多人都到我校（重大师专）声援，两个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战斗组，当时市委来人指责重大四十多人不按社论办事，大灭了革命派的志气。

总理：你们被打成反革命的有多少人？

同学：有四十多个。

总理：这四十多人现在来没有？

同学：没有，这一天，在我校办公大楼上还出现了两挺轻机枪（我校从来没有轻机枪的）校党委说你们敢冲，我们就开枪。

总理：群众被压，就没有冲了。重庆市委是什么态度？

同学：市委指责重大同学一通，事后重大同学就批判年昂之的讲话是大毒草。重庆市委还规定了四条禁令，是通过向职工以文件形式传达的。

总理：重庆市委在什么地方？

同学：在曾家岩。当时还不许工人、同学往市委门口通过。

总理：是真的吗？

同学：工人讲的。李井泉八月二十七日给重庆市委逐一定调子，打保票没有问题，并说：“不要把我的讲话公布到大字报上去，我的话是（看不清）的，抽掉了一个字就不行了。”

总理：这是一个长的讲话，还是一个短的讲话。

同学：要传达十多分钟。

总理：对重庆市委的估价。

同学：（简述“八·二八”事件……）造谣专家到处都是。

总理：以什么名义发的这些传单的？

同学：以各种调查组的名义发的。在全国散发大批大批攻击“八·一五”的传单，好多单位还作党政文件加以学习。李井泉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开的黑会我是参加了的，中心的内容就是搞垮重大“八·一五”，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总理：什么人参加？

同学：各个学校派两三个人参加，都是反对“八·一五”最凶的人，因为我曾骂过“八·一五”两次，所以我就去参加了。因为会议内容不准向外传达，所以叫黑会。就在这个会上成立组织了毛泽东主义（后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派韦久泰、梁大门为指导员。李井泉并说：“你们去冲嘛！他们不敢搞你们这支队伍，争取十天扭转阵局！”

总理：你听见了吗？

同学：我听得最清楚。还记下了。

总理：有录音报告是什么人作的，与九月七日的讲话一致吧。

同学：不知道是什么人作的，与九月七日讲话一致。

总理：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同学：我们要求改组重庆市委，交出黑材料，要求罢李井泉的官。

总理：你们中学生来北京冲破了规定吗？

同学：造反派都选不上代表，是自己选出来的。

总理：明天我要讲些原则问题，你们都去参加，以后就可以回去了，回去斗争吧！一个单位最后剩下三名代表就行了。地质学院人多，可以多留下几个。

同学：明天开会，我们不要“二·七”造反军的。

总理：这样好不好，明天我接见你们，具体问题我另行解决，来了我讲你怎能保证他们是铁板一块。李育兰原来也是保守派的，现在还是变过来了，明天我讲原则问题，以后我再找你们解决问题。原来那个造反军与你们混在一起。搞得我们很怕。我倒不怕，秘书长解决不了，我还要到现场去解决，看他们究竟是什么问题，鱼目不能混珠，叫你们等了这么久。你是保守派就站出来承认嘛！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法国有个保皇党，公开承认他是保皇党，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根本就没有皇帝了，工党实际上不是工人的罗！还有保皇党，反动派都敢公开，我们要干公开，错误要改。错了就改，不能伪装。彭真惯用的两面派手法危险性最大。彭德怀公开反党反对毛主席，容易发现。两面派手法危险性最大。你们青年人不要学习旧社会那一套，搞两面手法，要坦率，公公正正。你们今天就谈得很坦率，

有错误就改正。

现在有的革命干部爱讲故事，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实际上是歪风，有的子弟就学到了。特别是高干子弟有些小动作很不好。

同学：中学生都放假了，回家要挨打。

总理：不要怕，越打！犯的错误就越大。放假是对的，回家不对，要闹革命。你们回去斗争，去锻炼嘛！今天我们抱着你们的手去干革命，今后你们都见不到我们老一辈了，我们都不见了，怎么办？自己去干嘛！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期望。

你们要按原则办事。某个地区的具体问题，还要自己奋斗，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授予你们，你们要接班，现在你们锻炼得比我们好。

（此时，由成都地区学院红卫兵给总理献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袖章，亲自给总理戴上，并请总理代献袖章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最后，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恩来接见成都昆明等十七个单位和刘结挺等四人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1.30

〖地点：中南海小会议厅。周总理进到会议厅后，刚坐下来，看到会的人名单，就发现了宜宾的刘结挺等四人，一一点名和他们认识了一下。接着又详细地看了成都地院 11 月 30 日打来的长途电话记录。〗

周总理问："工人造反兵团北上了一千多人？"代表回答："已经到北京了 64 人，还有一千多人在步行，他们要见毛主席，要把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中央反映。"

昆明代表反映了他们的情况，说李井泉到昆明后，保守势力大力活跃，在学生中大挖红烙印、黄烙印、黑烙印（指阶级烙印）……。总理说："什么！这些怪名字，真是谭立夫思想！"

接着总理又让贵州代表谈贵州的情况。还问及贵阳保守派有多少人，组织工人、农民斗学生吗？"代表回答：从六月就开始了。逼死了学生一名，还有两名坐牢的，十六条公布以后，还逼疯了一个人。总理关心地问："坐牢的出来没有？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代表回答："一直到现在。11 月 2 日又打死了一人。"总理关切地问："是中央会议以后！是谁打的？省委没有处分吗？代表回答："17 日又打伤了 22 人，都是小学生。"总理气愤地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

接着总理又对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问题作了指示。总理说："各地红卫兵要求参加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以致使得省、市、县好多地方的会议都没有开好。我们说过：让他们自己去开，开了，好改正，好做工作。有些地方的左派还问是否毛主席说的，我给他们说：毛主席说过。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好多红卫兵还不是党员。要参加会议，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让他们关上门，冷静地考虑一下问题。红卫兵一进去，批评他们，吵起来，对立起来，他们就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开好这个会，在群众中检讨好，做好工作。文化大革命都无经验，全国都是这样，一下子大民主，他们搞不惯，有些人有抵触，但不是全部，我们争取他们转过来。"

周总理在听了一会贵州代表反映的情况以后，又听成电东方红战斗兵团谈到关于杜心愿的女儿组织了一个保皇战斗团的情况。总理说："几百人的组织嘛！还是用我这个名字叫'保皇'这是一个封建势力。"（代表插道：他们自己也承认！说他们是保无产阶级的皇！）总理接着说："那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开玩笑。保无产阶级，那就应该说保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因为有对立情绪。'保皇'嘛！总是一个封建名称，为什么不学一个新名称，'保守'！今天有，明天还有。'保皇'就固定了。红卫兵成立时，天天骂'黑狗崽子'，那又有什么意思。过去在北海公园门口还贴过'黑狗崽子不准进'。长期这么贴，能行吗？调合不调合的问题，是看你放弃原则没有！

接着，周总理又听了重庆、南充的代表反映情况。总理详细地询问了各地保守势力和左派的人数，过去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当听到有的学生、工人被斗、被关、被打时，总理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与同情。连连询问：怎么关起来的，关在什么地方，关了多久，现在放了没有，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黑材料处理的情况等等。同时也鼓励我们的代表说："你听他们说，他们说反革命就反革命了吗？"还风趣地说："南充是个大本营呀！你们去嘛！我看你们有点怕了吧！"当听到代表反映南充礼堂把李井泉的象和毛主席的象并挂时，总理惊奇地问："是真的？"代表说："是真的，取下来前还照的有相。火花公社就是李井泉蹲点的地方，针插不进！"总理又说："怎么这么大影响！你们要做工作哟！不会是铁板一块，要想办法做工作，要说服，要宣传，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要说他们都是保皇派。要同情他们，说服他们，想办法分化他们！"同时还鼓励大家："你们和他们辩嘛！他们有什么理论水平？我看还没有你们强，不革命才会出现匈牙利事件。"

下面，周总理又详细地倾听了自贡小代表王典新叙述了他所遭受的迫害。王典新才十三岁就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被父亲吊打八次，不给饭吃，南下同学给他送饭，有时一天只吃到一顿，还被捆起来，边打、边游行，最后，由于王典新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被家中断绝了关系。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南下同学协助下逃到北京的，周总理听到王典新小同学的血泪控诉时，都忍不住流出沉痛的泪水，但立刻又抑制住了，立即问："市委书记是谁？"还鼓励和安慰王典新同学说："你父母是不得已的，你到了北京，回去以后，你父母是会欢迎你的。"又说："他们说你是暴徒，当小暴徒也很好吗！你了不起！年纪这么轻，回去好好奋斗吧！"

最后，周总理又想起了宜宾的刘结挺等四位同志，迫于时间已深夜十二点四十分了，总理答应和他们四人专门找时间单独谈。临走时，周总理再一次和自贡王典新小代表握手，并亲切地对他说："努力奋斗，再加一把劲！"

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纪要

王力

1967.01.24

〖时间：六七年元月廿四日 2：12～4：00，地点：人大会堂小会议室。被接见者：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全体同志，四川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民。〗

当同学们谈到关于苗前民事件时提到了廖井丹（成都市委书记）梁岐山（四川省监委书记）时，王力同志说：廖井丹还指挥得动人吗？成都搞得那么糟。梁岐山这么厉害，他这样对待群众，这个梁岐山很成问题。

王力：你们是否回成都夺权？

同学：早就想回去了，回去一定要夺权。

王力：把苗前民带回去，让他们（指苗前民、梁岐山等人）耍花招，在运动中让他们各表演各人的，抓苗前民抓的不对。

最后王力同志说：你们做得好，四川就是要彻底大乱，成都将有希望。

首先由苗前民谈他被捕经过和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接着王力同志说：西南文化大革命搞的真不象话。从开始以来就是那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众：还有南充）啊！还有南充。李井泉、李大章俩比怎样？

苗答：这俩个人都是一样。

同学：是否中央批准李井泉养病？

王力：没有，原来听说他血压升高，当时说过让他进医院看病，没叫他长期修养，然后给大西南作检查。是他自己跑到上海，他老婆打电报要他回成都，被红卫兵抓了，这是前两天的事。

（对苗）你现在还觉得李井泉不错吧！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他还能当第一书记吗？（苗答：不行了！）他们红卫兵总部不要李井泉了。将来不要什么由上而下任命什么官，要由群众自己挑选。你们这些干部要到群众中去，立点新功，不能靠老本钱吃饭，有的连老本钱都没有。

李井泉、廖志高都退到幕后了，李大章也不得了吗？还有些部长级的干部呢？（同学：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时候都不是铁板一块，现在要做工作，如果是真正认识到了反毛主席，就会觉醒的，总会分化一部分。

十二月份成都还在打架（同学：现在还在打）那些血案都看到了吗？我看成都要大打一打好让群众和干部都受教育，因为是他们搞的嘛！比如上海工人 100 多万，上月的上半月才一千多人，这个历史潮流起来了，是不可阻挡的。

什么叫革命造反？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指苗前民之流）对李井泉还有幻想，西南局的问题还没解决，压力也很大。把你（指苗）的党籍都开除了，还顾什么？你够不够一个党员，你要不要党籍能靠李井泉给你恢复吗？只能靠群众。过去组织部的那一套，就是安子文干了廿多年的那一套，是反毛主席的，他的那一套哪里来的，都不是毛主席的。你当了十三年组织部长，看来他们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你们（指苗前民之流）过去就没有感觉到西南局问题的严重，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马列

主义者，就没有感到西南问题的严重，搞得什么东西！（此时王力同志生气）只要当个官就没上劲了，是资产阶级的，不但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现在要赶紧投入革命，不是搞两面派，不要搞假的。如果你过去是李井泉的死党，是反毛主席的死党，可就不可能救药了。如果你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的精神面貌就会得到改变要揭发问题，对李井泉不要抱幻想。李井泉、邓小平、刘少奇也可能要反过来，我们准备掉脑袋，但这也不行，这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你（指苗前民）的思想状态还是不好的，还不是积极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一提到李井泉你用词就不对，什么缺点呀！什么缺点呀！你根本没有仇恨，对革命群众受打击，受迫害不同情，对反对毛主席还不愤慨，你应站过来，把立场彻底改变，把那些坏东西揭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只要真正站过来了，群众是会相信你的。

（问苗）：你对宜宾地委张西挺的案子经手了吗？我见过那四位同志，他们比你们高明，他们的精神面貌比你好，他们拥护毛主席，彻底跟李井泉斗，现在你还不敢起来，还不是一个战士，你是否还是看到红卫兵青年人的缺点啦（答：没有），那不一定，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来，勇敢地同他们斗争，他们把手拷给你带上，进一步无非是杀头，看来他们对你并不是因为你是革命派而捉你，是否是李井泉的死党也不是，可能是李井泉的忠实走狗，对吗？你估计是因为你好象是揭了他（指梁歧山）的假造反，把你捉起来，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但你又没有真造反的决心，和红卫兵一起，跟他干到底。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你光荣，是第二种情况，捉得对，如果是第三、第四，他是真造反，因为你说他是假的，抓了你他是不对的。

对你（指苗）说实话，原来我们还认为你是革命派，他们（指梁歧山之流）捉了你，很想把你调来谈清楚，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苗前民同志你是否有决心跟小将一起造反，不要当这个官了。（答：思想上是这样想）应该这样，十三年的组织部长，把他（指李井泉推行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及其他问题）那一套揭出来就没你的事了。

将来不一定要搞一个什么部了，要搞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的新形式，过去那套是从苏联学来的，不要那一套，不要认为熬过运动这一关后又当官。

红卫兵也要注意，不要看成铁板一快，要做工作，保守派的工作要做，做了错事，犯了错误的也要做，不要采用一种方法，不要老是当学生，想整个的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学一点本事，懂的更多一些。尤其对原来的干部要区别对待，要有个政策，恐怕有一些老一点的干部去参加更好些，全部打倒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要造反成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注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运动，不能老是学生运动，这仅仅是开始，紧接着就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要动，不要以为干部都是铁板一快，是铁杆保皇，他们知道的比你们多，你们的本事也大，到处调查了许多材料，但不能忘记广大机关干部，要做他们的工作，不能靠外力，要内部形成造反派，青年小将是会干起来的，我看盟委一个廿四级的干部比一个四级干部强得多，比 20 级的干部还高明，他还拥护毛主席，说的头头是道。定了这么多级压力很大，这一套本来就不要了。当然不是指平均主义，他们借口生活待遇，其实不是这样。现在文件发下去，有级别限制，革命人民看不到，不革命的倒看到了，结果文件如石沉大海。

同学问：刘澜涛是否叛徒？

王力：你西北局（有一西安同学在场）的刘澜涛坏得很，不是叛徒是什么！

同学：学联、妇联之类组织还要不要？

王力：我是主张通通打倒！重新组织，由红卫兵代替，不是打倒人，是指打倒机构。

同学：李井泉、廖志高的老婆样样工作不搞。

王力：你说的不对，他们也干了不少坏事（王力看了李井泉反毛主席的一张传单）我给你们（指在场红卫兵）提出一点，要分别对待，现在叫你们红卫兵推选一个省委书记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过大革命锻炼的干部，将来谁当省委第一书记，省委名单，厅局长名单应由群众讨论，酝酿，不要形式的代表会，而是要真正的代表会讨论，要制定方式，上海工人就提出了谁当第一书记兼市长，第二书记兼副市长，他们提得好，给我们很大启发，叫他们提出方案，提一套名单，现在暂不公布。要由工人来定乾坤，由工人来发挥领导作用，学生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军队、中央马上就要发下指示，军队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凡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帮忙，军队都要按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我们主张在内部传达到红卫兵。

保皇派打了造反派，造反派无法解决时，可要求军队支援。如南京的造反派被打了三千多人，死了几个人，后来军队出动，抓了两千人，南京问题就解决了。

同学：成都造反派打得很厉害。

王力：左派要提高，学生运动中要整风，要参加联合斗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反对小团体主义，要树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要光想出风头，不要老想抢官做。不要养成坏习气，老干部的这些坏习气你们不要捡起来。

同学：简单谈了成都情况，说造反派间斗争很尖锐。

王力：这没关系，这是大的潮流、大的风暴，各种思潮都要登台表演，这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有些原来站在前面的，后来跟不上这样的大革命，这样大的革命，有分化这是正常的，但对左派队伍自己来讲，要严重注意，不要掉队。

同学：梁岐山的问题是否中央文革交给“北地东方红公社”搞？

王力：我们没有，我们不会这样搞，是不是我们办公室要过材料啊！（王力同志问右边坐着的文革办公室瞧玉山同志，答：没有）真假在群众中来辨别，让他们在群众中自己来表演，谁革命不革命不能由北京来决定，从北京来封也不行。

同学：成都经济主义很严重。

王力：成都的这个经济主义早就很有本事，十二月就听反映化了很多钱。

同学：关于夺权问题。王力：联合起来才能夺权，一个夺了另一个又去夺，要有适当地联合，组织和纪律，现在已出现有上海 32 个革命组织夺权，山西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接管了省委。

同学：抄总部好不好？

王力：抄总部我们没有提倡嘛！

同学：外地到本地串连的关系怎样处理？王力：你们说呢？（同学：应该以本地为主，外地为辅）那是大串连时期，现在住下的是有威信的，或者当地欢迎的就留下。

同学：留在本地的是想整垮一个组织，而成立另一个组织。

王力：外地只能帮助本地革命组织，不论什么三司也好，北航红旗也好，不能充当领导，搞个联络，通通消息，中央的任何决定不是凭空想，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不能乱下令。

同学：扣留人对不对？

王力：扣什么人，如果有民愤的黑帮可以扣，如彭、陆、罗、杨、另外也可以用一下，但不能普遍用，你们不要都抓了，并不是保皇派都抓，应抓凶手和幕后指挥者，反对毛主席的要抓。同学：同意李洪山的观点可不可以抓？

王力：当然可以抓罗！

王力：关于成都军区接管广播电台的事，造反派不同意，成都军区不得力，群众信不过，所以中央这次发了指示，就是根据成都和沈阳发出的。只要是军队接管，只能广播造反派的，不能广播保守派的。军队接管只能是暂时的，过渡的，造反派真正掌权了，军队就撤出，如果造反派已经掌了权，就不用军队去接管。同学：有人说毛主席元月初到成都，8 号返回北京，有此事吗？

王力：主席都在北京，没有出去。

同学：对苗前民的问题怎么办？

王力：宣布对苗前民的处理一律无效，恢复他的党籍，你们就回去宣布嘛！你们有权力宣布！苗前民你跟学生一起闹革命就好了！就年轻了！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王力

1967.03.16

从上到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是一股逆流值得注意，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研究一下第五期红旗社论，不能把这种东西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就放到第五期红旗社论提的那样就可以了，在三结合，两个阶级决战的时刻，应该注意，毛主席党中央每提到一个重要口号，阶级敌人总会接过去，他把“三结合”也会接过去，他也可以搞不革命的三结合，现在反对资产阶级新的复辟活动，主要是在决战时候，（问：是否主要是三结合？）同意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是无产阶级夺权还是反过来呢？搞复辟的三结合，假夺权，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比较集中的表现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建立三结合。斗争是什么结果？是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夺权还是翻过来？你们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要搞那一套，要复辟，就必然要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

干部问题，要正确对待干部，红旗第五期社论提出来，排斥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张，也有一些同志不清楚，肃清其余毒你们要发挥一点。《要爱护革命小将》写的不够，不好。干部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着重批评他们包办代替的工作组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现在看来是一个方面。还有第二个表现，就是把所有的干部统统打成黑帮，清华大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以团结干部，特别是清华的同学要注意，刘少奇由王光美、薄一波、叶林是他们打的，别的地方甚至把一般的党团员打成右派。团结干部首先必须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间来进行，事实上打倒干部的旗子是他们（刘邓）打的，在别的学校也是这样。必须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于干部问题也要着重批判他们。对干部，群众打倒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混淆阶级界限，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笼统的提打倒当权派呀，中层干部呀，带“长”字的，这没有阶级分析，要用阶级的路线的，站在那一边原则的区分来辨别他是左中右，这一问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刘邓一直是有斗争的，他们的主张是不对的，错误的，到刘邓路线揭发后，同继承刘邓路线的人一直是有斗争的，同脑子里有刘邓路线余毒的同志一直是有斗争的，对待干部的问题毛主席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是：二十三条毛主席就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干部政策，十六条完全适用，是做阶级分析，对干部要分析，同志们要把毛主席干部政策旗子拿起来，毛主席的是革命路线采取的政策，刘邓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刘邓反动路线有一贯的思想。毛主席批判他们四清中形“左”实右，在四清运动中不是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说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没有阶级分析，封建社会也有贪官，他们是只要有四不清的干部都要整。对毛主席提出的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四清我们还没有体会。

以前，刘少奇、彭真搞晋察冀，当时搞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干部和石头一样搬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要烧，这是错误的，他应该是领导骨干嘛，应该是他们领导来烧，这种思想是刘邓的余毒。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就要抓住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这条纲。这个问题红旗社论的那一段是毛主席提出的。就是两种形式：一概打倒，不能把这个罪加到群众头上。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军队的问题也要讲一讲。是不大好写。成都、福州、宜宾我知道。是不是还有一些不让回来的？在解放军的问题上，有些同志是有错误的。还是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三司联络站陈伯达同志是讲了话的。要掌握一条，有意见（对军区）要提，可以提，可是要采取适当的途径。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也正在研究。（问：三结合是否都要搞）一个问题是要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与1949年原则上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军管是在已经有了十七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了，已经有了广大的群众，广泛的群众运动，有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现在实行军管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支持群众的左派，准备建立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保障四大，保障社会秩序。更好地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促进开门整风。不区别是要犯错误，那不对！军管这个问题，不实行的要实行，官僚的可以以后撤消，作为过渡，军队支持左派群众，主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支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不但要有总路线，还有具体的政策，这样不会犯刘邓工作队的毛病，这是无产阶级的，同志们要相信这一点，军队保证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掌握的。也有犯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误，不要公开对抗，不然好人坏人就分不出来了。不能轻易把群众组织说成是反革命，有一部分不好就是一部分做了坏事，绝大部分都是好的，是好人，这一条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忘记了就要犯错误。

（福州的情况）具体的不了解，你们要总结一下识别左派、中间派、保守派，这个不好登报，可以给军队参考，帮助他们识别。

我们出去的人，不做阶级分析，容易莽莽闯闯，以前刘邓搞了群众的黑材料，现在去了不问他们的情况，就一头扎到他们那里、跟头头们转。不是有好几个联络站请罪嘛，我们不同意用请罪，动不动就挂牌子。青岛、山西、长沙、福州……是不是可以把不让回来的人统统开个单子给我，中央已经有命令了嘛，统统应该回来嘛，只要不是凶杀、放火。

昨天是合肥，北航在新华社的一个同学，他说安徽夺权的这派很好，昨天我同安徽代表谈话以后，他承认，他一个月在八·二七组织里，没跳出八·二七来研究。对安徽正在研究，反正很复杂。我们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代表团不能回答。问他们在夺权以前红卫军主要成员是陈明远，有什么理由说他们要抢权，有什么证据？为什么 11 日安徽三天血案立刻就写了呼吁书的 16 个干部组织发展了二千七到七千多的干部组织与那个组织有联系一概要分化打倒

究竟是什么理由？从这个时候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一个多月斗争的锋芒集中的对这个组织，斗争锋芒是对准于得水，死在监牢里（一只手搓草帘子，二十一天），为什么脖子上没有印子，为什么舌头未伸出来，面容正常。为什么镇压该组织的决定还有李葆华开会参加？这十六个干部中可能有不好的，是否都不好？是否比现在还未站出来的还不好？三结合不能根据官儿大小。我只举个例子说，北航红旗同志觉得都很不错，这些问题我们没法回答，为什么三天血案的直接指挥者王光宇（安庆）还结合，这样搞下去，李葆华是否可以结合。这样的结合是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是否李葆华是对了？原来学生是不是对？反对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刻骨仇恨是不是对？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作结论。夺权斗争是很复杂的，不能轻易作结论。中央很慎重，一个一个研究，既然翻过来，也没什么。

四川已经是这样的情况，我接到很多信。宜宾地委北航红旗同志早反映过情况，现在还认为四个人是反革命，我认为这四个人的案子完全是颠倒黑白，完全是李井泉他们一手制造的，是李井泉 1962 年到宜宾给右派和拥护彭德怀的人翻案，（地委）第二书记刘结挺坚决抵制，李井泉就陷害他们，把他们开除党籍坐了两年牢，他们没有屈服，这个案子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我们查了全部的档案材料，比较清楚的，现在把支持这些干部的人（这个案子打了一百几十个干部）都在镇压，这个矛头完全错了。他们派三个人来抓刘结挺等三人，带着逮捕证，我和关锋同志通过公安部把抓人的人抓起来。把宜宾方面军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个问题我们要处理。至于他那里还有什么复杂情况我们不知道，这个案子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要看他猖狂一时。（河南）最近搞刘建勋的少了。河南我们还未研究，以后再研究。河南来，怕要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才行，他们认为左的右的都要来。我们要考虑搞一条，在北京不要抓人。反正不要紧，一个省一个省的要到北京来研究。夺权要经过文革小组参加研究，毛主席批准才能定下来。

不要去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有人问毕业生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考虑，同学自己去考虑嘛。

（北京石油学院有人回家）这不好，应该让他们回来。不参加组织，自由战士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对学校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区别对待，团结。

（有人怕犯错误）这就不犯错误了吗？

毛主席的意见：大学、中学、工人开代表会，毛主席的意见是开中学红代会，然后再开工代会。然后再联合，这样好一些。

（中学是否实现班级大联合）这是一种提倡，要根据具体情况，是否是时机，要看具体情况。通过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起作用，要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旗帜不鲜明就不能联合。要根据不同学校的情况，具体安排。

人民日报准备系统研究一下，听听汇报，唐平铸的问题我们很久都不知道，后来以后搞了很久，我们才知道是×××搞的。

社外监督小组是必要的，留多少人在人民日报工作还可以商量。本来我们建议评论和文化革命工作是否可以合并。社外的同志主要参加这一方面的工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社内的是不是可以不搞了，要建立起临时的权力机构。逐步要有革命的三结合机构。临时有几个人作为核心建立短小精悍的班子。人民日报也无所谓，三结合，就是要有权力机构。政治部机构的同志怎样？王若水、李希凡两个要做为标兵，从全国来看，把他们打成三反分子，全国还有什么人？

1．不要社外监督组的名义。

2．评论组与文革报导组合并，留下的同志数量不要多，这样适当。

定下来这几个月不换，比较固定（三、四、五月）是关键时刻。是关键时刻。集中到评论报导部，当前任务是搞好报纸。不在报社的同志要建立一联系，发展一点。留下来的同志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服从人民日报权力机构的领导。统一指挥工作，内部按民主集中制选举领导同志。

军训报导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主席未批示。现在还不能见报，主席没批是有他的考虑的。对唐平铸要么就那么坏，要么就那么好。要立几个标兵，唐平铸也是一个标兵，唐平铸过去建立政治部不对，取消政治部不报告也不对。

总是要过的好一点，不要太泄气儿，（人民日报）六月以前是吴冷西办的，他就办的那么好？六月以后，陈伯达同志搞的。七月八月陶铸插了几下。唐平铸有动摇，陶铸的话也听，文革小组的也不是不听，说他完全听陶铸的也不符合事实。在公开揭陶铸以前唐平铸同志与陶铸疏远了。他与陶铸有裂痕，而且他上了陶铸一个大当，以后对陶铸就有了一定的认识，不久就写了揭露陶铸的材料。但是这个同志并不那么坚定，听毛主席的话并不那么坚定。但他揭露陶铸比报社内其他同志早。后来你们就把他打倒了，出来一个冒雨吉，也没有打我们的招呼，临时夺权。这一段比前一段还是比唐平铸同志的时候还是要好。所以不必那么灰溜溜嘛！大家都做了一点工作嘛！反正不能是恢复原状，要用革命的态度来对待三结合，精神是这样，形势不一定。笼统的打碎机器主要是贯彻革命的精神，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实质是保证这张报纸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是哪一个阶级的工具，哪一条路线的工具。工作还要做，要做到，包括你们自己，我也搞不清楚，你们对唐平铸究竟是什么看法。你们又送材料又提建议就要研究你们的态度。有五至七人组成领导核心。可以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你们要研究中央、主席提倡的订一个宣传报导计划，一体周知，充分讨论，一体周知。

夺权斗争嘛。二、三、四月能各省市、重要学校、重要厂矿、中央重要的部都能看出一些眉目来，搞革命的三结合，需要夺权的地方要夺权。看来四月份解决不了，再延长一个月。大串联看来不适合时宜，阶级斗争形势，三结合发展需要，看来不要搞……，一系列政策定下来，运动进入正轨，而且要来北京的学生主要都来了，看来就不要搞了，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大学开学应该你们回答嘛。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应该继续下去。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问到李先念、余秋里、谭震林）我不大清楚。李先念当前是谁反哪？（医大红旗……）这对不对？

谭震林 2 • 17 的讲话（不许传达、印发、执行）。外边不要公开，公开了还以为我们搞的，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搞的。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 年 4 月。

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1967.04.01

〖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李

天佑、叶群。〗

总理：现在开会，今天就根据前几天主席的指示，我们找你们来关于宜宾问题，叫党政负责人，群众代表都来，四川军区，成都的都来在这里，刘结挺同志控诉，来检查四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联的同学，回来反映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告状的反映许多问题，宜宾、万县、古灵、成都、重庆，看来不单是宜宾了，原来也不认为单是宜宾，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先要解决一下宜宾的问题，先请刘结挺同志讲一下。（刘结挺开始控诉……接待我们时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

康生：谁讲的？

总理：几号讲的？（刘结挺：中央办公厅的人讲的，九月十二日，说什么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要我们赶快离开北京，不然事会闹大……）

康生：电话讲的吗？（刘结挺：是直接接见讲的，二十七个被接见的人揭发了这件事，就被军分区抓了……）

康生：二十七个人中间一个揭露了这件事，被军分区抓到监狱，叫什么名字？（刘结挺：叫高玉文。）

总理：办公厅接见的人叫什么名字，你们不晓得？（刘结挺：我们没参加。）你们没参加，接见了他们。（刘结挺：对，接见了他们。）高玉文是谁抓的？（众：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王富德同志，高玉文还抓着呢？（王富德：高玉文是地方革命组织抓的，我还不知道呢。）你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来。（……郭林川没有来）郭林川在那里？（众：在宜宾。）

康生：怎么没找到？让王富德同志找他来，把他送来，保证他的安全。（众：王富德要抓他……）

总理：（问王学明）你说在什么公社？（答：郭林川在 xx 公社）（王富德：接到电话，我们找了，没找到。）甘渭汉同志，今天晚上你要保证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保证送到北京来。（……）

（谈到用飞机散传单，抓人一事）

王力：（对陈伯达同志）飞机一来，下面就抓。

伯达：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用飞机散发传单是谁同意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飞机散发也是吗？（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

（会议争论很激烈）

总理：同志们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他们原来那样对你们，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甘渭汉同志，电报讲，在监狱的请负责放出来，在外地的请负责找来，以上人员，请甘渭汉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 3 月 30 日派飞机来接，可你们，把底下这些人还看管着，当犯人，到了北京还这样。

杨成武：打电话给他们，昨天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犯人，不发出入证，他们是中央请来的客人。打电报时也打了电话，你们根本问题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

（众：还有四个没有来……）

总理：哪四个？是哪儿的？李良在哪里？（众：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甘渭汉同志，给你四个名字，加上高玉文，（众：刘结挺的女儿也被抓了。）几个？（众：三个）有人照顾吗？（众：刘结挺的家被抄了二十多次。）甘渭汉同志，要把这五个同志找回来，三个孩子，告诉他们送回家。（汪宗清：三个孩子没有抓。）你军管了嘛！你去查，限你二天。

（王茂聚控诉）

康生：牟海秀在这里吗？你晓得宜宾抓了多少人？（牟海秀：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你在中央面前声明你一点不晓得？记下来。沈学理你对抓人的情况晓得不晓得？（沈学理：我 3 月 5 日才放出来……）你到处作报告，你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抓了人没有？（沈学理：我在中央面前声明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是抓反革命。）好，记下来。

总理：讲你放出来以后嘛，出来四十多天了嘛，（沈学理：宣布了几个反革命组织，方面军，反修战斗团，前哨，觉醒，现在地委没有工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记下来！（……）（有人说：四川有人讲，李井泉还是李政委，牟海秀还是政委。）

康生：现在还是“他们的政委”嘛！（……）

（谈到军分区到京抓张西挺一事）

王力：军分区派的公安部的三个干部，来抓张西挺，他们以为刘结挺不在这里，我和关锋同志通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后来我们了解这三个干部原来是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的，是带功立罪的，就放了他们，让肖华同志办公室通知宜宾专区。

（1）刘、张、王、郭不是反革命。（2）抓人怎么样，后来回去就找到了。（温国良：到公安局，就不让我们出来。）总政下了通知嘛！军阀十足军阀！（……）

（王富德：我没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负责，没派人，我抓工农业生产去了。）

（争论激烈）

（王富德：我们都可以说话嘛，元月 25 日方面军跑到我们那里要我们派军队，军队根据文件只能军管。1 月 28 日把一万多人包围军分区，把我拉出来打了一顿，打坏了，养了一个多月，有医生证明，后来省里让我管生产，我就抓生产去了。）

王力：你讲话要讲事实。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讲假话，抓人我不晓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这样的，开始我不知道，在军区开会时，甘渭汉同我有三个人去北京抓人才知道。）

总理：谁派去的？

（汪宗清：军管小组，参谋李勤然，他是市武装部、政治部，主任，他是组长。）他自己决定的？没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没有。）（……）

（谈到 2 月 17 日和荣复军）

总理：这个问题和军分区和荣复军没关系？

（王富德：我们不同意成立荣复军。）

总理：有没有关系？

（王富德：我们对他们做正面教育……我们没关系。）

总理：又没关系了？！（……）

总理：今天结束这个会，这个会还要继续开，军分区，地委的要申明他们的意见，控诉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个一个问题弄清，你们激动心情我们理解，你们回去，今晚，明天上午开个小组会，哪个同志谈哪个问题，不要谈细节，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 月 28 日，2 月 10 日到京抓人，刘、王、张、郭问题都清楚了，以前他们也有材料，毫无疑问要平反，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四川全面开展斗争，三个省份的问题，刘结挺、张西挺、王聚茂三位同志把问题集中一下，四川要镇反这个问题，集中在那里。

康生：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 19 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 18 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 20 分钟开始大逮捕。

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韦杰：军区决定的。）万县开枪开死人，你们报告没有？（韦杰：当时没报告，大约五、六天后报告的。）五、六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誉发出的？（韦杰：电报式，以军区名誉。）

王力：打死多少人？（韦杰：五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报告名单。

关锋：是否是五个？就是五个？

总理：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离座谈情况差太远了，今天就停止，因为刘结挺提出，从宜宾情况到全省在我们看，拿宜宾来说，先镇压革命群众，革命组织，2 月底到三月集中揭发大的事件。万县、左灵、自贡、成都、重庆，通告包括地方很广了，要化一点时间，不是一、二天解决的。

第一件事：成都军区要负全责，赶快把这个事停止，梁新忠同志监督，马上打电话去，今后如这样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能抓，要放出来，也不要马上就放，不然会不知下落了，你们一个一个军分区打电话，军管电话给你们，一个个军分区传达到武装部，对革命群众不能再歧视了，对真正反革命组织要区别头头和群众，明后天要发通知。

第二，请在座的解决这个事，是局部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大形势，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么力量呢？第一相信群众，第二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嘛！

解放军起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柱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个人犯严重错误是个人责任，我们要相信群众会听主席、林副统帅的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过去的情况揭发就可以解决，不要对解放军抱情绪。

未解决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单位讲，在这里可以谈，把问题谈清楚，在外面要谈，对联络员，记者可以谈，更不要在报上，井岗山报，红卫兵报上登，也不要写大字报。军区打电话，你们不要打，四川很紧张，你们打了，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复杂紧张了。全国七千万人的一个省，李井泉是我们揭发的，对党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彻底解决。

康生：请同志们注意，我有几点说明：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总理：会就到这儿。

高呼：毛主席万岁！

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注：根据宪徽同志的意见，本资料中“众：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这节，其中“王富德”应为“谢英富”。原文件资料录入有误。此外，据谢英富回忆，该文件在“刘结挺开始控诉……接待我们时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后，漏了一段，大意是《脚印》中提到的：总理问有个宜宾八八工人造反团叫谢英富的怎么没来？宜宾在京的当权者说没找到。这时康生插话说：“你们军管了吗，怎么会找不到？去查吗。”……）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1967.04.03

〖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

周总理：现在开大会，今天先由军分区、地委讲一下，讲完再讲。严重的可以插一两句，要尽快一点。军分区哪个

同志？

（汪宗清讲……），（王府德讲……），（沈学理讲……）

王力：（对姚文元）沈学理，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呢？

周总理：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简短一点。

王力：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省委的材料都看了。

周总理：你好一点嘛，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讲的。

康生：你讲一下现在的情况，你总知道些嘛，你要亮相嘛。

姚文元：你是三结合对象嘛（冷笑）（对沈学理发言）

王力：三结合第一对象是他（冷笑）

杨成武：不亮相怎么结合？

姚文元：你在这里也可以亮相嘛（说着就笑起进里面去了）

王力：你可以亮相嘛，对于李井泉这个黑帮你可以亮相嘛？

周总理：你讲些什么，你对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么意见，你说嘛，没有说的就算了。

牟海秀：……

周总理：过去的事简单一点，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

康生：你对李井泉有什么看法（牟海秀：接触的少……）

张春桥：你对他现在怎么看（牟海秀：根本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王志敏：……

王力：冲军区的问题我插一句。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康生：（对王志敏）你讲了半天，而且要认罪，而且犯了严重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你没有讲，要具体点，犯什么错误，抽象化。（王……）

王力：四川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把毛主席批示再说一下（重复读一遍）

康生：我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中央向各地发的中央解决安徽问题，中央的批语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条。第二条是不得整群众，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反正是因为冲军分区或者对军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

各地区，各单位，夺权有不同意见，而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刚才王力念的（念一遍）。（郑光华讲……）

康生：同志，你讲一讲 2 月 17 日以后，16 日以后，19 日中间到外地捉人，实行白色恐怖，你 32111 什么态度？

康生：你简单讲一讲，32111 参加捉人没有参加捉人，参加打人没有参加打人？

周总理：抓人 2 月 19 日以后参加了？打人呢？

（郑光华：抓人参加了，打人不清楚。）

周总理：参加抓人，抓了多少？

王力：2 月 19 日以后你不是在宜宾吗？军分区、公安局和 32111 抓了 5 人，你在哪儿嘛。（郑光华：我不清楚）估计一下。

周总理：你不要讲了，（谢永福同志，高玉文同志讲话）（……）

周总理：省委的同志还有什么讲的，韦杰同志还有讲的嘛？你讲几句。（韦杰……）（储彬同志讲）

周总理：你写给我有多少人？军队内部的，你代表他们来了，你休养一下，以后写出来，以后还要提意见。韦杰同志你快结束吧！你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在 1 月 29 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宜宾的情况清楚了，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我代表中央文革讲几句话，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送给他的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残酷斗争革命群众，这样的一分材料他指示应该加以处理，找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谈，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问题大体上是清楚了。

王府德、汪学清、牟海秀、沈学理，这些人的发言虽然是不老实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的，逃脱不了的。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我们认为同志们继续斗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伙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必败无疑的。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现在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革命造反派的大干将们，你们讲了很多了，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 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

进，这个情况，材料反映很多，活动也很多。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从北京到成都串联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联的，过去邓小平、彭真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动，刘邓、彭真、罗瑞卿都到那里去串联活动，中央把它们盖子揭开的，刚才有的同志批评军区是很需要的，刚才说调到宜宾一个团（是二个营）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同志们，我简单讲几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同时，我们林副主席还研究了青海问题，以及其它军区的问题，也包括四川成都军区以及宜宾军分区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坚持这个看法，毛主席 1 月 21 日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的事，毛主席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第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军某些少数人犯错误，或者是青海的赵××那样混入解放军的坏分子。无理制造镇压革命群众事件，但总是极少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这些问题中间，林副主席讲究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问题，认为中间有的做得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林副主席建议，支左问题提到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不久文件要发到各地。

我们的解放军能掌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支持左派的伟大任务取得了胜利。

当然，支持左派问题犯了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正的。希望解放军、广大群众理解，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有重大作用。

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 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 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也反映四川斗争怎样复杂曲折，摆在前面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问题，可是看到一个事实，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刘少奇，反对邓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军分区、地委讲了几句，重点要我们派工作组，调查组，到宜宾调查，意见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痒的话，四、五个人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调查我们过去调查过，现在还在作调查，但有一点要承认，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要调查什么？军分区没有讲，地委也没有讲，省委一句话也不提。

我们希望军分区、地委、省委，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大方向问题，到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调查，可以做结论。

当然革命组织有没有错误，你们自己也要作检查，对解放军，骂解放军，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你们就这样，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并且要成文件，开除党籍事没有文件传达到县委，在宜宾要传达到全体党员。

这是可以看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一时可以使一些同志受迫害，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获得彻底胜利，从宜宾可以看出。

周总理：谢副总理讲一讲，解放四川才能解放大西南，讲一讲嘛。告诉同志们，全军增加他一个职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

周总理：同志们，结束关于宜宾问题三天的会，当然，不是很全面的结束，要从宜宾突破到整个四川，先把四月一

日中央文件念给大家。

（念文件）

周总理：四川问题军委还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提议，宣布十条命令，从对的，错的经验中得出东西，加以总结。解放军中一部分人犯了错误，群众也有错误，比如：冲军区什么，把负责人拉出来弯腰跪着，这是不对的，对坏分子也不这样。比如说：八条命令中央 2 月 21 日附了五条，转发了。即使对三反分子也不搞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同志早就说过，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所以冲军区把领导人拉出来跪，低头认罪，甚至戴高帽，挂黑牌，讲解放军是“保皇兵”，黑司令是军区，不对！这中央文件给你们，要好好宣传，学习。你们大方向是对的，要改正错误，有错就自我批评，造反派要自我批评，保守派要认清立场错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有根据中央那五条，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新的司令员已介绍过一次梁兴初同志请他监督办好，放出来，健康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题，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这个口头通知可以在当地同志中宣读，以后有文件……。今天会就到这里。

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1967.04.04；中发［67］154 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一、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二、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关于宜宾问题的批示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四月）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指责他们，更没有让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楚，让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重了。

资料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 卷）

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四月）

从宜宾问题的揭发，才开始揭开了四川阶级斗争盖子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李井泉的盖子。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次才翻过来。以后要把这个材料印出来，发给每个党员。四川阶级斗争的揭盖子，两条路线斗争还未解决。（摘自林彪同志 1967 年 4 月 5 日关于四川问题的讲话）

资料来源：《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 卷）

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王力 肖华 关锋

1967.04.16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杨成武、李曼村同志。〗

肖华：

我们刚才开了会，研究控诉军内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会，今天就解决一个问题。同志们有好些话要说，我们另安排时间。

关锋：

我们看了大家的决议，讲点意见和大家商量。我讲的可能旗帜不鲜明，态度暧昧，大家可以炮轰嘛！有些问题我可以答复，有些问题我不能答复，也无权答复，还有组织纪律的约束，我讲错了大家可以炮轰。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青海问题已经解决，四川问题也正在解决，也快要解决，情况也搞得差不多了，主席批准就解决。你们在大街上一糊大标语，外国人就很感兴趣。炮轰个人可以，炮轰我，我赞成。全军文革不能炮轰，不能改组，搞到大街上去敌人会造谣。

现在斗争的大方向，是对刘，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批倒批臭，必须先批深批透。这就要坐下来下点功夫，这不是象街上的大标语把刘少奇的奇字倒过来划的象个狗字能解决问题的。这样不够，不能批臭。得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好好去分析批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全党、全国、全军的重视，影响很大，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还只是开个头，我们还应当进行批判。刘邓是有一整套的东西要进行批判，解放前反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家发财致富，解放后还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土改、工商业改造，在农村反对合作化，和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唱反调。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没有解决。1960 年 1962 年搞单干风、翻案风。他说，不能普遍使用拖拉机就不能合作化。又说，没有拖拉机，合作化就不能巩固，反对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一整套的东西，需要我们很好研究，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嘛！在大批判中，大立毛泽东思想，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倒批臭，才能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批深批透，提高全国人民觉悟水平，保证以后不再出修正主义，出了我们就能发现。把一个人拉下马容易，文化革命不是简单地罢官革命，要简单地罢官容易，中央下命令就行了，那样不能在意识形态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最大的任务，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通过批判大立毛泽东思想。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和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他们都是那一套，起码有政治上的联系，都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前一段支左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地方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有的地方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了条件，大家也知道，许多地方出了岔子，主要是没有经验，也是难免的。个别的坏人也有，青海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是可以解决的。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四川的问题是好事还是坏事呀？察觉了就是好事。大家要注意爱护解放军，要爱护解放军的荣誉，特别是我们解放军自己。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有很大成绩，我们千万不要动摇了对解放军的信任。毛主席讲，有三个依靠、三个相信：一是相信依靠人民群众；二是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三是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三点不能动摇，动摇了这三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有一个地方军管，有缺点，学校去冲了，江青同志昨天严厉批评了的。毛主席提出的军管不能变，军管这块王牌不能冲破，有意见可以提。人民日报有篇社论说，对解放军的态度是区别和衡量左派的标志之一。支左中有缺点有错误是正常现象。对解放军贴大标语，开大会搞到社会上就不好了。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能开展"四大"？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做后盾，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没有解放军，我们就不能那样搞了。个别军区有个别的坏人，我们跟他们讲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个别严重的报中央毛主席、

林副主席处理。现在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命令，但是八条仍然有效的，不矛盾。

军事院校我接触的很少，地方院校接触的多，现在有个苗头，十条下来以后，革命派扬眉吐气，队伍又发展壮大了，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又冒出来一点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毛主席说，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多的国家。从领导方面，要善于引导。前些时候提出来要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队伍。搞不好的话，又要发生反复，出一些纰漏。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攻你们也要攻我们了，在大好形势下面，要特别注意，要把革命推进一步，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使大好形势又不那么好，要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缺点。林彪同志提出“三性”即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希望大家重视，“三性”缺一不可。没有革命性就谈不到科学性，没有革命性谈不上组织纪律性，没有革命性的组织纪律性就是奴隶主义。没有科学性也谈不上革命性，就看不到大方向，目标打错了。报纸上写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但是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资产阶级的纪律要打倒。我们服从毛主席、林副主席算不算奴隶主义？这不算！我们有政治原则性，有毛泽东思想作基础，离开了政治原则，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谈组织纪律就是奴隶主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离开毛泽东思想谈组织纪律，谈民主集中，那是奴隶主义。“一切服从我”，对上要民主，对下要集中，搞独立王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还要下级服从上级，这不矛盾。“三性”缺一不可。

我想大家看到十条命令，心情很高兴，也希望大家把以前的八条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和通知也看一看，避免片面性。

听说大家要成立粉碎军内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筹备会，要开大会，揪军内带枪的刘邓路线，我看不这样搞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借此破坏生产，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三支”中成绩是主要的，生产是很好的，军队一抓就好了。今年看来农业又是一个大丰年，工业水平比去年同期好得多，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正在抓，正在解决。搞到社会上，会破坏解放军的声誉，香港马上要见报（杨代总长：现在就见了。）苏联，蒙古修正主义也造谣。我们要时刻记住，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顾全大局。我活了四十八岁了，没做多少工作，犯了不少错误，往往在一点上，越想越有理，钻了牛角尖，忘了大道理，犯了错误。因此这样大会还是不要开，我这个建议不知对不对，和大家商量。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王力：

刚才肖华同志、关锋同志讲了话，我没有多少要讲了。刚才我文化革命小组会上听到同志们提出了意见，有些还是不大清楚。我们最近还想找机会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适当，然后再正式谈谈。中央文革临时让我们四个人到这里来，解决一个问题，听说同志们最近要开一个大会，希望不要开这样的大会。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提这样一个意见。我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不是从感想出发，而是从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需要出发的，听说同志们要开个会，四川来控诉成都军区，同志们掌握的材料可以交给我。如果有受打击的同志名单可以交给我们，这样对中央和中央文革解决四川问题有帮助，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时好请同志们参加，至少可以派代表来参加。你们要开大会，反而不利于解决四川问题。可以说，四川的问题是严重的，成都的问题是严重的。同志们要相信中央，中央文革是能解决的，四川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半了，宜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四川来的材料这么一大堆，各县的材料都有，材料我们都整理了。宜宾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现的，去年就发现了，这次解决宜宾问题是我们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四川的问题很快解决，党中央正在处理青海问题，安徽问题，内蒙问题。中央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的胜利！是革命群众斗争的胜利！也包括军队同志的贡献。这几个省的问题解决了，同志们可能还要提出别的省的问题，但不一定都要中央下命令解决，中央通过对这几个省的解决，又有十条和一些政策性的规定，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今年一月间，毛主席提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有伟大战略意义的，不要出了问题就看不到主流，一团漆黑。毛主席作此重大规定，就考虑到可能出些问题，毛主席头些日子还讲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因为军队里确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真空，在部队里有两条路线斗争，参加地方也是两条路线斗争，要表演，但是要相信部队大多数是好同志，坏人是少数，好人犯错误是绝大多数。这是与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不好有关。

毛主席说过，问题再大莫过于青海，但青海最近的情况最好。青海问题是反革命制造的，司令员被反革命抓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这是一次政变。坏事很快变成了好事。同志们对这些事情表示激愤这是好的，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革命激情，这表现了大家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痛恨。但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这样说，不是对解放军不可以提意见，有意见可以提，但要讲求方式，对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要反对，要提不同意见和看法，但要采取适当方式。今天只能解决这一个问题。

还有不要武斗，看到十条，还要想到八条。

陈伯达戚本禹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的讲话

陈伯达 戚本禹

1967.04.30

〖时间：凌晨〗

伯达同志讲话：

我叫陈伯达，你们大概还不认得吧。我的上级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级是汪东兴同志，我这个老百姓是归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来跟你们这些人民勤务员见见面。因为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是人民嘛，你们是管我们这些人民的。我向你们作了很多辛苦工作的人民勤务员致敬意！

汪东兴同志和戚本禹同志都说你们很辛苦，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又没人来看你们，又没有人来给你们报告，你们有很多困难，又没有来帮助你们解决。我们很抱歉，我代表文化革命小组全体同志向你们问好！我代表江青同志向你们问好！代表康生同志向你们问好！代表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同志向你们问好！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写信给汪东兴同志或者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

你们都是新到北京来不久的吧，都是各地来的吧？（汪东兴：都是各地来的，哪里都有，还有西藏的，还有海南岛的。戚本禹：来自五湖四海。）这个很好，你们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汪东兴：还有国家机关来的，已经搞了快一年了。）你们这个接待站是一个很好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可以经常地向群众学习，又可以互相学习，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对你们将来不论作什么工作都是有好处的。就这样子吧。（戚本禹，再多说一些吧，既来之，则安之。）你们接待站如果碰到我这样的人可能就困难了，话很不通，我要说情况又说不清楚，你们听不懂，碰到这类的事情就很困难了，有这些困难吧？（答：听得懂。）今天你们算接待我们吧，算是作了一次很大的招待，你们这么多人招待我们几个人，谢谢你们的好意吧！

这个工作的确是辛苦一点，跟人家谈话，有各种复杂的意见，但是可以取得很多经验。接触了跟全体七亿人口有关系的人。所有的问题请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请这个司令官上任。再见啦！

戚本禹同志讲话：

刚才听了很多情况，我负责把这些情况回去向小组反映。还有你们对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见，这些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都在，他们会负责解决的。

本来是今天要我来谈形势。我想先听听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大家谈了一些，谈了些很好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小组也没有专门谈，我可以谈一些看法，但都是自己的看法，没有很好和小组同志们商量，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只是供大家参考。

目前形势，我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具体来说：第一，从今年四月以来的大批判，这是我们党的现在的头等大事，整个世界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因为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大问题，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个大问题，对于世界革命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从十七年以来，我们国家里面，我们党里面，始终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同志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中国向那里去？走什么道路？不仅是十七年来，从历史根源来说，从抗日战争以后，就存在这个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是走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呢，还是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直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是到了总的解决的时候了。什么《海瑞罢官》哪，什么翦伯赞哪，都是舆论准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什么吴晗问题、邓拓问题，这都是前哨战，真正的决战，大的战役，是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不是很理解的。甚至去年毛主席提出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正在被培养成为接班人，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同志还不理解。当然有很多同志是理解的，他们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据我知道很多中央的同志感到中央第一个接班人是反对毛主席的，感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他们哭过好几次，很高的负责同志哭过好几次。他们这完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他们为中国的命运担忧，为党的命运担忧。但是我们很多同志不理解，甚至毛主席提出来他们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为我们接班人，还不理解。有的同志甚至在毛主席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大字报是干什么的，说的是谁，还不清楚。还有的同志，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理解这个大的斗争，不是很容易的。我们自己究竟到现在到底理解了没有？的确可以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充分理解了，我自己触及了灵魂了吗，我自己恐怕到现在还不是充分理解了这个问题的，这是很大的问题哪！

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他长期在党内形成一股反对毛主席的力量，国内国外都有他的社会基础，国外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支持他们，他们有些人甚至于与修正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内有地、富、反、坏、右，有资产阶级支持他们。所以毛主席那时老提这个问题，他出去到外省以后，就提出辛亥革命以后蔡锷在云南反对袁世凯，提出中央如果发生修正主义怎么办，他到好几个省都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有的同志觉得这是说笑话，中央还能出修正主义吗？以为毛主席在讲故事。大家都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这是清楚的，有劲头的，但是对自己国内的修正主义认识不清楚。毛主席再三警告，再三提出。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的号召，还是不理解，有的现在还不理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很好地紧紧地跟着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有距离的，过去有距离，现在还是有距离的。

在十几年以来，他们已经把很多要害部门都掌握了。一大批叛徒，这次红卫兵挖出来大批叛徒。你拿中央办公厅来说，主任杨尚昆、副主任曾三之类，都是修正主义的，坚决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都是他们的死党；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就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就是小小的秘书室，过去我呆过的秘书室，这次挖出来陈炳函，是个叛徒，历史上变过节的叛徒，当主任嘛，管这个来信来访的，很危险的。工交口、农业口、文教口，很多口，很多要害部门、重要岗位，都是他们占领着。党的三大重要部门，一个宣传部，一个组织部，一个办公厅，这三个部门都是他们掌握的。所以，刘少奇为什么敢于六二年提出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什么不能下去蹲点就靠边站吧，那都是有所指的，矛头指的很清楚了。居

然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教条主义呀，当时这样的嚣张，这样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猖狂地反对毛主席。我们很多同志是没有警觉的，有的同志就是看到了就哭嘛！看了以后感觉到党要分裂，我们很多同志听了也看了，却麻木不仁。

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经过从去年十二月份就开始的，今年四月进到高潮的这么一个大批判，全党、全民、全军把这个盖子揭开了，进行群众性批判，写了很多好文章，有很多好的发言。经过这么一个大批判，很多人由不理解到理解，由理解不深刻到逐渐深刻，这是很大的事情。你们看看最近的很多批判，我们党的、我们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从来没有提高到这么个高度，所以形势大好。我们党内，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大中学生、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从来没有这么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今天《光明日报》有一篇清华大学两个小将写的文章，用列宁的观点、毛主席的观点批判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那是水平很高的一篇文章，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样文章是写不出来的，这标志我们的接班人、我们的青年一代已经水平提的很高，相当高的水平。这篇文章并没有经过什么很多人加工修改的，就是他们写的。这是举例。很多小将在革命大批判里的发言是很感动人的，思想觉悟提高到过去没有的高度。不仅批判，而且他们的行动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挖叛徒集团，那是千辛万苦，我听过他们一次汇报，他们找过去国民党的报纸登的叛徒的“反共启事”，三天三晚上不睡觉，就是几个人一张张报纸翻，在旧报纸堆里面钻进去，一天吃一顿饭，把饭带到图书馆里去，咬一口冷馒头，吃了后就昼夜拼命地干。翻出以后他还去一个人一个人对口，那是无头案，那比我们这个接待工作困难多啦，我们接待工作人家送上门来，他那还去找啊！这个人是王某某，是李某某，张三李四，是谁呀？这个人改名了，现在又在那里工作？去找呀，找到一个线索再扩大线索，比方找到刘澜涛这个人，他就去扩大线索，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这个人叫什么。找到以后人家还不知道，还得到原籍去找，原籍不知道再到哪里找，那真是千辛万苦，翻山越岭啊。有的革命小将翻山越岭掉到沟里去了，掉到沟里去又爬起来，又继续走，他一步一步去走的呀！有一个小将说有一晚上翻山越岭掉沟里没有摔死，没摔死，爬也爬不出来，天也很黑，他爬好几次也没爬上来，天快亮了才爬上来，爬上来还毫不气馁，还要继续前进。找到这个人以后，人家不肯向你谈，你没有介绍信，谈党内问题要党的组织介绍信，你没有，我怎么和你谈呢？那小将就跟他讲道理：我们没有介绍信，你看我们是红卫兵，相信我们，我们这事情很重要，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了很多道理，讲的那些人都感动得流泪了，说：行，行，你没有介绍信我也给谈了，你这革命小将是好人。这样谈一点材料，谈一点材料以后就扩大。我听了以后实在非常感动，我想你们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动，你们叫他们给你们讲讲。就这样把一个一个叛徒挖出来。他们也顶负责的，是不是叛徒，不是就不是，并不是你说叛徒就叛徒的，不是的话，还给翻案；哪个人好，还表扬，刘格平就是他们表扬的。挖出叛徒，表扬好的，做了大量工作，在大批判中建立了功勋，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看到这些新生事物，我们感到我们国家前途、我们的接班人是可靠的，是有保证的，我们国家不会走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这是最好的形势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夺权斗争，毛主席讲三、四、五月份见眉目嘛，现在是有个眉目了。夺权，很多省市他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维护毛主席路线的人手里，而是掌握在维护刘、邓路线的人手里的，甚至掌握在叛徒手里边。象西北局的刘澜涛，那就是个大叛徒，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象山西的卫恒，也是个大叛徒。那么这要向他们夺权。这个夺权，很多省市，有的已经夺权胜利，象六大省市山西、北京、上海、黑龙江、贵州。有的两派斗争很激烈的，现在取得了初步胜利。青海付出了很大代价，青海、内蒙、福建最近局势明朗化了，由两派斗争激烈到明朗化了，河南看起来，也是有希望的。就是毛主席路线得到胜利的省，也就多了，已经取得胜利的省份在巩固这个胜利扩大这个胜利，没有取得胜利的省份，现在局势逐渐明朗化，经过了严重的斗争，局势明朗化了。

青海是很典型的，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革命派受到武装的镇压，发生很大的惨案，很多小将给打死时，他们要求面向东方，面向毛主席，喊着口号倒下去的，是可歌可泣的。由于他们的牺牲，使中央了解了青海的情况，他们（指赵永夫等一小撮人）封锁消息。司令员刘贤权是个很好的同志，从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他自己被关起来，被打，但他不考虑自己的问题，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反映情况。他写了一封很好的信，有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的信，要兰州军区直发中央，但被全军文革办来信来访的人压了。如果他那个信件能够很快送到中央手里的话，青海的惨案是可以避免的。所以你们的任务的确很光荣也很艰巨，只要压了一件很关键的东西的话，就要给党、给人民造成损失。全军文革处理来信来访的办公室，如果只要很好把这封信，因为林彪同志认识这个人，只要送到林总那儿去，送到毛主席那里去，这个事件就可以避免。因为中央对这个地方有了解。这一点应该表扬你们西北组管

青海的同志，他们在发生惨案以后，反映了一些情况，当然中央决定调查不是根据他的反映了，但他的反映起了作用，我们看到了。我们小组当时提出青海问题，根据七八个材料，这个材料也是当中一个，这个材料上边还有我们写的字，我们把这些材料提到毛主席、林总那里去，毛主席看了后，指示要调查，指示怎么样调查，很具体，调查哪几个关键，很具体。你们在这个重大斗争里边，你们接待室起了作用。当然你们刚才同志讲了，不是为了表扬做工作，但是这件事情是应该表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接待青海来访的同志表示感谢！

象青海最近就可以搞革命三结合了，局势很明朗，坏事也可以变好事，经过一个大斗争以后，反而会把事情搞清楚。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也不怕，第一，我们反对，第二，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内蒙也发生很大事情，首先开枪的是内蒙，军队里坏人，向群众开枪了，打死了韩桐嘛。后来又抓了很多人，大肆逮捕。你们说那里边都是好人，那也不是，极少数是不好的人，大多数是革命群众，好的革命群众，坚定的左派。中央经过了详细的充分调查研究以后，批评了内蒙军区，给内蒙革命群众平了反。他们现在还在闹，还有人支持的，但挑拨不了几天了，情况基本上清楚的，明朗了。大凡这些地方，经过大反复的地方，都是很有希望的。青海干部就用不完，革命干部用不完，很多，你找三结合的对象很多。所以要把刘贤权调到内蒙去。得力的干部很多，坚决维护毛主席路线的干部很多，经过考验，信得过的干部很多。内蒙也是这样，有上千的好的干部。最近四川也发生了大的反复，四川也是有希望的，四川刘结挺，宜宾地委书记，做省委书记不一定比李井泉做的坏，肯定比他做得好，因为他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他虽然是地委书记，但是维护毛主席路线的，李井泉虽然是省委书记，又是西南局书记，可他是执行刘、邓路线的。所以四川不缺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很多，很优秀的干部。

河南最近斗争也是很激烈，凡是这些地方都是有希望的，不要担心来人很多，很麻烦，那没有什么，很有希望。凡是那些不明朗的地方，你说运动起来也起来，没起来也没起来，反正都是不清楚的地方反而难办，真正斗争激烈的地方好办。弄不清楚，情况不明，这些地方的确难以表态，你们叫“和稀泥”，我说不叫“和稀泥”，不表态，怎么叫和稀泥呢？不清楚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讲的嘛！那不叫“和稀泥”，叫我们去也不好表态，不清楚嘛，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有不少地方还不明朗，不清楚，有些地方，你们接待是没办法表态的，你们表态那是个问题，表态表错了，支持错了是个问题，可以不表态，可以说我们不清楚，可以负责向中央反映情况，但是斗争要依靠你们自己回去斗争，这里不能解决问题，让他们回去参加斗争。河南问题，中央最近要开会的，召集双方代表人物来座谈。反正你们过去说军区宣布哪个组织非法，你们就支持，恐怕不行。现在不这么做了吧？（答：现在不了）。现在不了，那好啦，不清楚的地方就不要表态，不叫“和稀泥”，不清楚，怎么能表态呢？瞎表态怎么行呢？河南情况表态是不严肃的，你不清楚那派对，那派不对，军区对，支持军区，到底支持对不对？也不清楚。

刚才表扬了（反映）青海（问题），你们有一个地方的确是应该自己触及一下灵魂的，人家造你们的反，你们觉得很不舒服，那你们过去有些地方帮助，实际上是站在群众对立的，甚至我听到反映，看到信件，说到你们接待室抓人，你们协助他们抓人，这个事情究竟有没有？你们帮助把人抓走的，这事情有吗？（答：公安部批的）。公安部批，他批的不对，你们应当提出来嘛！（有同志说：接待室领导同意的）。你们可以给室提意见，他们可以检查，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意见，说中央小组没有管，但是你们自己应该检查一下，看到这件事情，不来管一下呢？你们说地质学院不好，造你们反，但地质学院这些学生是有风格的，地质学院他自己出粮票，就是保护这些人，他听了以后是革命的，他们就保护，公安部来抓人，他不让抓，藏起来，没有地方睡觉，一个小床睡两个人，没有吃饭的，他自己买两个小馒头，你一个，我一个。所以康老、总理表扬了他们，说他们是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作风，小旋风柴进嘛！柴进就是专门搜罗造宋朝皇帝反的人。地质学院就有这么个风格，专门搜罗造反的革命群众，我们首先知道抓人，不是从其他方面，首先是从地质学院，他们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的学生都哭了，一面哭，一面讲，说四川来抓人，抓的是好人，带手铐送走了，是公安部批的。我们接了电话以后，马上报告江青、伯达同志，下了命令，下了死命令，要火车到成都后，不准离开车站，马上回来，连抓人的一起回来，回来以后，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恐怕工作还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也应该触及一下自己的灵魂，因为毛主席、党中央把我们放在这个战斗岗位，我们战斗岗位出了一点毛病，应该检查一下，别人造一下反，我们要欢迎。下边我还要说造反问题，再研究，总的精神要欢迎，不要反对他造反。我们不对的，欢迎人家批评，言者无罪。四川问题，王力同志批评了，我记得不是王力同志，是康老还是伯达同志，我忘了，这个事情应当批评，我知道，我查了，这不是批评你们西南组，何必这么紧张呢！不是批评你们，那是批评中央办公厅过去的秘书等，我查清了，事情是他们办的，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他们很早给李井泉提意见，李井泉要打击报复他们，开始时，拉拢，李井泉老婆给刘结挺

老婆送礼，他就不要，不接受这个礼物，这是相当有风格的，以后李井泉就把他们关起来。他们反对李井泉三自一包，刮单干风，很早就反对，到我们接待室，那时在德胜门，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来，来了以后，接待人员不认真，当然这件事不是决定在接待人员，这个事情还是决定在邓小平，接待人员把材料送给童小鹏，童小鹏把这个问题送给邓小平。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概八月份的事。这很不应该送的，他送去了，接待人员不知道，童小鹏应该讲话知道一点，邓小平跟李井泉的关系接待人员不知道。邓小平批给西南局，接待人员就让他们回西南局解决，告的是西南局李井泉嘛，怎么能转给西南局呢？邓小平是包庇他嘛！于是回去后，又被抓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批评的，而且应该引起我们警惕。这本来是送上门的重要情况，揭发西南局的李井泉的问题嘛，是很好干部嘛。所以你们接待人员，有个重要任务，要给党发掘干部，发掘好的干部，发现革命左派，向中央推荐。这个人应该推荐，但是没有嘛，弄回去受打击报复。来信来访有大量很好的干部，能做很多好工作的，可靠的、优秀的，我们应该发现出来。过去，很多干部、群众给毛主席写信告刘少奇、告邓小平，后来中央办公厅提出个名单，我们了解了一下，名单里有好几个人是很好的干部，很好的同志，现在建议地方提到三结合的岗位上去。辽宁有个金铁匠，他就首先向中央反映三马一犁，刘少奇提倡的，富农可以入党，揭发这个问题。后来也是长期受打击报复的人，很好的干部嘛，很优秀一个干部嘛！你们接谈人员应该给党发现干部，象这种人就应该提出来嘛。而我们没有提出来，关起来，抓起来了嘛，打嘛，被保字号的产业军打嘛！为什么产业军叫保字号？保李井泉嘛！人家炮轰西南局，他就反对嘛，所以说他是保守组织。当然很多群众是受蒙蔽的，保守组织中的群众，不一定都是坏的，很多还是好人。象这些问题是应该检查的，这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以前的事。但是以后又有事哪，四川来的不是刘结挺，而是王结挺、李结挺。来了后，你们也没好好接待，送回去嘛，没有很好反映问题。

刚才讲四川讲的多了，讲讲其他问题，四川情况已说过的很有希望，大批好多干部出来。湖南斗争很激烈嘛！湖南抓“湘江风雷”嘛！我们中央文革指示“湘江风雷”里不纯，头头很反动，要抓起来。那一个“湘江风雷”不一定都坏嘛，明显地抓了很多好人。现在一个叫章伯森的就反对这个事，他是原来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就反对这个事，他就出来造反。那些斗争激烈的地方往往还是有希望，现在局势逐渐在明朗。你别看那儿发生武斗了，什么打、砸、抢，你别光看到这一面，你要看到它的主流，大家要看到大方向，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总会发生事情，发生不理想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以后，有些坏事会变成好事。有些事情不能叫打、砸、抢，有些是革命的反抗嘛，正义的行动！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局势明朗了嘛！局势明朗就可以搞三结合，不然你去跟谁结合？经过这些斗争有了结合对象，有了可靠的接班人，这个事件就好解决了，桃子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摘桃子了。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基本上是这个局面，很多省份斗争很激烈，经过激烈斗争局势明朗。有些省份还在斗争，再过一个时期，再过一个十天半个月，也会明朗。还有些省份，现在还不明朗，还需要经过些斗争，但是大部分省份现在看起来没有夺权省份，多数的现在局势明朗，这是群众付出代价的结果，付出很大代价，经过很多的斗争，经过很多的艰苦的斗争，由于他们的斗争，使很多省份局势明朗，到了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步啦。过去几个月就不是这样情况嘛！所以说形势是大好的。还有些少数省份，保守势力占优势，感觉还是有，但是少数，整个讲起来是少数。这是各省市夺权情况，这个情况不平衡，但总的形势是大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些军区，有些少数的军区，他在支左方面，他有些方向不大清楚，迷失了方向，个别的象赵永夫那样坏人完全是坏人篡夺领导权。有些少数支持错了，大部分是认识问题，现在经过斗争以后也在转变，特别是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认识问题统一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在扭转这个局面，形势也是好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很多地区，很多单位，现在就是逐步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本单位斗批改是个大事情，因为前一段主要是冲击司令部，冲击每个省市的司令部，他没有时间来很好的照顾本单位。现在很多地方已转入搞本单位，象北京市很多地方，现在本单位的斗、批、改已经开展了。当然全国来说，这个斗、批、改，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恐怕还要二、三个月的功夫，现在群众全国来说，整个来说，你叫他转，还转不过去。但是已经有很多地区，很多单位在转了，就是运动在深入。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整个生产形势是好的，逐步好转。在一月份搞经济主义的时候，当权派，掌权的搞经济主义，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铁路中断，工厂生产停产，那个局面相当严重。经过左派反击以后，中央、毛主席提出一月革命号召以后，局面大有好转，特别是军队参加管农业、管工业、管交通运输，军队接管很多要害部门以后，局面大大好转，

现在国民经济基本上纳入正轨。铁路、港口，特别是港口，那时候上海港、大连港、天津港都堵死了，外国轮船进不来，停在马头上，停在海上。当时毛主席都提出这个问题，经过几个月以后，很大好转。革命的左派，上海那些革命左派，学生，写文章的人，在一月份不是搞本单位的斗、批、改，他们是在码头前线，在港口码头上组织工人，自己参加劳动，抓这个事情，疏通交通命脉，很多人累的吐血呀！他们的确是做了很大很大的工作。特别是四月份以后，局势才好转，生产局面好转，有些赔钱单位不赔钱了，生产走上正轨了。

主要这四个方面：大批判，全党全民的革命群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还有夺权，各省市夺权有了眉目了；第三是很多单位转入本单位斗、批、改；第四是经济局面走向正轨。这个四点，标志着我们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大好的形势，整个局面是好的。

现在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当然各个时期有些反复，压制左派，就不谈了，前面已经谈了。现在值得注意新的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冲击军区。有些地方左派重新冲击军队，中央十条下来以后，又向军队冲击。北京高潮已经过去了，北京，你们看到那个时候贴李钟奇的大字报吗？炮轰李钟奇嘛！李钟奇有一两天大字报超过了刘少奇。本来，李钟奇是谁，谁也不知道这个李钟奇，这一下子，那一两天，人人皆知，说是有个李钟奇，很出名呀！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知道了有个李钟奇。那是相当大的冲击，卫戍区有点紧张，一天有几千人到卫戍区，后来，认为北京卫戍区不能乱冲的呀！保卫经济，保卫毛主席的，马上中央文革开了紧急会议嘛，把这个风刹下去了。但是各省市，此风方兴未艾，正在兴起，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苗头，所以中央《红旗》发表了社论，发了个按语的社论。接待员同志们要在接待工作中宣传这个社论，不要革命群众再犯错误。有这么两段，前一段有些革命左派走了"之"字道路，曲折的道路，开始炮轰省委。有的省委跑到军区去，他就炮轰军区，他就不分清红皂白就炮轰。炮轰军区以后，搞得军区很紧张，于是中央发表了八条，说不能炮轰，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八条一出来以后，有的军区拿这个令箭整这些群众了，"炮轰我们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中有权，有权就抓人，"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抓了不少人。抓人以后，犯了错误了，中央又来个十条。十条以后，说是你犯错误了，他连过去犯的错误都不认账了，他本来过去冲是错误的，错了也不认账了，于是又来冲。现在有些地方，这个问题，有些军队就灰溜溜的站不起来。有些革命左派重犯历史错误，当然其中有个别人别有用心的，想把矛头引向军队，利用军队过去在支左里面犯了些错误，来挑拨群众与群众的关系，有的，有这个坏人。但是很多革命群众过去犯了错误，那时他请罪，痛哭流涕请罪，有的给抓起来，有的请罪。中央说不要请罪了，发了个十条，意思大概说没有错误了，于是又去冲，有的地方冲的可带劲呀！象山东，好些地方，广东呀，绝食好几天，广西呀，广西韦国清是好人嘛，你还冲他干什么？那是好同志嘛。不少地区在冲击，这是值得注意的苗头。这是我们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都不赞成的。那么军区犯点错误，你过去也犯错误了嘛，你过去冲军区也错了嘛！你不检查错误又要去冲，你不是又错误了吗？军区犯一次错误，你犯两次错误，比人家还多。我们不赞成这样作法，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军队犯错误多数情况是认识问题，除了赵永夫个别少数坏人以外，是认识问题，包括你们这里一些错误也是认识问题。你们可以想想你们自己怎么支持错了，你们就可以理解军队他为什么会犯错误。因为军队由于过去刘志坚不介入，长期来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他不清楚，他不理解。很多军队的同志匆匆忙忙到了战场以后，他连《海瑞罢官》是干什么的，还不知道，海瑞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说海瑞是宋朝人，海瑞是唐朝人。他不知道海瑞是什么人。吴晗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说"三家村"就是彭真，彭真就是"三家"，他知道这个，他不知道"三家村"原来还有廖沫沙、邓拓，他不清楚。什么聂元梓大字报，什么陆平，陆平是干什么的，他都不知道，他以为陆平是北京市委的书记哩！弄不清楚，他就没有这个准备。问他通知看了没有，就是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是干什么的，他不知道。就是因为前一段不得介入，他对文化大革命整个发展过程他不清楚，更不要说四十几年的修正主义他更不清楚，甚至有人喊"打倒刘少奇"他觉得这个不行，那还行？这个不行。有的人还比较好就是人家说是一边游行，一边去喊"打倒刘少奇"，叫他参加，他想来想去，说是参加要参加，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但是一面参加，一面报告说不行啦！那儿喊"反对刘少奇"啦！你说这种状态，要理解，他没有准备过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报他也没看，井冈山小报过去不能看，这个小报他不相信，《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他才知道有这个事，他不理解。所以你说他因为这些情况犯了些错误，你说他是刘、邓路线，那其实的确冤枉了他，他是真正拥护毛主席呢，你不相信呀？你问他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别人的？那他说，我是听毛主席的，别人都不听。但是他的确犯了些错误，帮助了刘、邓路线犯了错误。他这与省市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李井泉的错误，他就是支持刘少奇，他就是支持邓小平，他完全是自觉的，很清楚的，那他态度很明朗。你问他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邓小平的？他听邓小平的，不听毛主席的，他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卫恒他就是听薄一波的，他赞成给薄一波作报告的，给安子文作报告的，就是不给中央报告。他的人事安排都要问

过薄一波，他不问中央他不问毛主席。那这些人压制群众，本身就是刘、邓路线的，所以是刘、邓路线忠实执行者。那么部队呢，第一没有财权，没有地盘，他没有人权，他就是野战军，没有牵扯，他不是保他自己的地位。他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没有准备，突然一下子命令号召介入，介入后又不好好调查研究，一屁股就坐在保守派这一边，坐这一边，人家就控诉他，控诉他更恼火，就抓起来，抓的很带劲，有个八条他就糊里糊涂犯了那么大错误。犯了路线以后你说他是刘、邓路线，他的确是冤枉，痛哭流涕，他冤枉这个事，他就不是。比如你们这里很多军队来的同志，犯了这个错误，他不是刘、邓路线。你可以说批评他有两条路线的，有这个认识问题；你说这个组长就是刘、邓路线，那还要调查一下，还不一定。当然我不了解，也可能个别人是。但我看不一定。他无非也是准备不足，认识不清楚。同样，你要懂得你们接待室的问题，你就懂得那个省市是怎么回事了。他就是这么回事。这个情况现在你就冲击他，不去搞刘、邓路线，不去批判省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去把矛头对准军区，象天津、山西、山东都是不对的，我们不赞成。你山东军区无论犯什么错误，开始他还是支持左派的啦，还是支持王效禹的啦。他后来有些错误，但一开始我们听过他的汇报，他是支持革命地方的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呀！现在把矛头对他是不对的，显然是错误的。天津也是这样情况，天津的肖思明，他是支持左派的呀！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苗头，弄不好，那么左派重新犯历史错误，弄到最后还要请罪。我们不赞成请罪，请什么罪呢？犯了错误就忘了吗？青年人犯错误，他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清楚解放军怎么回事、解放军是那个司令部的。所以不要请罪，但现在还要冲，这就不行，不能把矛头对准军区，对准解放军，我们中央发了社论。但是它这个运动发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会冲，尽管说拥军爱民，他贴了口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他还会冲。我们接待同志要注意这点，注意这个苗头，给他们讲些道理，不要他们犯错误，你们对军区有错误，可以向中央反映，可以贴大字报，但是不要去冲，不要在门口绝食呀，请愿呀，示威呀，不要搞这些。不要把矛盾公开化，内部解决问题，我们提倡这样，即使是对河南也是这样，也应该这样。不管对内蒙，我们当时也是这个方针，我们跟学生讲的还是内部解决问题。所以如果的确有人说内蒙军队就是“保皇狗”，如果有这种说法，那是不对的。但这些你不要完全听他的，那些来人申诉的，那有些夸大，如果有那是不对的。

军队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没军队我们怎么敢搞“四大”？湖南地、富、反、坏他就不敢动，你怎么说叫他出来动，他就不动，他说他自己是鼓楼上的麻雀，你钟再响，他也不动。他为什么不动？就是看你解放军还没动。刘、邓路线为什么不敢造反？为什么田家英叫刘公造反刘公不敢造反？就是因为有解放军。解放军掌握在毛主席司令部手中，掌握在林彪同志手中，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里。他们有个人想抓军队，给我们识破了这个阴谋，就是罗瑞卿，打下去了，所以他就不能造反。为什么田家英建议刘公造反，刘公他就不敢造反？他难道那么善良？他秘书报告都准备好了，彭真在杨观楼搞了一批酸秀才嘛！就把毛主席的、中央文件做了一番准备的黑材料嘛，那很系统的，这就是他们上台的秘密报告，他们那些黑帮都计划好了嘛。有的黑帮交待，他们政变以后，陈伯达怎么安排，谁人怎么安排，那个人怎么安排，都做了周密的计划的。为什么不敢动手啊？就是因为有解放军。外国人都看到这点，你们看到参考消息，外国人都知道这点。

所以对解放军我们不能冲击，这是我们的根本利益。解放军再有错误，他只要不是赵永夫、反革命，都要内部解放问题，那怕他的刘、邓路线抓的人比你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抓的还要多，那也还是要内部解决问题，因为他犯的错误跟你犯的错误不一样。现在也有的当权派他想把矛头转向军队，他自己跑掉，说“我还没抓人嘛！都是你抓的”。有少数坏人打这个主意呢！他再抓人，他是内部错误，他是个认识问题，因为他的确不是为了保他的地盘，而李井泉完全是为了保他的地盘，保他自己，保他那个刘、邓路线。矛盾性质不一样，毛主席说过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一样，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如用对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那种方法来解决军队跟群众的矛盾，那就错了，方法错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就是无政府主义。这个无政府主义本来在中国没什么市场，如果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象巴金、黄元那、庞仁爱（湖南的），但是那力量不大。当然我们现在讲无政府主义和那种无政府主义不一样，无非是一些现象，不能成系统的东西，但有这种苗头，就是你们所说的打、砸、抢，就是所说的什么命令都不听，什么纪律都不要，那种倾向是有的，甚至有的地方还相当厉害。无政府主义是机会主义一种反映，是对机会主义一种惩罚。它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刘、邓路线要人家做驯服工具，搞这一套，搞机会主义，不让人家造反，压制人家革命，谁革命要抓起来，就要斗争，象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的那一套。他搞机会主义，它就走向反面，就产生了一种过去不让造反，要奴隶主义、绝对服从，要做驯服工具。一旦走向反动，走向反面，他就是一切纪律都不要，不要一切约

束，就可以任所欲为，他愿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愿意把玻璃打碎就打碎，愿意把桌子打翻就打翻，他今天愿来就来，不愿来就走。甚至这种作风也要蔓延到机关里去了，有的机关，有些干部他愿到那去就到那去，根本不上班，不要任何纪律约束，不要任何组织领导。机关里这现象还不是很严重，有些学生里边、工人里边，有些地方相当严重，有的一些三线工地工人跑了，根本不干活，前个时期有些矿井（少数，不是普遍的）他可以不上班。教员里边，有些小学教员，中央说是指示他也不听，中央指示复课他也不去，但工资要领。所以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工资要领，你不给他工资他要造反。为什么要加强军政训练，解放军派到学校去？它就是要克服这种倾向。这里归罪于谁？归罪于刘、邓路线，它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实行机会主义统治，所以造成一种走向反面，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这是列宁的话，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讲了，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那么现在我们夺了权了，所以这种惩罚弄得我们挺麻烦了，本来对他的惩罚很好了，所以现在要引导。有个二七铁路技校跑来打、砸、抢，砸你的办公室了。二七（机车车辆厂），我在那劳动过，产生那现象很正常，他那党委书记叫吴文彬，那是彭真的一个忠实的、山西帮宗派主义集团里的成员，他就搞这一套，严厉统治哪，那个学生整得就是象小媳妇一样，所以一解放以后，校长、党委书记、教员统统被打倒，他就为所欲为，本来有生产任务，他根本不生产，很不正常。我们找了三个人去军管（军管工人，学校是工厂的附属单位，它是归教育局管的，不是直接领导单位），连军管去的三个军管同志都不愿管。我们说你把那学校也管起来，他们说不行，那个学校无论如何他不管。所以这个无政府主义发展起来相当严重，因为你“法不治众”，他一帮子人，你怎么办？你又不能都抓起来。所以接待工作中对这要进行些教育，当然教育无效也好嘛，多教育总是有效，多数还是可以争取的。

“联动”也是无政府主义。“联动”不是最近放出了吗，刚才同志们也提出为什么放“联动”，你怎么办？你关了在那儿不是个办法，毛主席下了决心，下了命令嘛，放出来。弄得他们喝酒，晚上出来，完全颓废，精神颓废，堕落，没出路，这样放出来对他们进行教育，争取他们多数，少数顽固分子让他们表演，充分表演，让社会上也知道“联动”是怎么回事，不然你说“联动”组织不好，要反的，他有的人还同情。不是放了这几天吗，出了好多事嘛，在天安门一帮子“联动”无缘无故就打人，打了人后边追也追不上，到了前门以后，后边又打了几个人，骑车子又跑了，还有把车子给你搞到河里、河沟里去。最近办了好多事，这下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说这个“联动”实在是坏。汪东兴同志也碰到一场（汪东兴同志：昨天晚上），他跟我说是吴俊英那个八·一八，我说可能是“联动”，他后来查居然是联动，吴俊英的小孩是“联动”，是过去机要室的黑帮的子弟。“联动”的基础是右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那些子弟，因为他们是主张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他老子当黑帮，他也要愿意奉陪到底的，有那么一些人的。当然对这些人，我们还是采取争取的方针，分化、瓦解，争取多数，但是有的人是相当顽固，这也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特别是放了“联动”后，武汉说是也有“联动”组织。北京“联动”已到天津打、砸、抢，那会闹一阵，你们要有这个准备。那个长辛店恐怕还是文明的吧？还会有比较更厉害的，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他只要闹不要紧，他闹了以后群众看清楚后会要跟他进行斗争的。你们也要进行工作，进行引导嘛。当然你们不要和他们打、砸、抢，你们不要以拳头换拳头，因为我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你们可以引导，群众会对付他们的。

值得注意的苗头，我觉得大概值得注意这么两个问题。当然有些地方还会有些反复，因为这么大的革命啊，旧势力不反抗，不阻挠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

形势大概我就讲这些吧。看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顺便讲下接待工作。接待工作，接待室是由汪东兴同志直接抓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所以你们有很多工作要经常向汪东兴同志反映，请他来给你们作报告，因为中央文革的会他也参加的，中央开会他也参加的，毛主席开会他也参加的，他是有权威的，你们应该支持他来领导你们的工作。他经常请我们，他不是没有请，经常跟我们文革小组讲，说是要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话，他是做了这工作的。那我们就请他讲话，他说他没权威，我说我不相信，你看今天证明你还是有权威的嘛！大家给你鼓掌嘛！既然有权威，我看你还是经常来听取意见，给他们作报告。

因为你们给我们中央文革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们应关心你们，我们不关心你们是错误的，过去关心的不够，应检查。刚才你们不是给王力提了个意见吗，不是王力个人问题。你们工作很辛苦的，因为我过去也做过这工作，你们的困难，你们的辛苦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很多同志任劳任怨的，有的工作同志被揪被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坚持了党的政策的，很不容易的。很多同志接待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反映了很多情况。所以今天我向陈伯达同志说，“无论如何你今天要见见他们，那怕你给他们问一声好。”他很忙的，他还是来了，说

明中央文革还是关心大家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恐怕有些话你们不要惊呀！就是从你们工作中还是有缺点的，有错误的，不那么理想的。按照理想接待室还要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作了很多工作，但是不够理想，主要是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带有方向性的一些情况，那些重大问题，你们反映还是不够。你们的简报我们经常看了，你们现在出了几百期的简报了，四百多期，还是经常看的。不只是联合接待室的简报，还有一种是信访室的简报，都看了。这些简报里反映了些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反映的不够。

中央的联合接待室是中央的耳目，是党中央的、毛主席的眼睛、耳朵，要灵敏。是一个渠道，是向中央联系群众的一个渠道，是个桥梁，你们一定要起到这个作用，要经过你们使群众跟中央能够交流，能够挂上钩，而不是经过你们以后把它切断。要注意反映这些带有政策性的，带有方向性的，带有一些苗头的地平线的那些东西，就是刚刚出来的一些问题。有些太阳当顶的问题不要反映了，大家都知道嘛！太阳出在地平线上的那些问题。你们要反映。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也知道，谁也知道的那些问题，已经知道了就不要反映，因为那个东西变成一种负担。举例说，中央解决了内蒙抓人问题，现在还反映内蒙抓人，打击群众，那么这情况，他已知道了，已经解决了。（我举例子，讲得严重了，因为要举例子，讲得夸张了。）那么类似这种情况已经解决，已经知道了的，简报还不断反映，每天还在反映。因为向中央反映情况有很多渠道，什么群众来信啦，快报啦，记者的反映啦，中央开会啦，这些地方也要做点工作，了解情况。你们可以找你们办简报的同志，你们有一个办简报的，过去不是在中央文革呆过么，为什么派一个在中央文革呆过的同志去办简报呢？就是要你经常回来交流情况，但很少回来。范恭俭在不在？（范答：在）。你就没有很好做这个工作，派你去接待室办简报，你就没有回来讲什么情况，也没有给我们写封信，没有起到交通员作用，反映新问题，带有政策性问题。你们过去反映过党员党籍问题，把党员档案烧了，这是带政策性的问题，反映了以后，我们马上就发了指示，不要烧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嘛，就是根据反映发的，不要随便开除党员嘛，这是带有政策性的。譬如打、砸、抢也是带有政策性的，现在中央已经知道了的，就不要反映，不知道的情况，要反映就是了。刚开始的问题就要反映，别人反映了的，你们也要反映，不怕重复，因为情况刚开始，中央需要了解，后来中央知道了，解决了，就不要再反映了，再反映，就要反映新问题。还有带有方向性的，方向路线问题的，譬如军区支持错了，那个支持错了，带有方向路线问题，那要反映。

还有大量的，不一定是方向、政策问题，也不一定是新的，但是不断地、大量地也要反映，如内蒙中央解决了，不是新问题了，方向性问题解决了，根本方向就对了，但是大量地、几千人来，那么这个问题要反映。几千人来那就是群众性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那天我们接了电话后，也是个问题，老是四百人轮流坐在中南海，给中央施加压力，也不好，后来林总也知道了，林总给毛主席反映了么，毛主席下了决心，说是文革小组要见嘛，总理要见嘛，所以开了会嘛，开了会不知怎样了，大部分人回去了吧？（不一定）总是好一点么，我们讲了话了，讲了话你们还不走，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你的责任了。

你们就根据中央精神去做工作，到他宿舍去，到他那地方去做工作，必要时，可找军区来人领他们回去，保证他们回去不挨打么。但做保字号工作，首先一点，你们要坚定，你们自己要坚定。如果不坚定，摇摇摆摆的，说话也不理直气壮的，那人才不走哩。我看你们不一定很坚定，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坚定。你们要别人坚定执行中央路线，你们自己也要坚定执行中央路线，如果你们思想上还同情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他决不会走。

群众，他比你聪明，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群众比你聪明，不管是保守派，革命群众多数人的智慧超过你，他看你的态度就看出来了，说你这个人"他同情我们呢"，"我们才不走了呢。"如果是坚定的，他看看没有空子好钻了，有些人他就走了，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走，还有的人留着。执行中央决定要坚定不移，是经过毛主席、林副统帅批示的么，情况很清楚嘛。革命派打、砸、抢总比保守派打、砸、抢好得多。你说他没有，也不一定没有，也有一点，也要反对，他们来了，也要给他指出不对。另外对革命派，我们自己心中也要有数，不一定去宣传，心里要有数，对革命派，要用阶级观点马克思观点来看，你看每个革命派，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有这么回事！都是坚定的左派，我自己还不敢说是坚定的左派，我就不怎么坚定，别人说我是左派，我就很高兴了。那有这么多坚定的左派啊？不会的，坚定左派是少数，左派里面多数人是左派，但不一定是坚定的，坚定是少数，骨干分子是少数。但左派队伍里，多数人是好的，大多数是左派，是维护毛主席路线的，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为文化大革命立

了功劳的，这些人是运动的主力，大方向正确。我们始终要有这么个认识，要相信大多数，要坚定不移地相信，不能受冷空气影响。但同时要看到左派队伍里面有些人不是真正左派，是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压迫的时候，要求革命，他不一定是左派，但是他受压迫。这些人在运动中，不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不断改造自己，成为左派。还有一些，他会变化，因为原来是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运动里面受到革命考验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有些在运动中发展了“私”字，还是变成小资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变成小资产阶级。在胜利条件下，容易被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所俘虏，有的人甚至可以过去是造反的、革命的，变成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还有极少数极个别的，混入革命组织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个人野心分子，这是极少数。我们要有分析，看到这些现象，就不奇怪了，不因为发生些问题就因此迷失方向，迷失对主流的看法。为什么我们要相信革命的左派大多数是坚定的，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一点？主要是大多数左派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得非常好的还是少数，但是少数在不断增多的，不会是多数都是那样、多数很坚定，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坚定，都不会犯错误，那还是少数。但是左派队伍里多数是无产阶级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点要相信，要坚定不移。那么在左派队伍里面，整个造反队里面，多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这种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会分化的，一部分在革命运动中，在改造自己，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基本上是无产阶级，有的他慢慢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还有极少数是坏人、野心家。你们有分析的话，那对象内蒙左派里面发生一些问题，就不会奇怪，不会因为听说左派组织里面有一个什么国民党军官就大惊小怪，不因为这些现象，就迷失了你对本质的看法。要区别现象和本质，有时现象和本质不一致。要区别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因为左派队伍里有些不纯的，有点打、砸、抢，这是现象，要看到主流，要看到大多数，无论什么时候要相信大多数，要坚定不移，这是毛主席的革命战略思想，这一点很重要。不会听，遇到冷空气，就摇摆不定，耳朵软了，就对中央发生怀疑。

我看到你们油印的接待工作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几点意见，是“红色革命造反团”写的，你们这里有个“红色革命造反团”是吗？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来访接待站的红色革命造反团。（答：是过去的）经验基本上是好的，红色造反团主要强调要毛主席路线，强调了当群众小学生，强调把接待室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这些东西都是好的。

对接待工作要旗帜鲜明，支持革命派，这个支持，这个旗帜鲜明，不一定要你每件事都去明确表态，因为有的事中央没有讨论，你表态有困难，这个旗帜鲜明，是要你自己思想上要鲜明，你反映的问题，观点要鲜明。譬如四川刘结挺问题，我们为什么说接待人员有这个毛病？因为他报告里不鲜明，完全是客观主义的报道，人家怎么说，他怎么报。客观主义的报道也可看出态度来，他没有态度，你报道什么，你有什么材料，这个没有纯客观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没有的，都有倾向性的。

要求我们能够按照毛主席思想，学习“老三篇”，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人民极端热忱，要把这当成座右铭。这两个极端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每天、每件事情都要碰到，每时每刻都要碰到，这就是“公”字。什么叫“公”，就是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对群众要极端热忱，每件事情，每件工作，每个斗争我们都要“公”字当头。刚才有同志讲“你们不要我们干就不干了”，“我们都交给你了”，这些语言都不是很符合“老三篇”的，不是极端负责任的，不是极端热忱的。什么工作没有困难？如果我们光找没有困难的工作来做的话，那就不是很好的共产党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挑重担子，作接待工作，对我们每个同志都是考验，一个大考验，究竟你是个什么材料，究竟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这是个试金石。

我们工作要有长期打算，不要作一两个月的打算。有人到我们文革小组来当记者，开始做一两个月，现在也没有长期打算，当然他不这么说，他问工作大体什么时候能告一段落，他可以有个准备，有个安排，他是这么提问题的。我就问他，你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有没有胜利信心？他说我有胜利信心。我说：你如果有胜利信心的话，那工作不是两三个月的事情；如果没有胜利信心，你认为刘少奇的路线大概是能胜利，那大概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工作两三个月能结束了。因为他胜利的话，我们就该坐班房了，就给抓起来了，那你赶紧走吧，散伙，你们也散伙吧。如果毛主席路线能胜利的话，我看文化革命小组恐怕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存在一年两年的，将来怎么改组，总是有同志要做这件工作，因为毛主席说了，这两个月见眉目，真正解决问题要两年时间，一、二、三年的功夫。我说如果你坚信毛主席革命路线能胜利的话，那你要按毛主席的话准备，不要做侦察工作了，因为部队他总是讲侦察情况的，我知

道他是摸底的。我说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你们不要用再侦察了。我看你们工作也是一样，如果你们也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话，那么你们要准备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一年二年，准备下去，怎么样？当然现在九百人，以后可能八百人，可能七百人。即使留七百人，二百人回到你们本单位，那还有文化革命，还有麻烦事情。你不要以为你来了以后，事情才这么麻烦，过去工作多舒服，那工作，上班倒杯茶一喝，八小时以后下班回家，现在没有这个日子了，我跟你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全国都一样，不相信你回去可以试试看，都不那么太舒服了。革命嘛，那能象写文章，绣花。现在写文章也不能那么舒服。过去写文章的确是那样，你看，我光一个礼拜看材料，即是挺舒服的，看完材料做摘录，做完摘录以后编排，完了后形成观点，讨论几次。现在不行，甚至明天要，今天是晚上就要干，没有什么材料准备，你赶紧东动动，西动动，主要是态度鲜明，观点鲜明，马上弄出来。现在写文章也挺紧张的。现在有人讲天下没有乐土，是没有乐土了，安静生活没有了，无产阶级革命冲击掉了，什么过个礼拜六啊，看个电影啊，领小孩到公园玩一玩啊，现在这种日子不太多了。现在决战嘛，在决战的时候，那能这么舒舒服服的？那也不是绝对没有了，减少一点。打“淮海战役”了，还带着小孩逛公园？没有时代意义，不符合时代精神了嘛。周谷城是反对时代精神的，我们是赞成时代精神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精神。这么个时代，我们就要有这种时代意义的工作方法，符合时代意义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被揪一下，被斗一下，整天吵吵闹闹的，弄得今天开个会，都是对我们很好的锻炼，革命的锻炼，都是大风大浪。要迎接这个风浪，你再过两年，文化革命解决了，你再找还找不到了呢！你再找人揪你一下，斗你一下，还找不到了呢！我半夜开会，想想过去哪有？这是幸福，这是斗争的幸福。毛主席说：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这里边是无穷的乐趣。你别看现在挺辛苦的，挺难过的，你过了几十年，中国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的灯塔会在全人类发挥作用，那时你就会感到乐趣，感到幸福，感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毛主席把你调到中央接待室去工作，接触那么多群众，挨了那么多揪，那么多斗，这真是其乐无穷啊！我们要迎接这个斗争，迎接这个风浪。挨一下打也不要紧嘛，革命群众打一下就算了嘛，我们不计较，保守派、右派打我们，对我们是考验。我们中央文革有个同志，他昨天出去看到“联动”打人，他自己就抱着那个人，愿意挨这个打嘛，他维护群众嘛，自己抱着群众挨打嘛。因为他穿军装，“联动”有些人说“不对，那是解放军”，跑了。挨一顿打，挨一顿揪，也是光荣的，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群众要很好座谈，他们造你们的反，我看首先要欢迎，其次可以商量：你这个方法不对，我们还要工作嘛，你这样弄得我们不能工作了，把人揪走了，不行嘛，跟他讲道理，我们那天跟他们打了电话，把人揪走，不对嘛，人家要工作嘛，他们感到理亏，把人放了。不行的话，你们组织个代表团，弄上二十个人，到北航去请教、学习，向北航学习，或者接到你们空军招待所。你们去二十个人，就说：向你们学习嘛，征求你们意见、批评嘛，交换意见嘛，我到北航找韩爱晶，到红代会去，组织些代表去听取你意见嘛，请你开会来斗争我，有意见你们给我提，你们不是要揪吗？我给你送上门来，不用你揪了。你们不会不讲理吧，你们试试看，失败了，再想别的办法，一计不成再来一计，再想别的办法。说你们去了很多人，整天斗争我们，我们欢迎你们斗，我们还希望你们再斗，我们都来了，领导同志都来了，听取你们意见，请你们开会，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开会，听取你们批评。他大概没办法，就会把这些调回去批评你们，他不调回来，再想别的办法。你不要和他们硬顶，那不行的，因为他是革命群众，你能把他抓起来？你跟我反映再多，我也没有办法，他是革命小将，“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革命”，你们没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吗？那怎么办，毫无办法，只有和他们交换意见，把我们意见和他们讲，摆事实，讲道理。他们愿意参加工作，可以分配他们一点任务，可以组织起来，有些不是接谈不了嘛，他愿意帮忙可以嘛，反正又不发他们工资，你们又不负责他们工资，怕什么呢？发工资又不归你们发，汪东兴同志发嘛，无非招待他们吃一顿饭。请“东方红”来个群众相结合，但我们领导，情况要向我们反映，而且要听我们纪律，不能乱表态，讲道理。可以请他来帮忙，而且可以请他一个组织派人来，不要谁愿意来就来，我又不了解，而找他了解的人来帮我忙，我非常欢迎，人多多益善，我“韩信点兵”，我不怕兵多，完全由我安排，我都吃得下。你一个人带他几个青年，让他干嘛，他愿意干就让他干嘛，当然他和你商量时，不一定要那么多人，要很多人，你也难办，适可而止嘛。将来有，就安排他工作，听他意见，他不对你批评他，他对你接受嘛。人最怕讲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他没有理就不好办事，你们如果有理就不怕，没理你们就怕。如果你们自己没理，有缺点，有疮疤，又怕人家揭，那就不行了。请他来工作，请他来帮忙，我们向革命小将学习，我贴个大标语“向革命小将学习”，请你作个榜样，我看一看你怎么谈的，你谈，我在旁边听，我在旁边记，让你指导好不好？那也可以。你也记，抓小辫子不怕，你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怕什么呢！我们一天到晚不知抓多少小辫子，我们讲话，现在近代化，给你录上音，你看，这段你讲的，给你放，抓你小辫子。错了就错了嘛，讲错了纠正嘛，有错必纠嘛。现在有些小将，有这一点不好办，他可以讲错话，你不行，他讲错话不算，他讲完就完了，也有点不是所有的，这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小将，他当然讲话可以不算，

你不能和他平起平坐，他是小将，他讲话就是可以不算的，你当然讲话要慎重，你是代表国家机关干部。你也向小将说，我讲了不算，那也不行，讲话有错误还要去承认。那这个不平等也就不平等，没有办法的事，那只能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是受党的多年锻炼嘛，他是小将，才受到一年，还不到一年，去年六月开始，十个月的锻炼，他资格没你老，学毛主席著作没你多，吃的饭没你多，他当然讲错了就不算，你讲错了还算。所以你讲错了，还是要检讨一下，说讲错了就完了，他当然就抓你辫子，他造你反，不抓你辫子，怎么造反呢？你可以理解的嘛，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有什么奇怪的。这样，采取一个合作态度，不是抵制态度，我们也可帮你们做些工作，这样的话，就可以统一了，一致了。试试看，不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你们找汪东兴同志商量，再让他想办法。我看这样比较好。

还有一个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问题，我看这不成为问题，就是一个你们通过正常渠道，通过你们的领导，经过简报、开会（汪东兴同志在文革开会，经常反映你们情况）；另外，你们自己每个人都有权利直接给中央文革写信，直接给中央写信，直接给毛主席写信，你们觉得有些情况严重，必须反映，而又反映不上去，你们可以写信，我们从来鼓励这一点。最近中央文革从中共中央办公厅调来人嘛。办信有个同志说，他们的领导是杨忠友，我说你们对杨忠友，如果说你们要反映，他说这个情况不可以反映，那你们可以服从，说可以不反映，但是你们可以直接反映，你可以保留意见。说我可以保留，对你不赞成，我要反映，你不给我反映，我自己送。你要送给谁送给谁，你要送给江青，送给伯达同志，也可以送给王力，你要给谁就给谁，但要注明这个情况，我是要他本人看的，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每天都要看到很多东西的，可以看到的，你们也可以直接给中央文革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给汪东兴同志打电话，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怎么找不到呢？你就叫他请汪东兴同志嘛，请不到的话，你找他秘书，请他秘书记录下来嘛。再找不到的话，你就想办法，串连一下，范恭俭他就知道嘛，你请他去打听，打听以后你就记在小本上，每天打电话嘛。但是我还要说明一点，重要事情打电话，你如果老打电话，也就不重视了。很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打的，你们可以打，也可以给中央文革打。那么你每次都要找到我们哪个人，那个是困难的。我跟你说实在的，我一天到晚除了开会时间在办公室以外，大体上都不在办公室，你比方现在你们谁去打电话，我在这里就找不到，所以只有你打给值班员记下来。一般地说，你们应该经过领导的这个渠道来反映，他过滤一下，有的重要的他能解决他解决，他不能解决他反映。那么特殊的你们觉得有不同意见，说他不给我反映，他不对，你们可以直接反映。但处理中央机构他有权利，有的他处理，有的他不处理，你就不一定每次都催。我想这样大体可以解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问题。我想今天就讲这些吧。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 中发 ［67］ 147 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

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按：下文摘自司马长风著《"文革"始末》（香港百叶文业 1976 年 1 月出版）部分武斗介绍，仅供参考；下文中的"毛派"和"反毛派"即为文革研究者通常所称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新保守派。

武斗几乎是随着红卫兵的出现就发生了。不过 1967 年 1 月以前，所谓武斗次数既少，规模也小。正规的武斗到一月风暴后才出现。从一月到三月底，武斗的情况虽然已极严重，但是比起五月前后的武斗来，仍是小巫见大巫。例如，武汉从四月底到六月初一的一个月内就发生了 200 余次武斗，死伤一万六千多人；北京从四月卅日到五月十日这十三天里，发生了五十人以上规模死伤的武斗一百三十三次。而北京与武汉并非武斗最激烈地区，如河南，四川，广州情况还要严重得多。

因为武斗太多，发生的地区太广，无法个别说明，笔者根据极有限的资料，试将四，五，六三个月的武斗情况列表如下：

武斗地点　日期　出动人数　死伤情况　备注

天津 3 月 27 日 六千人冲南开大学 50 人重伤，220 人受伤 抗议驻印尼大使姚登山被迫害，游行示威，两派冲突

成都 4 月 4 日到 11 日 连续发生六次武斗 死伤一万人 反毛"产业军"余毛派"工人造反团"武斗

北京 4 月 13 日 四千人武斗 伤数百人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及师大人大等红卫兵，攻击"新北大公社"

兰州 4 月 18 日 军区司令杨嘉瑞，政委王世泰，胡继裳指挥十万群众，争夺《甘肃日报》社，攻击毛派 重伤 27 人，轻伤 70 人 尸体投入黄河

郑州 4 月下旬 3000 人 伤 340 人 公安局支持反毛群众袭击庆祝北京革委会成立大会

南昌 4 月 30 日报导 四百余乡镇发生流血武斗 全市 54 间工厂 33 间停工

石家庄 5 月 1 日 动员军车 150 辆 毛派 245 人伤，15 人重伤百余人被捕 攻击毛派控制的军事机关

成都 5 月 1 日到 5 月 4 日 动员十万人 毛派死 11 人，伤 2400 人，重伤 700 人，被俘千余

当权派十万群众围攻毛派工人更动员成都附近 30 万农民，冲突持续一个月

郑州 5 月上旬 五万反毛群众 毛派红卫兵死伤数百 反毛群众袭击郑州工学院红卫兵

成都 5 月 6 日 反毛派 20 万人冲入成都 死百余人，二千人受重伤入院 5 月 4 日冲突的延续

重庆 5 月 6,7 日 二万人 死 300 人,伤者无计,另撞沉毛派渡轮 7789 部队政委张继臣指挥反毛派群众进攻毛派 8.13 毛派死 200 余人

佳木斯 5 月 6 日 二万人 毛派死 11 人，被捕 150 人 反毛派群众袭击红卫兵总部

长沙 5 月 4-6 日 不详 5 日毛派死 22 人，6 日死 39 人 两派争夺广播电台

开封市 5 月 12 日 不详 不详 北京派往的军事调查团 250 人，25 日被包围后失踪

宜宾 5 月 13 日 二万反毛派 死 200 余人，伤 1900 人，28 人被活埋，700 人被捕 军人支持反毛分子镇压毛派红卫兵

乐山 5 月中 不详 百余红卫兵被活埋

宜宾 5 月 13-16 日 三万人 毛派死 300 人，伤 1500，被俘 700 余人，24 名活埋 攻击毛派据守的建筑物

昆明 5 月 29 日 反毛派三万人包围毛派 2200 人 毛派仅 500 人逃出，死 266 人，重伤千人 昆明军区与云南省军区对打

郑州 6 月初 一万人 死 105 人 军区政委何运洪指挥群众袭击 “二七公社”

长沙 6 月 6 日 死 62 人

武汉地区 4 月 29-6 月 24 日 武斗 200 余次 死 350 人，重伤 1500 人轻伤万五千人 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 俘囚北京派员谢富治，王力、周恩来赶往斡旋，二人得释。

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记录

周恩来 康生

1967.05.16

〖时间：1967 年 5 月 16 日凌晨 1：30－3：33；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有：总理、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五十四军首长谢家祥、白斌副军长，蓝亦农副政委也在场。〗

总理：

对不住，你们来了好久了，今天五月十六日，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通知发出一周年，大家都在庆祝。

四川的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都先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先听听八•一五观点的意见。请八一兵团张益同志谈谈。

（八一兵团张益发言后，江陵厂军工造反团一代表发言说：革联会成立以来，对抓革命促生产不是起了积极作用，而是起了消极作用。）

总理：

你们反革联会的写来了十六条意见，我们看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来了。……

我来读一下《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稍加解释。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有五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第一、重庆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和群众中，都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在军队内和群众中进行充分揭露、批判。这就解决了矛头指向谁的问题。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总还是革命组织，既然都是革命组织，斗争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都学了《红旗》的文章了。从全国来讲，斗争矛头应指向刘、邓；从四川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从重庆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这是大方向。斗争中要考验锻炼你们，要明确大方向。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驻川野战军（五十四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六二年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是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队。今年，党和毛主席，下给了部队很大的光荣任务，任务非常重，“三支两军”的任务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五十四军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但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因此，他们错误性质是不同的。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农、支工很努力，还担当了部分军管任务，还有军训试点也取得一定经验。我在这里替五十四军讲一句，五十四军被李井泉割裂得非常分散，从中印边境回来就分了四十多个地方，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我报告了主席，主席也没想到。这是不许可的。李井泉把他们分散住在四十多处，李井泉有意识把正规军住分散了，地方好影响他。另外，地方独立团扩大，这是李的坏注意。五十四军处在这种很不利的环境下，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复辟，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反运动，重庆受了成都的影响。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开片会，布置镇反，五十四军没有完全顶住。捕人就捕多了。当然这不是多少问题，问题是不应捕不应该捕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搞四大，发动群众，对有过激行为的人，应帮助提高他，为什么要当成反革命？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成都军区犯的，重庆受了影响。重庆与成都要区分，重庆与成都不同。此外，在处理不同意见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是参加了革联会的，交院九·一五、西师八·三一不赞成夺权，有不同意见，对革联会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在当时军队应考虑，却支持了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把部分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错误。

这种错误五十四军领导已开始认真的改正，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重庆情况和成都不同。五月四日，五十四军电报提出：只要主席说我们支左支持错了，我们就立即改正。原来没有想到这点，没有想到支持了一方，而没有支持另一方。中央指出后，恍然大悟，正在认真地改。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成绩还是显著的，错误已指出了，应让解放军有改正的机会，错捕了就放。五十四军在重庆人数不多，任务又重，解放

军多少年又没作群众工作了，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只要坚决改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解放军是具有伟大光荣传统的，最受群众信赖的，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你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在文件中避开革联会，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联会，争论就没有结果的，一月革命以来，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重庆大联合没有联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对。开始没有意识到“三结合”，“三结合”是后来才发展的。革联会吸收几个人（过去负责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所以有争论。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摇身一变。尤其体现革联会是野战军领导的。解放军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了权对另一派压制，形成对立，形成二、三月的紧张。说革联会对了，但条件不成熟；说不对，那时又做什么？革联会是军队领导的、支持的。解决安徽、江苏问题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重庆不必这样作。江苏改为军管，安徽最后也军管，文件上没写。如果争论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这样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们应向前看，在四川作出表率，就是由军队领导人出面组织临时筹备小组，向前进，促进其联合，把争论停止下来，再要争论就会不能前进，影响生产任务，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同意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筹备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争论就停止下来，这点很重要。如果同意中央决定，回去就不要吵这个了，甚至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五十四军政委）？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筹备小组由蓝亦农同志作主任（组长），白斌作副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不只一方。同时有其他适当干部。干部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再定。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市委书记，是“革联”夺权后的“三结合”对象）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找适当的负责人参加。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重庆筹备小组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把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起来。如象上海建立后就发紧急十条。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当然，一个革命组织宣布另一个革命组织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也要取消。错捕的要放，但现行反革命不在此例。

凡被错打的要恢复名誉。对立现象要解除。受压制的一方，前次让他们先发言，先出出气。现在你们（指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要反过来压他们，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会犯错误。

夺权的一方要多负一些责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错误要大些，你们是当权派嘛！过去“八·一五”压了“八·三一”，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另外的一方也要自我批评，错误只是小一些，只有通过大批判运动才会大联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通过整风，自我批评，就可以眼睛向前，而不是向后，希望你们在大联合方面作个典型。

“产业军”是保守的，头头还有坏的。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一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五月六日事件中，他们都在一三二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

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八·一五”，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如李井泉关在你们学校，总给人有口实。这是过去的事，不深究了。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八·一五”先做自我批评，另一方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重庆组织作出模范来。你们送给我的关于武斗情况的照片、材料都是指责对方的，我们看后心里不好过。十四、十五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后五十四军军队才隔开了。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

即使过去有一些事实没弄清楚，组织小组调查，把坏人抓出后也不要武斗。即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要抓去放在学校。你们重大八·一五能把李井泉管起来还很不容易，是因为当了权。在北京还不行。北京开始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哪一个红卫兵也不好看管，像个刺猬，交给了卫戍区。

不要搞打、砸、抢，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批臭，不仅要把威风打下，还要触及灵魂。当然，对煽动武斗的坏人要处理。

这个问题，我说多一点，多寄托希望在你们身上。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我们委托军队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川问题决定在重庆原则适用，但是具体意见要按照五项规定办。我们相信干部总会出来“亮相”的，集中力量斗争任白戈一小撮及各单位，也有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条告诉了我们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以刘、邓为代表实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同伙，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同伙，所以无论在军内，群众中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罪恶都要充分的批判揭露，这点要充分注意。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联会的，会后谈文化革命中的问题，都要看在反对刘、邓路线作了些什么。

两个编辑部的文章，要害是打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你们研究得如何，掌握得如何？在北京，我问了一下，有的学校，特别是打内战的学校，来不及去学习。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彻底揭露。李井泉、任白戈作了很多罪恶，在报纸上要彻底揭露。

同志们知道五月十六日是什么日子吗？一年前，党内发了《通知》这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历史意义的通知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指十六日）马路上结队游行，庆祝文革小组成立。一年的工作，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我想同志们要了解第一段，就要大大加强学习，解放军同志也不例外。

第二个问题更是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领导干部。这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语录上也有：没有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能进行到今天这样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哪怕哪个人，哪件事出了错误，但总的原则不能动摇。

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话，五十四军三支两军工作，看到他们的成绩，实事求是地看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工作是有成绩的，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不是支持了右派、保守派。错误缺点，首先在于没有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这种方向路线错误，主要不在军内，而在刘、邓、李，在四川以李井泉为首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八·一五同志谈大方向，没有谈到这个大方向，刘、邓路线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前段时间也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红卫兵部队、重庆八·一五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犯过没犯过错误。有些人有些怨言，他们是革命的受到镇压，受了害，八·一五同志也间接受了害，被蒙蔽了，要有自我批评，现在一些组织受镇压，而另一些没有，甚至盲目支持镇反，但不能因此说八·一五不是革命组织，这样说也是错误的。受镇压的不满意，不要因为平了反，反过来打击报复，骄傲，又去压八·一五，这样你们更要更要犯错误，两方面同志都应该吸取教训，军队同志支持的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缺点是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杨刚，但他刚认识了错误就改。开始我就感到五十四军总比成都军区认识错误早些快一些。不能动摇对人民解放军的信任。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都很有成绩的，这样的军队该不该拥护？（众：应该）

第三、第四，总理解释很清楚了。革命组织之间如何团结的问题，大家都要进行整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记得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吗？这是根据主席语言写的通知，主席讲，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训，比不训大不一样，军训，可以跟解放军学许多好的经验，所以提出五种学习。你们是大学生，我考考你们，五种学习是学什么？“八·一五”不是最拥护解放军吗？周家喻讲讲。（周：弄不大清楚）考住了吧！（笑）忙于打内战，对这些就不注意了。（反对派笑）你们不要笑，考你，你也一样。五种学习，一学政治，二学军事，三学四个第一，四学三八作风，五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有那么多优良传统，到底要不要学？要学。

你们那里还没军训吧（有四个学校开始了）要学十五个文件，你们学得怎样？

（总理：建院不是军训了吗？沈志清，你学得怎样？沈答：开始还好，以后忙于打内战，学不下去了。）

说的实话，好。同学这话很深刻：忙于打内战、没有学，所以要整风，加强自我批评。

不用考你们了，十五个文件题目可能都不知道。（总理：“老三篇”还学一些吧？）忙于打内战，没有武器不是混战一场吗？要自我批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有一条要自我批评。看看五条，很有好处。打内战，你们看第三条怎么说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不是和稀泥，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打倒。第四条讲民主集中，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现在年青人批评人马列主义不少，批评自己马列主义不多，这是通病。要整风、整思想、整组织，以理服人，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四川打得厉害，是惨痛的经验。

第五、要把中央军委八条和十条结合起来，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大联合，“三结合”，把斗批改任务完成。今天晚上广播了明天就登五月十六日通知，希望同志们好好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希望

大家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总理、康生同志讲完话以后，五十四军的代表、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同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黄廉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意见。周家喻同志还说，要很快返回重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进行工作，对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前一段出现些缺点错误，愿意听取其他革命组织的意见，诚恳接受批评。）

（周家喻表态后）

康生：我有个问题问周家喻同志，你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话很好。“产业军”你敢去做工作吗？（周答：敢）要靠说服，教育，分化。对保守派要有策略，艰苦耐心的工作。主席这段话在去年八月三十一日提出，今年三月七日又提出，到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懂得，说解放军和稀泥。你讲得很好，要实践。你去做“产业军”工作，开始还有可能挨打，还会有人说你右倾呢！好多话都讲了。这种革命劲好但却没有很好的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今后要看你们的实践。（周家喻：今后一定做到。）不要怕人说右倾。

总理：我问周家喻同志第二个问题，你说愿意接受其他革命组织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容易。你面对着“八·三一”、“九·一五”给你提意见，你有没有勇气听？（周答：有。）希望你带头做模范。不要一听就说“扯谎”，“造谣”。以后要有这样精神。今后，你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重庆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康生：总理讲的不光是对重大八·一五，对你们（指反革联派）也适合。

总理：我对重庆是很有感情的，在那里同反动派斗争了七、八年。过去重庆是雾重庆，现在重庆是光明的重庆，一字不改地传回去，希望你们快快回去，杀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吴庆举：总理，今天发生了一件严重违背十六条的事件，今天下午首都红代会在火车站抢去了我们八箱揭发批判李井泉的材料，每集四册，共一万五千册，还有罗文斌的材料。这些材料被他们污蔑为“黑材料”。请看这是他们抢走材料的声明。（随手递给总理）

总理：红代会抢去的材料，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副总理解决。（把红代会的抢材料的混蛋声明转给杨成武同志）

杨成武同志问吴庆举：材料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什么要求？

吴庆举：坚决要求追回，红代会抢我们的材料已不止一次了。

（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中央首长接见重庆市来京汇报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康生

1967.05.17

〖时间：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凌晨 01：15～3：20 分，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有：总理、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白副军长，兰副政委也在场。〗

周总理的讲话：

你们反革联会的写来了十六条意见，我们看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来了。四川问题正在展开。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都先回去了，写来了一份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昨天连夜开了会，根据他们的报告，提出了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已送经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审查批准。

我来读一下《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稍加解释。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有 5 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在军队内和群众中进行充分揭露、批判。这就解决了矛头指向谁的问题，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

首先，确定大方向，矛头指向谁。一般来说，在座的是重庆各革命组织，有的犯错误多一些，有的犯错误少一些。既然是革命组织，就应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斗争矛头应该首先是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通过斗争、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们都学了《红旗》的文章了。从全国来讲，斗争矛头应指向刘、邓；从四川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从重庆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这是大方向。斗争中要考验锻炼你们，要明确大方向。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警备司令部是驻川野战军（五十四军）五四年曾参加抗美援朝，六二年抗击印度侵略军，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队。今年，党和毛主席，下给了部队很大的光荣任务，任务非常重，“三支两军”的任务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他们支持了一派革命组织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他们在支工、支农上很努力，还担当了部分军管任务，还有军训试点，应该承认有显著成绩。五四年他们被李井泉这个修正主义分子搞得非常分散，在北京住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我给主席报告了，主席也没想到。李井泉把他们分散住在四十多处，李井泉有意识把正规军住分散了，地方好影响他。另外，地方独立团扩大，这是李的坏注意。五十四军处在不利境地。五十四军不是支持保守派，是没有顶住成都军区某些领导人的方向、路线错误，把文化革命当成肃反运动。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布置捕人，捕多了，这是一个错误，要

帮助他们，教育他们。

次之，对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组织，赞成“革联会”的，不赞成的，多听听各方意见，就能谨慎了，但听了一方面意见。支持公安部门错捕群众，支左中犯了些错误。

五十四军已开始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打电报给中央说，如果支错了，中央指出马上改正。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应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因为任务艰巨，他们的人又不太多，多少年不做群众工作了。只要坚决改，是能得到群众谅解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受人民拥护的队伍。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这一条我们避免争论“革联会”问题。这不是和稀泥。夺权，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你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实现大联合；同时，过去负责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条件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造成对立，形成紧张局势，这是革命派内部争论。

中央解决安徽问题，江苏问题时，我们都没有回答夺权问题，江苏改了军管，安徽也是，文件上没有写这个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筹备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争论就停止下来，这点很重要。如果同意中央决定，回去就不要吵这个了，甚至影响了生产。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五十四军政委）？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市委书记，是“革联”夺权后的“三结合”对象）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参加适当的负责人。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

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建立生产的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当然，一个革命组织宣布另一个革命组织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也要取消。错捕的要放，但现行反革命不在此例。

当权的要多负点责任。如过去“八·一五”压了“八·三一”，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把矛头向上，向全国的，四川的，重庆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头，这就一致了。通过大批判，站在一条战线上合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也一致了。希望你们回到重庆做出表率来。

“产业军”是保守的，头头还有坏的。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一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五月六日事件中，他们都在一三二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八·一五”，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八·一五”先做自我批评，另外方面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你们给我们的照片，我们看了很不安。十四、十五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不要你抓我，我抓你，抓了不放。北京开始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那一

个红卫兵也不好看管，像个刺猬，交给了卫戍区，你们“八·一五”要把李井泉交给警备区，他确实也不好办。

这个问题，我说多一点，多寄托希望在你们身上。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里首先一个问题，第一条是告诉我们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四川讲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就重庆说就是任白戈和他的一小撮同伙。不论在军内，对李、任等人要彻底揭露批判，希望同志们注意。无论赞成“革联”的或反“革联”的，你们都讲了意见，希望今后要紧紧掌握大方向。

两个编辑部的文章，要害是打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你们研究得如何，掌握得如何？在北京，我问了一下，有的学校，特别是打内战的学校，来不及去学习。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彻底揭露。

同志们知道五月十六日是什么日子吗？一年前，党内发了《通知》这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历史意义的通知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指十六日）马路上结队游行，庆祝文革小组成立。一年的工作，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我想同志们要了解第一段，就要大大加强学习，解放军同志也不例外。

第二个问题更是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这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语录上也有：没有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能进行？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这是不能动摇的原则问题。要实事求是地估计五十四军在“三支两军”问题上的成绩和缺点。他们不是支持了右派、保守派，是支持了左派。缺点在那里？在于没有抵制。在解决四川问题中，成都军区某些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然这不是首先来自军区，而是来自刘、邓、李井泉方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这一点，“八·一五”的同志要注意，那天“八·一五”的同志谈大方向，就没有讲到这一点，要深刻注意到这是个方向问题，注意到毛主席写的大字报中说的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群众。李井泉就是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镇反运动。反“革联”的同志是受害者，“八·一五”是受蒙蔽的。希望“八·一五”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另方面帮助他们自我批评。这是事实：

一些组织被镇压、被捕，有些组织没有被镇压、被捕。盲目支持镇反，是错的。但是，不是“八・一五”不是革命组织了，这样也说错了，不要因为中央开了会，给你们（指反对革联的）平了反，因此而骄傲起来，压制“八・一五”，那你要重犯错误。希望两方注意。解放军认识到错误，（支持这一派压制了另一派，支持了公安部门的镇反），能纠正错误。我看五十四军比成都军区要认识得正确一些，认识得早一些。不要动摇对五十四军的信任，是毛主席缔造的，在打美帝、打印度反动派时有很大功勋。这样的解放军应不应该拥护？（答：应该）

第三、第四，总理解释很清楚了。革命组织之间如何团结的问题，大家都要进行整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记得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吗？要向解放军学习，能学好多好的经验。通知中提出五种学习。你们是大学生，我考考你们，五种学习是学什么？“八・一五”不是最拥护解放军吗？周家喻讲讲。（周：弄不大清楚）盲目打内战，对这些就不注意了（反对派笑）你们不要笑，问你们也是一样。要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你们那里还没军训吧（有四个学校开始了）要学十五个文件，你们学得怎样？（总理：建院不是军训了吗？沈志清，你学得怎样？沈答：开始还好，以后忙于打内战，学不下去了。）好，说老实话。所以，要整风，要加强政治工作。不用考你们了，十五个文件题目可能都不知道。（总理：“老三篇”还学一些吧？）忙于打内战，没有武器不是混战一场吗？要自我批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有一条要自我批评。看看五条，很有好处。打内战，你们看第三条怎么说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不是和稀泥，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打倒。第四条讲民主集中，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现在年青人批评人马列主义不少，批评自己马列主义不多，这是通病。要整风、整思想、整组织，以理服人，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四川打得厉害，是惨痛的经验。

第五，要加强军民团结。总理讲了，把军委八条、十条结合起来，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完成斗批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中央的五条，没有个八条。同志们要动脑子，这种谣言是很多的。说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我看了，里边还有邓拓的咧，没有发表的，不要乱信。有五首是没有定稿的，但传来传去，也是错误很多。还有造总理的谣、造陈伯达的谣，造王力、关锋的谣，我是不会写文章的人，有人也替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咧。

要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王力：十六条好好学学。）你们每人算算帐，（指学了那些文章）打起内战，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们把这个帐算算。（王力：《通知》也要好好学。）同志们好好学一下，希望同志们更好的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总理、康生同志讲完话以后，五十四军的代表、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同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黄廉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意见。周家喻同志还说，要很快返回重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进行工作，对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前一段出现些缺点错误，愿意听取其他革命组织的意见，诚恳接受批评。

康生同志：我有个问题问周家喻同志，你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话很好。“产业军”你敢去做工作吗？（周答：敢）要靠说服，教育，分化。对保守派要有策略，艰苦耐心的工作。主席这段话在去年八月三十一日提出，今年三月七日又提出，到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懂得，说解放军和稀泥。你讲得很好，要实践。你去做“产业军”工作，开始还有可能挨打，还会有人说你右倾呢！

总理：我问周家喻同志第二个问题，你说愿意接受其他革命组织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容易。你面对着“八・三一”、“九・一五”给你提意见，你有没有勇气听？（周答：有。）希望你带头做模范。不要一听就说“扯谎”，“造谣”。以后要有这样精神。

康生同志：总理不是只对“八・一五”讲的，也是对你们（指“八・三一”、“九・一五”）讲的。你们不要各取所需。

周总理：我对重庆山城是有感情的，我在山城住过几年，过去是雾重庆，现在是光明的重庆，希望你们快回去。（众起）。

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

周恩来

1967.05.19

1、派军队保护造反派。

2、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

3、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付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

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康生 江青 陈伯达

1967.07.21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晚八点四十五分——二十二日凌晨四十分，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刘建勋等。〗

康生同志：咱们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同志们看，现在北京热闹不热闹？全国都很热闹，上海、四川各地都很热闹。

你们看，百万雄师这一套，对不对？（众答：不对！）你们这个态度很好，有点路线的觉悟。全国革命人民、全国革命组织、革命造反派，应该有所表示，当然，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你们估计一下，在河南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二七方面：有！已经到河南了。）百万雄师已经到河南了，产业军也到河南了，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铁军、十大总部，特别要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仔细考虑，你们组织里，有没有同情百万雄师的，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百万雄师是反对二七公社的，是反对中央给二七公社平反的，这在武汉有标语。不但百万雄师，武汉军区也有人这样反对。因为河南军区何运洪与武汉军区有关系。何运洪为什么敢这样大胆呢？同志们，河造总的同志们，十大总部的同志们，你们应该很清醒的考虑。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直接领导的，一军也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我不说武汉军区整个不好。但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准备自己检查。他们里面有些组织，特别是独立师的一些干部，煽动“百万雄师”反对中央，因此，全国革命人民坚决反对他们，北京的革命群众，还有部队，反对他们不是偶然的。这是件好事，把他们的面貌一下暴露出来，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请河南革命组织、群众组织考虑一下，河南有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危险，有没有按照这样的方法再来第二个武汉，每一个革命群众，每个组织，每一个真正要革命的人，都应该在他的头脑里考虑考虑。当然，他们一意孤行，有他们的自由，他们可以走上反动道路。但是，我希望革命群众要禁止这种现象，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假借革命运动走上反动道路。现在，王任重的百万雄师，李井泉的产业军，都向你们河南走，可见河南有点油水。不然，为什么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同情他们的，有支持他们的，和他们结合和他们有点共同的东西，所以，他们才去。是同他们搞在一起，还是反对他们？这个问题摆在群众组织面前，这两条路要自己选择选择，这不能和稀泥，这不能宗派主义、有小团体主义，这是国家大事，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希望革命的组织，千万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我觉得，群众总是好的，我们坚决相信群众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一个时候不明真相，会受蒙蔽。现在武汉街上贴满了标语，有些军区的宣传车，也大肆宣传说：“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这完全是造谣。还造谣说，中央说，百万雄师是革命左派。军区的宣传车假造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林副主席的谣言，欺骗群众。他们总是想采取内蒙古反革命分子的手段，造成既成事实压中央，他们完全想错了。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不会被这些坏分子压倒的，他们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让他们表演表演，谁愿表演就再表演一番。这样的阶级斗争，才能把文化革命搞到底。这看起来是坏事，实际上是好事。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彻底的。同志们，今天从北京会上一大课，他代表全国的革命组织。这一点，我为什么讲呢？因为河南武斗不是停止了，而是一天天的在发展，有军区的某些人在我们面前玩弄两面派手腕，还在煽动群众。同志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懂得什么叫陶铸，什么叫王任重，那些坚持执行，坚决拥护陶、王的人，象文敏生、赵文甫等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你们拥护的是什么样的首长，他是什么结果。从这个问题，也可以叫何运洪、李善亭等人看一看，他们实行这种路线，如果不改变，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们能代表解放军吗？（众答：不能）现在全军陆海空都在游行反对他们。同志们从今天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得到一个经验，我看对解决河南问题很有好处。当然，也可能有人错误地估计形势，比如你们的公安公社吧，他们看看形势满好，又蹦了出来，我们准备他们蹦，刘大坤，还有一个钟什么东西，他们已经蹦了出来，谁跳出来都行！他们认为是一个大好时机嘛！我看大暴露一下，他们高兴一下，河南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现在河南的武斗，不是停止，是发展了，是在酝酿一个武汉百万雄师这样的反动行为，有这样一个危险。因此，我希望你们看到街上革命群众游行的声势，得到一个教训。军区某些人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支持对抗中央指示的反革命的百万雄师不会有好结果。当然有些同志，比如何运洪同志，检讨承认错误，我们是欢迎的，但是，我上次讲了，是真革命假革命，有一条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真正的革命者，是全心全意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会两面三刀耍两面派手段同志们犯错误不要紧，哪个组织有错误也不要紧，犯错误坚决改正自觉检查就好了。现在有些群众组织，一面打人，一面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说这种话实在可耻。“从这件事件是可以得到教训的。当然百万雄师内，积极参加的还有“三字兵”，这一点你们铁军要很好注意。“三字兵”就是“黑字兵”，还有公检法，你们十大总部要注意，要警惕，他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彼此有同情的基础。我们同意同志们刚才讲的，我一接触河南问题就看出武汉了，不解决武汉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河南军区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政策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大暴露，对解决河南问题有好处，同志们从这里可得到积极的教训，也可以得到另外的教训，无非是再表演一次，因为事情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今天我希望同志们，希望每个组织，都平心静气地向团结方面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团结方面走。求同存异嘛，不要向分裂方面走。有些组织说起来是统统拥护中央的决定，一个“但是”就转过去了。从总的方面讲，我们代表团的工作是逐渐逐渐向较好的方面发展，我希望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军区的检讨已经印好了，可以发给你们，希望军区把这个检讨发到军分区，如果你们军区真正拥护中央的革命路线，要准备有人冲军区，有人压你们，考虑制造困难，说明他们有办法不让你们改正错误。我们希望大家向团结方面走，向前看，不去算旧帐。

武汉军区的问题，希望你们作为一面镜子，引以为鉴，不要向这方面走，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现在看，事情的发展不完全是这样。当然，河南也还是逐渐向好方面走的，同志们要注意国家大事，脑子里有敌人，有阶级，有敌人。陶铸、王任重不是死老虎，陶铸、王任重把手还伸向河南。他们的黑爪牙是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敏生、赵文甫等。我们今天也可以讲，对于何运洪的问题也可以讲到底，是改正错误还是坚持错误，我们相信你改正错误，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底是不是确实如此，因为在军区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还受压制，代表何运洪路线还在兴风作浪。如果他们这样干，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甚至犯了错误的干部，都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希望他们真正改正错误，不是玩两面派，真正按照毛主席、按照中央的路线干。河南的问题会完了吗？不会，还会有一场严重斗争，这一场严重斗争对于你们革命群众组织是个严峻的考验。究竟站在那一边，摆在你们面前，由你们去选择，愿意站在那一方面就站在那一方面。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了就好啦，对中央同志，对文革小组，对毛主席，采取那样的态度，是什么行为？是叛变行为。是愿意跟叛变的人在一起，还是愿意跟革命的人在一起，要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跟着叛变的人阴谋诡计总会暴露出来，两面手法会暴露出来，两面三刀总会被揭发出来，希望代表了解这回事，也希望你们对不明真象的群众进行工作，你们不是说要革命吗？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反对毛主席路线，还叫什么革命？你们每次都喊毛主席万岁，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但是你们实际行动并不象喊口号那样容易，互相读语录那样容易。我告诉你们，北京和全国革命派都在游行，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群众是真正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

对你们，也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对于河南特别重要，因为河南是受武汉军区领导的，过去是中南局陶铸、王任重领导的。过去军区是反对二七公社的，现在“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同样反对给二七平反，这里面你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难道我们的同志愿意同他们那样的反动行为搞在一道吗？难道还同他们划不清界限吗？我相信大家不会这样的，现在形势大好，但是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艰苦的。我希望两方面、几方面达成协议，有些意见可以彼此协商，但是，是有共同点的，共同点，就是反对百万雄师，你们能不能就反对百万雄师达成协议？（众答：能）十大总部同铁军你们能不能？（他们答：能）这就有共同基础了，有这个共同基础，达成协议就不难，你们一方面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各组织在这件事情上，对“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和一部分独立师，应该发表文件表示态度，象北京的革命群众一样，一起上街反对他们，北京也有两派，但是他们遇到这个东西，大家就一起上街反对他们。大敌当前，就应该团结一致，这一点对于河南的革命群众特别重要，因为百万雄师到你们那里去了，就是给你们搞联合，联合十大总部、铁军、河造总（十大总部、铁军、河造总皆表示坚决同百万雄师、三字兵划清界限）你们不但打电话，还要发表文件。

张保怀：我们二七公社发表声明……

戚本禹同志：你们没有问题。

二七：（读声明的全文，当读到武汉局势极其严重时）

康生同志：你们把形势看得太严重了，事实上，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部分小丑。

（当二七公社读到百万雄师迫害王力、谢富治同志，感到万分沉痛时）

康生同志：这句话不好，为什么要悲痛呢？受坏人的打，就光荣，受了好人的打，就打成朋友嘛！

（当二七公社念到百万雄师迫害王力同志时）

康生同志：不但迫害文革小组的同志，而且迫害他们带去的北京红代会北航红旗井冈山等四个人）

（当二七念到杀退这股反革命逆流时）

康生同志：向中央施加压力不一定是反革命。是非常错误的。

（最后二七公社把“河南二七公社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最紧急声明”全文念完。）

河南造总：（表示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和百万雄师进行斗争）

八大总部（反二七那一派的）（表示和百万雄师开展斗争）

康生同志：同志们这种表示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何运洪今天还是要改正错误的问题，还要看，一看，二帮嘛！最好不定他的反革命性质，这一点是我们的建议，当然，你们群众组织自己有你们自己的看法，出于义愤，也可以。但是何运洪今天还是检讨错误的问题，一看二帮嘛，不一定完全是那么一个性质，他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的确我们还要一看二帮。

（郑大战斗师表态）

康生同志：（打着手势制止他）你们可以印发文件，一方面发给我们，一方面向家里讲，在家里散发，这个办法好。

（战斗师继续抢着说：我们讲了以后，我们散发）

康生同志：（又打手势制止）大家的意思我知道，大家要反对百万雄师，把他印出来好。今天晚上，大家一方面赞成刘建勋同志回河南领导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有的同志说：刘建勋有错误。刘建勋同志的错误，已经检查了。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检讨过多次。今天晚上又在我们的代表会上作一次检查，现在请他来讲一讲，同时，他自己也知道省委一些问题要揭露一下，除此以外，纪登奎同志、戴苏理同志，他们也要求作检查，有时间也请他们检查一下，现在请刘建勋同志讲。

刘建勋：（开始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没有提林付主席）

康生同志：他没有提林副主席，可能有人要抓小辫子，我同你们说清楚，这是林付主席提议的，他有最大的谦虚，他首先禁止我们的干部祝林付主席身体健康，特别禁止我们中央讲这个话。

（当刘建勋同志谈到文敏生五年连升三级时）

康生同志：这一点我查了一下，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发现有一股单干风，这时候刘建勋同志对河南的灾情估计得过于严重，犯有一些错误，主要是借地问题。这个问题是陶铸提出的，真正坚决执行的是文敏生，但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听到主席批评以后，这两个同志有两种态度，那时候，我们知道很清楚，刘建勋同志很沉痛的检讨自己的错误，而应该受到批评的文敏生，根本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他仍然依靠陶铸，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由他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并没有沉痛的进行检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两个同志的本质了。

（当刘建勋同志谈到，提拔文当省长，陶铸要调文到黑龙江当第一书记时）

康生同志：陶铸想叫文到黑龙江代替欧阳钦。

（当刘建勋谈到，文敏生决定对郑大联委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方针时）

康生同志：明支持、暗瓦解给中央反映以后，有人提出怎样评价文敏生，给他归纳了两句话，说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李先念最了解文敏生，先念同志说：这个评价最恰当不过了。

康生同志：现在请纪登奎同志讲话。

（纪登奎同志发言，当谈到何运洪的罪恶时）

康生同志：何运洪同志来了没有？

张树芝：没有来。

康生同志：怎么没有来？

张树芝：有病了，是心绞痛。

康生同志：有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说？

张答：给联络员讲了。

（当纪登奎同志讲到文敏生等人布置收集南下北京同学的材料时）

康生同志：希望同志们注意一下，中南地区在陶铸、王任重的指领下，有一个特点，坚决反对北京南下的学生。无论是广西、广东、湖北，无论是湖南、河南，他们都要搜集所谓南下一小撮学生的材料，这是王任重的口号，这一点，当时河南刘建勋同志没有这样做。他欢迎南下的学生，赞成他们，这在中南地区可以说是很少有的现象。有一件事我没有查清楚，河南军区的同志们和一些群众组织，对北京红代会支持青海八一八同志进行迫害，当时青海赵永夫镇压八一八，北京的学生有牺牲有流血的。赵永夫被揭露后，北京的学生要求支持青海八一八，中央同意他们去，当他们坐车路过郑州时，遭到迫害，有没有这回事？

二七：有！是铁路公安处搞的，属于公安公社。

（当纪登奎同志揭发杨蔚屏吹捧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时）

康生同志：杨蔚屏在不在？

杨蔚屏：在（站起来，又低下头）。

康生同志：你是杨献珍的学生，对杨献珍有没有揭露？写没有写揭发杨献珍的文章？

杨蔚屏：没有，没有写。

康生同志：你看对不对？我知道杨献珍对你比较重视，这一点在党校的时候我知道，杨蔚屏是支部书记。

杨蔚屏：学习的东西多一点，别的东西不知道。

康生同志：不是知道不多，观点一致就看不到。省委书记对这样的事情不关心，不同他划清界限，对反党叛徒不揭发一点东西，并且表示不知道，这就不对了。杨献珍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时候你正在党校嘛。

戚本禹同志：河南大批印杨献珍的著作，是谁搞的？要查一查。

康生同志：杨献珍 1957 年还在党校，那时候杨献珍就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过去不认识杨蔚屏，

我认识杨蔚屏是杨献珍给我介绍的。杨蔚屏知道杨献珍的问题不揭发，是不对的。路线上不要和稀泥，怎样能够这样对待杨献珍的问题呢？这说明你的思想有问题。1954，55，56，这在党内批判杨献珍，你一句话不讲是错误的。

杨蔚屏：我回去揭发。

（戴苏理检讨略）

（当戴讲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动摇不定时）。

康生同志：你这个同志就是政治上软弱，你不能坚定地支持谁反对谁，就是摇来摇去。

（当戴检讨他政治上很动摇时）

康生同志：你这个同志就是政治上软弱，说这一点我赞成你这句话，你是年轻力壮的同志，工作是有能力的，是了解你的同志对我讲的，不是河南的同志给我讲的，你这个人不那么坚定，看风势，那里势大向那里歪，这一点自己应该注意，作为共产党员，要引以为鉴，如果坚持正确路线，就不怕孤立，不怕受打击，这一点嘛你自己讲得对了。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是小组的同志给我讲的，你工作很有能力，但有这样一个毛病，这一点我们革命的同志要帮助他，不仅看到他好的方面，而且应当看到他的缺点方面。

（当戴讲到他对河造总的评价时）

康生同志：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是不是还想依靠河造总？

戴：那不能单依。

康生同志：这一点你说的不那么明确，必须要联合起来，和支持自己的团结起来，但也要帮助他们，改变缺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戴讲下去）

康生同志：例如说河造总冲了军区，大家不是反对打、砸、抢吗？反对打、砸、抢为什么还冲击军区？军区何运洪犯了错误，整个军区不是这样嘛，要改正错误，表示态度，不要采取这样的办法。

（当戴谈到文敏生、赵文甫的问题，他说过去做过揭发，今天不在这里讲了的时候）。

康生同志：你可以讲讲嘛，我们没有听到你揭发。

（当戴讲到文敏生看到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刮胡子就发脾气时。戴狡辩，我谈过）。

康生同志：我还记得 1950 年我有病来到北京，听到刘少奇大讲国际关系，说和苏联的关系要搞好，搞不好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说见了苏联人一定要刮胡子，大讲一套他的刮胡子的理论，现在又听到一个刮胡子的故事。

二七发言：刚才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对错误的向群众组织作了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从今天的检查来看，刘建勋、纪登奎的检查是认真的，诚恳的，深刻的，我们坚信刘建勋、纪登奎同志一定能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河南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戴苏理的检讨，尽管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但我们表示欢迎，欢迎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略）

中学红卫兵总部：刚才我们听了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的检查和对文敏生、赵文甫问题的揭发，表示热烈欢迎……（略）

（11 点 50 分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同志走进会场，我二七战士激动地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

江青同志：革命的同志们万岁！向革命的同志们致敬！

姚文元同志：（带领大家高呼）打倒刘、邓、陶！打倒王任重！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生同志：你（中学红卫兵总部代表）表示反对百万雄师，这是好的，我们欢迎，现在你不是赞成我的话吗？我有个建议，你那个红卫兵为什么用黑字？

中学红卫兵：因为开始是黑字。

康生同志：现在全国有个说法，叫黑字兵，这个说法代表一个观点，你们不一定同那些人一样，你们属于不了解情况，黑字兵是山东的，实际上是武汉的三字兵也是黑字兵，你们换一下可以不可以？

中学红卫兵总部：马上换。（并当场摘掉了黑字袖章）

康生同志：你们可以讨论，我不是说你们和那些黑字兵完全一致，你们赞成就换，不赞成就不换。

中学红卫兵总部：河南的武斗不但没有停止，而是大规模的爆发，很严重，很多老工人都哭了。全国第二砂轮厂也停产了。

康生同志：在郑州吗？

中学红卫兵总部：二砂造联很坏，把铁皮搞成盔甲。

康生同志：你们关心制止武斗，不搞武器，这一点是好的。我希望你们两方面调查，如果二七有，不对，十大总部有，也不对，河造总有，也不对。你们关心这个东西，要几方面调查，我们得到的材料，不仅是一个方面的东西，甚至工人拿起武器，拿起了枪，所以，希望全面注意这个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中学红卫兵：我们呼吁抓革命促生产，"百万雄师"为什么到河南去，有一定原因。

康生同志：对。

中学红卫兵：工厂停工，扒铁路，把贵重法码当弹弓子打，这都是二七公社黄委会东方红干的。

康生同志：你们学校是不是在铁路西边？

中学红卫兵：在铁路西边。

康生同志：听说新乡斗的很厉害。

中学红卫兵：大家要按照《"六•六"通令》、《七五协议》书办事。

康生同志：你们都签字了吗？

中学红卫兵：康老说不签字不行，我们签字，不执行，辜负了中央首长的期望。

康生同志：在北京达成协议，在家里搞武斗，你们代表中，有没有想打倒戚本禹同志的？

河造总、十大总部：没有。

康生同志：有的说打，打打试试嘛！

中学红卫兵：河南出过打倒谢富治的标语。

康生同志：你们打倒谢富治，有一个谣传，是从打倒刘建勋同志发生的，他们说刘建勋为什么没有打倒呢？就是他有后台，这个后台就是谢富治。所以谢富治要打倒。

中学红卫兵：主要是何运洪有问题。因为打倒谢富治是 155 部队提出的。

康生同志：对！军区个别人，首先是何运洪，要打倒刘建勋是错误的，影响到群众，主要是何运洪的错误。

铁军：我是铁军的，我要发言。

康生同志：我问你一个问题，铁军到底和联动有没有关系？

铁军：没有关系，是他们造谣的。

康生同志：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代表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同志：

应该是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刚才有一位同志讲，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这个意见很好，要大力宣传。挑动武斗的人总是一小撮，如果广大的群众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揭出了他们，他们就会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发动群众，要向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工作，这样我们才能胜利。

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热烈鼓掌）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做深入的群众工作，这是第一条，同志们要向群众深入地宣传这一条，做比较艰苦的群众工作，要广大的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的阴谋，是要做一些工作的。但是，还要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枝、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革命小将你们要吃亏的。现在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当然，武汉的革命小将也在采取自卫手段。同志们，当我们听到“百万雄师”以及他们的幕后一小撮操纵者拿着那样的武器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行凶，甚至绑架、殴打我们的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我们能允许吗！（群众高呼口号）

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我希望各方面都不要撕毁协议，谁撕毁协议谁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号跟我们订了停战协议，他马上就撕毁了。

我今天看看同志们，就把这个道理讲一下，我们有理，真理在我们这边。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工人、革命农民这边，不在他们一小撮那边。我们必胜，他们必败。如果他们挑起武斗，不肯放下武器，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

我就讲这么一点。（热烈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康生同志：军区张树芝同志报告一个情况，就是说这几天还有人冲击军区。同志们不是反对打、砸、抢吗？不是达成的有协议嘛！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情况？刚才工人总部写了个条子给我，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了，为什么不讲讲这几天的事情，冲军区是一个大事，问题是过去也有人冲过，那时候没有协议嘛？我们达成了协议，大家签了字，就应该注意。

张树芝：（略）

（当张树芝讲到有的地方开着吊车搞武斗时）

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工人总部要特别注意，你们要负主要的责任，别人没有吊车嘛，把生产工具变成了破坏工具。

张树芝：吊车一开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康生同志：新乡就开了吊车。

二七：他们提出三天内全部消灭二七派，用吊车围攻二七派，在家内的人，家都被抄了。……

康生同志：用吊车毁坏大楼是反革命行动，要查一查。

二七：现在新乡的二七派逃荒的很多，新乡军分区搞全市停工、停产、停电。

康生同志：新乡军分区要负很大的责任，立即打电话（对张树芝）告诉他们再这样搞要受到严厉惩处。

戚本禹同志：军法处置。

二七：听说李国秀把炸药交给老保，新乡地委的老保已经散了，李国秀又给他们打气，让他们跳出来。

康生同志：他们看到百万雄师去了嘛。

二七：李国秀对地委老保说：就是剩我一个人，我也支持到底。四川产业军血洗开封以后，又流窜到新乡，行动口号是把腿打断。……

康生同志：当前新乡、开封市的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

二七：十大总部、铁军运到新乡几百人，挑运农民进城……

康生同志：同志们要注意，这几天恰恰都同“百万雄师”的行动一致是不是统一布置的？

二七：他们和十大总部有联系，还翻印他们的传单，说中央文革说“百万雄师是革命造反派。”

戚本禹同志：康老刚才说了，那些全部是造谣。

康生同志：军区是谁讲的？全部是造谣，而且是相反的。

二七：河造总说中央派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武汉（这时伯达、康生、本禹、姚文元等同志都笑了），8201 和武汉陆海空军游行支持“百万雄师”。

康生同志：8201 就是独立师。

二七：“百万雄师”在郑州有一千多人和十大总部，河造总联系在一起。

河造总、十大总部：二七公社善于造谣，完全是造谣。

康生同志：你们等人家把话讲完嘛！这是讲“百万雄师”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百万雄师！

二七：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成立了河南省革命派联合总部，明天开大会，规定农民四点钟进城。……

戚本禹同志：（对河造总）有没有这个事情？

河造总：没有！是造谣，我下午三点钟才挂过电话，是造谣！

戚本禹同志：现在就马上往家打电话。

河造总：有没有中央派人调查？

康生同志：我们可以派联络员给你们一块打电话。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他们讲完，你们再讲嘛！

二七：统一行动指挥部在省工会，我们认为这一系列武斗行动不是偶然的，最近所以发生大规模武斗是河南军区和河南省委内一小撮搞反革命两面派的结果。

康生同志：这一点你们刘大坤，还有钟什么东西（指钟生溢）实在作了反革命两面派。你们在这里搞的决议，他们在家里反对，说决议是假的，现在你们两方面都不要讲了（二七和河造总都要求发言）我提议由河造总起草达成一个协议，共同反对百万雄师，反对四川产业军，反对产业军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不是今天起草吗？你就起草嘛！

（河造总站起来解释并攻击二七公社。）

财贸总部：河造总不起草，我们起草。

康生同志：好！

新乡李玉坤（老保）（当李玉坤谈到用吊车参加武斗时）

康生同志：不管怎样，用吊车吊房子，任何人也不能解释这样行动。（当李玉坤讲到和二七公社联合有些保守派的

工作不好作时）这是困难的。（当李玉坤攻击二七公社夺枪时）不要说这个事了，你还是谈谈如何制止武斗吧！

李玉坤：我一定下决心。

康生同志：下什么决心。

李玉坤：我可以马上回去，作大联合的工作。

康生同志：你坚决支持军分区，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军分区同我们的观点不一样。

李玉坤：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李给康老念语录：相信群众相信党……）

康生同志：我相信群众，我相信解放军，也相信干部，但我不相信对抗毛主席路线的人。

李玉坤：完不成任务不是革命派。

康生同志：你的话很多，实际表现是最少，你解释的多，理由也很多，但实际却相反。

张树芝：今天，新乡八一八的大楼和河医的大楼，新乡八一八楼里面还有放射性元素，河医的大楼实验室里还有细菌，非常危险，我们责成新乡军分区负责让围新乡八一八的人撤退，郑州由军区负责让他们撤退，现在撤退没撤退还不知道。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意见你们可以提，但是冲到我们办公楼我们不能办公，我们不能同意，昨天有三股人冲过军区，并且上去就喊。

康生同志：还要揪出刘建勋？！

张树芝：刘建勋同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我们信得过的，他回河南我们坚决支持，坚决拥护。我们军区全体指战员是表过态的。为什么昨天晚上还出现过这个情况。

康生同志：你们的目的是给军区施加压力，使军区不承认错误。

张树芝：我们由于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家可以批评，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康生同志：（对张树芝）你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你们承认错误，你们部队中间一部分人，群众组织中的一部分人，一定要大大向你们施加压力，你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昨天晚上十二点钟冲进军区，围攻陈桂昌副司令，使他无法工作，完全没有保证。

康生同志：我们认为陈桂昌是对的，李善亭、钟生溢是错的。

戚本禹同志：这个是真的，他亲自给我打电话，陈桂昌是好同志。

康生同志：我们坚决支持他。现在陈桂昌同志受压迫，受围攻，我们就看出动向了，张树芝同志要时刻注意，这个文件发出来，大问题还在后头。

康生同志：张树芝同志的讲话，希望同志们注意。中央关于河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发下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相信不相信群众？我们相信群众的，我们相信军区认真检查以后，广大群众会拥护解放军的，会欢迎支持军区改正错误的。我们坚决相信，不管那一派，绝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但是我们不相信欢迎何运

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如果有的同志还要军区继续执行何运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不支持。

现在请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

同志们，你们的会我们参加很少，这是第三次，所以知道的情况很少。我今天来主要是看一下。

现在有一点很值得在座的代表注意，河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各省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利用何运洪在支左工作中所造成的罪恶和留下的空隙，进行活动。我看到一个材料，武汉"百万雄师"，一百条纸老虎（康生同志：就是行尸走肉，我看"百万雄师"就是行尸走肉），都走到河南来了。（康生同志：我还叫他是"白完行尸"，就是白色恐怖完蛋的行尸走肉）。"百万雄师"是个狗屁！他起这个名字是吓人的，没有三天功夫，到现在还不到三天，政治上全部破产，臭名远扬，组织上土崩瓦解。你听到这个名字好象很凶，其实很松，纸老虎。四川"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康生同志：实际上就是李井泉、王任重到了河南。"产业军"是李井泉的，"百万雄师"是王任重的，两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往河南去了）。北京的"联动"，东北的"荣复军"到了你们河南去了，到你们中州去了，利用过去河南军区何运洪所造成许多错误和所作的罪恶，开辟战场，他们为什么窜到河南去了？为什么不到北京来？这些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都窜到河南这个目标，就是想把河南作为战场，我的话大家听懂听不懂？（众：懂）懂，那我的中国话说得差不多，其实，我的祖先也是河南人，不晓得是那一代。这一点很值得大家警惕，不但看到河南的消息，并且有行动。所谓行尸走肉的"百万雄师"，就是在河南造谣，有的同志把四川"产业军"叫残匪，残是残无人道的残，匪是罪恶深重的匪。他到你们河南杀人去了，有这么一个材料说，一个残匪杀了七个人，群众逮他时，他说："你打死我还赚六个"，要不要河南成为保守派的河南？（众：不要）说了不要行动上呢？我要看行动，要看你们这边（指十大总部，河造总）十大总部，河造总你们行动要特别注意，听其言观其行，你们在这里信心很大，说得怪漂亮的不行，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你们在这里订协议，刚才张树芝同志说了，没有实行，把协议斯毁了。江青同志刚才讲，什么人破坏协定？中国的蒋介石。这是值得深思的，走错了路，可以走回来，"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对河造总、十大总部）我讲话有点进步，你们也要有进步，不要口是心非，我们相信张树芝同志的话，坚决不作两面派。你们年纪青青的，在这里达成协议，回去另搞一套，和各省反动派勾结起来，你们成为窝藏的地方，为什么这些"产业军"、"百万雄师"、"荣复军"、"联动"都窜到河南呢？就是有人搞反革命两面派。给他们抬轿子，利用河南的保守派给他帮忙。现在他们在河南都有活动，刚才康生同志说，军区要有这种准备，就是准备有人向军区施加压力。军区公开承认错误后，有人向张树芝施加压力（戚本禹同志：那是一定的；康生同志：在座的人尽管否认，但一定会有，实际也是这样，百万雄师、三字兵、公检法和一部分独立师的干部也是乘武汉军区改正错误的机会，向军区施加压力，要它不要承认错误，这个问题武汉有，河南也发生了。）这是一种罪恶活动。这种活动一定要失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是毛主席缔造的。这个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支柱，是不可动摇的，它犯有错误完全可以改正，有人有一种反动企图，有这种反动企图的人必定又会重新犯错误，必定会失败，这一点军区要提高警惕。

河南问题，在声明发表以后，它就树立了权威，有了威信，得到群众拥护，河南的局面是可以稳定下来的。谁要破坏这种可能稳定局势，必定要碰到头破血流，失败的不是革命战士，而是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康生同志：不管他有多少人，"百万雄师"不是号称一百万人吗？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他们的头头是武汉市委组织部长、原大叛徒王明的勤务员。）有一个问题，十大总部、河造总在座的代表都要想一想，你们究竟是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走这一条唯一正确的路线，还是跟那行尸走肉在一起？（康生同志：可以叫做"白完行尸"）你改得好。你们十大总部、河造总首先制造杀人武器，有没有这个事？（答：没有）"百万雄师"、"产业军"总是有人帮忙。（二七：在郑州、洛阳、许昌、开封、新乡都有"百万雄师"、"产业军"，并且制造武器，郑工实习工厂因制造武器，车刀飞了打死一工人，纺织机械厂制造弹簧枪等）（河造总：二七公社造谣，他们最近开了政工会议……）你们哪，我讲一讲，你们不要忙于辟谣，先检查一下。（戚本禹同志：可以看一看谁在搞武斗？）你们听他讲完嘛！用国家的财产、物资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这是什么？该当何罪？国家财产、物资都不能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叫做破坏国家财产。现在十大总部、河造总有些工厂把国家财产、物资用来制造小团体杀人武器。是有这个事情。

（河造总：是二七公社制造武器、挑起武斗）（戚本禹同志：他们是少数，不会这样做。）康生同志：（今天晚上正在军区围攻陈副司令员的是不是河造总、十大总部？）（戚本禹同志：陈桂昌给我打电话，确实是这样，安全没有保证，张树芝同志你们要保障陈桂昌同志的安全。）（康生同志：我有一个材料念一下，根据军区反映，昨天晚上，河造总的一些成员，军区士兵和干部造了陈副司令员的反，昨天河造总的一百多人，夜十二点围攻陈桂昌、赵复兴。刘大坤、钟生溢溜走，后来又把赵复兴放出，一致围攻陈副司令员。他们说：为什么把军区声明支持河造总一句话拉掉，要是刘建勋搞鬼，就坚决打倒他。这个问题何运洪、张树芝他们回答，这是他们觉得为了促进各派大联合，提出二七公社、河造总都不写，开始还向中央作了报告，然后到总理开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河南军区那个稿子的事，这个问题和刘建勋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如果河造总继续围攻陈副司令员，那我可不愿意你们。今天晚上十点钟已经有五百人冲进了军区，现在正在调人。他们造军区反的原因是军区内一部分人说：刘建勋同志到了军区，刘建勋不承认河造总是造反派，十大总部也说刘建勋歪曲中央精神，只支持二七公社。明天开大会要揪刘建勋。今天造军区的反，是内外配合。他们准备明天开大会。据省委机关造总东风兵团翻印了武汉“白完行尸”十八号公布的一个材料。为什么“白完行尸”要到那里去？就是有人欢迎他们和翻印他们的材料嘛！这个传单捏造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产业军”的批示，说毛主席、林副主席支持“产业军”，这完全是造谣。这样的东西竟有人翻印！省委机关造总丁石、张治安你们听着，我预先请你们注意。）

关于破坏国家财产，制造杀人武器问题，我特别讲一下。不能用国家财产、物资制造小集团杀人武器。特别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一方面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河造总和十大总部他们占有工厂，搞这些东西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工人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被人利用，不要被保守派利用，特别是工人同志要注意，在座的有没有工人同志？（众：有）工人同志要特别注意，不要被人利用。在工厂，工人被利用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文化革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文化革命，所以过去有些走错路的工人，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应当再被人利用。不然，将来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还有挑动农民进城的问题。谁挑动农民进城？（康生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不仅仅看看人家，首先要看到自己，看自己利用农民没有。）（河造总：我们保证没有。）（康生同志：不是保证不保证的问题，你执行何运洪的路线，一定动员农民给军区施加压力。）你们有些保守派按照自己的目的。让农民犯错误（戚本禹同志：制造谣言）。在农村制造谣言，用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过去没有解放以前，毛主席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按照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现在情况改变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这时候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是反动的。（河造总、十大总部：这个口号是二七公社提的）你们不要嫁祸于人。（康生同志：你们不能这样歪曲，发明这个口号的是李井泉、产业军，讲事实嘛！）（戚本禹同志：产业军最早喊出这个口号）（康生同志：你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宗派主义？你们是反对李井泉，还是保护李井泉？）用诽谤、造谣、中伤，总是要失败的，你们以为得计吗？李井泉就是在城市混不住了，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背叛了毛主席。（康生同志：如果把这个事情嫁祸于二七公社，那就是客观上帮助了李井泉、产业军。）李井泉想要农民进城，保卫他们政权。他还不是失败了。

康生同志：我告诉同志们一个秘密，农民不会无缘无故的进城，各地的规律就是军分区、人武部的动员。凡是动员农民进城，大体都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大家对这一点不要怀疑。

伯达同志：给农民记工分，记多少钱，给多少粮食，不然农民怎么会进城来呢！有些农民就是糊里糊涂进来的。不给粮食，不给工分，不给钱，农民就是不给他干，还有戚本禹同志说的，在农民中间造谣，总是说造反派怎么破坏国家财产，要求农民进城支援，宜宾农民进城破坏生产才厉害哩！（戚本禹同志：这是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办法，调动群众斗群众。）

康生同志：浙江保守派动员农民进城，就是军分区人武部搞的。

伯达同志：农民进城主要搞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农民把对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也喊打倒。他们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康生同志：动员农民进城，不是当权派不行，因为要给农民工分、钱、粮食，谁有这个力量？

伯达同志：你们要特别注意人武部。

康生同志：新乡、开封如果没有军分区共指挥，农民不会进新乡、开封。

伯达同志：张树芝同志，你们的工作要认真。

张树芝：我们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在郑州不成，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准备把中央首长指示、中央批示传达一下，经过教育，那些不赞成中央指示，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最有纪律的，对他们是要执行纪律的。

康生同志：张树芝同志，你们现在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开不成不错，我支持三级干部会议不开。开这样的会议，看什么人领导、什么路线领导，有的省军区也是这样。用第一个办法开三级干部会议，名义上是传达中央指示，实际上是动员他们反对中央批示，动员他们让农民进城。很多这样的经验，你们要注意，有的军分区，人武部常常以各种借口召开会议，什么好听起什么名字。比如有的用学习毛主席著作模范人物介绍经验会的名义开会，实际上是动员农民进城。有的以整顿过去支左工作为名，实际上动员部队反中央，动员他们同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相结合。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经验，你们也要注意。现在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到底开好还是不开好，你们考虑。有没有人在三级干部会公开的或秘密搞何运洪以前那一套。

伯达同志：何运洪同志要做人武部的工作，不要让他们动员农民进城。

康生同志：他们有很多理由总是借口下边不通来对抗中央，说什么"都能够拥护军区"，"很多人向我们讲思想不通"等等。过去你们河南军区何运洪就作过嘛！说"给二七公社平反，召集干部会议通不过，还要看看。"

戚本禹同志：有电报。

伯达同志：一个是刘建勋同志回河南帮助做人武部工作，能够一分为二就一分为二。

康生同志：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拥护，一个是打倒。

伯达同志：都是利用人武部。

康生同志：现在就有人揪刘建勋，陈桂昌就揪走了嘛！

伯达同志：人武部有好的，能够改正错误还应该欢迎；不想改正错误的要有适当措施。我把这个秘密全给你们说了，你们要采取这个办法对付我，会不会？（造总，十大总部：不会）你们在这里保证，回去也应当保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犯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了罪，对人民犯了罪，对农民说来也是犯了罪。

康生同志：农民明白了之后会找他们算帐的。

伯达同志：在座的代表同志们，如果你们对农民犯了罪，农民会找你们算帐的，农民受蒙蔽是一时的，我们相信群众，信任群众。毛主席的路线就是信任群众的力量，希望他们能过来。群众可以犯错误，但是他们会改正，你们不要以为可以随便利用农民。那样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今天我主要是讲两点。一个是现在全国各地的保守派组织或反动组织大量流进河南，并且进行了活动。你们要注意，特别不要供给他们武器，不要拿国家的财产制造杀人武器。一个是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你们纵容各地保守派组织，

动员农民进城，这是犯罪。你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要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我相信作大总部中大部分群众，特别是工人同志会提高觉悟的。要想利用他们的一小撮人最后一定会被戳穿的。所以，对"白完行尸"、对"产业军"、"荣复军"、"联动"的态度是考验你们的试金石；动员不动员农民进城来反对造反派，也是一个试金石。

康生同志：

我有个建议，请同志们注意。河南总的形势是大好。为什么呢？因为军区表示了它的态度，向中央表示，坚决改正错误，而且中央对他们的检查也有了批示。所以，比过去的形势更好了。只要军区坚决改正错误，只要同志们和各个群众组织坚决实行《中央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坚决执行中央对军区检讨的批示，执行你们自己达成的协议，那么河南的形势一定会更好，这一点我们有信心，但是，当前河南是存在危险的，这也要估计到。

一、刚才大家讲"白完行尸"、"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了你们那里，而且产业军在那里杀人，据开封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杀了八·二四的同志。这些反动组织都到河南去，他们去干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

二、河南现在武斗向前发展了，张树芝同志都承认，不管什么理由，什么解释，事实是存在的，而且这个武斗还有大发展的危险，也许就在这几天。

三、请同志们注意，正当我们这一种好形势，军区同志改正错误，你们有一部分组织向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改正错误，要他们继续坚持过去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这种压力已经开始，我们估计，不但是想压军区不改正错误，而且还会有大量的人跑到北京，向中央施加压力。不管怎样保证，事实总会有的。（伯达同志：现在就有向中央施加压力的。）

据说洛阳已经到了。希望施加压力者明白，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痴心妄想。来两千也好，二十万也好，我们再三同同志们讲话，毛主席领导下的党中央，它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拥护何运洪路线的人，想向中央施加压力，不能动我们一根毫毛，这种人一定碰得头破血流。

四、防止天灾。从天气预报看，黄河水汛有大大增长的危险，黄河水可不管那一派，不管二七、河造总、十大总部，都不能分离。我们不是说一切为人民服务吗？我们就是要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同时，抓革命、促生产。

因此，我有五条建议，都要从积极方面向前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要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方面走。

一、希望双方面达成协议，坚决向刚才表示的那样，坚决反对百万雄师，我想同志们可以达成协议（伯达同志：还有产业军、联动），坚决谴责百万雄师在武汉绑架谢富治、王力同志和对他们的迫害。你们必须充分准备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谴责这种叛逆行为。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你们应当坚决抵制这一点，同北京的革命群众一起与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作坚决的斗争。今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坐火车到北京来，北京所有革命群众都上街游行抗议，并且不准火车进站，不准他们下车，而有些比较激烈的人准备武斗，我们想办法说服了。因为北京不同于武汉，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应当让他们下车，因为另外还有老百姓嘛！下车还要安置他们吃饭、住宿。可以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嘛！不要搞武斗。这一点，二七公社要注意。就是说不要用他们的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他们现在已经把反动面貌暴露了，还不容易斗争，而且这里许多人是被蒙蔽的，对他们还是要更好地做工作，你到那里乒乓乒乓武斗一顿。当然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带着枪到北京来的，带着枪到北京是来干什么的？但是，我们是革命的，可以给他们辩论，不一定动手，应当采取这样的办法。现在，百万雄师、荣复军、产业军、联动都去了，"三字兵"也去了，很可能在你们那里会师。

（伯达同志：他们在河南会一败涂地）所以要坚决反对这些反动组织到河南破坏文化大革命，坚决反对一个任何组织同他们结合在一起，坚决反对任何组织利用他们的力量反对另外一派，不管那一派都坚持这一个协议。

三、要把已经达成的六条协议重申一下。目前河南武斗发展，重申一下这个东西有好处，坚决实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坚决制止武斗，这一条是当前最重要的一条。无论新乡，无论开封，无论洛阳、郑州都要注意。

四、保证黄河水汛安全，任何组织，都不得捣乱和破坏防汛工作。不准任何组织砸、抢防汛器材、物资。不是说关心五千万人民吗？这就是关心五千万人民的问题，坚持这个协议，有没有困难呢？是有困难的。但是，可以在各方努力下解决。因为这是关系到河南五千万人民的问题。

五、坚决拥护解放军，欢迎、支持军区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要他不承认错误。这是最后的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最关键的一条。有了这一条，就可以防止农民进城，制止武斗才可能有真正的保证。这不是你们一个人在这里就可以保证的，刚才有个人说：他（李玉坤）可以保证制止新乡的武斗，这可不可能。事实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你没有抓住关键，关键在军分区，而军分区的关键在政委李国秀，据我们知道不止他一个人，所以，不要那样天真了。因为有何运洪的路线问题，要从路线问题上考虑才能解决问题。拥护中央批示，拥护解放军，支持、欢迎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变错误路线而不是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路线，这一条可以达成协议。因为中央有批示。

我建议明天一天，核心组要搞出协议来，这个问题本来今天就明显了，刚才有个同志写了嘛，主要是达成协议和贯彻执行协议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下：

（一）双方达成协议，反对百万雄师在武汉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行动。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写出文件、传单在社会上散发。

（二）双方达成协议，坚决反对百万雄师、产业军、荣复军、联动到你们河南去破坏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分裂、挑动武斗。

（三）双方重申，保证实行已经达成协议的“七•五”协议书，特别制止日益发展的武斗。

（四）双方达成协议，黄河防汛协议要坚决贯彻执行，材料、物资、计划不允许破坏。

（五）坚决拥护军区的检查报告，拥护中央的批示，欢迎、支持军区的同志改正错误，反对向军区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改正错误。

这样五条建议，请你们商量，看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赞成，你们就回去平心静气搞协议，不要算剥皮帐，达成文字的东西，这样你们回去就好做工作了。赞成就散会。达成协议，再开一次会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二七公社的代表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打倒刘、邓、陶！

打倒王任重！

打倒陈再道！

打倒文！赵！杨！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其它各方代表也高呼口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转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传组“关于出版用纸生产和供应情况”的通知

1967.07.24；中发［67］225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党委，国家计委、建委、一轻部，总参、总政、总后：

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传组提出的“关于出版用纸生产和供应情况”转发给你们。目前出版用纸需要量日益增加，但生产计划不能很好完成，因此，纸张供应比较紧张，致使毛主席著作印制工作及一些报纸和杂志出版受到严重影响。这一问题必须妥善加以解决。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提出的三点解决办法是很好的，各地区、各部门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保证这三点意见的实现。关于第一点，以国家计委、建委为主，组织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研究和组织执行；关于第二点，作为重要措施之一，对几个重要的造纸厂（例如汉阳、宜宾、江西等造纸厂），即由所在地军区实行管制，抓革命、促生产；关于第三点，严格控制各高等院校的小报发行数量的问题，由各地革命委员会或者筹备小组、军管会或军区负责，其中北京的小报取消航空版并严格控制发行量一事，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执行。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央首长对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1968.09.16

〖时间：1968 年 9 月 16 日 20 点 35 分至凌晨 3 点 28 分，地点：人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同志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接见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同志。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这个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部分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注：文中×××者是记录时没有听清姓名。〗

总理：江青同志等一下来，她有点事。

同志们！上次会议只听了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的汇报，讲了一些话，在座的同志有一半参加了。现在经过十多天，你们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有了进展，从形式上说，只有一个厂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了二百四十五个厂，已经成立革委会的有一百四十九个，占出席会议工厂的百分之六十，现在又有九十五个工厂成立革命委员会，达成三结合的协议。从这一点说来，是一件好事，我应该向你们祝贺。

当然，现在形势还要发展，还要前进，光有协议还不行，在家里还要实现。现在还有的厂两派对立情绪很大，很需要推动一下。今天想听一听搞得好的几个厂，但不要详细介绍。

这次会议除六个机械工业部外，还有化工部的厂，一机部的厂，一机部有个标兵是上海机床厂，大家在报上看到过报道了，现在请张育生同志来说几句，不要说的太多，不要按书面讲，讲几个中心问题。

（张育生同志主要汇报了上海机床厂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决心做毛主席的好工人的情况。汇报了五七年毛主席视察该厂、六八年毛主席批准发表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的调查报告”，和毛主席“八·一五”最新指示对全厂的最大鼓舞，最大鞭策的情况。汇报了该厂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情况。当汇报到接待外宾来厂参观的时候）

总理：是否参观的人太多了？是否妨碍生产？一天接待多少人参观。（张育生，参观的人很多。）

总理：那不好，妨碍生产，要有限制才行，请一机部军管会写一个东西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每天接待多少人，报告中央，中央文革再通知各地注意。

（当张育生汇报到：在批判了反动技术权威夺了他们权以后，工人成了科技战线上的主人，仅今年一到九月份就试制成功十三种新产品，有四种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如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仅用六个月时间就搞出大型平面磨床的时候）

总理：你们机床供应国防工业的有多少？（张育生：供应国防工业我不清楚，援外的占百分之二十。）

总理：你们过去两派联合以后，组织不存在了，还有分歧吗？（张育生：还有一点。）

总理：你是技工学校毕业的吗？（张育生：初中毕业。）

总理：你是磨工？（张育生：是。）

总理：你是哪年进厂的？（张育生：一九五八年。）

总理：科室人员有多少？（张育生：一千六百人，现在已经取消了六个科室，下去一半了。）

总理：下去一半了？你们两派分歧还有一些，还有什么观点不同？（张育生：我们两派没有多大分歧了，主要是旧党委还有一套人，影响我们。）

总理：旧的规章制度还没有完全改革。（张育生：有的搞掉了，有的还没有。）

总理：你们厂有没有军代表？（张育生：原来有，成立革委会后走了，我们要求解放军去，向市革委会提过几次。）

总理：你们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了嘛！你们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别的地方去了吗？（张育生：派出了八百人。）

总理：你们大家听一听，上海机床厂能作到的，难道你们做不到？你们能不能做到？

（众答：能）

总理：是嘛！向先进的学嘛！他们那里也不是没有派别，但是只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按毛主席的指示联合起来了，清理了阶级队伍，坏人就揪出来了。你们国防工业老底很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坏人更多，有没有啊？（众答：有）

总理：你们厂党员有多少？（张育生：党员九百人，团员一千人。）

总理：有没有靠边站的？（张育生：整党还没进行。）

总理：造反派头头吸收了些没有？（张育生：还没有。）

总理：你就谈到这里，现在听一听南昌飞机厂的情况。张羽同志到了吗？（张羽同志汇报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了革委会成立后抓了三件事，狠抓了根本，大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斑，车间办、班组办、家属也办，深入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工人的精神面貌有很大改变，家属的阶级觉悟也有很大提高。）

总理：家属有多少人？（张羽：加在一起四万多人。大批判大大促进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展，现在已经揪出阶级敌人四百九十五个，占全厂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有些是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

（当张羽汇报到今年的生产可以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时）

总理：是否超产？（张羽：可以。）

总理：八月份南昌也是高温的时候，是否也是高温高产？（张羽：是高温高产。）

总理：刚才你说的那个人是什么人？（指张羽同志前面汇报中提到的抓出国民党盐务局“剿匪”少校大队长）你们很多厂要注意，特别是重庆、成都、太原、西安、武汉，有些坏人钻到了工业部门。（张羽：今年的特点是提前四个月另五天完成了援外任务。）

总理：是啊！南昌厂一个任务去了很快能完成。重庆有的厂，调已经搞好的援外产品有的人就不让调，要打内战，重庆厂的同志们要想一想，这种人是什么人？

（当张羽汇报到研制机型情况时）

总理：希望你们成功，预祝你们成功。世界上还没有用这种机型的，我们应当超过。

总理：讲的差不多了吧？（张羽：现在工人决心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但是现在“吃不饱”。）

总理：你们要求任务可以加任务。

总理：再听一个北方的，哈尔滨枪弹厂的情况，哪个来讲？（李文茂：我叫李文茂）

（李文茂汇报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汇报了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经过三次反复，两派群众组织联合不起来，革命、生产受了很大影响时）

总理：你们两派和“山上”、“山下”有没有关系？（李文茂：有关系。）

总理：你们联合以后才脱钩？还是以前就脱了钩？（李文茂：联合以前都没有脱钩，联合以后两派都脱了钩。）

（接着汇报了两派联合后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大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狠抓了革命的大批判，第三狠抓了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揪出了坏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生产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总理：现在是九月中旬，你们国庆节后能不能超过六六年的产量？（李文茂：还有困难，主要设备年久失修，六六年走资派为蒙蔽群众，搞物资刺激，同时又搞了八百九十六个家属工，现在有一个车间的工人平均年龄四十一到四十二岁，有后继无人的危险。革委会成立后，思想革命化还差一些。）

总理：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嘛！你们厂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有？（李文茂：八月份抽调了三百人，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八个大专院校。）

总理：科室人员有没有下放？（李文茂：我们有四百五十九个科室人员，第一次精简剩下一百七十五人，第二次精简后现在剩下九十五人，分政工、办事、生产三个组。）

总理：你估计日产在四季度能否超过一九六六年？不好回答吗？（李文茂：不好回答。确实有些问题，现在有些条件确实不行。）

总理：发挥工人阶级积极性嘛！有些设备可以维修嘛！（李文茂：我们一定想办法。）

总理：你作了多少年工？（李文茂：六二年进厂。）

总理：是不是中专生？（李文茂：进了两年中专，以后退学了。）

总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们结合的不是有个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吗？（李文茂：他是革委会副主任，现在执行任务去了。）

总理：要回来的。（李文茂：三个月以后回来。）

总理：大家想办法，总是会超过的。需要量很大，需要你们努力。

总理：现在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情况。重庆高射炮厂，是军代表先说还是两派先说？两派先说吧。张代荣同志来了吗？（张代荣：来了。）

总理：好，你讲。作了多少年工了？（张代荣：四八年进厂的。）

（当张代荣汇报到厂内阶级斗争复杂尖锐，两派斗争激烈，对立情绪很大时）

总理：现在还对立？（张代荣：对立的严重。）

总理：是否达成了三结合协议？是否同意了？（张代荣：同意了。）

总理：林兴礼同志是不是对立面？（张代荣：是。）

（总理看着参加汇报的人名册）

总理：你们两个是坐在一起的嘛！万县、重庆都是四川嘛，岁数也差不多，你念到初小，他是大学，哪个大学的？（林兴礼：是万县私立××学院〖解放前〗。）

总理：学什么的？（林兴礼：学会计的。）

总理：好，你坐下。（张代荣：我们有两个观点分歧，形成两大派，分歧越来越大，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对立最大，把我们“反到底”赶出去，四千多人拖到涪陵，军区把我们送回厂去的。）

总理：你讲今年他讲去年，还不是吵，要往前看嘛！（张代荣：我们今年一月二十九日回来的，对立情绪仍然比较大，阶级敌人挑起武斗，打伤三百多人。）

总理：国民党残渣余孽揪出来没有？（张代荣：没有。）

总理：两派对立不仅今年，还有去年，这要联起来看。（张代荣：我的工作经常出去，把材料拖进来，把产品运出去。）

总理：邓美名同志在家吧？他是重庆的，是三级工，是五三年进厂的，张代荣你们是一伙的。不要说今年被赶出去，手无寸铁，去年你们占优势的时候怎么样啊？去年不晓得，今年又晓得这样不全面。（邓美名：我来讲，我们厂是郊区的一个厂，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国民党时期是模范兵工厂，解放时有跑的有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几乎都是国民党员，敌情很复杂。一九五五年时国民党比共产党还多。现在还有五个单位国民党比共产党多。有潜伏下来的敌人。）

总理：你们现在八千五百人，老的有多少？（邓美名：职工二百多人是老的，是有衔的。）

总理：老工人有多少，（邓美名：老工人也有很多参加国民党的。八百多人参加了国民党。）

总理：现在在八千五百人中，有八百多工人、二百多职员参加国民党？（邓美名：连职员在内八百多人，有衔的二百多。）

总理：共产党员有多少？（邓美名：一千多。）

总理：八百多人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不会人人都是坏人吧？八千多人为什么国民党还揪不出来？（邓美名：由于派性的关系。）

总理：这就对了。（邓美名：两派各讲各的。）

总理：两派达成协议了？（邓美名：达成了。）

总理：不要互相责备对方。（邓美名：多作自我批评。）

总理：说起来都通，张代荣同志他就讲被赶出去，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去年打得厉害的时候你参加了吗？（邓美名：我们是比较典型的。）

总理：不仅典型，北京都知道了，都被敌人登了报了。（邓美名：观点一分歧，就成了两大派上了敌人的当，动起了枪炮。）

总理：你们打了多少炮弹？（邓美名：好几千。）

总理：你们把船也打沉了，还装了炮舰，是不是你们？（邓美名：是。）

总理：这些事你们就不提了，发生多少次事件，你们就不提了。不要算这个账了，现在要认真联合起来，揪出坏人，刚才三个厂都讲了这个问题，三个厂的情况教育了你们，你们都是工人嘛！要想一想这一点。

（这时江青同志来了，全场热烈鼓掌）

总理：你们说一说你们厂怎么联合的，怎么清理阶级队伍的，你们晓得你们厂是那么多国民党，要一分为二，群众是集体加入的。但是搞破坏帮助你们把炮搞到船上去搞炮船……后勤部调武器援越受到阻挠，明知道是国民党你们就不管，你们说说这个问题怎么办？（邓美名：去年我们被"八一兵团"赶出厂了，把炮搞出来装了军舰。打了很多炮弹，打沉了船，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我们忙于打内战，把敌人放在一边不管，这不仅是错误而是罪过，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尽快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由于打内战，现在还是半停产状态。我们现在落后了，我们要赶上去，我们在国庆节前争取揪出几个像样的走资派。）

总理：你这个意见张代荣同志是否通？（张代荣：同意。）

总理：林兴礼同志是否同意？还有磨工梁峰同志，你们一共来了几位？（邓美名：来了九个人。）

总理：军代表来了吗？你相信不相信会促进他们搞好。（贺乾铭：会搞好。）

总理：你什么时间到厂的？（贺乾铭：五三年到厂的。）

总理：一直没有离开？（贺乾铭：参军后到学校学了几年。）

总理：什么时候回来的？（贺乾铭：六五年回来的。）

总理：你对厂里的情况你是了解了，哪些是国民党你晓得不晓得？你有责任，你们现在没军管。（贺乾铭：晓得一些。）

总理：王茂德（厂长）来了吗？（王茂德：来了。）

总理：是三九年一月参加工作的。（王茂德：我过去是部队转业下来的.）

总理：梁峰没有来，杨晋强来了吗？（杨晋强：来了。）

总理：你是实习生？（杨晋强：对。）

总理：哪个大学的？（杨晋强：在南京工学院。）

总理：你是哪一派的？（杨晋强：是“八一兵团”的，和“八·一五”在一起的。）

总理：你是学生，所以和“八·一五”搞在一起。

总理：张绍学同志你是四七年参加工作的，你是四川人，是解放前到厂的。还有游尊贵同志来了吗？（游尊贵：来了。）

总理：你是车工？（游尊贵：对。）

总理：蒋承宪同志来啦？车工，六三年参加工作的。（蒋承宪：对。）

总理：你们年纪都很轻，你们都是“反到底”的？（游、蒋：是。）

总理：唐帮永同志来了吗？（×××：没有来。）

总理：技术员王业春同志来了吗？（王业春：来了。）

总理：你们来了九个人，你们九个人同意这个意见吗？（众答：同意。）

总理：你们既然达成大联合协议，是否要搞三结合？干部呢？（邓美名：我们双方解放了两个干部，我们协商解放的。）

总理：过去的错误，你们双方有责任，领导也有责任，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按照斗批改的方针，好好坐下来，最重要的是联合起来，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你们厂是国民党老底子，那么多国民党留下来，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联合起来就揪出来了，你们还是要好好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和家里通电话，主要是家里搞，你们还要回去搞。在这里主要是把毛主席的指示好好学习。你们两位还有什么要说？（林兴礼：我们两派有名单，干部也有名单，家里同意我们的协议，正在作工作，我们回去也进一步作工作。）

总理：革委会你们说一说。（林兴礼：我们名单商议了，没有意见，我们双方商议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过去不能联合，打内战，是敌情严重，这个厂是伪兵工署的模范厂，今年摸底的情况有八百零四个国民党员，其中中尉以上的五十人，工程师以上三十一人，技术员十九人，工人五百八十八人。）

总理：你把工程师、技术人员这些人首先清理，两派联合起来清理，就可以弄清，一方面打一方面保就对立了，一定要清理阶级队伍。

（×××同志汇报了有些原来国民党参加共产党的人的情况，工厂里有十一个是专政对象，有十三个是封建会道门骨干，军、警、宪、特四十人。一百六十六个工人中有七十三个是国民党参加共产党的。现在还有八个科室七个车间国民党超过共产党。）

总理：历史上你不要说得这样繁琐，主要是国民党的破坏，这些事情如果揭发出来对方是否会同意？（林兴礼：我们交换敌情时，有的还没有同意，有一部分同意了。）

总理：你怎么看法？（邓美名：他们谈对方如何，我们要谈也很多，现在不能谈，要靠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才能

抓，如果谈就会争吵，我们要多作自我批评，团结起来看问题就好办了。）

总理：你们是否同意邓美名的话？（众答：同意。）

康生：把你们自己内部的坏人讲一讲吧？（林兴礼：我们自己内部已经抓了十七个，两个国民党中校、五个国民党上尉、六个中尉、四个少尉。）

康生：×××表面上是拥护哪一派的？（林兴礼："反到底"观点的。）

康生：×××呢？（林兴礼：是我们观点的。）

江青：你说清楚一点，你们要"反到底""血债要用血来还"？

总理：他们说自己内部的坏人。

江青：对，你们组织内部有不少坏人。（林兴礼：如×××自己不出面，而是要儿子出来搞武斗，这是我们组织中的坏人，我们已经捉了十几个。）

康生：以后怎么办，你们讲一讲。（林兴礼：迅速建立革委会，虽然意见不一致，也要把革委会先建立起来。）

江青：你大前提错了，要先搞革命大联合，你不搞大联合怎么搞三结合呢？革命三结合就是革命委员会，你不会说话找一个会说话的来。（林兴礼：我们现在已达成三结合协议了。）

康生：在这里达成了协议，家里怎么样？（林兴礼：大家都讨论了，两派都支持"八・三一"协议，三结合名单家里也提出来了，经过几次反复。）

江青：你叫什么名字？（杨俊祥：我叫杨俊祥。）

总理：你们现在有没有大联合的局势？（林兴礼：两派曾提过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严阶级派性没有联合好，在"八・一五"会议促进下，陈华堂亲自作工作，八月三十一日

我们达成了联合协议，现在正酝酿名单。第二阶段一方面斗私批修，一方面酝酿名单。）

康生：搞什么样的联合形式？（林兴礼：现在首长亲自支持，解散两派组织，和社会脱钩。）

总理：能否归口大联合？（林兴礼：搞成一派。）

江青：是否按车间？（林兴礼：按车间、班组，现在家里形势很好。）

康生：好是好，就是头头问题，是背后国民党的问题。

总理：你们都很清楚，你们厂那么多国民党，都可以点出名字，可你们不联合起来斗他们。

康生：一年多了，还让国民党在那个地方，怎么像无产阶级的样子？

江青：你们打了多少炮？

总理：总数加在一起两万多发。（林兴礼：我们没打。）

总理：他们打的多，你们也打了一些。

江青：一炮也没有打，敢保证？（林兴礼：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没有炮。）

康生：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

江青：打也不是打了吗？暴露了敌人，锻炼了小将，在中央面前要说实话。（林兴礼：确实没有打。）

江青：后来你们打“反到底”嘛！

总理：把他们赶出去了。（林兴礼：我们有错误可以调查。）

康生：打得那么厉害，还说调查？

江青：你们还不把“反到底”欢迎回去？你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派。（×××：现在还有一些没有回去。）

总理：在哪里？（×××：在成都。邓美名：最近回去后又打死了两个，他们武斗都是带枪的。）

总理：“八一兵团”要欢迎“反到底”回来搞大联合、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搞出敌人，抓革命促生产，你是否欢迎他们？（林兴礼：欢迎。）

总理：成都军区不是分期送你们回来吗？（×××：人现在都散了。）

总理：你们厂主要的人是否都回来了？（×××：生产工人基本上都回来了，在外面的数量不大了。）

总理：“八一兵团”要欢迎他们，真正归口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大家都可以回来的。（×××：路费也没有。）

总理：厂革委会可以帮助你们解决，重庆除你们厂四川有没有负责人在这里？军代表在不在这里？管生产的是哪个？有个参谋长嘛！你要推动他们，带动他们，重庆对立最厉害的时候，打架也是最出名的。要真正联合起来，把工作作好，打电话回去，时间不多了，今天已经十七号了。

康生：我听你们两派发言都客观的叙述了你们厂内有多少国民党，但你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劲就不那么足，不能客观的叙述，要联合起来一致对敌，敌人那样破坏我们，那样杀害我们，你们一点气愤也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

江青：我今天已经干了五个多小时了，为什么？就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这就是铁证，铁证如山，你们还在那里打内战！你们就是不揪这个大王八蛋！他是国民党特务、大内奸．大叛徒、是五毒俱全的家伙。你们都是年青人自己打内战，不想想自己背后的坏人，不斗李井泉，更不要说刘。邓、彭、贺、罗了，有没有一点敌情观念？支左人员有没有敌情观念？×××站起来！你们为什么偏心那一派？你有偏心没有？你敢说你没有偏心吗？你要说老实话。

江青：把一派统统打到成都去，都是群众嘛！一定要安安静静地好好坐下来、我今天生了大气，我有阶级气愤，你们看（指着材料袋）都是铁证，你们上了这些王八蛋的当，上了这个大反革命的当，五毒俱全。皖南事变我们有一万人的主力军，刘少奇、项英和国民党、日本人合伙，搞了我们一万多人。我有足够的材料，他们又是美国特务，又是日本特务，又是苏修特务，你们对他们没有一点仇恨，你们两派还在对打，你们后面有什么坏人？应该像个样子嘛！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样子嘛！

康生：你们厂给无产阶级丢人，这派怎么样那派怎么样，仅仅是有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照你们这样作法能领导一切吗？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吗？你们想一想！

总理：你们已经打了两年了。

江青：毫无敌情观念。

康生：毫无敌情观念，和国民党和平共处，讲起来是客观报道，一点仇恨没有，直到现在还不下决心还不联合！

总理：把对方的阶级弟兄当成敌人，你们也晓得背后有坏人，但是又听他们的话，听国民党的话，双方都是这样。

江青：你们那里是没有跑走的国民党的窝。

陈华堂：到这来开会背后还开黑会，就是坐在那边的那个。

江青：他叫什么名字？不要害怕。（郭光昶：我叫郭光昶，是二五五厂的。×××：他是车间主任。）

总理：是泸州的。

江青：既然你是头头，那你说一说，我能听反革命的话，能听革命者的话，能听群众的话，既然有人指你的名，你就像样的讲一讲，你是干什么的，过去作什么的？

江青：我首先声明，同志们不要武斗，要文斗（指郭光昶）你大胆的说吧，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过，说了不要紧。保证你人身安全。（郭光昶：我的错误，主要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对待群众，对待对方，思想。立场、观点上有错误，总看人家缺点多错误多，看自己的优点多，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受了反动的"多中心论"的影响，和对方联合思想上有抵触，在毛主席身边的教育下，思想上有些转变，特别是签订三结合协议后，思想上更进一步认识到，来前及来后的一段时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和自己一派的开过一些会，作过一些研究，想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

总理：你暗中搞串联吧？（郭光昶：在这次三结合协议后我思想是比较通的，有些同志还没有完全统一认识，所以思想还不太通，我们在签订协议（星期五）后，星期天在景山一起去玩，另一方面也谈了在思想上应很好认识这次……）

康生：为什么不在签订协议的地方去说？为什么到景山去？

江青：你多大年纪了？（郭光昶：四十岁。）

江青：有点经验了，有点国民党的经验了。

康生：既然签订了协议为什么不当面谈，跑到景山去，你讲讲这个道理？（郭光昶：在签订协议前后……）

康生：为什么跑到景山去？

江青：高级知识分子。加入过国民党没有，老实说！

总理：哪个大学的？（郭光昶：重庆大学。）

康生：什么时候毕业的？（郭光昶：一九五一年。）

康生：解放前就在重大？（郭光昶：解放前就在那里读书。）

江青：你是普通国民党还是有问题的国民党？（郭光昶：我不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

总理：在大学没加入过？

江青：那时候要集体加人的。（郭光昶：没有，我确实没加入过国民党。）

江青：你是共产党？什么时候加入的？（郭光昶：五六年入的党。）

江青：四十年代那时候不加人国民党行吗？（郭光昶：我真的没加入国民党。）

总理：你家在重庆？你父亲是干什么的？（郭光昶：父亲在大学教书。）

总理：在什么大学？（郭光昶：伪陆军大学教俄文的。）

总理：你有国民党军队的关系了。

江青：你父亲叫什么？（郭光昶：叫郭贯伟。）

江青：刚才揭发的同志要注意，这样的人只要他能彻底交待，交待他的错误、缺点，要给他出路。

陈华堂：我们跟他讲了，在这里交待会宽大处理的。

江青：给他出路、但不要说假话，说假话没有前途。陆军大学比黄埔还高一级，是蒋介石的嫡系，学了出来就当官，你怎么样解释，这是起码的常识。蒋介石把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出来后就当官。（郭光昶：我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我父亲参加国民党是集体参加的。）

康生：是不是国民党军官？（郭光昶：教俄文不是旧军人，是文职。）

康生：在哪里学的俄文？（郭光昶：在北京有个外文学校学的。）

总理：到过苏联没有？（郭光昶：没有。）

江青：说不清楚你就是和我们顶牛。

康生：你父亲是否在？（郭光昶：在。）

康生：现在干什么？（郭光昶：没干什么。×××：他父亲在北京。郭光昶：在我哥哥家里，去年武斗以后就出来了。）

江青：你哥哥在哪里？叫什么名字？（郭光昶：在整型医院，叫郭兴照。）

康生：你父亲住在哪里？

总理：你是哪一派的？（×××：是“红旗”的。）

总理：“红旗”和“反到底”是一个观点的。（郭光昶：和“反到底”是一个观点的。）

江青：你究竟加入过国民党没有？（郭光昶：的确没有。）

江青：要是查出来可不好办！既然你是小头头，又操纵一部分人，你父亲是国民党，又是陆军大学的教授，而且教俄文，对你的犯错误你应该表一个什么态？（郭光昶：我向陈华堂同志汇报了，我在小组中也检查了我的错误，我愿意在中央首长面前进一步检查我的错误。）

总理：什么错误？（郭光昶：错误是对待群众问题，受反动“多中心论”的影响，不愿和对方联合。）

陈伯达：你是否到你父亲那里去请教？（郭光昶：没有。）

康生：景山黑会你父亲参加没有？（郭光昶：没有。）

康生：为什么不回答到景山开会的问题，不要说主观客观。（郭光昶：是去玩一玩照照相。）

江青：你是革命来了，还是游山玩水来了？

陈伯达：你背后还有什么人？

黄永胜：你在中央文革面前要说老实话，话不要说死，群众眼睛是亮的。

陈伯达：你不要说死。

江青：你讲一讲（对陈华堂）他的材料是什么？

陈华堂：他的材料我没有带来，他是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策划景山黑会对抗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最主要人物。

康生：四川为什么工人不出来，都是大学生、职员出来，工人不是领导一切吗？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为什么让大学生、国民党出来。

总理：许绍林同志，你们是一个观点的？（许绍林：我是“红旗”观点的。）

总理：作了几年工？（许绍林：一九三八年进厂的。）

总理：三十年工龄，你很老了。你怎么看法？

江青：你不要怕他。（许绍林：对郭光昶我不知道他的情况。）

总理：景山黑会你去没去？（许绍林：我去了。）

康生：你们开会去了多少人？（许绍林：就是我们几个人。）

江青：几个？（许绍林：七个人。）

总理：石祖根同志，你怎么看法？你是青年同志。（石祖根：我带的照相机，就是他说的。）

康生：七个人谁通知的？（石祖根：我通知的，我说星期天大家照照相，在景山大家说我们落后了，应该赶上去。）

总理：（对郭俊堂）是不是你说的脱了军农也要支持“红旗”？（郭俊堂：我没有说这个话。）

总理：哪个说的？（郭俊堂：我没有说。我是支持“红旗”派的，但我没有这样说。）

总理：你支持这派又压那一派。

康生：你对郭光昶怎么看法？（郭俊堂：他们去景山开会没有和我讲。）

总理：你也是他们的后台之一。

黄永胜：就是后台。（郭俊堂：支左当中有错误，有倾向性，陈华堂同志批评我接受，坚决改正，因为世界观改造不好，受了一些影响，错了就改。）

江青：是不是王力到过你们厂？

黄永胜：你是哪个部队的？（郭俊堂：是××军×××师，现在是分区独立团。我们部队去年到泸州到二五五厂护厂，同时宣传毛泽东思想，今年五月军管但工作没有展开，对敌情没有很好调查核实，现在两派都搞了些材料，军管会还拿不出意见，打算将两派材料集中起来调查研究，才能拿出意见。）

康生：你不有意见了吗？你支持一派嘛！怎么说没有意见呢？（郭俊堂：在宜宾表态支持了“红旗”，对“泸化兵团”长期没有明确，我们主要执行护厂任务，我没有表态是什么组织。）

总理：是否你表态他们是保守组织？（郭俊堂：没有，那是武装部表的。）

江青：你们是什么时候到泸州？（郭俊堂：去年九月三日。）

总理：你呢？（郭俊堂：我是管部队的，以前对两派材料没育掌握。）

总理：那一派负责人是谁？你有什么意见，你们厂还在停产？（×××：上月底已经恢复了一部分，主要是材料问题，现在工厂还被包围起来，九月四日又打了七个多小时。）

总理：你们达成协议了吗？（×××：在这达成了协议。）

总理：家里怎么样？（×××：我提几个意见，我感觉代表不对等，我们坚决要打倒的是政治部主任陈洪。陈洪有杀父之仇，两派严重对立与陈洪有关系，他这次也来参加了会议。）

总理：郭俊堂同志，陈洪以什么名义参加的？（郭俊堂：从宜宾那里指定来的。我没有参加研究。×××：你真的没有参加研究？你不老实。）

康生：不管知道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江青：有杀父之仇，是不是说共产党杀了他父亲之仇？该杀就杀嘛！（郭俊堂：陈洪是革命干部，不是革命干部怎么来的？是军区决定的，他是六四年转业到厂当政治部主任。）

江青：有杀父之仇是什么问题？（×××：陈洪父亲当过伪保长，搞我们游击队情报的，当过情报组长，当时游击队把他镇压了，陈洪通过私人关系，找了××县长（他父亲的朋友），××县长给平了反。他杀过我们的游击队员。）

江青：同志们听到了吧？杀得有理没有理呀？（众答：有理。）

江青：对这种人应该坚决杀。（×××：当时陈洪说："泸化兵团"是保守组织，陈洪说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连小学生也不放过，陈洪完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另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造成两派的对立，陈洪有四封亲笔信。）

总理：陈洪今天为什么不来？（×××：没让他来。）

黄永胜：他什么时候参军的？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是不是知识分子？（×××：三八年参军的，从炮兵研究院到五机部的，又由部到厂的。）

总理：那一派是不是不承认你们这一派？（×××：不承认。）

总理：这个问题在逐步解决了。（×××：如上边好好引导，是可以解决的，宜宾长期不承认我们。）

总理：成都军区，宜宾革委会已经通知我们，他们要改变作法，对你们那个地方的形势，还是推动你们联合，真正联合起来，好把双方组织的坏人揪出来。

江青：信在哪里搞的，谁收到的？（×××：我收的都交给领导小组了。）

江青：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对陈洪要坚决打倒。）

总理：他父亲是反革命，是应该杀的。

总理："红旗"对陈洪怎么看法？（×××：我们也调查过两次，情况不一样。）

总理：四封信有没有这个事？（×××：我们得到一封信。）

总理：他是坚决支持你们的，给你们出谋划策嘛！（×××：我们还没有这样认为。）

总理：他给你们出主意。（×××：有好主意也有坏主意。）

江青：你们上了人家的当。

总理：你是革命群众组织，他是当权派，给一派写信不是反对对方？（×××：我来说一点。）

江青：女同志来讲一讲。

总理：刘连英你说一说。（刘连英：我补充陈洪所干的一切，他一直没有向党交待过，陈洪有一系列三反言行，我认为是最恶毒的，他攻击去年军委的八条命令，我们有的同志问他，他说只适合军队，不适合地方。说主席批了中央还没有批。）

江青：他把毛主席和中央分割开来。（刘连英：就是刘少奇说的那样："反对毛主席是反对个人，不是反对党中央"。）

黄永胜：这个话是反动的。（刘连英：陈洪和他父亲是分不开的，他死心塌地的站在他父亲一边。我们厂分裂成为两大派组织，长期对立是和陈洪分不开的，就是陈洪搞的鬼。）

江青：揪出他来，你们军队主动把他揪出来，军队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现在建议，把他送到卫戍区监管起来。你看，你们几个男同志说不清楚，她把陈洪问题说清楚了。陈洪一方面隐瞒了反革命历史，一方面又镇压贫下中农，至少是反动的。

总理：你们"红旗"怎么看法？（×××：我不清楚，如果是这样……）

江青：让女同志说完，她讲得好，我不是偏袒女同志。

总理：江青同志是主持正义的。（刘连英：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们组织自成立以来二年多来，一直受压，毛主席批准的"八·一五"会议我们不能来参加，被剥夺了权利，但是有中央给我们撑腰，有军区正确的领导，使我们有一肚子委屈，一肚子气，今天在中央首长面前倒出来。）

江青：好！不要哭，你们联合好了回去斗批，立刻办，打个电话，把陈洪先捉起来。

（刘连英：从去年把我们"泸化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工厂的老工人为了保护工厂，被他们杀害了。）

江青：不要哭，你们有自卫权利，（刘连英：今年二月又来了第二次大围剿，今年七月还在打炮。……我们要联合起来，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揪出来。）

江青：对。

总理：讲得好，本质问题揭出来了，你们两派这样对立，就是背后有人。

江青：（对郭光昶）你要讲老实话。

总理：陈洪给你写过信没有？

江青：你们对工人同志就下死劲地打，哪给的枪炮屠杀工人？

总理：你们包围在外头，你动员人包围的，是不是？（郭光昶：我在运动初期就靠边站了。）

总理：为什么作代表？

江青：要老实点，说老实话。（郭光昶：我是支持"红旗"的。）

总理：你给"红旗"出谋划策。（郭光昶：六月份后恢复了我的工作，我表态支持"红旗"，但我和"红旗"还没有发生关系。去年七月发生武斗，"红旗"跑走，我没有离开厂，到十一月份我才离开，出去后，才到"红旗"那里去，真正参加"红旗"。在"红旗"中我一直是普通战士，去年抓革命促生产会时，我以管生产的干部名义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代表五月就完了。×××：我来揭发，我是"红旗"普通联络员，我观察了很久，据我看来郭光昶是"红旗"派参谋长。九月八号景山派会有一封信在我手中。除七个人外，会内会外还有几条线。郭光昶虽不在勤务组中，但起到参谋作用，而且以军管组身份参加过"红旗"派勤务组会，在景山会议上，除研究前段所谓失败教训外，也针对下段要揪坏人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信全部在我手中。据我看来，郭光昶是很不简单的人物，会内会外都有活动。张元培：七月十一日，"红旗"派打炮，码头打坏二十一条船，初步估算，损失六十八万元。×××：补充一下，是七月十一号晚打的，共打坏二十五条。）

江青：你说谁要你抓生产的？（郭光昶：是驻厂部队，独立团。）

江青：具体什么人负责？（×××：去年十一月还没有军管会，有一个营值勤，营长叫翟西英。他指的是军代室代表，是支持"红旗"的。×××：来京前，老工人要我们带话请示首长，一年多我们戴着保守组织的帽子，老工人死了六十三人，他们调动三十四个县、市的力量对付我们。）

江青：泸州支左同志站出来讲讲，是怎么回事？（×××：他们镇压时，说是总理九月三号批准他们来打我们的。）

总理：我怎么能批准这种事！

江青：军队同志要老实汇报。（郭俊堂：整个泸州支左是统一的，我们一个营护厂。）

康生：不管是多少人。

江青：你们镇压老工人，就叫支左？没有走资派，能调动这么多县的民兵？（郭俊堂：去年八月发的枪，武装了好几个团。）

康生：你把事情说清楚，把自己撇开。

江青：你再不说老实话，我给你摘掉红帽徽。红领章。你知道红星的来源吗？

总理：你说老实话。

江青：你没有自我批评，就是我。我、我，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没有人民，没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知道红星的来源吗？你们对待老工人这样苛刻，压制他们，只给十四元工资。你拿多少工资？（郭俊堂：一百四十元。）

江青：这问题就说清楚！（郭俊堂：去年武装支泸，我……）

康生：不要说你自己，总是把你摆进去。（郭俊堂：武装支左是错误的。……军管会是五月十日成立的，政委是主任，曹德林等三个副主任。×××：我补充一下，目前军管会在厂外，没有进厂。张元培：军管会就和"红旗"派一块没有进厂。）

黄永胜：毛主席叫你们支左，你们支持一派压一派。毛主席的哪一个指示让你们支一派压一派？中央文革有这样指示吗？你们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你们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态度？对中央文革是什么态度？你们忘记了你们是解放军！你们没有改嘛！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两年多了，你们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学到哪里去了？群众是要革命的，大多数工人是好的，工人阶级是老大哥，应该向工人阶级学习。你们不但不向他们学习，而且镇压，打死那么多，那么多国民党你们不抓，现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了嘛！你们还不觉悟。（郭俊堂：我有错误，坚决改。）

黄永胜：没有改，两年多了，你们还是那样。

总理：这样重要的厂，是国家急需的，打敌人、援外都少不了的，你们军管会，团的副政委参加下，要把它搞坏，包围起来，怎么像解放军！无怪你前两天说，把军衣脱掉也要支持"红旗"，支一派压一派。（郭俊堂：不是我说的，我听到过这个反映，是一个战士说的。）

黄永胜：把军衣给他脱掉。

伯达：军队要马上撤开。

总理：你向茹副参谋长报告后。马上打电话回去，你们不像解放军。

康生：你什么时候参军的？（郭俊堂：一九四五年。）

康生：哪里人？（郭俊堂：辽宁人。）

江青：多大岁数？（郭俊堂：三十九岁。）

康生：你原在家是干什么的？（郭俊堂：读书。）

江青：你家庭是做什么的？（郭俊堂：租地种菜。）

江青：菜农最富裕，一亩园十亩田。雇人吗？（郭俊堂：老家原籍山东，逃到东北后父亲做工。四八年解放后分了几亩田，给国家交租。）

总理：胡说，怎么能说给国家交租？

江青：种多少亩地？（郭俊堂：……）

黄永胜：你不老实。

康生：你今年四十岁，解放时二十一、二岁，那时你干什么？（郭俊堂：今年巳参军二十三年了，一九四五年参加冀热辽××军；以后到锦州，打山海关，一九四六年改编为××旅。）

康生：你参军以前干什么？（郭俊堂：读书。）

康生：在满洲国学校读书吗？（郭俊堂：读了六年。）

康生：问你是不是在满洲国学校读书？（郭俊堂：是。）

总理：你这么怕，心里有什么鬼？

江青：恐怕不单是种菜吧？有没有雇工？

总理：参军时你家里干什么？（郭俊堂：哥哥给人家当长工，舅舅是煤矿工人。）

江青：这是金字招牌，为什么这样含含糊糊？（郭俊堂：……）

黄永胜：你读书后干什么？（郭俊堂：读六年书后就参军了。）

黄永胜：几岁读的书？（郭俊堂：八、九岁。）

江青：你父亲是干什么？（郭俊堂：跑关东的。）

江青：我也是山东人，我家也是闯关东的，你瞒不了我，你父亲能让你读高小不容易，我读书时穿不上制服，我看你比我的家还是富裕的。我是一个木匠工人的女儿。你这样含含糊糊，你说你父亲闯关东，你哥哥当长工，你自己这样含含糊糊，你头脑不清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干了坏事，如果想把红星拿掉，欢迎。（郭俊堂：坚决改正错误。）

江青：如果部队和走资派结合起来，革命组织要联合起来揪他们，把一些坏蛋揪出来。

总理：现在打电话回去，问一下泸州厂是否还在包围。

江青："七·三"、"七·二四"布告是否在你们那里起作用？宣传了没有？（茹夫一：宣传了七、八天。）

江青：要广泛深人地宣传，必要时派飞机撒传单。（茹夫一：已撒过一次了。）

江青：再撒。（茹夫一：是，再撒。）

总理：打电话问清楚，这里既然达成协议，尽管情况复杂，陈洪事情通知一下，先把他隔离起来。

江青：郭光昶，你的精神面貌完全是和我们对立的，我怀疑你这个共产党员，或者我批评错了，你也可以批评我，我感觉你的精神面貌十分不正常，你不符合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要求。

康生：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郭光昶：一九五六年入党，一九五七年转正。）

康生：在什么地方？（郭光昶：在厂内。）

康生：什么人介绍的？（郭光昶：组织部长×××，副科长×××。）

康生：这两个人现在哪里？（郭光昶：×××在×××厂，×××在××县。）

康生：你入党十一年了，你晓不晓得共产党员的三个条件？毛主席讲的建立什么样的党。怎么说的？（郭光昶：……）

陈华堂：上次个别找他谈了话，指出他犯了三个错误。第一，策划开了黑会。第二，承认了他在群众组织中是高参，做了坏事要改。第三，到北京后活动很多，有会内，也有会外的，今天连这个姿态也没有了，不承认了。

康生：你不是靠边站很久了吗？你不是没有派吗？

江青：你每月多少工资？（郭光昶：一百零八元。）

江青：你每月给工人多少钱？（郭光昶：……）

江青：你每月只给工人七元钱。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难怪你这样，你和我们都是顶牛的。

总理：你和陈华堂同志谈活，承认三点错误，现在连这也不承认了。你到景山开会，说是照相，完全是骗我们，（郭光昶：我没有欺骗首长。）

总理：上午的话和现在的话就不一致。（郭光昶：在景山的确没有向领导汇报，也没有向军管会汇报，从这点看是错误的，非法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研究了如何认识错误，把以后会开好。）

江青：你是否是头头？（郭光昶：不是。我们过去的错误不仅不愿意联合，而且根本不承认人家。虽签订了协议，并不等于思想上完完全全扭转过来，我感到差距很大，有必要把思想彻底扭转。）

总理：是想扭转，还是在想新花招？（郭光昶：正因为如此，才在景山开了一个会。因思想不通，也讲了一些派性话。）

江青：什么派性？是资产阶级派性。（郭光昶：是资产阶级派性、小资产阶级派性。）

康生：说了一些什么资产阶级派性的话？（郭光昶：因有三个人没有参加"八一五"会议，所以也介绍了一下会议情况。我感到跟不上主席。）

江青：哪个主席？（郭光昶：毛主席。）

江青：这个会是在达成大联合后开的。（郭光昶：三结合后。）

江青：这样问题就大了。你既然好心好意、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你就应当请上军管会，请上对方的同志一起谈一谈，否则就变成串联会，是非法的黑会。

康生：你说的好像头头是道，其实越讲越使人怀疑。为什么不公开开会，而到景山去开会？按你讲的很光明正大，为什么不敢公开？你要答复这个问题。

江青：我们是分秒必争。你们还休息、照相？其实你也是分秒必争。

康生：什么照相？在北京的人都召集来了，讲那些骗人的话干什么？

江青：你说不出毛主席要求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我想的也许主观，你脑子里的主席大概还是那个刘少奇吧！我看你还得靠边站。

总理：你们"红旗"不仅要和陈洪划开，和高参也要划开。有没有这个认识？石祖根同志。

康生：你不说真话，什么工人的态度，什么青年团员！

总理：你还是头头，起码的真话都没有嘛！

康生：我们可以不相信你。这是无产阶级的态度、共产党员的态度、青年团员的态度吗？！在中央面前，在毛主席身边能允许这种态度吗？

江青：他的出身还是城市贫民，读了初中二年级。那么你的家庭一定有个职业了？

（石祖根：我父亲原在武钢当工人，已死。×××：他还是复员军人呢！）

总理：哪年参军，什么时候复员的？（石祖根：一九六零年参军，一九六六年转业的。）

总理：什么部队？（石祖根：××工程兵独立团。）

总理：你是解放军，为什么不说真话？

江青：你们开会，照相机还是你拿的，你像工人吗？我看你像个少爷。你脑中有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石祖根：没有。）

江青：那你应该怎么办？（石祖根：好好检讨。）

总理：到外面打、砸、抢，你是否指挥了一部分？（石祖根：我从来没有指挥过。）

康生：我看你像。

总理：说真话，是否指挥过你这派的？（×××：他是负责武卫连的，他没有出去过。）

总理：那么文明呀？

江青：你身上有没有毛主席语录？你读了没有？你配不配做工人阶级？要不要做工人阶级一分子？你脑子里有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观点？你大概自己想串连搞一个什么党吧！（石祖根：没有这个想法。）

总理：你们签订协议是真的，还是应付"八一五"会议？（石祖根：是签了，但思想上还有些想不通。）

总理：想不通，就是不想和对方联合，就是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因为军区、革委会没有对这个组织表态是什么性质。）

总理：性质是可以转化的，你扣人家工资，打人家，不可以转化？

江青：你们矛头不对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对着国民党残渣余孽，而是对着工人阶级，对着自己一个阶级的兄弟，这是什么错误？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还在抵触！什么叫抵触？当面抵触，背后乱搞。你们如果还能够做真正被称得起工人阶级的话，你们就应该把你们背后的黑手抓出来，把你们自己组织的黑手抓出来。把你们的黑手都抓出来，两派就大联合了。联合以后再抓。要不要这样？（众答：要。）

总理：你们"红旗"派站起来，看你们是否有这个决心。江青同志这样要求你们，你们应该接受。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去做，这是对你们的起码要求。要和坏人划清界限。

江青："七•三"、"七•二四"布告把问题都说清楚了。

总理：你们在方向上犯了错误，不要再滑下去。刚才江青同志告诉你们要和那派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江青：你们不这样做，两派群众都遭殃，破坏国家财产。

总理："红旗"问题，你们响应江青同志号召吧？（众答：赞成。）

江青：今天晚上不睡觉，回去也要谈一下。

总理：解放军同志要做工作。今晚按江青同志讲的，不睡觉，连夜谈起来。

江青：要撤销包围。扣的工资要照补。捉的人，双方都要放了。能不能照办？你们能不能代表你们那派？（众答：能。）

总理、江青：你们头头互相拉拉手，坐到一块去。

江青：郭光昶如果是个高参也是个坏高参。不过我要声明一句：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总理：你们四川动武的作风，在北京就不行，你们回去后要文斗，不要武斗。

江青：还有郭光昶，你如果转过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会给你出路的。你看了九月五号《红旗》杂志编者按了没有？（郭光昶：看了。）

总理：那是毛主席的教导，你要好好想一想。

江青：你不要怕，我们保证你的安全。要给你出路，但是要转过来，要老实，不要做两面派。还有石祖根那个小青年，向我们撒谎，要作自我批评。

总理：石祖根，你要像解放军，应不应该作自我批评？需不需要？

江青：你要不要作自我批评？（石祖根：要。）

江青：好，那你写一个给我们。（沈西林：我补充一下，二五五厂问题不仅有坏人挑动，而且牵涉泸州、宜宾两大派问题。尽管在京签订了协议，如宜宾、泸州问题不解决，则协议是空的，现在厂外有人包围，厂内被赶进来几万人，被称为“老保”。）

总理：（对军队同志）你们打电话问一下。

江青：头脑里要有敌情。

总理：有人在挑。现场就发现了，是陈洪。不要盲目乐观，但问题一定要解决。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任何困难，我们都能克服。

康生：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中央开会，批评的那个人，没有出门就武斗起来了，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泸化兵团”要特别注意，不要翘尾巴，否则要犯错误。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批评这一方面，另一方面就高兴，翘尾巴就犯错误，在毛主席身边，不能搞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泸化兵团”赞成不赞成？（众答：赞成。）

康生：有保证没保证？（众答：有保证，不武斗。）

江青：“红旗”这一方面可不能再挑起武斗，你们这个高参要注意，不要走回头路。（众答：按中央首长指示办。）

江青：你面上没有笑容，在我们面前紧张死了。有什么紧张的。

总理：成都××××厂不谈了，成都厂子两派联合起来的很多，但军事工厂还受其他厂的影响。重庆、泸州。成都，都是军工生产基地。重庆××厂、泸州×××厂、化工三厂、成都××××厂，全国都等待你们，晓得不晓得？（答：晓得）不听你们汇报了，摆在一起谈。

江青：到北京后要把革命搞好，不要游山玩水。

总理：只争朝夕。

江青：两天不睡觉有什么关系？死不了人，要解决问题。

总理：（对成都××××厂）钨丝也是你们那里生产的，全国等待你们，难过不难过。我们钨矿是最丰富的，你们出口钨丝的厂，但是我们现在要进口钨丝，七四五厂同志来了吗？（张元培：七四五厂同志站起来.）

总理：七四五厂同志，你们达成协议了吗？（×××：达成了。）

总理：你们要执行。

总理：现在听一个太原厂汇报，也是药厂，也是两派闹的凶的，一个大联总，一个联合总部。江青同志有别的事，先退，请她讲几句话。

江青：我来迟了一些，有些事情。到这里，对情况不是太熟悉的，我想和同志们讲几句话。

同志们应该配称得起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不应该在工人阶级脸上抹黑，搞武斗。我们坚决反对武斗，但是一定要搞武斗，我也没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武斗就会转化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同志们已经看了，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总理请中央文革的同志们来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我们听了一些。我迟到了，因为我在搞大卖国贼的东西，我搞了五个多小时，铁证如山哪！同志们！刘少奇是个大叛徒，几次叛变，他的所谓叛变是抓进去，这里有很多名堂。在安源他就被捕叛变过。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反革命，是五毒俱全。我这里的材料都是敌伪档案，都是他自己的亲笔。同志们！你们不把仇恨引导到这上头来，引导到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他们在西南的代理人的斗争上面来，只是在那搞武斗，阶级弟兄自己搞自己，这上了敌人的当了！两派背后都有坏人，要自己揪自己内部的坏人。既然搞革命的大联合，就不要像刚才泸州的情况那样，又去开黑会，要光明磊落。你们干的就不是光明磊落的，这个作风不好，这是刘少奇的作风，是特务的作风。

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骨气的，苏修威胁我们，所谓撤退专家，撤退了更好，我们的建设更好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贯主张自力更生，不要觉得我们低人一等，我们要仇恨这些反动的技术权威。上海有一些青年工人，当然也有老工人，他们发明了人工合成蛋白是好多年了，我是这几年才知道的。资产阶级的技术权威说什么，发明权要让外国人搞。我们没有份，后来外国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说中国有发明。同志们！不觉得可耻吗？让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来承认我们的发明？！然后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才承认。我们的青年，我们的老工人，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有很多发明的，就是被刘少奇、邓小平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了你们，压制了你们，应该仇恨他们。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王、关、戚！打倒杨、余、傅！还要打倒谭震林！这个反革命我还保了他了。打倒谭震林！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前年冬天开始，他们就用反动的经济主义来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着他们就用挑起武斗、挑起群众斗群众来破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我想，我九月五日的讲话可能同志们都听到了。但是，现在已经是搞革命的大联合了，搞好革命的三结合了，那就要讲政策。我们要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我今天没带来，也不必再读了，你们自己回去看，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延安的时候就有，就是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里有犯过这样的错误或那样的错误的人，但回过头来了，应该欢迎他们。就是对那些死不悔改的，也给他们出路，我们无产阶级有这样大的气魄。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的小学生，也是革命群众的小学生，也是同志们的小学生。今天你们会议的气氛，现在我觉得好一点了，我刚进来的时候不那么振作，是否大都是技术人员。我很抱歉，我迟到了，我听了两位女同志的发言，还是有一点革命的气魄。

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们，要有革命的气魄，你们读一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一个共产党员的三个条件。

我的话要是讲错了，同志们炮轰我，打倒我，都可以，我的话完了。

（这时江青同志先离开会场，全场热烈鼓掌）

总理：现在我们再听一个太原的，二四五厂首先听一下联合总部的。代表是刘贵臣，来了吗？（答：来了）到前面来。

总理：刘贵臣同志，你们厂停产十个月，现在怎么样？（刘贵臣：我们厂停产的时间比较长，现在全部复工了.）

总理：现在有人要翻案。（刘贵臣：翻案就坚决打倒。）

总理：海燕怎么样了，你回答我。（刘贵臣：海燕是四清下台干部，中央没有批。）

黄永胜：哪一个下台干部中央批了？

总理：下台不一定都批，是借口。（刘贵臣：都批了。）

总理：这话不对头，你保他是不是？（刘贵臣：我支持过他站出来革命。）

总理：他要翻案，你保他对不对？（刘贵臣：我在海燕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

总理：你是否认识了？你讲一讲，要有革命精神，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就值得学习。（刘贵臣：海燕是上级干部，虽然四清处理的，但我感觉这人在历史上大节还好，没有犯过错误。×××：他枪毙过两个贫农，他当县长时，地主叫他是父母官. 刘贵臣：是经过省里批准的。）

总理：你现在怎么看法？（刘贵臣：现在看海燕的确有严重错误，我保他犯了严重错误，对他历史调查不够细致，表了态，没有和大联委同志一起商量核对。他哥哥的特嫌问题，还不能得出结论，没有查证。）

总理：有人说海燕是他家里人。（×××：他哥哥就是海涛。）

总理：你和大联总达成协议，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刘贵臣：通过学习我们应对革委会采取补台办法。）

总理：你们可以巩固加强。生产是否在恢复？（刘贵臣：现全面恢复生产。）

总理：工人同志是否回厂了？（×××：没有打出去过，两派间没有打死人，谁也没有把谁赶跑，最近生产成绩很大。）

总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治安员。）

总理：哪个学校毕业？（×××：北京工业大学毕业。）

总理：大联筹同志讲一讲。（郝辅义：我们达成大联合协议和巩固三结合的协议，我认为协议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顾虑能否贯彻，因为这是第四个协议了。）

总理：不要再去叙述历史了。（郝辅义：我们说一说海燕问题。）

总理：他承认犯了严重错误，也有上边的影响，你不必去挑了。

康生：你们厂的主要问题是你们头头的问题，是科室人员掌握的问题，不只是海燕的问题，工人没有掌权，而是科室人员掌权的问题。

总理：你是哪个学校的？（×××：太原化工学院的。）

康生：就是工人阶级没有翻身，就是让科室人员、知识分子掌握了，工人阶级应该觉悟起来。

总理：现在请老工人同志讲几句。（王玉武：我代表我厂老工人坚决要求中央处理海燕问题。海燕问题把我们厂闹得乌烟瘴气不能生产，他虽然不在我厂，有些人还在保他。）

总理：把保他的那些人调出来，你们两派都反对海燕，是否把海燕调来批斗，不要武斗。你们在这批判他，你们两派赞成吗？刘格平、张日清同志好不好！你们负责把他们调来．又如王治安等人，这你们也没有分歧，意见是一致的，把他们调来。

康生：你们都赞成吗？把海燕调来，有利于你们联合嘛！

总理：好！那就不要说太多了。（王玉武：还有罪行，他生活腐化，强奸幼女……）

康生：你们谈一谈生产吧！恢复生产怎么样？（王玉武：去年十一月以前，我们的生产基本上不错。）

康生：完成了任务没有？完成了多少？（王玉武：我说不清楚。）

康生：你们哪个晓得？（×××：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抓了海燕以后，直到今年五月……）

康生：海燕又把你们弄住了，你们工人就没有一点力量？（×××：有些管道都烂了。）生产被破坏了，你们心里也不痛心？（×××：我们很痛心。）

康生：从什么时候恢复的生产？（×××："八一五"会前几天。上年年总产值只完成了百分之五点几。）

总理：你们两派是否都通了？（×××：我们通了，我们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康生：你们搞来搞去还是个海燕问题，那个问题容易解决，两派都同意了，怎么一个人就把你们的手脚都捆起来了，你们不谈生产问题，停产那么久，不感觉心痛，你们在中央面前怎么交待？你们打内战什么都不顾了。

总理：海燕翻案也是去年二月。（×××：就是二月逆流。）

总理：刚才说了海燕调来你们批斗，他们现在承认错误，同意他来嘛！（×××：他们还在保。）

康生：不对嘛！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既然你们是一直向前看的，你们今后怎么办？到底你们的生产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情况怎么样，怎么一点你们不关心呢？你们为什么不抓革命促生产？把矛头对准谁呢？我看你们脑子里根本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你们山西到底落后到什么时候？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最早，现在你们在全国最落后，停产了十个月，你们心里不痛心！

黄永胜：山西革委会成立最早。

康生：成立最早可是在全国最落后。

陈伯达：山西省革委会成立最早，这是山西省的光荣，但是革委会内部不团结，影响群众的团结。山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好好地检讨，要有高姿态。山西革命委员会应该负责任，要向群众作适当的检讨，应该这样子。我们拥护山西革命委员会的团结，他们自己很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内部的问题总理还知道得多一些。刘格平、张日清同志要有高姿态，在工人阶级面前，在群众面前要有高姿态。两派对这个问题……（没有听清）要团结，不是海燕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山西革命大联合的问题。

总理：你们军管抓生产的是哪一位来了？（张元培：管生产的是赵冠英，本来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后来不知道名字怎样撤销了。）

总理：为什么？我们同意了嘛！

康生：总理都同意了，我们都同意了，你们不赞成赵冠英来，是不是军区不同意，是不是核心小组有人不同意？不管同意不同意要通知他来。是不是核心小组同意了，没有人通知他？

总理：山西国防工业不仅在太原，还有长治等地，你们把海燕弄来大家批判，但是不准武斗。气当然对，但还要想着敌人，海燕还不是主要敌人。（××：就是这个大坏蛋的关系。）

总理：你们没有一点自我批评，有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们不要光责备人家，你们厂不要问题只纠缠在海燕一个人身上。一定要放眼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按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办事，你们说对不对，（众答：对）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众答：有。×××：张政委你要……）

总理：伯达同志已经讲了嘛，核心小组同志到你们那里讲讲话嘛！（×××：海燕在四清中已经斗臭了，但省委认为他大节还是好的，只是生活上有错误，他和陶鲁笳、卫桓有过斗争，和厂走资派作过斗争，所以海燕又进了厂。）

总理：这个问题可以结束了吧，大家承认海燕不好要批判，这不是海燕一个人的问题，还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立那么严重，因为他一个人把生产停下来，你们不痛心吗？赵冠英同志要马上参加会议，把山西国防工业好好抓起来。今天十七号了，请山西革委会核心小组，把你们十六个厂组织起来，讲几句话，你们要高姿态，他们就放心了嘛！山西的国防工业、冶金工业搞得不少，可冶金工业搞好大联合了，现在再推动一下国防工业，你们再走也放心啦，好不好，有没有信心。（众答：有）

总理：我知道长治问题严重，我刚才讲了，合起来开嘛！讲一次话。推动一下。四川搞得很差，还有陕西、湖北，也是闹人的问题，武昌造船厂的头头来了吗？（×××：建议太重要解决一下，联合都没有解厌。）

总理：要你们推动啊！还要我推动？（×××：推不动了。）

总理：就这么落后呀！那么一道讲。

康生：我讲了山西问题你们两派要作自我批评，生产问题不能都推到海燕身上，海燕是一个四清下台的干部，把五千多人的厂搞得你们不能生产。他那样厉害？我们应当讲公道话，不能完全责备你们，主要还在上层领导，核心小组不团结，影响了你们，不是什么海燕问题，海燕问题那么难解决？不是的，你们自己也知道，伯达同志一针见血的点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核心小组应当采取高姿态，应该作自我批评。然后工人作自我批评，这样才公平，嘛！

陈伯达：要向两派革命群众作自我批评。

康生：要向核心小组作自我批评。问题不完全由你们负责，很多同志讲了，对海燕问题没有什么分歧，到底分歧在

哪里？海燕第二次赶走了以后才停产的，同志们脑子只算一笔账，没有向前看，我们是否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们想了没有？赵冠英的问题，同意了，不通知这是什么道理，你们有责任，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促进核心小组的团结，同时，他们的团结来推动你们，问题的关键在这里，快两年了，山西的工业搞得这么样？还不自愧？还不作自我批评，怎么对得起毛主席！你们拿什么东西去见毛主席。中央决定今年国庆节，要派工人代表来参加，有四个条件。

总理：第一，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厂、矿的产业工人，第二，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不清理不行，因为坏人还在一起，怎么来观礼？第三，抓革命促生产有成绩的，十个月不生产怎么说是有成绩？第四，已经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学校去的。你们看。只有实行了三结合，清理了阶级队伍，抓革命促生产好的单位才能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你们有几个厂够条件？四个条件差一个也不行。这次来是来产业工人，不能是服务性的行业来。看来煤矿可能来的多一点。

康生：核心小组同志想一想！××军的同志想一想，中央很关心山西的问题，是老根据地了，看你们能否派出来。但必须要够四个条件，你们来了我们要审查。通知收到了没有？你们一点也不发急？还是天天海燕，你揪一辈子海燕，代表也是派不出来。

总理：海燕、王治安可以调来批判嘛！重型机器厂你们革命委员会既然军管了，就要从军管入手，还是要推动两大派，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

么几个阶段。"有些单位要重新作起，过去革委会是一派，另一派不同意，现在军管了，要重新作起。

康生：不仅山西，四川同志也要考虑考虑，西安的同志也要考虑考虑，武汉的同志也要考虑考虑，云南的同志也要考虑考虑，你们有没有资格派人来。（×××：重型厂有个问题必须中央解决，过去中央处理过，就是工资问题。）

总理：具体问题今天不谈了。

康生：我问你生产怎么样？（×××：从昨天起恢复生产了。）

康生：不生产，拿工资，你红脸不红脸？

总理：你们临时强迫我们解决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因为情况不明。

康生：你们说罗枫奇有没有问题？（×××：我们调查历史上没问题。）

康生：我们也调查了。（×××：我们相信中央。）

康生：那就对了，相信中央就好嘛！

康生：你们不是工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挂帅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反不反对多中心论的问题，你们那里也是这个问题，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总理：山西问题已经谈得这么久了，办法也谈了，整个十六个厂，请张元培同志组织一下，下午由核心小组的两位主要负责同志去讲讲话，把赵冠英也请他到会，他就在北京。开了会以后，你们就分头来推动，我不相信不能解决，伯达同志点了，核心小组要高姿态，有些责任他们承担起来，减轻你们不必要的责任。如赵冠英同志到现在未来开会，连我们都要负些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检查。上边多负责任。底下就少负些责任。主要强调要毛泽东思想挂帅，

把派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反动的多中心论打掉，真正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有一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司令部，就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康生：两派联合起来，把自己方面的坏人揪出来，两派联合起来，共同揪出来，你们讲的阎锡山，你们那里还有几个坏人为什么不揪？天天叫海燕，放着敌人在那里不管，你们那里没有革命没有生产，有的是资产阶级派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总理：武汉造船厂胡厚民同志没有来？请他来。孔庆德同志：你把他调来，中央碰头会请他来，如不行，把朱鸿霞请来，他是副主任。请他一道和同志们作工作。武汉的工厂再不恢复太不像话了嘛！

七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批的上海第一机床厂，他讲的很生动，有脑子，听起来就不同。上海工人阶级，在一月风暴首创夺了走资派的权、这是先进的工人阶级。东北黑龙江，开始受宗派主义的干扰。开始点革命之火时学生点火是好的，起了开路的作用。但是主力军还是工人阶级。毛主席在七、八、九三个月连续发出了五、六个指示，你们要好好学习，工人阶级是主力军，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把斗、批、改搞得越彻底越好。现在我们面临着斗、批、改的新高潮，全国已经实现一片红，进一步就是斗、批、改了。各单位无论是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都要进行。将来还有人民公社。这就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在农村中有贫下中农的配合，工人阶级的责任比第一个年头第二个年头更加重大了。国防工业都是产业工人，但从工业战线比较起来，国防工业比轻工业落后，比其他重工业，如煤炭、交通也落后，我们怎么好过呀！在座的同志们要想一想，国防工业吸收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和中等知识分子到工厂来，他们在工厂中有好的作用，如果和产业工入结台在一起，向产业工人学习，他可以作出像第一机床厂的成绩。如果留在科室学习不结合，言行不一致就作不出成绩。这次造反他们带头开始起了积极作用，但形势发展了，前进了，他们和社会上两大派联合起来了，四川就表现的这样，不管“反到底”，不管是“8·15”，不管“泸化兵团”，都有知识分子。成都也有这个典型，太原也是这种情形，武汉、西安还没有谈，恐怕也是这种情形。还有昆明都是这种情形。兵工基地东北改变了，上海就好，北京也有些改变，天津也好一些，你们大家想一想，国防工业战线上的工人阶级，你们不仅要抓革命、促生产，还要促战备，你们直接为战备服务，还有援外任务。

康生：还要援外嘛！世界革命那样发展，你们那样落后。

总理：我们要经常向人家作自我批评，我回头就要见一位外国朋友，我要告诉他，对革命的朋友要讲真话，我们全国已经实现一片红了，而生产不如一九六六年，要说明这个道理。明年一定会好起来，我们有信心，你们有没有信心？（众答：有）这还像样子。刚才有的同志，劲儿就是不够，第四季度生产一定会上去。

康生：我们要将你们的军，我要领外宾到你们厂里去看看，看看你们革命的情况到底怎样？

总理：不要只给人家好的看，刚才讲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关键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太多了。今天还没有接触七机部，现在他们好了一点。怎么好的？就是工人阶级开进去了，现在也联合起来了。不开进去还是要打内战。七机部六、七万人，知识分子占了一半，就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了，没有和工农兵相结合。你们是学兵工的，待遇已经够高的了嘛！还不好好干！还搞宗派主义，还搞小资产阶级的风头主义！这是不对的。差不多八、九个学校是为兵工服务的，现在有的分下去了，六八年要分下去，六九年还要分下去。要他们好好地劳动，要听老工人的话。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多少代的，我们的新工人也多。我们的产业工人有一千多万，加上交通运输工人算起来就有两千多万人。这么大的数目，国防工业应该当先，可是现在是落后了。

我们希望你们这次会议开好，你们到二十五日就要让地方了，要让给国庆观礼的代表来住，要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住。你们不走不行，不走，我们就要送客了。你们回去要好好地搞抓革命促生产嘛！你们来，就是来开这个会嘛！

你们要把主席的指示学好，要把老三篇、老五篇学习好，特别是最近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中旬以来，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主席思想。你们一定要把国防工业赶上去，我们耽误了两年了，第四季度必须往上升，明年一定要有跃进的局面。你们自己要好好想一想有没有这个信心，（众答：有）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魄。你们不是像我们这样年老了，我和康老现在都七十岁了，我们还是向主席学习，你们就那么正确？你们对毛主席指示要认真学习、认真贯彻。你们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这是主席讲了的嘛！

希望你们这次会开了以后，再来北京要带来新的气象。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肃清，取得新的成绩。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今后要成为一个战斗的生产组织。让这样的代表到北京来，好不好？（众答：好）

好，散会。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及两个附件

1970.02.05；中发 ［1970］ 6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军管会、军代表：

现将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发给你们。

当前全国军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正在积极进行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战争挑衅。可是，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严重地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前的战备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央认为，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歪风；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

中央重申：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

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目前正在施工的，责成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重新审查，酌情处理。

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

四、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

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严禁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

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

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和财务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加强财务监督。必须切实实行群众性监督。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伟大教导，结合当前的斗、批、改，开展革命大批判，厉行增产节约，坚决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现象。

各级领导接到本通知，应立即进行传达，认真检查处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附件一：

有些单位存在着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

最近，有些群众来信反映，有些单位不顾大局，搞铺张浪费，影响很坏。现摘登如下：

西安市在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

西安市今年以来修建的百货大楼、旅馆、饭店、电影院、住宅、办公大楼等，据不完全统计有六十处，建筑面积约十余万平方米，投资约一千五百多万元。有的建成后已开门营业，有的正在昼夜施工，有的正在拆迁民房，筹备新建。这些建筑，工程浩大，地点集中，仅东大街和西大街即建起三层以上大楼二十余座，钟楼一带盖起大楼五、六座，光修建延安路百货商场即花了近四十万元。

西安市革委会办公驻地内，原旧市委一砖到顶的二十余间平房被拆掉，现已建成新的三层办公大楼， 投资约十万元。

用大少爷作风办"五•七"干校

河北省革委会在宁晋县大曹庄筹建一所"五•七"干校。在建校过程中，负责建校的同志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搞铺张浪费。

建校规模庞大。今年已修建了一千一百多间校舍，明年计划再建两千五百间左右。该校用于建房、运输、雇木、瓦工，共花了一百二十多万元。建校舍求大、求好。新建的宿舍全是砖瓦房，白灰墙。有六百乡间房屋已打水泥地面。新盖的饭厅兼礼堂浪费极大。

他们把原省直机关的家俱，不管适用的不适用的全部拉来，其中包括沙发、地毯、弹簧床等，共装了五十九节火车

皮。学员们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从城市到城市，从机关到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利于干部思想革命化。

用钢铁筑成的四个掩蔽部

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供应处修复总站，职工不到三百人，为了防原子弹，修筑了四个大掩蔽部，用了废旧钢材六十八吨，其中有些是好钢材。这四个掩蔽部，职工利用晚上加班和一部分工作时间，花了一个多月才建成。还集中了十几台电焊、气焊，焊接钢梁骨架。工人们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来信人也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的，是害了一种原子弹恐吓病的表现。

四川有些单位挥霍浪费成风

江北县和荣昌县很多基层单位借成立革命委员会之机，讲阔气，摆排场，大摆筵席，大吃大喝，造成很坏的影响。例如江北县静观区五个商业单位办了一百七十桌酒席，上水镇五个商业单位设宴三天，办酒席二百六十四桌。九龙公社和十个大队联合举办酒席一百二十九桌。该公社的新民大队为庆祝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还单独办酒席三十九桌。荣昌县多数基层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都摆筵席二、三十桌到一百几十桌。如该县搬运公司竟办了酒席二百九十四桌。联升公社一大队办酒席一百七十三桌。宜宾地区东风矿区、宜宾纸厂在成立革委会时，铺张浪费比上述单位更为严重。

乐山地区革委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乐山的七八六一部队与西藏的零零四四部队换防时，大摆筵席迎送，地区革委会一些负责同志还带剧团到各县慰问演出。为了设宴欢送七八六一部队，事先派人选购特产和高级烟茶。宴会当天，各县革委会成员都出席相陪，从下午二时一直吃到晚上七点多。零零四四部队来乐山，也同样大摆筵席欢迎。这次欢迎、欢送活动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到十一月底止。地方上大办酒席，招待看戏，共花了一万二千六百元。七八六一部队除各团分别举行告别会外，师部在乐山举行了三次告别会，办酒席几十桌。结果，上行下效，该地区不少有支左人员的基层单位都设宴欢送。如乐山地区运输公司只有一个军代表，就办了五桌酒席欢送。

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

附件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

中 央：

我们接到中央办公厅“要彻查”柳州新建房屋的电话后，及时召开碰头会进行讨论，除决定派专人去柳州进行全面检查外，还将“要彻查”的电话通报全区，进行普遍检查。

经检查，柳州市近年来确实修建楼房七十多座。这些建筑多是六七年以来历年计划修建的工程。其中百分之九十（包括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对被破坏的房屋）是为恢复生产、安排人民生活需要修建的厂房、商店、校舍和民宅等。但也确有少数单位滥用职权，挪用生产资金，挥霍国家资财，修盖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柳州电机厂把自治区拨作该厂恢复生产资金三十一万元的百分之八十八，用于修建礼堂、厨房和宿舍。柳州铁路分局贪大求洋，将原车站站房推倒重建，并扩大建筑面积三倍多，为装饰门面，还派专人到上海购买五个大吊灯。致超过原计划三十余万元。柳州农械厂挪用生产资金七万三千元修建礼堂。市工人俱乐部乘修缮礼堂之机进行扩建，花了八万多元。

问题的发生，是一些领导成员沾染了地主资产阶级作风，摆阔气，讲排场，任意挥霍，违法乱纪。柳州电机厂革委会主任阎洪明，对生产上急需修建的车间、仓库不优先安排施工，却假借修建“厨房”、“食堂”为名上报预算，欺骗领导，兴建礼堂。柳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林乐伦，在负责扩建站房工程中贪大求洋，力主推倒全部站房重建，在施工中，以向二十周年国庆献礼为名，要承建单位停止整党建党，突击施工，加大混凝土标号，增加模板等，多用

了水泥五百吨，木材四百立方。局领导上虽事先发现，但不作纠正，迁就默认。柳州农械厂革委会主任束宽昌，对某些领导成员提出挪用生产资金修建礼堂的错误主张，明知不对，也不坚持原则。柳州市革委会缺乏全局观念，在战备形势下，对该市修建工程，不认真审查，从严控制，还支持了市工人俱乐部扩建礼堂的错误。

上述问题虽属少数单位，但性质是严重的。初步了解，其他一些地区一些单位也有类似现象。问题发生在下面，严重的责任在领导。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勤俭建国"，"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宣传贯彻落实不够，对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抓得不力，看不清在大好形势下掩盖着的另一倾向。加之工作上官僚主义，对下面教育，督促检查不够，见事迟，抓得不力。

为了进一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教导，我们拟将柳州市一些单位修盖楼、堂、馆、所的严重错误，通报全区，立即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狠批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坏作风。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

作者：何 蜀 编撰

1966 年

7 月 1 日

本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点名批判中宣部负责人周扬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曾在 30 年代"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写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不久穆欣本人也遭到打击迫害）。此文由新华社发给全国各地党报转载。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委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不经任何组织手续，而对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任白戈公开点名批判。在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震动。

7 月 8 日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赶到重庆，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市委会议，传达由陶铸通报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 30 年代的问题，60 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并要求把这个意见用座谈会的方式传达到 17 级以上的干部中去。随即，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

7 月 29 日　中共重庆市委驻重庆大学工作组召开有专案人员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当面揭发批判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工作组长、副市长兼市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余跃泽宣布郑思群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里通苏修"等四大罪状。宣布对郑进行"监护"，

8 月 2 日　郑思群自 6 月 21 日被市委工作组定性为“黑帮”，被市委宣布“停职检查”并在 22 日《重庆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后，对强加的罪名不能接受，不堪迫害，于凌晨以刮胡刀片割断颈动脉自杀身亡，终年 55 岁。

8 月 3 日　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精神和毛泽东有关撤销工作组的指示、刘少奇关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讲话。重庆大学每班选派三人参加。大会未完，重大学生就已闻讯在校内写出大标语“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当晚出现《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一封信》等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死亡事件的大字报，对市委工作组表示了公开抗议。

8 月 4 日　中共重庆市委驻重庆大学工作组晚上召开全校大会，市委书记鲁大东代表市委宣布永远开除郑思群党籍。会后所有学生被带回各自班级强行表态。同时连夜组织“左派”写拥护市委决定的大字报。

8 月 5 日　市委工作组奉命撤离重庆大学，遭到部分师生员工自发拦阻，要求澄清郑校长死亡事件，作出检查。工作组被迫暂留学校，直到作了检查才得以离去。

8 月 8 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称《十六条》），在第六条中特别提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同时在第四条中却又说：“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8 月 13 日　重庆大学学生周孜仁起草的号召向市委造反的大字报《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得到全校数千人签名响应。数千师生集合前往附近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串连，受到冷遇。下午在校文工团戏剧队房间里由吴庆举主持召开了总结会，各系派代表参加。到会的校体育队周家喻、冶金系熊代富、查正礼、电机系黄顺义等后来成为八一五战斗团的主要领袖人物。

8 月 15 日　因对工作组评价上的分歧，重庆师范专科学校（今重庆师范大学）学生出现两派对立，反工作组一派处于劣势，其“轻骑”、“排炮”两个小组派出代表向反工作组观点已占大多数的重庆大学师生求援，重大数千师生应邀前往声援，与师专保工作组一派展开辩论，附近的师专附中（今市第八中学）学生及一些工人、机关干部、居民也带着不同观点前往该校加入辩论，双方争执不下，前去处理问题的市委领导被纠缠多时难以脱身。形成重庆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性大辩论及造反派师生与市委领导当面争执局面。事后，重庆造反派将此日视为造反开始纪念日，造反派亦被称作八一五派。

8 月 22 日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热情赞扬、大力支持的北京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影响下，重庆由党政领导部署组建的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教职工组织赤卫军等从本日起陆续上街“破四旧”，并在市委统一布置和公安机关配合下对一些“专政”对象进行查抄。大量采用抄家、封门、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体罚、殴打、砸毁文物古迹等武斗手段。著名民主人士鲜英（抗战时期曾给予中共大力支持的“民主之家”特园的主人，1957 年被打成“右派”）被市委内定为重点抄家对象之首，由市公安局和重庆大学赤卫军组成抄家队进驻，在特园内挖地 1 尺进行全面查抄，特园内曾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袖的大客厅中的珍贵历史文物《签名轴》（上有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纪念性签名）从此失去下落。据不完全统计，主城区市中区由区委组织对统战人士、工商业者、“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及“有海外关系”者 6407 户进行了抄家，抄走各种财物估价 396 万元；江北区由区委指名查抄 1445 户，抄收 944 户物资（折价 27 万余元）；北碚区由市委社教分团和区委组织对“五类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1240 户进行了抄家，抄走各种财物估价 43.

956 万元。南岸区抄家千余户。沙坪坝区查抄住宅 1000 余家。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全市共有 13160 户“牛鬼蛇神”被抄家。

△市委晚上秘密发出四条指示：1、不准到市委门口参加（跟学生的）辩论；2、不准到市委门口写反击（学生的）大字报，如果对市委有意见，也不要贴大字报，可以由工作队转；3、不准职工去看大字报；4、不准家属子女去看

大字报。同时警告：若有违反者，党员开除党籍，团员开除团籍，干部受处分。

8 月 23 日　市委派至北碚区的社教分团文教工作队发出《关于缙云山风景区和北泉公园文物古迹清理情况的报告》，提出缙云山和北泉公园等寺庙的大小泥塑神像均应彻底捣毁。官方组建的红卫兵按此精神在全区砸毁神像 2000 多个。

8 月 24 日　重庆各大专院校统一成立了“红五类”学生和教职工中的党、团员骨干为主的赤卫军。

△重庆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

△十几所大、中学校的造反派学生到六中召开革命串连大会。经大会主席团多次“邀请”，市委派书记处候补书记丁长河在大会快结束时到会，但不表态。会后，全体与会者到市内游行并散发传单。

△李井泉到重庆。当晚接见重庆大学文革筹委会全体委员时说：你们都是八一五派，你们去声援师专、建院的革命行动，就像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样。刘文珍、鲁大东陪同接见。

8 月 25 日　重庆市委召开各大专院校文革筹委会代表和学生代表“炮轰市委”会议，列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西南局文革小组组长刘文珍代表西南局讲话，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

△重庆大学赤卫军召开批斗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时泽、校团委书记刘稚民的大会，会后宣布将二人交机械厂群众“监督劳动”并责令检查。

8 月 26 日　重庆大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八一五战斗团冒雨举行成立大会。

△重庆及外地赴渝学生 1 万多人以本日《重庆日报》一通栏标题底纹下暗藏有“北京大红尸”字样的“反动标语”问题而围攻、冲击报社，并将总编辑袁明阮揪出戴高帽子游街、批斗至次日。

△重庆市南岸区一批高中学生到老君洞、真武山等道教、佛教名胜地“破四旧”，真武山住持和尚因被搜出练功刀剑而被认定有“变天复辟”阴谋而当作“反革命”扭送公安局。随后一些学生又到市内著名佛教名胜罗汉寺“破四旧”，五百阿罗汉塑像全被砸毁。

8 月 27 日　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讲话，宣布罢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的官。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代表市委作检讨。

△下午，重庆市赤卫军在市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

8 月 28 日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部分学生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因写出的“集中火力炮轰市委”大字报被当地正在集中学习的民办教师以“毛主席万岁”标语覆盖而发生冲突。此事被市、区党政领导支持下反对造反的一派干部、群众夸张宣传为所谓“八二八惨案”，八一五派学生被宣传为“暴徒”、“反革命”。随后，市内许多地方出现对八一五派学生和赞同八一五派观点的群众围攻、揪斗、游街、强迫请罪等现象，群众对立情绪加剧，武斗现象多有发生。

8 月 31 日　在到重庆蹲点的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大力促成下，重庆五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在重庆七中召开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中学生红卫兵总部。

△市学联和市委文革办公室串连组织23个学校的人员在重庆医学院会议室成立了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站。

△西南师范学院造反派学生与红旗战斗团发生激烈冲突，时称“八三一”事件。

8 月　两路口税务所罗光远等成立“红色警卫队”，后发展成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

9 月 1 日　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和市委领导到会祝贺。

9 月 1 日至 3 日　南岸区数千群众在市 39 中学广场与主张“炮轰区委”的少数派师生、群众“辩论”。每天都有数千人停工、停产、停课到区委阻止“炮轰”派进入区委机关。

9 月 2 日　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开会商定：重庆师专党委书记要撤职，市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要在 3 日大会上作检查。通知各学校派代表参加。市委书记辛易之要到会检查“八一五”那天压制群众的错误。

9 月 3 日　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市委派来了乐队和记者。同时，由市委提议，经请示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奉命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并派来了 10 个解放军“联络员”。

△重庆大学赤卫军将已调离重大的前党委副书记宋殿宾及其妻张道臻抓回学校，挂黑牌，戴高帽，在风雨球场批斗，并把邓时泽（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正荣（无线电系党总支副书记）、贺学洪（冶金系党总支副书记）、王德伦（教务处副处长）等抓到会场陪斗。首开丑化、武斗领导干部的先例。

△重庆市委晚上在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召开十二所大专院校代表会议，辛易之代表市委就“八一五事件”作检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近千人到会“造反”，控诉在南岸等地继续发生围斗八一五派学生事件，要求市委立即出面解围，并公开登报、广播承认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组织。两派师生发生冲突。李井泉通过专线电话听取汇报，一面通知派人到南岸区解围，一面要市委书记鲁大东“顶住”，不答应八一五其他要求。

△得到党政领导支持的一些干部、群众晚上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八二八惨案受害者控诉大会”，斗争“八一五”派学生。

△西南师范学院造反派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成立。

9 月 4 日　重庆市委文革办公室发出秘密通知，要求各单位制止打人、戴高帽、日夜不停扭住辩论等情况。

△重大、师专等校八一五派师生在师专宣布绝食，要求市委停止组织群众围攻八一五派师生。

9 月 5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按照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部署，为了保卫党委、对抗造反派而建立的群众组织工人纠察队，在首家试点单位中梁山煤矿宣告成立，发出铅印《宣言》传单。随后，全市纷纷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

△重大、师专等校八一五派师生千余人在绝食 10 小时得不到市委答复后于凌晨步行前往市郊茄子溪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搭乘上京“告状”。当晚 7 时搭上增派列车赴京，在 9 月 15 日毛泽东第三次检阅“百万革命小将”中得到“接见”。

△因重庆大学一学生 9 月 2 日在南岸区辩论中遭到群众围攻，首都南下红卫兵在南岸区市 39 中学广场召开大会批斗区委领导人，副市长段大明被通知到会陪斗。

9 月 6 日　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 500 余人由书记、矿长带队，乘 11 辆卡车到市区游行示威。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干警大会，副院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邢华民宣布成立“红卫兵”，分发袖章。

△全国四十几所大专院校赴渝师生组成“八二八”事件联合调查团。

9 月 7 日　为免“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之嫌，重庆市委下令撤销设于江北区下横街小学的“八二八惨案展览”。

△李井泉在重庆召开学生座谈会，提出要把八一五战斗团和赤卫军中的红五类分出来组织统一的红卫兵，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织起来，就可以在十天半月内取得优势，压倒八一五战斗团。会后，李井泉指示重庆市委，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工人学生要进行阶级回忆对比教育。

△李井泉在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重庆市 50 多家大型工厂党委书记会议，布置组织工人纠察队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外地赴渝师生在体育场召开“八二八”事件真相辩论会，邀请曾发出传单“控诉八二八惨案”的有关单位参加，但这些单位均未到会。

9 月 8 日　在市委授意下，由市学联出面串联，选拔“红五类”子女组建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五十四军司令员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奉命担任“辅导员”，并派来解放军联络员 10 人。随后，市委号召各单位发动“红五类家长”踊跃“送子参军”（即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重庆日报》进行大肆炒作，全市掀起“送子参军”热潮。

△重庆钢铁公司一批造反派工人群众集中到公司办公楼外抗议保守派造谣宣传“八二八惨案”诬蔑重大八一五，揭穿“八二八”事件真相，遭到保守派围攻。事后不久，重钢造反派组成重庆九八战斗团。

9 月 9 日　《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以套红通栏标题显著报道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成立消息，发表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致敬电》，并配发社论《向英雄的红卫兵致敬》，称“这是我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件大喜事”。还派出记者前往设于红岭公园（即鹅岭公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采访老工人“送子参军”消息。

△重庆钢铁公司一批造反派工人乘十辆卡车从上清寺到朝天门沿途高呼“八一五好得很”，反击“八二八”后对重大八一五的造谣攻击。

9 月 10 日　《重庆日报》头版报道老工人陈荣森、老贫农简阳卿等 36 人向全市红五类家长发出倡议《立即掀起一个鼓励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热潮》。并报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举行接受新战士入伍大会。

△重庆市第六中学造反派师生在体育场召开各界群众声讨市委大会。

9 月 11 日　《重庆日报》报道《广大红五类家长满怀革命豪情争送子女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李井泉电话指示重庆市委：要拼命发展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开誓师大会，授旗、登报。市学联主席莫泽礼和市委文革办公室主任李友当晚向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传达。

△外地赴渝师生“八二八”事件调查团在江北下横街街道办事处门前举行调查汇报会，揭露所谓“八二八惨案”真相。

9 月 12 日　《重庆日报》报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迅速发展壮大/广大红五类子女积极要求参加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批老工人和贫下中农继续送子女入伍》。

△市委通知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赶制 200 面红绸队旗（包括尚未成立组织的学校也安排在内。

9 月 13 日　外地赴渝造反派师生在体育场召开声讨重庆市委大会。

9 月 14 日　按市委安排，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召开誓师大会。五十四军"辅导员"韦统泰、染大门，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和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等出席。李长春代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讲话并发布《动员令》。鲁大东代表市委发表热情讲话。

9 月 15 日　《重庆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全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举行誓师大会》，韦统泰（五十四军军长）、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鲁大东（市委领导）等到会讲话表示热烈赞扬和支持。《重庆日报》配发社论《热烈欢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长壮大》。

9 月 16 日　市委向刘文珍（在重庆蹲点抓中学生红卫兵组建工作）报告了中学生红卫兵与重大八一五关系密切的情况，刘文珍决定断绝对中学生红卫兵的物质供应，撤出市委联络员。

9 月 18 日　市经委按照市委工交政治部指示，连夜派出工作组到几个工厂去"制止造反军开大会"，但去后未发现造反军开会。说明工人造反军已于 9 月中下旬开始零星出现。

9 月 20 日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按市委授意将日益倾向八一五派观点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强行合并，统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此后被群众讥称为"思想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人员强行进入设于文化宫内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封锁大门，切断电话线，抢占大楼。

9 月 21 日　《重庆日报》按照市委指示刊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中学生红卫兵"合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消息，并宣布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撤销。拒绝合并的中学生红卫兵在第四十一中（今巴蜀中学）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来自 103 个学校的代表一致抗议市委授意下将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的作法，选出了新的临时主席团。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筹备成立。

9 月 24 日　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 8000 多人在市人民大礼堂集会，抗议其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强行合并，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向市委提出八项要求。僵持至 27 日凌晨，数千中学生出发宣称"步行上京告状"。市委派出大批汽车、组织各校教师及家长到沿途学生逗留的茄子溪、江津、永川火车站劝阻、拉回部分学生，但仍有 1500 余名学生在永川乘上火车，于 10 月 6 日到京。

9 月 25 日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纠察总队成立。次日《重庆日报》报道。

△外地来渝师生在体育场召开全国革命串连大会，八一五派学生和工人作了控诉发言。会后游行。

9 月 29 日　造反派的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后更名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市体育场宣告成立，会后游行。

9 月　"破四旧"之风蔓延各区县，许多文庙、牌坊、教堂及名胜古迹等被砸毁。一些区、县委布置将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商界中"政治摸底排队"划分的"三、四类分子"送往农村劳改。

△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与刘德彬，同文联司机、炊事员、勤杂工等组成红卫兵战

斗组。

10 月初　在重庆大学新大楼筹建了工人造反军、财贸工人造反团（负责人大渡口肉联厂李加贵）等组织。财贸工人造反团后改为重庆市革命职工造反团。

10 月 6 日　罗广斌、杨益言给市委书记处写报告，称重庆市文联“问题不少，性质严重。所办《奔腾》双周刊，据前三十期的粗略统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约占 40%，这不是小问题，有关领导干部是有严重责任的”，并称自己因积极与文联领导王觉等人斗争，长期受到压制，提出：“到底是机关领导？是工作组？还是工作组之上的领导同志对我们采取了错误的对待？总之，领导上怀疑我们，工人同志相信我们，群众靠拢我们，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到底算反革命的右派？还是算革命的左派？”

10 月 7 日　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编印上报市委、市文革办公室的《情况反映》第 73 期载《关于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况反映》中称：“最近几天，我们对‘革命工人造反军’的情况作了进一步了解。据工交口五十七个单位初步掌握，参加‘革命工人造反军’的约有 1279 人，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现已退出这个组织的有 805 人。”

10 月 9 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召开会议，宣布撤出解放军辅导员，会上，负责人之一孟军发言指出市委犯了路线错误，也批评了解放军辅导员对红卫兵总部有包办代替的问题等。

10 月上旬　合川红卫兵“破四旧”中，著名古迹钓鱼城庙宇部分被毁，千佛岩石刻被砸。

10 月 11 日　重庆市公安局根据四川省公安厅指示精神，报经市委同意，在省二监狱组建了一个“保护统战对象免受红卫兵冲击”的学习集训队（“一月夺权”后集训对象由各单位造反派接回）。

10 月 17 日　《重庆日报》以“本市赴京进行革命串连的红卫兵、革命学生畅谈在天安门城楼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的体会和收获”为题，发表一组文章，其中包括赤卫军染经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李长春、重大八一五周家喻等。

10 月 19 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上午对学校广播站、印刷厂、电话总机等要害部门实行夺权，并到校长室夺走校印，在夺权过程中对不服从者进行殴打。

10 月 23 日　罗广斌、杨益言写出大字报《致重庆市文联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信》，公开造反立场。

△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红卫兵驻京联络站打电话回重庆，反映“思想兵”总部政委刘桂兰、副政委孟军在北京与北航红旗和重大八一五打得火热，听说要组织红色造反团造总部的反。“思想兵”总部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做稳定军心工作。

10 月 25 日　重庆工人造反军筹建总部。

△重庆市文联由罗广斌、杨益言主持进行所谓“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提出候选人 11 人，被剥夺选举权 8 人（“黑帮”邓均吾、王觉；“黑帮爪牙”中层干部向晓、马融、张继楼，《重庆日报》揭发出来的副刊“黑编辑”杨世元；“摘帽右派”李南力、温田丰），选出郭清（炊事员）、尤淑芳（临时勤杂工）、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五人为文革筹备小组成员，组长郭清，实际由罗广斌、杨益言控制。完成了文联的造反派夺权。次日起文联文革小组正式行使领导文联机关文革运动等权力。

10 月 29 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孟军、刘桂兰从北京串连回来，到五十四军军部找解放军辅导员谈准备向市委造反的想法。梁大门接见时表示不怕他们写大字报。

10 月 31 日　重庆工人造反军等工人造反派在人民大礼堂召开大会，要求市委承认工人造反军为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并拨给办公地点、活动经费，与市委派出人员谈判无结果，随后于次月初发起组成重庆工人北上告状团步行上京告状。

11 月初　重庆工人北上告状团步行至璧山县后，重庆市委派人追上劝其返回未成，市委请重庆驻军派出数十辆汽车将工人送到永川改乘火车上京。

11 月 3 日至 13 日　重庆市委按中央指示召开三级干部会，贯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市委就“方向、路线错误”作出检查并动员各级干部转弯。

11 月 8 日　罗广斌、杨益言晚上将原驻文联工作组组长牛文拉到市中心解放碑“辩论”。

11 月 13 日　重庆工人造反军 300 人在江津小南海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搭乘“上京造状”，致使火车停驶 3 小时。

11 月 20 日　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政委刘桂兰代表她和副政委孟军在造反派集会上作题为《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长篇发言。

11 月 23 日　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校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造反者数千人在西南政法学院举行大会，批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总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省、市委操纵利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具的罪行。成立了造总部反的总联络站。

11 月 25 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内的造反派在解放碑召开大会，揭露其总部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批判省、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重大八一五等下午在解放碑召开“就所谓八二八惨案同西南局、省市委对质辩论”大会。一些所谓“八二八惨案受害者”上台揭发了工作组如何操纵他们诬陷重大八一五的事实真相。

11 月 27 日　全国赴渝师生及重庆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纪念“11·27”殉难烈士大会，罗广斌作报告，并在大会结束时绕场一周招手致意。大会上宣读了罗、杨等起草，文联文革小组刻印的决议：倡议改重庆市为红岩市，改《重庆日报》为《红岩日报》，改“11·27”烈士为“红岩烈士”等。

11 月 28 日　重庆工人纠察队决定更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订于 12 月 4 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海报张贴出后，造反派普遍认为此举系“保皇派”阴谋，决定到会造反。

12 月 1 日　重庆市委在小温泉召开干部会，说明市委已经犯了路线错误，如果再滑下去，就有变成“四类”（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干部的危险。对 12 月 4 日工人战斗军召开的大会，一定要说服他们不开，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

12 月 2 日　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在重钢招待所会见工人战斗军负责人楚光辉等三人，提出：目前少数派（即造反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 12 月 4 日的大会切不要召开。但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表示大会非开不可，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下午，市委电话通知各部委和各区委，一定通知所属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 12 月 4 日的大会。

12 月 4 日　重庆工人战斗军（由工人纠察队更名，一般仍称之为“工纠”）在（大田湾）市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造反派强行冲击会场造反，引起激烈冲突，形成文革中第一次群众性大规模武斗，数百人受伤，并传开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言。此后，

市内到处发生两派群众相互抓“凶手”、砸广播车、抄砸群众组织办公处等武斗事件。武斗升级为两派群众组织间的打、砸、抢、抄、抓。

△重庆造反派建立八一五派临时联合指挥部。

12 月 5 日　重庆及外地赴渝造反派下午在市体育场召开“一二·四惨案控诉大会”，重大八一五代表发言称：“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作家罗广斌在发言中说：“昨天，就在这里牺牲的革命先烈，是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庆市委所屠杀的。”一些造反派“目击者”在发言中对“工纠打死造反派”作了“控诉”。会后，因传闻市委要“转移尸体销毁罪证”，一些造反派组织强行接管了重庆市火葬场，查封了 14 具正待火化的尸体，等候检查。

12 月 6 日　一些造反派组织从重庆市火葬场抢出四具“可疑尸体”，晚上从第一工人医院停尸房抢出当天死于心脏病的学生李天敏的尸体，作为“一二·四”事件尸体运往体育场陈列展出。

12 月 7 日　造反派布置从下午开始在市体育场举办了疑为“一二·四惨案烈士”的尸体展览。将抢来的五具“可疑尸体”陈列供人参观。参观中的一些宣传将五具尸体称为“烈士”。市歌舞团造反派编出了追悼烈士的歌曲《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满街教唱。

12 月 8 日　造反派下午把在体育场展出过的五具尸体强行抬进重庆市委办公厅楼上机要室停放至次日，逼迫市委交出“黑材料”。

12 月 9 日　重大八一五《815 战报》创刊，主要刊登了“一二·四惨案控诉大会”的有关发言和控诉文章，在此前后，控诉“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单、大字报满天飞，极大地激化了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武斗愈演愈烈。

△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参加由首都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去北京向中央告状。罗广斌预支了全体人员的旅费。

12 月 15 日　西师八三一等在“一二·四惨案调查团”召开“炮轰团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会（团部负责人为重大八一五熊代富，首都一司驻渝联络站钟东等）。

12 月 16 日　重庆国防工业系统造反派组织八一兵团在重庆工业学院礼堂成立。

12 月 17 日　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赴京控告团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发言，“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重庆“一二·四惨案”的传闻迅速传遍全国。

12 月中旬末　西师八三一等在“一二·四惨案调查团”召开第二次炮轰团部右倾思潮大会，随后改组团部，重大八一五熊代富等退出，换成西师八三一岳朝亮，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刘连仲，工人周又强等。造反派内部矛盾加剧。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及罗广斌、杨益言等与重大八一五产生意见分歧的造反派以“一二·四联合调查团”驻地为“联络站”经常联络会商，后被重大八一五一派讥称为“廉（黄廉）罗（罗广斌）栈”。

12 月 25 日　重庆及外地来渝造反派召开批判《重庆日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原《重庆日报》编委、报道组组长沈世鸣发言《戳穿重庆市委操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黑幕》；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政委刘桂兰，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及组织部长孟军联名发言，揭发市委操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破坏文革“罪行”。

12 月底　国防工业系统又一造反派组织军工造反兵团成立。

1967 年

1 月 1 日　晚上西南政法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纵队、政法兵团、红教工革命造反纵队等联合召开批判大会，批判重庆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副总指挥沈诚（西南政法学院文革筹副主任、政法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003 团政委）。

1 月 2 日　因得知工人战斗军等将于 4 日在体育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晚上由黄廉主持召开会议，筹备于 4 日针锋相对召开“一二・四”事件一周月纪念大会。重大八一五代表在会上力陈不开这个大会以避免引起群众之间再次流血冲突的观点，辩论至凌晨 2 时，终于同意大会延期举行。

1 月 3 日　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仍然通知于 4 日召开“一二・四”事件一周月纪念大会。重大八一五发表声明拒绝参加。

△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等在校内夺权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

1 月 4 日　西师八三一、工人造反军等“联络站”一派在体育场召开“一二・四惨案一周月纪念大会”。重大八一五等抵制，认为此大会是想要制造新的流血冲突的“左倾冒险主义”行为。

1 月 5 日　杨益言与北大学生侯均初等到大渡口向重钢、十八冶等单位工人造反军分部、“九八”战斗团、红岩兵团等宣传“联络站”观点，遭到拥护重大八一五一派工人的围攻。

1 月 6 日　沙坪坝区造反派与区委机关“七一”战斗队、区人委机关“星星之火”战斗队宣布夺了区委、区人委的权。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26 日改称沙坪坝区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区临委）。

1 月 8 日　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工人战斗军、文艺革命军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

1 月 9 日　中学生红卫兵与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负责人辩论，称文化宫是为劳动人民开办的，不能向劳动人民收门票钱，最后文化宫负责人被迫签字同意自即日起废除门票制度，让工农兵群众自由进出。

1 月 11 日　罗广斌从北京回到重庆。深夜由罗广斌、杨益言召集一些群众组织在重庆市文联开会商讨夺权问题。杨益言提出将《重庆日报》夺权后改名《红岩日报》。

1 月 14 日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者夺权接管电台。

1 月 15 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办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展览》被下属组织造反，自即日起停展。

1 月 16 日　造反派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布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总攻击动员令》，其中第五条提出：“解散一切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组织，砸烂一切保皇机构，封闭一切保皇组织主办的报刊等。任何人不得违抗，否则，格斗勿论。”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于上午接管校内各行政领导部门，宣布夺权，同时抄砸并查封了重庆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部、重庆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总部和重庆工人战斗司令部。

1 月 17 日　重庆市经委红色造反团等宣布在经委夺权，成立经委“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这是市级机关第一个夺权单位。

△八一五派准备结合进革联会的市委常委、副市长段大明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发“黑市委”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保卫科科长孟祥兆（原重庆市公安局副科长）被广播电台造反派揪斗游街后押回市公安局，随即又将市公安局局长刘佑东和几位副局长同孟祥兆一起押到解放碑批斗，要求公安局正副局长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当众宣布将孟逮捕。

1 月 18 日　大渡口区造反派夺权。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造反派与进驻重庆市公安局的武汉钢二司红卫兵聚众冲击重庆市看守所，将暂押于此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保卫科长孟祥兆押出游街示众后送回公安局。

△罗广斌在西南师范学院向八三一战斗纵队作形势报告。

1 月 19 日　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与重庆市公安局造反派联合夺了市公安局直属机关各级领导权。

1 月 20 日　重庆《新闻报道》头版报道：重庆邮电局八一五红色通讯兵团夺了电讯部门的领导权。

1 月 21 日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发出紧急呼吁，倡议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召集全市各群众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大联合大夺权问题。

1 月 22 日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晚上邀请红岩机器厂八三一战斗团、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八一兵团、红建工造反兵团、邮电八一五、二轻兵团、红农八一五、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地区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卫生系统八一五、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重庆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等三十七个群众组织开会，商讨按照当天《人民日报》社论精神联合夺权问题，并决定按系统分工，于 24 日开始进行夺权。

1 月 23 日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市经委、《重庆日报》社、广播电台的造反派等七个组织联合发起于 29 日召开全市造反派组织抓革命捉生产大联合大夺权会议。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集十二所大专院校和六中、二十九中、师专附中等校群众组织开会，商讨夺权分工，决定：重大八一五、重庆革命教职工造反司令部配合其他组织夺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的权；六中 32111 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夺市监委、市委宣传部的权；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等八所院校配合其他组织夺市人委的权；并决定于 24 日下午 1 时同时动手。

△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宣布接管重庆市公、检、法三机关。

△以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红卫兵为主的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成立，掌握了公安局全部权力。一周后，驻军代表介入。

△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红卫兵与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造反派宣布法院夺权。随后成立了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革命造反管理委员会，2 月 22 日改称革命造反委员会。

△重庆市南岸区八一五革命造反派接管委员会宣布夺了区委、区人委的权。2 月上旬改称“重庆市南岸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

1 月 24 日至 26 日　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 50 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按照毛泽东指示“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重庆驻军五十四军代表支持下组成“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1 月 25 日　31 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大会筹备处”，发出于 29 日上午召开“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的通知。

1 月 26 日　四十二个群众组织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开会商讨夺权后如何掌权事宜，决定：由工人造反军总部、红农八一五、退伍军人造反军、财贸八一五、重庆地区军事院校红色造反联络站、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组成七人监管小组管理市人委；市委宣传部由中学生红卫兵、六中 32111、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体委八一五、四川美术学院共管；市委办公厅、市监委、市委组织部由教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放军、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监管；市委财贸政治部由财贸八一五、财贸九二一监管；市委工交政治部由八一五野战军、二七战斗团、二轻兵团、交通学院九一五监管；市农林局、农工部由红农八一五、西农八二六监管；市委国防工业政治部由八一兵团监管；市邮电局由邮电八一五监管……

1 月 27 日　重庆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联络站召开成立大会。

1 月 28 日　《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发布，在第三条中规定：“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重庆驻军 2000 名指战员举行“坚决支持重庆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武装示威游行，表示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组织夺权行动的公开支持。

△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在校内夺权。

1 月 29 日　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 30 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以戴高帽、“喷气式”等武斗手段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并当众焚烧了刘少奇、邓小平像。八一兵团代表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发言分别是红岩机器厂八三一代表、红农八一五代表、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代表、财贸八一五代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1 月 30 日至 2 月 2 日　“联络站”一派召集 50 多个群众组织开会，讨论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及联合夺权问题。

1 月 31 日　罗广斌在大渡口重庆钢铁公司向造反派工人群众作报告。当晚，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城里发动“打倒罗广斌”的宣传攻势，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

△新华社重庆记者站“新闻尖兵”夺权接管记者站。

△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一〇五红色造反团、一〇五红工造反团从红色造反总团中分裂出来再次夺权。

2 月 1 日　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 50 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出急电，称重大八一五等组织在驻军支持下进行的“一・二四夺权” 是“假夺权”。因夺权而激化的内部矛盾使重庆造反派正式分裂为两大派。

2 月 4 日　由西师八三一发起，在罗广斌、杨益言支持下创办的《新山城》报创刊。作为“联络站”一派报纸与革联会的《新重庆报》对抗。只出版创刊号一期。

2 月 5 日　革联会一派红卫兵将支持反革联会一派的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从市文联家中抓走。

2 月 6 日　重大八一五与西师八三一召开辩论会，阐述各自观点。

2 月 7 日　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成立。

△重庆市公安局临委会与工人造反军总部联系研究后，得到造反军总部同意，决定对造反军前哨支队中一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进行处理。本日出动部队包围前哨支队，逮捕一人。

2 月 8 日　“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副主任有重大八一五熊代富、财贸八一五王绍川、原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徐正身等。

2 月 9 日　杨益言由北京大学侯均初、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余刚勇等学生护送，乘吉普车逃离重庆经贵阳上京告状。

2 月 10 日　作家罗广斌在革联会一派的关押地马家堡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后勤工程学院）跳楼自杀。革联会一派宣布其为“畏罪自杀”。

2 月 11 日　革联会一派的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兵团重庆分团进驻重庆市文联实行反夺权，并宣布市文联反革联会的罗广斌、杨益言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2 月 12 日　革联会召开成立大会，反革联会一派到场造反，发生冲突。当晚，反革联会一派到《重庆日报》社抄砸大会报道铅版，发生冲突。

△因在革联会成立大会上被八一兵团一负责人撕毁旗帜，军工造反兵团到革联会静坐抗议至次日下午。

△反革联会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驻重庆市政协）被革联会一派抄砸。

2 月 13 日　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抄砸了支持革联会的首都三司驻渝红色联络站（驻重庆市人民交通公司）。

2 月 14 日　反革联会的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驻重庆大学分点、四川大学八二六驻渝联络站（驻市六中）等被革联会一派抄砸。

2 月 15 日　革联会在市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公判枪决 2 人，判刑 3 人。为“镇反”大造声势。

2 月 16 日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发出《告别信》，按总勤务站要求撤回北京。

2 月 17 日　反革联会一派在“联络站”开会，商讨于 19 日召开“反右倾”大会。川大八二六代表在会上提出要“坚决向成都黑军区、重庆黑警司猛烈开火”。

2 月 18 日　革联会得悉中央军委 2 月 17 日致四川大学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公开信，连夜向所属组织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把四川大学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员抓起来，并提出“如有抗拒者，以革命行动对待。”

2 月 19 日　革联会布置凌晨在全市抓捕四川大学八二六人员（包括从贵州经重庆返成都在火车上的八二六人员），砸了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革联会与驻军部队一起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 60 万人大会斗争李井泉、鲁大东等“走资派”，会后由驻军部队开路举行示威游行，李井泉等被挂上黑牌武装押送游街示众。与此同时，反革联会一派在市体育场召开“反右倾”大会，拥护革联会一派的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战斗团、六中 32111 战斗团、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等冲击会场造反，两派发生武斗冲突。原反对革联会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鬼见愁”周闯（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负责人周荣之弟）在会上宣布站到支持革联会一边。反革联会一派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与革联会一派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八一五派抄砸由西师八三一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控制的“一二 •四惨案调查团”并将其成员赶出人民小学。

2 月 20 日　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再次遭到革联会一派抄砸，三司人员上街游行抗议。

△革联会一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召开大会，宣布工人造反军（北碚地区）六号门纵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当场逮捕 7 人，勒令登记自首 58 人。会后将拘捕人员五花大绑车载经北碚区、沙坪坝区、市中区游街示众。

△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由永川专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出面开始“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 237 人，刑事拘留 746 人。

2 月 21 日　革联会专政委员会与重庆市公检法联合发出《通令》，宣布工人造反军（临江门街道）前哨支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拘捕 13 人，勒令其余 80 余人三天内到派出所登记自首。

2 月 22 日　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和市公安局上午在解放碑召开批斗处理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大会，会后将被捕者田树堂、许洪烈等五花大绑载手铐挂黑牌游街示众三天，此外该组织还被判处管制 2 人，劳教 1 人，勒令登记自首 72 人。

△重大八一五出动 20 多卡车人员到北碚区抄砸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师专附中八一五等组织以“一贯反对革命的八一五派”、“大反市革联会”等罪名将重庆大学红岩公社负责人徐光明扭送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关押 15 天至 3 月 7 日释放。

△解放军 242 部队（后勤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总团上街举行反革联会示威游行。

△万县军分区宣布“主力军”（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工矿企业职工为主组成）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2 月 23 日　《新重庆报》公布革联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告》，发表镇压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的报道及社论《扫除一切害人虫》，

△革联会组织人员晚上抄砸了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首都三司、一司、清华井冈山、北地东方红等驻渝联络站联合发表《外地革命师生赴渝造反兵团公告》，宣布不承认革联会，要继续批判重大八一五总团的右倾。

2 月 24 日　革联会一派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

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级镇反专门机构。

2 月 26 日　革联会组织上千人围攻反革联会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军工造反兵团广播站，发生流血冲突。这是“文革”以来全市第一次冲击国防工厂事件。

△革联会布置各单位组成镇反领导小组及“打鬼队”（专门对反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进行抓捕、捆绑、刑讯逼供）。革联会组成警司（五十四军）、公安局、红卫兵（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三结合镇反小组”，到区县、工厂、街道地段指导“镇反”；从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四十一中东方红等抽调 80 余名学生组成打鬼队，驻市公安局进行擒拿格斗、捆绑等训练。

△革联会在解放碑冒雨召开全市中小学革命师生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2 月 27 日　革联会下午召开斗争前市委负责人鲁大东大会，安排准备“结合”的前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在揭发、批斗鲁大东时“火线亮相”。在会上重点发言的有市文革“红旗”革命造反队、市委宣传部“红旗”革命造反队、市公安局“长缨”兵团、市委工交政治部“造反有理”战斗队、市委机关红色工人造反团、市委组织部革命造反派、市委办公厅“红旗”革命造反队等。为防止反革联会一派冲击会场造反，五十四军在会场周围地区实行戒严，将反革联会一派群众游行队伍拦截于嘉陵江大桥和上清卡一带两个小时。

2 月中、下旬开始　反革联会一派的一些群众组织相继被驻军、革联会或参加革联会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大批群众被逮捕、拘留、揪斗或“勒令”自首、请罪，其间大量出现对被抓被斗人员捆绑、殴打、罚跪、游街，对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进行抄砸等武斗现象。

2 月下旬　重师附中中学生红卫兵、石油校八一五战斗团、红岩二中红卫兵团等造了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反，成立了中学生红卫兵红色造反临时联合委员会，发出《紧急联合声明》宣布原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退出革联会的所谓《严正声明》对他们无效，并申请加入革联会。

2 月　中共南岸区委财贸部副部长刘星楼、干事陈茂德，区委党校办公室主任王若谷，因不堪文革迫害，自杀身亡。

3 月 2 日　革联会对綦江县松藻矿区工人造反军打通战斗团实行戒严，捆绑斗争 577 人，拘押 120 多人，勒令登记自首、写认罪书上千人。

3 月 3 日　原首都一司、三司驻渝联络站以“首都红代会驻渝联络站”名义向重大八一五负责人周家喻、熊代富、黄顺义及前市委领导人辛易之、段大明等发出《挑战书》，要求在解放碑辩论重庆革联会问题。

3 月 4 日　四川工农兵业余革命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重庆市文联革命职工”联合发出《通缉令》，通缉所谓“以叛徒罗广斌为首的‘三家村’反革命集团成员”杨益言、刘德彬，称在文革中，“这个集团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文联实行了反革命的篡政夺权，继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串通一气，大搞分裂活动，拼凑反革命的小联合，破坏山城八一五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实属罪大恶极。”

△原首都一司、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以“首都红代会驻渝联络站”名义与重大八一五在市中心解放碑冒雨辩论革联会问题，双方各执己见，最后辩论会在八一五派“革联会好得很”口号声中草草结束。

3 月 5 日　革联会和市公安局宣布市中区红旗纸箱厂红铁锤战斗队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逮捕 3 人，拘留 5 人，勒令登记自首 7 人。

3 月 7 日　北碚区驻军宣布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

△晚上革联会一派部分组织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肃清救世主流毒群众大会”，批判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等反革联会的言行。

3 月 8 日　革联会所属的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八三一负责人周荣等 7 人被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拘捕。

△反革联会的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西师八三一、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上街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七周月，欢送首都三司战友，抗议革联会镇压造反派。与革联会一派的六中 32111、八一兵团等发生冲突。242 红总的十辆军车被八一兵团等包围扣留至深夜 12 时，直到八一兵团等得知驻军将对 242 红总采取行动才将其放走。

3 月 9 日　驻军对后字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实行戒严，宣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负责人及骨干 30 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 29 人。

△驻军在西南师范学院校园主持对西师八三一“首恶分子”的批斗大会，会后逮捕了“首恶分子”。

△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黄廉从北京归来在市中区牛角沱车站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

3 月 10 日　革联会召集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通过讨论，一致同意段大明作为三结合干部，参加革联会常委工作。

△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学院反革联会的九一五战斗团团部。九一五负责人 8 人被拘捕。

△重庆新华印刷厂红旗战斗队被公安局勒令解散，负责人被逮捕。

3 月 11 日　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参与反革联会活动的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3 月 12 日　革联会一派砸抄反革联会的财贸九二一战斗团。

3 月 13 日　革联会和公安局临委会在重庆灯泡厂实行戒严，宣布该厂八二八战斗团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余四个组织勒令解散，捆绑斗争 80 余人，拘捕 29 人，斗争会后游街示众。

△中共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3 月 14 日　参加过反革联会的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一〇五”红色造反团在重庆市人民大礼堂举行支持革联会文艺演出，被重大八一五、六中 32111、《山城红卫兵》报编辑部等上台造反，并逼“一〇五”人员当场请罪。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主办”的《山城战报》创刊号出版，并在《告读者》中称：因重庆目前各革命群众组织小报太多，已给印刷工作和纸张供应造成困难，为保证毛主席著作的正常印刷和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自即日起各革命群众组织小报除《山城红卫兵》外一律停办，并联合创办《山城战报》。从 3 月 22 日出版的第三期起改为由革联会宣传委员会主办。

3 月 15 日　重庆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八一五派公安总部代表章志鉴任主任，驻军代表曾惠平、“解放干部”

罗让任副主任。原市公安局“临委会”被取代。20日，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撤出市公安局。

3月17日　革联会一派的江陵机器厂八一兵团六五分团发出通令，勒令该厂反革联会的军工造反兵团解散（此前该团已被抓捕和批斗多人）。

△据公安局革委会统计，全市从2月24日到本日止，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个，由群众出面砸掉的82个，自行解散的146个。后据反到底派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在《向山城革命群众揭露重庆市二、三月“镇反运动”的情况》中称：“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七百六十二个（分布在四百多个基层单位，大多数是工厂的）。”

3月19日　革联会派赴北碚的“追穷寇战斗队”发布《反动组织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的十大罪状》。

3月20日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东方红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中学生红卫兵红联会联合发出《关于召开本市红代会的倡议》。

3月25日　重庆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3月26日　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以致“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公函》的形式明确表态：反对原工人战斗军、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文艺革命军等保守派恢复组织。

3月28日　革联会召集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结合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岳林。

3月　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到月底止，重庆全市被拘捕2253人，24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明令取缔。另外被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抓捕的人员和砸垮的群众组织不在其内。

4月1日　重大八一五召开全团大会，辩论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态度，大多数成员不顾总团负责人的反对，自发举行了“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示威游行。重大校园中展开了对革联会是砸还是保的大辩论。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22期发表由首都三司、一司、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赴渝联络站和北大赴渝战斗队联合供稿的《妖雾弥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称八一五派夺权是“和平过渡”、“改良主义”，革联会是“反革命的三结合”，革联会变本加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4月3日　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恢复活动。

4月3日、25日　八一五派沙坪坝区临时委员会两次召开批斗李井泉、任白戈和区委领导人王秀峰的大会。

4月4日　重庆市革联会常委会作出决议：责成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起草文件对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问题表态；对镇反中解散组织的错误查实纠正，立即恢复八一兵团总部；责成重大八一五和政法学院重新进驻公安局；责成红卫兵司令部重新派人到革联会组织委员会工作；鉴于“反对工纠挤进工代会”呼声日高，决定无限期推迟原订在4日召开的工代会。

4月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命令》（十条）发布，主要精神是要求参加“支左”的部队保护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其中明确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等，并重申“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革联会发出为“镇反”辩护的《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随《新重庆报》

附送。

4 月 7 日、8 日　革联会连续召开“炮轰大会”，欢迎各革命组织对革联会的错误进行“炮轰”。八一五派不少组织对革联会“镇压群众”、“复辟资本主义”作了控诉，二轻兵团、四川外语学院八二六的代表呼吁把革联会砸烂。但多数代表认为革联会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一棍子打死。8 日上午革联会副主任王绍川（财贸八一五负责人）代表革联会常委表态，承认工作中有错误，但镇反大方向正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革联会主任刘润泉（驻军代表）作小结。

4 月 8 日　鉴于八一五派内部反革联会情绪高涨，重大八一五、建院八一八数百代表被专车接到警备司令部小礼堂，五十四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参谋长耿志刚发表讲话进行劝导，使多数八一五派骨干坚定了支持革联会的信心。

4 月 9 日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体育场召开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五十四军领导蓝亦农到会讲话。八一五派中要求砸烂革联会的中学生冲主席台造反。

△建院八一八“迎春到”、“人未老”贴出标语：“万炮齐轰革联会，揪出山城谭震林！”

4 月 13 日　革联会召开各造反组织群众大会，对一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群众组织进行公开平反。此后被捕群众陆续获释。反革联会一派重新聚集队伍，因其“砸烂革联会”的一致立场而被称作“砸派”，后于 7 月中旬经支持该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提议（鉴于该派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改称为反到底派；革联会一派仍称八一五派。夺权以前造反派与所谓保守派之间的两派冲突转化为造反派中两大派之间的冲突。

△市公安局反革联一派砸了公安局革委会牌子，抄了部分“镇反”材料，斗争了原副局长、参与领导公安局内部“镇反”的“三结合干部”罗让。

4 月 15 日　重大八一五、建院八一八等组织举行拥护革联会示威游行，从沙坪坝徒步游行至市中心。

4 月 17 日　据革联会调查研究小组《向山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汇报（修改稿）》记载：全市二、三月镇反中“三县八区刑事拘留一千二百人，截至四月十七日已释放八百九十八人”。

4 月 18 日　重庆医学院重医兵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团、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重庆河运学校航锋等上午在大坪地区和市中区举行“砸烂革联会”示威游行。六中、二十九中、红岩三中等中学原八一五派中的反革联会学生下午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红一方面军”成立大会，加入“砸烂革联会”行列。

△老红军、老干部胡伦（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郝振乙（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关明臣（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等 13 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支持“砸烂革联会”。

4 月 20 日　鉴于“砸烂革联会”呼声日高，重庆师专八一五成立“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此后各地八一五派陆续建立起主要用于指挥武斗的“捍红指挥部”。

△华中师范学院学生到重庆市文联，砸了“工农兵文艺兵团”牌子，文联反革联会一派开始恢复活动。

4 月 21 日　北碚地区八一五派在解放台召开“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誓师大会”，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等冲击会场造反，重大八一五宣传车、广播器材及铜管乐器被砸烂。

4 月 22 日　八一五派在市中心举行“抗议砸派挑起武斗”示威游行，沿途展示重大八一五被砸烂的宣传车、广播器

材和铜管乐器。

4 月 22—25 日　革联会召开各区、县公、检、法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及部分公安派出所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前段时间的“镇反”工作，一致认为，打击“现行反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不少，有些还非常严重。

4 月 23 日　砸派 30 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打倒刘少奇、砸烂革联会”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游行队伍与八一五派发生多起武斗冲突。

△在北碚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重庆钢铁公司）等地相继发生造反派两大派由辩论引起的斗殴、砸广播车等武斗事件。

4 月 24 日　八一五派派晚上出动二百多辆汽车满载人员冲击设于市中心民族路餐厅楼上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广播站，被占满街道听广播的反革联会群众阻拦轰走。

4 月 26 日　《新重庆报》九一四战斗队发表声明坚决砸烂革联会。

4 月 27 日　砸派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到重庆大学校内示威游行，与重大八一五冲突。次日，政法兵团到革联会大院（即市委大院）内静坐抗议。

5 月 2 日　八一五派组织人员欲将在革联会大院内静坐抗议的砸派强行驱逐，砸派组织人员前来营救，两派发生武斗。

5 月 7 日　毛泽东在一则批示中对各地出现的造反派与驻军冲突情况说：“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 54 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诸同志共同商处。”

5 月 11 日　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新北大》校刊驻重庆地区特派记者受新北大公社总部委托发表声明：坚决砸烂革联会。

5 月 16 日　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在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或《中央五条》），决定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意见》既肯定重庆驻军在“支左”中有成绩，又承认他们“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求“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意见》对造反派两大派矛盾的焦点“革联会”采取了回避态度，既未予以承认，又让支持革联会的五十四军领导（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担任革筹组领导。《意见》要求两派“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5 月 17 日　砸派在市内举行拥护《中央五条》和“欢呼革联会寿终正寝”的盛大集会游行。

△晚上革联会召开会议讨论次日举行欢呼红五条游行事宜，到会八一五派负责人普遍对“红五条”表示不满，最后决定将次日游行改为“拥护解放军，支持革联会，誓死捍卫一月革命伟大成果”游行。

△晚上重大八一五在校内举行坚决支持革联会、捍卫一月革命伟大成果大会。

5 月 18 日　八一五派在市内举行“誓死保卫革联会”的示威游行，对《中央五条》未承认革联会公开表示不满和抗议。重大校内也出现大量对中央表示抗议的标语、大字报。

5 月 20 日　蓝亦农、白斌、韩怀志（五十四军副军长）、耿志刚（五十四军参谋长）到重庆大学风雨操场，向正举行辩论大会的八一五战斗团全体成员发表讲话，称革联会是一月革命的产物，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五条”字面上没有革联会，实质上有，因为肯定了五十四军的支左，而五十四军支左就是支持的革联会一派。革筹组的成立，革联会是向前了。并以当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将缴获印军武器全部交还印军一事来说服八一五派要对反革联会一派高姿态。

5 月 21 日　经过五十四军领导苦心说服，八一五派认识到“方糖甜，圆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转变对《中央五条》的态度，举行“坚决拥护红五条”大会和游行。

△砸派在解放碑、沙坪坝区、市中区体育馆、重庆医学院等地举行声讨八一五派“反对《红五条》”、“炮打中央”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大会。

△下午，五十四军领导分别接见两派负责人。

△重庆国防工业系统砸派联合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成立。

5 月 2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

5 月 23 日　两派在石油技工学校武斗，武斗由动拳头升级到动用钢钎、铁棍、匕首。

5 月 26 日　五十四军致电成都军区并报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电报中说，近几天，该军领导人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后字 242 部队红总等组织负责人，听取批评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些组织举行了军民联欢会。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五条，愿意接受市革筹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等等。

△重庆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成立。

5 月 27 日　毛泽东将五十四军有关重庆问题的电报批发给各军区、各军、各兵种，并以中央军委名义批示：“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病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八一五派将这条“最新最高指示”大加宣传，以此打击认为五十四军“拉一派打一派”的砸派。

5 月 28 日　因八一五派有标语提出“要来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砸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发表《遗书》，表示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

5 月 29 日　砸派在市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炮打中央的反革命逆流”大会，市革筹组白斌（五十四军副军长）、唐兴盛（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到会作了呼吁团结的讲话。

5 月下旬　因《中央五条》未承认革联会并决定另建革筹组，革联会不便继续存在，各区县革联会纷纷更名为“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或联合总部）”（简称捍红指挥部或捍红总部），后成为八一五派指挥武斗的专门机构。

5 月　砸派大专院校学生组织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成立。

6 月 1 日　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两派武斗，武斗中越南留学生被打。

△两派在重庆发电厂、电力技工学校及杨家坪等地武斗。

△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成立。

6 月 2 日　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伤数十人。

△两派在重钢和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嘉陵机器厂、江陵机器厂等地武斗。

6 月 3 日　重庆市第三中学（今南开中学）两派武斗，死 1 人。

△砸派新成立两天的重庆大学井冈山公社被八一五派抄砸。

△万县市赤旗战团红卫兵数千人涌向万县市公安局揪斗局长，要求释放“镇反”中被捕人员，引起两派冲突。致伤学生数十人，其中 31 人送专区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在中央领导人接见外事口等单位及首都红代会各大专院校负责人时，江青在讲话中说：“关于武斗问题有点补充：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坚决反对挑起武斗的坏人，特别要找出挑起武斗的幕后操纵者。”第一次公开提出“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这一说法。

6 月 5 日　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砸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两派使用棍棒、钢钎、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增援，揭开了重庆造反派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前去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指战员数十人受伤。

△两派在后字 242 部队、邮电学院、工业学校、机电公司等地武斗。

6 月 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时称《六六通令》），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其中第四条规定：“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第六条中规定：“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重大八一五向西师春雷派出增援武斗人员。到现场后，因解放军劝阻，于当天返回。

6 月 7 日　两派继续在西南师范学院大规模武斗，重大八一五再次派出的增援武斗人员由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指挥，以校体育队学生组成“敢死队”强攻，获胜后将俘获的砸派人员押到重庆大学毒打审问。

△江津县两派大规模武斗。

△八一五派江北区捍红指挥部在江北城召开批斗前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大会，江北区委代理书记郑天明陪斗。会后将任白戈用卡车送回重庆大学，经过江北上横街派出所门前停下喝水时，砸派第十六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前来与八一五派争抢任白戈，争抢中任白戈颈项被抓伤。郑天明在混乱中独自返回区委住处。砸派将任白戈抢走后，辗转经江北区观音桥绕道江北县、北碚区运回到市中区一号桥重庆科技情报所内进行“垄断”批斗。以后，八一五派亦将李井泉、任白戈等“走资派”进行“垄断”批斗。次年在“三一五指示”中周恩来为此说：“重庆去年把李井泉搞去，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它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

6 月 8 日　重大八一五武斗人员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施家梁附近遭砸派武斗人员截击，重大八一五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并遭到关押毒打。熊代富被砸派作为“武斗头头”注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途中火车上被八一五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走。

△八一五派西师春雷兵团撤到嘉陵江北岸天府煤矿。天府煤矿砸派撤出。

△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两派武斗。

6 月 9 日　革联会召开八一五派各大组织会议，总结西师“六五事件”教训，筹划进一步武斗。

6 月 10 日　重大八一五建立卫戍司令部、三Ｏ一野战队（负责校外武斗）、三 O 二部队（负责校内武斗及治安）等专业武斗组织。随后，一些八一五派组织相继建立武斗指挥机构，砸派亦相应建立了专业武斗组织。

△建设机床厂与第二十中学两派武斗，死 1 人。

6 月 11 日　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以严厉措辞向重庆国防工业系统砸派群众组织军工井冈山发出《公函》，称 6 月 9 日解放军指战员陈干清等 4 人在制止西师武斗后被该组织抓走并被扣押、打伤，要求立即放人，赔礼道歉。随后，砸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向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回复《公函》并广为散发，指责警备区司令部偏袒八一五派。

6 月 12 日　重庆市革筹组正式办公，与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发出《联合通知》，提出制止武斗八条禁令。

△市革筹组组长蓝亦农、副组长白斌到八一五派控制的市儿科医院看望在西师武斗中受伤的八一五派伤员和八一五派儿科医院九一五战斗团。

6 月 13 日　八一五派武斗队抄砸设于重庆市中心解放碑东侧工农兵餐厅（原民族路皇后餐厅，即今会仙楼宾馆）支持砸派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广播站，重伤 4 人，餐厅停业。

△八一五派集会庆祝市革筹组办公第一天，革筹组负责人蓝亦农、白斌出席。

△砸派在市体育馆举行集会，由“反修战士”、归国留学生代表控诉遭到八一五派毒打的经过。

△嘉陵机器厂两派武斗，砸派军工井冈山占领全厂。

6 月 13 日至 21 日　两派在嘉陵机器厂武斗，死 1 人。

6 月 14 日　两派在闹市区江家巷重庆市装卸运输公司办公楼（八一五派一联合广播站所在地）武斗。

△八一五派抄砸砸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指挥部。

6 月 15 日　北碚地区因武斗而逃离原单位的一些砸派人员在西南农学院成立专业武斗组织猛虎团。

△两派在位于市中心的第二十九中学武斗。

△两派在重庆新华印刷厂武斗，砸派被赶出厂，砸派《山城红旗》报第 8、9 期无法出版。

△市公安局八一五派公安总部召开大会批斗原公安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斌。孙斌不堪迫害，于中午自缢身亡。

6 月 17 日　重大八一五召开全校大会，宣布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将副校长、老教授金锡如，教务长、老教授王际强，总务处副处长李子俊、无线电系党总支副书记陆正荣等挂上黑牌押到会场示众，并宣布成立校“劳改队”。此后，该校正副教授 30 人中有 20 余人和一大批部、处、系的领导干部被以各种罪名关进校“劳改队”。全校连同各处、系设立的“劳改队”共 11 个，先后关押了 100 多人。被关者均遭到残酷的体罚、武斗折磨。著名二级教授

张可治在“劳改队”被迫害致死。

6 月 18 日　二十九中两派武斗。

6 月 19 日　涪陵县两派在涪陵轮船公司船员俱乐部武斗，1 人重伤死亡。红联司与川涪工总司两派正式形成，以人民电影院至夏家沟为“三八线”，各控制东西两段。

6 月 20 日　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两派武斗，死 2 人。砸派占领全厂。

△重大八一五为指挥武斗而私设的电台开始日夜值机定点定向联络。

6 月 21 日　按照重大八一五负责人周家喻于 6 月 16 日提出的“一定要控制全市舆论”的要求，八一五派出动数十卡车武斗人员在解放碑周围闹市区抄砸砸派广播站。

△砸派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

△两派在化龙桥地区红岩橡胶厂、工业校、二中等地武斗。

6 月 23 日　设于大坪五一技校内的八一五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拔除砸派设于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内的武斗据点，两派上午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重大八一五三 O 一武斗队以钢钎、大刀为武器进攻无效后，八一五派大坪地区武斗指挥部命令石油学校武斗队纵火将该小学烧毁，武斗中死 4 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 3 万余元。重大八一五武斗队返校途经重庆医学院后门时，遭砸派武斗队拦截，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副政委被刺伤。

△两派在石油学校武斗，死 1 人。

6 月 24 日　重大八一五总团部署各分团为武斗“生产防御工具”，此后陆续私造了土喷火器、燃烧瓶、刀、矛、匕首、手榴弹、手枪、“八一五”式冲锋枪、烈性炸药等武斗军火。

△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到望江机器厂传达省革筹负责人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给两派要求停止武斗的信，该厂砸派认为驻军“拉一派打一派”，对其进行阻挠。

6 月 25 日　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布告》，宣布将派出武装巡逻队昼夜巡逻以制止武斗。砸派一些组织认为此举实为威胁该派，戏谑地宣称亦将建立自己的武装巡逻队进行昼夜巡逻。

6 月 26 日　南岸区砸派宣称组成南岸区武装巡逻队。

6 月 27 日　两派在中梁山地区武斗。

6 月 28 日　解放军建字 203 部队砸派“驱虎豹造反兵团”宣称将组成武装巡逻队在全市范围内昼夜巡逻，并“望警司大力协助”。

6 月 29 日　砸派在市体育馆、八一五派在沙坪坝，分别以武斗中死者为“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并乘车载尸游行。八一五派游行车队在化龙桥与砸派发生武斗。

6 月下旬　万县、开县等地红联站派农民二三千人进入万县市参加围攻专署、卫校等主力军派（与砸同派）据点的武斗。

6 月　由于武斗升级，重庆生产急剧下降，导致城乡市场极度混乱，商品供应日趋紧张，全市粮食库存供应量由 28 天下降为 13 天，不少地区煤炭、猪肉、蔬菜脱销。

△重庆市公安局八一五派建立了专门从事武斗的指挥部，下设动态组和五个战斗连。

7 月 1 日　两派上午 11 时至下午 2 时在（北碚）重庆纺织五厂武斗，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西师附中无产者和砸派猛虎团都入厂参战，双方使用钢钎、棍棒、石头、烧碱水等。同日，两派在北碚街上武斗，死 2 人。八一五派控制了重纺五厂、工人会堂、人民会堂、四十四中学、重庆市自然博物馆等地。

△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 2 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全天停诊。重庆医学院 66 级毕业生、砸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

△两派在建设机床厂武斗，死 1 人，伤数十人，砸派占领全厂生产区，半自动步枪大量流散出厂。

△两派在长安机器厂武斗，砸派控制全厂要害部门和主要生产车间。

△两派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武斗，八一五派攻占分行大楼。

△重庆驻军派赴望江机器厂制止武斗小分队在洛碛码头被砸派拦阻，经 6 天半谈判后才得以上岸，

△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警备司令部”发表公开将斗争矛头指向五十四军的《关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

△因受武斗影响，由八一五派控制的《新重庆报》、重庆市邮电局联合发出启事，称自 7 月 2 日起《新重庆报》暂改为每日出半张（两版）。直至 10 月 1 日才恢复出版全张（四版）。

△砸派重庆印刷工人、二十九中红一方面军、六中指挥部主办的《小人物》报第 3 期发表《用人民战争制止武斗》。

7 月 2 日　重庆市革筹、重庆警备区再次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制止武斗。

△八一五派在北碚街上抓捕砸派人员，抓到后将一般群众关进私设于重纺五厂、天府煤矿等地的“监狱”，将负责人送交重大八一五处理，西师八三一负责人胡继泽被转押于重大“监狱”直至“九五命令”后才释放。

7 月 2 日至 3 日　万县市红联站派与主力军派在万县城内专署、卫校等地大规模武斗。

7 月 3 日　两派在北碚重纺五厂再次武斗，八一五派动用了自制土炮（发射鹅卵石、石块）、鸟枪。砸派猛虎团被土炮打死 2 人，伤数十人。此后八一五派控制了北碚区邮电、银行、轮渡、车渡、公交和大部分粮店、商店等部门，及嘉陵江以东的跃进公社、红星公社、东阳公社，嘉陵江以西的红旗公社、向阳公社、前进公社、火炬公社等广大农村，砸派人员被大批赶出。公路客车停运。

△砸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九一纵队》报第二期发表《武装保卫毛主席的大民主》、《蓝亦农、白斌回头是岸》等文章。

7 月 4 日　周恩来派秘书传达指示：重庆造反派进驻银行，有抢金库的可能，驻重庆部队要直接出面控制起来，不能把两派斗争搞到银行。群众组织占领银行，不得干扰银行正常工作。

△砸派在市中心解放碑为死于武斗的《东方欲晓》报主编、重庆医学院学生于可等“烈士”举行“追悼大会”，“烈

士”亲属作了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革命到底”。

7 月 5 日　两派在重医一院东门武斗，死 2 人。

△两派在中梁山武斗，持续至 7 日。

△八一五派西师春雷造反兵团《春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打一场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提出：“我们对敌人不能抱丝毫幻想，也不能单纯依赖专政机关”，“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这样，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斗歪风”，“只有用这种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声称“七月血战的战鼓早已敲响”，号召“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人民战争”。

7 月 6 日　两派在重医一院门诊部武斗，死 1 人，伤数十人。

△两派在（北碚）重庆光学仪表厂武斗，死 3 人。

7 月 7 日　两派在嘉陵江南桥头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砸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打死 2 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省革筹闻讯后当即指示要求交出凶手和枪枝弹药。五十四军代表前往二轻局大楼交涉未果。八一五派将大楼包围。当晚五十四军派出宣传车在武装巡逻队保护下宣传省革筹指示。砸派出动人员将宣传车包围。对峙至次日下午，二轻局大楼内砸派武斗人员撤离。

△两派深夜在（北碚）浦陵机器厂（上海内迁厂）武斗，厂内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全厂停产。从次日起八一五派武装包围切断了该厂的粮、菜、煤、水供应，该厂上海援内职工被迫于 7 月 15 日全部返回上海。

7 月 8 日　砸派猛虎团前往八一五派控制的（北碚）红岩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小口径步枪、猎枪等，死 9 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市革筹组在警备区司令部召开两派代表会议，共商制止武斗事宜。

7 月 9 日　两派凌晨在北碚区澄江镇（“文革”中改名火炬镇）第二十三中学武斗，砸派数十人被抓。缙云山园艺场砸派撤离该场。八一五派控制了澄江镇地区。

7 月 10 日　于 8 日增援中梁山武斗后留驻于战旗小学的重大八一五三 O 一武斗队，于黎明前以自制土喷火器和土炮伏击从煤校返回重庆电机厂的砸派武斗队，砸派被土喷火器烧死 2 人，烧成轻、重伤各 2 人，钢钎刺死 1 人，重大八一五武斗队被自己土炮喷出的火焰烧成重伤 1 人。当天上午，重大八一五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砸派河运学校航锋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八一五武斗队使用了非法私设的电台进行联络。

7 月 11 日　两派在重钢三厂武斗，厂军管会前去制止武斗的人员被刺伤、抓走 2 人。

7 月 12 日　两派在二钢厂武斗，前往增援的重大八一五三 O 一武斗队三一纵队攻占该厂办公大楼后，其负责人将吉普车一辆抢回学校据为己有，用坏后丢弃。

7 月 13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通知谴责了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的“走资派”和“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组织他们进城镇压革命造反派”，有的地区还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口号。通知规定：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已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补贴工分等各种优待一律无效，因参加武斗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及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由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陪同到达重庆。

△砸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山》报发表长篇专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文中以江青 6 月 3 日讲话提出的“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为依据，提出“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政治攻势来制止武斗！”号召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

△八一五派攻打砸派占据的重钢公司文化室据点，两派武斗持续 16 小时，近万人围观。伤数十人，砸派死 2 人。

7 月 14 日　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凌晨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分别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 9 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

△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八一五派八一兵团，砸派军工井冈山）达成停止武斗 14 条协议。中央代表谢富治应邀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 3000 余人召开“团结大会”。

△两派在北碚区前进公社（邻接西师、西农）武斗，动用了民兵枪枝，有死伤。

7 月 15 日　四川省革筹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与副组长刘结挺及中央代表、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一起到武斗严重的北碚区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纺五厂等单位视察。

7 月 16 日　万县地区两派在梁平县大河机械厂、县文化馆等地大规模武斗，死伤数十人。主力军派退出县城。

7 月 17 日　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到北碚街上向驻军上缴武器，与八一五派发生武斗。

△张国华、刘结挺等在北碚区分别接见两派群众。

△张国华、刘结挺与中央代表李再含于午后 1 时至晚上 10 时半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接见砸派代表。

△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砸派“红总”发表《敦促蓝亦农、白斌二同志改正错误书》。

7 月 18 日　据王力回忆：“主席在 7 月 18 日晚上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还夸奖（武汉）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王力反思录》1012 页）

7 月 19 日至 20 日　张国华、刘结挺与中央代表李再含到武斗严重的望江机器厂给两派做工作，要求停止武斗。

7 月中旬后　砸派改称反到底派。

7 月 20 日至 21 日　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长江电工厂武斗，八一五派攻占全厂。

7 月 21 日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举行“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张国华、刘结挺及重庆驻军、市革筹领导韦统泰、蓝亦农、唐兴盛出席讲话。

7 月 22 日　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在讲话中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次日，江青讲话中这一内容由上海《文汇报》造反派

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迅速传遍全国。

7 月 23 日　在北碚街上举行声讨武汉“七二Ｏ”事件游行的两派发生冲突，伤上百人。当晚，八一五派向西南师范学院发动进攻。西师八三一于次日凌晨撤离学校。八一五派控制了北碚城区和大部分农村。

7 月 24 日至 25 日　江津县两派大规模武斗，九七派（与八一五同派）将红总派（与反到底同派）赶出县城。

7 月 25 日　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中化龙桥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八一五派形成威胁，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攻打工业校，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枪支。八一五派攻占该校。该校反到底派红岩兵团死 10 人。重大八一五三 O 一武斗队张全兴和“战地摄影师”唐世轩被小口径步枪击中身亡。为报复，该武斗队抓获反到底派俘虏 200 余人押回重大毒打审讯，其中毒打致残 1 人。重庆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

△反到底派在体育馆外召开声讨“七二〇”事件、声援武汉造反派大会，会前得知工业校被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工总司负责人黄廉在发言中连续三次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错呼为“敌人不灭亡就叫它投降”。

△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正在重庆医学院开会，得知工业校被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武力攻占，决定打开军工厂军械成品库向下属组织发枪“自卫”。总部勤务组负责人除双溪机械厂董元和外全部签字为此决议承担责任。

7 月 26 日　永川县两派武斗，死 12 人。

7 月 27 日　反到底派重钢三厂延安兵团武斗队晚 10 时许开枪打死过路行人 3 人。

7 月 27 日至 28 日　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两派争相抢夺军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外扩散。

△空气压缩机厂造反派将坦克开出厂到杨家坪街上示威。

7 月 28 日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派出三三、三四、三五纵队到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协助守厂”，得到该厂八一五派配置的坦克、机枪等武器。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下午和晚上两次抢夺沙坪坝区武装部各类枪械 30 余枝，弹药一批。此后重庆八区三县均出现武装部及军管会等武器弹药被抢夺事件。

△因受武斗影响，重庆铁路分局九龙坡火车站货场货运全部停顿，积压物资 12.5 万吨，积压车皮 400 个。

7 月 29 日　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长安机器厂六月天兵、重钢三厂铁拳头等组织武斗人员到江北区委大院内职工宿舍抓走中共江北区委代理书记郑天明，关押于重钢三厂招待所内毒打审讯，翌日郑被折磨致死。

△忠县人武部主持的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建了 13 个造反派武装连队，以“武装保卫忠县”。

7 月 30 日　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 5 吨，伤亡各 1 人。

7 月 31 日　两派在北碚区武斗，死 3 人，伤 13 人，八一五派北碚区“捍红总部”下令将北碚青木关至歇马场的小湾公路桥炸毁。

△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 18 户。

△两派在荣昌县城武斗（持续至 8 月 6 日），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死 78 人。

7 月　重庆市公安局八一五派在局办公大楼等处修建了武斗工事，动用了刑侦技术检验标本枪 206 枝和其他业务用枪 163 枝及 3 部步话机。革联会还在市公安局大楼武斗工事内安装了接力机和坦克报话机各一部以传送武斗情报。

8 月 1 日　反到底派占领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

△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到杨家坪地区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 2 人，伤 10 人。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三八纵队从长江电工厂运回 8 万余发半自动步枪子弹。运送中动用了私设电台联络。

△建设机床厂 45 车间工人何心贵去车间为同事领取工资路上被三十五中学一武斗人员当作活靶子练枪法打死。

△两派在北碚龙车寺武斗。

8 月 2 日　两派在北碚火炬镇（澄江镇）武斗，反到底派攻占该镇。八一五派武斗指挥、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负责人、红岩公社公安员唐天伦被反到底派俘虏。

△两派在（北碚）重庆第二十三中学武斗，死 1 人。

△两派在解放军后字 242 部队武斗，反到底派占领该学院。

△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死伤多人，动用了坦克。该厂八一五派武斗负责人方文正在久攻不克时下令将反到底派占据的厂俱乐部烧毁。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在攻打该厂医院和水塔一线时纵队长谢宗正等 3 人身亡，重伤致残 1 人。八一五派占领全厂后，该武斗队负责人出于报复下令将该厂无辜群众 1 人从家中抓出杀害。八一五派武斗队并将从家中抓出杀害的无辜群众 7 人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枪杀后未死者由师专附中武斗队补枪致死。

8 月 3 日　重庆军分区 667 号交通艇早上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封锁长江航道的检查哨高射炮击沉，解放军 3 人遇难。

△两派在市中心第二十九中学和相邻的大同路小学武斗，八一五派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负责人张光耀徒手前去双方交火地带救护中弹同学身亡。

△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建设机床厂职工宿舍）被反到底派用四联高射机枪击中烧毁；反到底派在进攻该厂军库时，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负责人、红一连指导员王木全（九中学生）等多人身亡。

△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武斗队到建设机床厂领取武器后返回时在储奇门路口遭到凯旋路中学八一五派设卡拦阻，发生冲突。

△反到底派南岸城建兵团武斗队从建设机床厂领枪归来，在黄葛垭新市场附近遭到八一五派伏击，死 10 人，伤多人，十几支半自动步枪被抢走。

8 月 4 日　据王力回忆：“林彪在此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前面说形势很好，后面主题是夺枪问题很严重，必须发布命令禁止夺枪。毛主席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前面说同意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他不同意后面林彪关于夺枪

的话。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他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更严重的是，主席 8 月 4 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军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王力反思录》266、1012 页）

△设于市中心财贸俱乐部的财贸八一五宣传队转移驻地，遭到反到底派武斗队袭击，8 人（多为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成员）身亡，其中年龄最小者 14 岁。

△反到底派占领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

△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将运送百货、食品因武斗所阻而停泊于长江深水中的人民 5 号登陆艇和 2014 号驳船劫持回厂。人民 5 号登陆艇被改装为“炮艇”。

△两派在北碚 845 厂武斗，该厂生产的炸药、雷管大量被抢走，全厂停产。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无产者负责人胡明富在武斗中身亡。

△因受武斗影响，八一五派控制的《新重庆报》、重庆市邮电局联合发出启事，称因报纸用纸一时供应不上，《新重庆报》从明日起减少发行数量，只在本市地区供应部分零售报，订户一律暂停发送。直至 9 月底才重新开始收订。

△涪陵地区南川县红联站抢劫县武装部军火库。

8 月 5 日　八一五派反攻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武斗中死 25 人，伤数十人。当时有报道此次武斗的小报文章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指示武装“忠实”派（与反到底同派），以围剿红贸派。红贸派红联司抢夺军分区军械库枪械 3000 余枝，火炮 22 门，子弹 100 多万发。

△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拦江抢劫从武汉开往重庆、运送生猪的 2021 号拖轮。至本日止，据不完全统计，长江上客、货轮被武斗组织抢劫百货 356 吨、食品 504 吨、生猪 2378 头及医药、香烟、罐头等若干，损失近百万元，导致重庆至上海、武汉的客、货轮运输中断近 40 天。

8 月 6 日　重大八一五及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二钢厂等单位八一五派武斗队到巴县抢夺武装部枪枝弹药扑空后，抢走解放军 153 炮兵学校 122 榴弹炮一门，120 迫击炮两门，炮弹一批，拉到重大校内组成炮班，该炮班参加武斗 5 次，发射炮弹 41 发，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建筑被毁。

△两派在嘉陵江大桥两端展开枪炮战，江北枣儿坡上的市副食品干果战备物资甲级仓库被击中起火焚毁，直接经济损失 84 万余元。

△两派谈判达成于本日 12 时无条件停火的三条协议，但转眼即遭破坏。

△涪陵红贸派抢劫军火仓库。

△云阳县人武部奉命派出 10 个造反派武装连队赴万县市参加武斗。武斗中云阳县 58 人丧生。

△合川县造反派到县人武部武器库抢夺枪支弹药，不慎触爆炮弹，造成人员伤亡。

8 月 8 日　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

“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 24 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 207”拖轮等船只 3 艘，打坏 12 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

△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负责人伙同空气压缩机厂、中梁山煤矿八一五派武斗队将该煤矿军管会 9 枝枪械及弹药全部抢走，三〇一武斗队负责人独得 6 枝枪。

△万县市两派开始枪战。

△涪陵《忠实兵战报》发表动员大规模武斗的社论《消灭贸匪，解放全涪陵》。“忠实”派川涪工总司用 5 艘机动船将石柱、丰都两县武装部枪弹运回，红贸派红联司在清溪、黄鹄嘴等地以火力拦截，双方死 10 余人。

8 月 9 日　重庆两派达成《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和《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

8 月 10 日　重庆两派达成《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的协议》和《关于保证伤员正常治疗的协议》。

△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指示在全地区十县城乡宣传伪造的《中央军委命令》，称“‘涪陵红贸’八月六日抢劫军火仓库是反革命暴乱事件。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此进行镇压，并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协助镇压。”为所谓“武装剿匪”进行动员。

8 月 11 日　忠县两派在三公里处武斗，死 2 人。

△涪陵红联司在龙潭车站附近截击对方军车 4 辆，双方共死 58 人，伤 25 人。

8 月 11 至 13 日　八一五派攻打设于市中心解放碑西北侧市交电公司大楼（今新世纪百货大楼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13 日深夜大楼被燃烧弹击中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一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

8 月 12 日至 13 日　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动用各种枪炮、战车、坦克，双方参战者均在 700 人以上，支援者上万人，死伤上百人，直接经济损失 357 万元。八一五派攻占全厂。

8 月 13 日　据《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410 页）记载：“望江机器厂派性武斗队进攻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驻厂部队指挥部，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 2 名解放军战士、1 名工人。”而《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99 页）则称：“望江机器厂造反派武斗组织包围驻厂部队一连一排指挥所，连续开枪射击，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等 3 人，伤 1 人，部队被迫还击。”另据知情者回忆，此事件中，望江东方红的武斗人员是下午从山下上山去布防设岗，走到半山腰时突遭袭击，先后被打死 8 人，另有奉命开车前去抢救伤员的司机也被打死在驾驶室里，而张参谋长与警卫员被打死的地点，是在“进攻者”看不到也打不到的地方。上述两记载中均未提到群众组织一方伤亡情况，只后一记载有耐人寻味的“部队被迫还击”一语。

△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二中队、五中队在行进于第二十二中学至北温泉途中时被河对岸八一五派机枪扫射死 3 人、重伤 2 人。猛虎团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将俘虏中的北碚八一五派武斗指挥唐天伦枪毙“祭灵”。

△成都《井冈山之声》报十九期发表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望江纵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革命与武装革命——并再论人民战争救山城》。

8 月 14 日　两派深夜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大规模武斗，死 11 人，烧毁市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第六中学一幢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及部分设备，直接经济损失 50 余万元。烧毁 1300 名干部的档案和大量文件资料。反到底派攻占原由八一五派控制的南桥头，将已在反到底派控制中的江北区与市中区上清寺地区打通。

△八一五派以公安总部为首并动用市公安局马克沁机枪等枪支在市中区制高点枇杷山公园上建立枇杷山指挥部。

△万县市两派大规模武斗。红联站派撤离市区时，枪杀了关押于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在押刑事犯 33 人和主力军派俘虏多人。主力军派也采取报复行动枪杀了红联站派俘虏多人。

△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亲自研究部署，拟定计划，派人侦察地形，摆制沙盘，发放武器弹药，指挥“忠实”派武斗队对红贸派进行“第一次围剿”，并调来重庆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 101 号炮艇参战。攻占涪陵全城，红贸派撤离。

8 月 14—15 日　重大八一五武斗队为保障“庆祝八一五造反一周年”纪念活动安全，以榴弹炮反击嘉陵江对岸连日来向重大校园发射“三七”高射炮弹的江陵机器厂反到底派，共发射炮弹 9 发，打死该厂工人 2 人，学生 1 人，打伤 7 人，打坏该厂围墙和办公大楼。

8 月 15 日　重大八一五因本校受到嘉陵江对岸江陵机器厂反到底派炮火威胁，改在三中广场举行八一五造反周年纪念大会。新北大公社“攀险峰”战斗组、清华大学井冈山四一四总部“井冈红军”战斗队、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等外地代表到会发言祝贺。会后演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八一五风暴》。

△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武斗队舰艇在李家沱地区发射炮弹 20 余发，打坏渡船 3 艘，李家沱长江渡口停渡 40 天。

△市第七中学（沙坪坝区）被嘉陵江对岸炮火击中校图书馆大楼，馆藏 200 多年的所有古籍图书全部被毁，实验仪器大部被毁。

△两派在市革筹组大院武斗，死 2 人，反到底派夺走警卫分队手枪 7 支，抢走 3 卡车物资、5 辆小车。

△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指挥的“第一次围剿”，将红贸派赶出了县城。红贸派 3 万多人在强渡乌江时又遭到狙击。两天武斗中死上百人，伤上千人。（涪陵红联司毛主席的红卫兵战报编辑部《涪陵战报》第 12 期，1968 年 6 月 15 日出版）

8 月 16 日　由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发出公开信，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

△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上午在重庆市第一中学召开沙坪坝地区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为固守八一五派占据的沙坪坝区，保证该区与市中区之间的道路畅通，决定攻打位于沙坪坝至市中区要道中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至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一线的反到底据点。会后在歇台子解放军 421 部队（通信兵雷达技术学校）设立了“前线指挥部”，令各单位武斗队于 17 日到指挥部报到集中。

△晚上，反到底派驻南岸黄山武斗人员 200 余人到建设机床厂领枪，途中为免遭封锁必经之路的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射击，抢劫了九龙坡机务段一列火车，因扳错道岔，火车驶出后撞上另一列停在道上的列车，幸因速度较慢而未出轨。次日返回时，武斗人员又拦截了一列火车，躲进邮政车中通过危险地段。

△由忠县人武部主持的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通知，将该办公室原发的〔67〕54 号文件中提出的“坚决采取‘文攻武卫、军民联防、武装保卫忠县’的革命行动”更正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采取‘文攻武卫、军

民联防’，武装保卫忠县”。

△撤离县城的涪陵红联司在焦石开会成立“军法处”，迄至 9 月止，该“军法处”先后 6 次审批处决了 30 余人。

8 月 17 日　八一五派凌晨 4 点袭击（北碚）第二十二中学，驻该校的反到底派猛虎团六中队（重纺五厂“八二七”）数十人被俘，其负责人王五二、龙树生等 4 人被枪毙。

△反到底派撤离西南农学院，猛虎团撤离前将八一五派俘虏王志高等 9 人枪毙。反到底派西南农学院八二六战斗团后勤负责人王兰英（女）被八一五派俘虏后枪毙未死，幸得农民救活后逃到成都向省革筹汇报，得到省革筹组长张国华接见。

△重大八一五武斗队将所谓“猛虎团匪徒”二人（嘉陵煤矿工人）抓到学校，次日强迫其为八一五“烈士”裹尸，并鼓动群众将二人打成重伤，随后又从医院抬出毒打致死。

8 月 18 日　（北碚）解放军成字 302 部队（机要学校？）反到底派“红总”撤离校园。

△八一五派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反到底派占据的电力学校。两派武斗中死 45 人。

△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二连由十一中“红色暴徒”人员带队（包括南山中学、五中、十七中、窍角沱中学等校学生）前往袁家岗附近五台山增援，先期占领五台山高地的八一五派供电“八二九”十多人身亡。

△反到底派工总司负责人邓长春在武斗“舰艇”《反到底一号》(即原人民 5 号）上为王家大山武斗中身亡的“舰队”副司令李鲁沂（嘉陵机器厂武斗队负责人）举行追悼会，枪毙八一五派俘虏 2 人（其中一人未死)，并将死者抛尸江中，为李“祭灵”。

△由忠县人武部主持的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给组建的 13 个造反派武装连队发放武器弹药。

8 月 18 日至 19 日　江陵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从夜 10 时到晨 6 时向重庆大学发射 1 千多发炮弹（未炸)。重大图书馆震垮一角。

8 月 18 日至 20 日　八一五派为固守其占据的沙坪坝区，保障该区与市中区之间的道路畅通，打掉位于两区之间大坪、潘家坪一带的“拦路虎”，凌晨向这一地区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死上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前线总指挥、重大八一五负责人下令炸毁，仅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 4 百余万元。另据重庆市博物馆统计，文革前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 10 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当时估计损失 127.5 万元。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驻空气压缩机厂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纵队参加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在武斗中死 8 人，伤 7 人，是重大八一五在武斗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8 月 20 日　反到底派设于南岸黄山的专业武斗组织“黄山警备区司令部”成立。该组织还在武斗中动用了非法私设的电台与反到底派望江厂“金猴”武斗队及其“舰队”进行联络。

△重大八一五为指挥武斗而私设的电台与北碚区“捍红总部”勾通，实行定点定向联络，

△杨家坪地区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与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对射炮击，江北区反到底派炮击八一五派占据的红港（朝天门码头）、儿科医院、枇杷山等地，反到底派“黄山警备区司令部”炮击八一五派占据的弹子石等地。

△市革筹组副组长白斌召集两派制止武斗小组代表，就中央调查组来渝安全问题作出四条规定。

△八一五派北碚区捍红总部在西南农学院编造布置的“西农魔窟”（猛虎团罪行展览）开放。此后，八一五派小报上刊登《惨绝人寰的杀人魔窟》、《杀人魔窟西农白公馆纪实》一类文章进行大肆宣传。反到底派则称八一五派私设的重纺五厂（大明纺织厂）监狱是“白公馆”，天府煤矿监狱是“渣滓洞”。

8 月 21 日　中央调查组一行 30 人来到重庆，下令两派就地停火，到警备区谈判。

△反到底工总司和机关司令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各武斗据点中央调查团已到重庆，立即停止开枪，保持克制，好让中央调查团只看到八一五派一方在开枪。

△长安机器厂反到底派负责人吴凤岭（后被安排为重庆市革委会委员）率武斗人员包围人民银行江北城分理处，从金库提走人民币 67 万元为厂里发工资。

△江北区八一五派凌晨从江北城老城区撤离，反到底派武装游行庆祝“解放”。

△江青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和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座谈会上说：“革命派处于劣势，没有武装，赤手空拳。在这样的情况下，像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你要向我进攻，我要还击你，这对不对呢？我认为这是对的。”

△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指挥对红贸派再次进行围剿。

8 月 22 日　反到底派“黄山警备区司令部”武斗队下山向八一五派占据的南岸区中心地带上新街南岸区武装部、区委大楼等制高点发起进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死 22 人，伤数十人，打坏房屋 7 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 17 个和居民 34 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 9183 件，粮食 2650 余公斤。反到底派撤退时担任掩护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红二连一“班长”身亡，次日红二连全连下山将被残杀后暴尸野外的尸体抢回安葬。

△在中央文革作出要求重庆两派停止在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的“三点指示”后，两派继续在该厂武斗。该厂八一五派武斗负责人在准备撤退时下令将关押于地下室的 20 多个反到底派俘虏用手榴弹炸死，因通往地下室的道路被火力封锁未遂。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 3 辆小车送干部到市革筹组听报告，途经两路口时，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遭到想要劫车的三名反到底派武斗人员枪击，五十四军干部处处长张甲奎、司机李永梁遇难，文化处处长郝子义、保卫处副处长曾惠平、卫生科科长齐宗勋、参谋吴士龙等中弹受伤。

△重大八一五武斗队在校内团结广场枪毙俘虏 1 人。

△万县地区梁平县 7 月 16 日武斗后退出县城的“主力军”派在外地武斗队护送下返回县城，以武力优势压垮了“联合指挥部”派。

△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命令各县人武部集训和武装复员退伍军人，组成“围剿贸匪（即红贸派）”武斗队。

△国家计委《关于目前煤炭生产和供应问题的报告》指出，（因受武斗影响）煤炭生产从 6 月下旬以来节节下降，按照 8 月上旬的日产水平，市场用煤、发电和铁路用煤都得再减，这样其他工业部门大部分将处于停产和保温状态。

8 月 23 日　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八一五派大举进攻。杨家坪中心区的八一五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

周围燃成一片火海。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撤退前枪毙反到底派俘虏 5 人（其中孕妇 1 人）。

△两派在铜梁县西泉武斗，死 35 人，烧毁西泉造纸厂原料 200 多吨。

△合川县草街地区和重庆北碚区永红地区八一五派在合川县草街镇成立专业武斗组织“渝、合捍红总部草街分部”。

△经周恩来 22 日夜审阅后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名义发出立即制止重庆武斗的三点指示由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向两派群众组织传达：一，立即停止对一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压厂的进攻，并撤出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向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8 月 24 日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烧毁河运学校实习工厂和库房等建筑。

△两派在重庆交通学院武斗，死 5 人。

△重大八一五三〇二武斗队将该校炊事员 1 人（怀疑其曾为反到底派送情报）毒打、捆勒致死；为灭口，当晚又将其侄枪杀于停尸房内。

△因遭武斗炮击，重庆五〇二发电厂五万机组四台被破坏（占全厂生产能力 70％）。通往杨家坪的 153 高压线被打断，10 条输电线也被打断 7 条。

8 月 25 日　反到底派武斗负责人邓长春在“黄山警备区司令部”批准枪毙八一五派俘虏 1 人。

△华蓥山地区八一五派成立联合指挥部，会后举行武装示威游行。

△因全市武斗不止，市区粮食供应将断，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向省革筹、省军区、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告急。

△忠县造反派武装连队奉命前往万县市和梁平县支援造反派围剿“保守组织”红联站派。

△由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其中提出：“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

8 月 26 日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烧毁河运学校东、西学生宿舍和西教学楼等，至此，该校全部建筑物 15000 余平方米及室内设备全部被毁，损失国家财产 200 余万元。

8 月 28 日　八一五派武斗队凌晨向反到底派占据的北碚歇马场解放军总字 424 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发起进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 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 424 部队红联等撤离。至此，八一五派占领北碚全区，此役被八一五派称为“八二八大捷”。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在这次武斗中动用了非法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并在占领该部队后将军用电台（报话机）15 部、军用雨衣和军装一批等军用物资抢回学校武装武斗队。

8 月 30 日　涪陵驻军支左领导小组通报表扬参加武装围剿红贸派的彭水县武斗队彭水连，称他们是“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军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消灭涪陵地区的贸匪武装，看成是自己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义务，他们和武隆、黔江、垫江、南川的造反派一样，自动组成连队，告别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家乡，跋山涉水数百里，前来支援涪陵造反派，……积极配合、并肩作战，还愉

快的接受武隆县造反派负责人的指挥，彻底打垮了盘踞在太和的贸派武装，光复了太和公社。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缴获的三十多支枪，全部武装了当地造反派。……”

中下旬　两派在杨家坪地区空气压缩机厂等地进行的大规模武斗，参与人员上千，动用了枪炮、坦克，持续一周左右，许多街道房屋被毁，双方死亡上百人。

下旬　永川县两派大规模武斗，占据地委、专署机关的专联司派（又称工农派，与八一五同派）撤走，红旗派（与反到底同派）占领全县城。

本月　省革筹调查组调查重庆武斗损失情况，调查表明，重庆 165 个大中企业因武斗停产或半停产的达 157 个，其中完全停产的达 109 个，因停产减少产值 3 亿余元，厂房和大量物资遭破坏，直接损失达 1 亿元。主要公路被切断，交通基本瘫痪。

△重庆发电厂因武斗全厂停产，35 千伏杨家坪变电站被破坏。

9 月 1 日　周恩来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汇报说到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武斗中一夜之间打了 1 万余发高射炮弹时，痛心地说：在越南 1 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美国飞机！

△两派达成立即停止武斗的初步协议，商定于 2 日 18 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4 日前分点封存武器。谈判前，反到底派工总司负责人邓长春率一批谈判代表乘车下黄山过江进城，在长江边被控制车渡的八一五派武斗人员抓到水泥厂，遭到殴打，经中央调查组和驻军严令放人，邓长春因被杀伤，未能参加两派谈判。

△万县主力军派（与反到底同派）武斗队越过长江，联络云阳、开县、忠县、奉节等县同派群众组织武斗队，合围、堵截红联站派。

9 月 2 日　南桐矿区两派在万盛街上武斗，死 7 人。

△成都警备区、重庆警备区开始护送反到底派躲避武斗赴蓉人员返回重庆。

9 月 3 日　八一五派在北碚召开“八二八祝捷大会”。武斗队员扛着枪、捧着获赠的奖品《毛泽东选集》参加庆功游行。

9 月 4 日　重大八一五为指挥武斗而私设的电台与中梁山地区八一五派“卫戍司令部”勾通联络。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当晚开赴华蓥山建立“根据地”。

△四川省革筹组成员张西挺率省革筹调查组一行 24 人到渝。

9 月 5 日　由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称《九五命令》）。

△江青在接见安徽赴京代表的讲话（时称《九五讲话》）中，一面说坚决反对武斗，一面又说“我声明，谁要向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一定还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按总团决定上华蓥山建立“根据地”，并以私设电台与学校总团勾通联络。

△重庆八一五派举办的《叛徒罗广斌》展览开始在北京航空学院展出。

9 月 6 日　不愿介入武斗的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办的《战恶风》报第二期发表该司令部于武斗炮火正炽的 8 月 27 日呼吁两大派迅速停止武斗，组织力量下乡抢收、抢种的紧急呼吁和要求其下属组织下乡支援农业“双抢”的《特急命令》，并公开表明了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不怕来自左、右两边的攻击，不怕被说成是“右”了、“修”了；反对“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唯观点论”等见解，并在一篇小品文中称武斗中身亡的人不是“烈士”而是“冤士”。

△江津县两派在东羊火车站武斗，动用了枪炮及装上防护钢板的机动船。

9 月 7 日　江津县九七派召开造反周年纪念及武斗“烈士”追悼大会。会后决定将抓到的红总派俘虏 7 人枪决祭灵，次日凌晨执行（7 人中 1 人因执刑者系熟识邻居放空枪而幸免于难）。

9 月 8 日至 9 日　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

9 月 9 日　重庆警备区发布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办法。同日，重庆反到底派发表《紧急告全国人民书》，表示“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公开认错……未经中央允许动用了国防企业的武器、弹药是不对的”，保证“立即集中上交用于自卫的一切武器、弹药”，并抢先作出姿态将一批武器、弹药送往重庆警备区司令部上缴，中央调查组组长陈斌、四川省革筹调查组组长张西挺接见了上缴武器、弹药的代表。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各地组织学习江青《九五讲话》。

△重大八一五《815 战报》第 38 期发表《一支非常革命化的战斗队》，歌颂重大八一五专业武斗组织三〇一野战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文攻武卫的模范”、“重大八一五的骄傲”，在“历次自卫反击战”中“冲在最前面，打得最勇敢”，“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并报道在该校唐世轩、张全兴、李盛品、苏玉发、何孝柱、刘文举、萧在光、高维命、段亚伟等“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后，《我团战士纷纷报名申请参加 301 部队》。

9 月 10 日　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动用了电台，制定了联络讯号，设立了野战医院和后勤物资保障系统，指挥武斗联队兵分三路，以“宣传九五命令”为名，向红贸派发起又一次围剿。成都军区闻讯后来电指出：“部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准携带武器。”但李畔以“上级不了解情况”为名，下令继续前进。

9 月 12 日　重大八一五派赴华蓥山建立“根据地”的三〇一武斗队一小分队在岳池县石垭镇遭到反到底观点一派伏击，武斗队员冯纵（校足球队员）身亡，10 人被俘（经军队干预，双方谈判后释放）。

9 月 13 日　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参加了“武装支泸”（即帮助泸州红旗派武装攻打红联站派）的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返回永川县。

9 月 14 日　中央调查组部分成员上午到达北碚区调查武斗情况。20 日下午离开。

9 月 15 日　市工业指挥部统计，全市工交系统被造反派抢劫船只 18 艘、车辆 354 辆。

9 月 16 日　重庆两大派负责人在市革筹和警备区司令部主持下于上午 9 时签订了《重庆两派关于外出人员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双方商定：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务必于 9 月 25 日前返回原单位；各群众组织已抓的人于 9 月 16 日 14 时前送到警备区司令部；各群众组织修筑的工事、埋设的地雷、各种障碍物等于 9 月 22 日前拆除；全市水陆交通运输于 9 月 20 日前恢复正常，群众组织和个人抢劫的车船，于 9 月 20 日前上交警备区司令部和归还原单位，全市银行、邮电、医院、商店、粮店及其它行业立即恢复正常业务；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立即返回农村。

9 月 17 日　中央调查组、省革筹调查组及市革筹制止武斗小组一同到潘家坪武斗现场验尸，运回 26 具，尚有 6 具待处理。

9 月 18 日　毛泽东在视察路经长沙时接见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在谈及群众组织抢枪、农民进城武斗等问题时，毛泽东说："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支枪。"当黎原说到"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时，毛泽东说："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他还肯定了黎原"发枪"的作法，说："枪发给左派了，现在他又送回来，给你保管好了枪，不然右派就抢跑了，这是个好经验。"

9 月 19 日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刘丰时，杨成武谈到："听说重庆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成都军区急电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不能出兵镇压群众，要停止前进，并规定"四不准"，即不准夜间行动，不准开枪，不准接触，不准穿插。但李畔坚持继续对红贸派进行围剿。

9 月 21 日　武装围剿涪陵红贸派的涪陵地区武斗联队一万多人，动用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三七高炮、重机枪等，于凌晨向逃至丰都县栗子山上的红贸派 2 万人发起总攻。

9 月 25 日　撤离在外的北碚区反到底派从即日起陆续返回原单位，回来后均遭到八一五派围攻，发生武斗，多人受伤。

9 月 26 日　江青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说"有些地方的红卫兵搞了一些过火行为，如什么喷气式呀，挂牌子，下跪呀。但这不是主流，这是支流……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9 月 27 日　突围逃至武隆县黄沙坝一带的涪陵红贸派一万多人遭到涪陵地区武斗联队伏击、围歼。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指挥的对红贸派的武装围剿，自 8 月 14 日起，历时 45 天，追击围歼经 4 个县、22 个区、67 个公社，打死上千人。（涪陵毛主席的红卫兵战报编辑部《涪陵战报》第 12 期，1968 年 6 月 15 日出版）

9 月 29 日　北碚区两派武斗。刚返回单位不久的 845 厂反到底派"八二八"再次被赶出厂。刚返校不久的西农八二六数十人被打伤，负责人李玉麟、陈德学等被八一五派抓走，以私刑逼供炮制出"反戈声明"、"交待"。

△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从华蓥山区撤回，在北碚向驻军上缴了武器。

9 月 30 日　一度撤离的解放军 302 部队"红总"、424 部队"红联"等反到底派组织乘车返回北碚区原单位，遭到八一五派围攻，发生武斗，多人受伤。

△忠县人武部对 13 个造反派武装连队的武器弹药进行了登记，计有轻机枪 38 支、步枪 624 支、手枪 11 支、子弹 26724 发、持枪征 705 份。

7、8、9 三个月因武斗导致大批职工外逃，工厂停产，三个月工业总产值仅完成 2.4 亿元，相当于 3 月份的 75％。

10 月 1 日　重大八一五《815 战报》第 42 期发表《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记我们身边的麦贤得——董继平同志》，报道重大八一五三〇一武斗队成员董继平在 8 月初空压厂武斗中负伤头部中弹，脑浆迸出，经救治后，能用唯一能活动的左手写"毛主席万岁"、"815，301"。

10 月 2 日　两派在西南师范学院武斗。刚返校不久的西师八三一再次被赶出学校，其负责人羊衍海、李盛龙等被八一五派春雷兵团抓走，以私刑逼供炮制出《羊衍海反戈声明》及录音广为传播。

10 月 4 日（6 日？）　反到底派建立“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重庆分站”。

10 月 7 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要求各地组织学习贯彻。毛泽东指示中尽管谈到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但却未对各地发生的大规模武斗表态（只谈到在批判斗争"犯错误干部"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同时还称其视察期间（正是各地爆发大规模武斗的 7、8、9 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0 月 9 日　重大八一五上午在校内风雨操场举行死于武斗中的“段亚伟等十三位烈士追悼大会”。有死者父母到会发言，称他们失去了儿子内心非常悲痛，但是又很骄傲，因为儿子是坚强的八一五战士，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钢铁誓言。

10 月 19 日　中共中央批转林彪 8 月 9 日接见“七二〇事件”后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时的讲话，号召各地组织学习。林彪讲话记录稿由毛泽东于 9 月 13 日、10 月 11 日两次阅批，作了一点小修改，称“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该讲话中按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讲话精神加以发挥，谈到这次文化革命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东西就不能暴露。”

△两派在（北碚）解放军 424 部队武斗，反到底派 424 红联指挥部及广播站被抄砸。

10 月 20 日　市革筹召开大联合动员大会，两派代表共 2800 人参加。中央调查组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讲话。

10 月 22 日　返回重庆的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到市中心游行示威。

△綦江县两派武斗。

10 月 23 日　梁兴初到重庆。

10 月 27 日　反到底派负责人李木森、黄廉、王以时等应邀到歌乐山林园解放军 412 部队（通讯兵工程学院）为该院反到底派红旗造反团举办的中层干部学习班作“形势报告”，当晚在反到底派财贸井冈山宣传队“拥军爱民”演出中，八一五派冲击会场，发生武斗。八一五派为抓获已被解放军驻该学院勤务连（警卫连）接到驻地保护起来的反到底派负责人，冲击勤务连驻地，勤务连执行“九五命令”，在劝阻无效时开枪拦阻，造成伤亡。整个事件中死 32 人，重伤 53 人。事后，按梁兴初指示，勤务连连长、指导员被拘留审查，排级干部被隔离审查，全连被解除武装，集中整顿。

10 月 29 日　“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的母亲刘光友就“一〇・二七”事件发表最最强烈抗议最最紧急声明，称此事件是“砸派黄廉等一小撮”制造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不讨还这笔血债我死不瞑目！”

10 月 30 日　反到底派举办的干部斗私批修学习班开学。原重庆市监察局长、老红军刘文泉发表讲话。

10 月 31 日　八一五派三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红联会、重庆东方红红卫兵）成立“大联合”组织“红卫兵重庆警备区”（简称红警区），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央调查组代表和

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市革筹领导到会祝贺并接受了所献的袖章、胸章。会后举行了游行。

△至本日止，沙坪坝区支左部队收缴武斗枪支 2778 支，子弹 11 万多发，炮 109 门，炮弹 1864 发，手榴弹 9831 枚，炸药 2314 公斤，机动车 67 辆。

11 月 1 日　八一五派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农学院的星火燎原战斗纵队合办的《星火燎原》报发表“英雄母亲张妈妈”张思德母亲（率南充“临联”拥军慰问团到重庆）在北碚区捍红总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其中鼓动说：“把他们（反到底派）那些坏头头整死！把他们整死了，他就轻如鸿毛。……我们人死了，就重如泰山。”

11 月 2 日　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视察重庆大学，观看大字报并与重大八一五负责人交谈。

11 月 2 日至 6 日　梁兴初由重庆驻军和市革筹负责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等陪同，在重庆警备区小礼堂三次（2 日下午、3 日下午、6 日全天）接见反到底派负责人李木森（工总司）、黄廉（工总司）、粟远奎（机关司令部）、徐光明（井冈山红卫兵）、邓长春（军工井冈山）、李盛龙（西师八三一）、刘福均（建院井冈山）等。讲话中明显偏袒八一五派、压制反到底派。

11 月 4 日　中央调查组负责人和梁兴初、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乘东方红 111 号轮船到望江厂视察打捞上来的 8 月 3 日被反到底派击沉的重庆军分区交通艇现场。梁等当场表示对八一五派的支持和对反到底派的斥责。八一五派长航兵团、港口兵团在朝天门码头举行死难解放军三战士追悼会。

△重大八一五下午在校内举行“掀起教育革命新新高潮誓师大会”，染兴初、中央调查组组长陈斌、周恩来联络员温伯华，市革筹蓝亦农、白斌，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等到会，染兴初、陈斌、蓝亦农讲话祝贺。

11 月 5 日　八一五派 242 部队文筹《242 战报》发表长篇报告《为什么重庆市武斗特别严重——向中央调查团汇报》，历数反到底派武斗罪状。

△重庆军分区某部为 8 月 3 日被反到底派击沉的军分区交通艇上遇难三战士举行追悼会，宣布将其中二人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一人追认为模范共青团员。八一五派代表出席。

△梁兴初晚上在人民大礼堂观看八一五派演出大型歌舞史诗《八一五风暴》。

11 月 7 日　江北县武斗事件增加，5 天内发生了 12 起。

11 月 8 日　梁兴初接见财贸八一五代表并观看财贸八一五宣传队演出的文艺节目。

11 月 9 日　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午夜到解放碑地区观看大字报并突击检查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要求上缴武器。又视察了八一五派红旗广播站。

11 月 11 日　梁兴初晚上在文化宫礼堂观看八一五派演出的《红卫兵战歌》。

11 月 12 日　梁兴初由重庆驻军及市革筹负责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陪同视察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医学院，检查拆除武斗工事及上缴武器情况。当晚驻军部队到该学院戒严搜缴武器。

11 月 16 日　反到底派在市体育场召开 50 万人大会纪念《红十条》、《红五条》下达半周年。会前一些反到底派组织赴会途中即与八一五派发生武斗。会后游行时两派又在市中心第二十九中学外武斗。警备区司令部派到现场宣传“九五”命令的宣传车宣传器材被砸毁。

11 月 17 日　市医药公司两派武斗。

11 月 19 日　梁兴初由重庆驻军领导人陪同接见八一五派负责人，讲话中公开赞扬八一五派，指责反到底派，将武斗责任归于反到底派一方，说："那天我和他们（反到底派负责人）谈到早上 4 点，我讲你们再打群众就要反对你们，不是我反对你们，是群众反对你们，因为我是群众中的一个。重庆四百多万人反对你们，那时你们完蛋就完蛋啦！"谈到上缴武器时，梁兴初说，他知道八一五派七医大红总等组织还保存有枪，但又说保存一些枪他也赞成，枪要保存在好人手里，只是要登记，要编成班、排、连，听从解放军调动，只准用于防守、自卫，不准进攻。

11 月 19 日至 21 日　两派在璧山县大规模武斗，反到底派璧山"东彪卫士"撤离。八一五派璧联司占领全县。

11 月 20 日　两派在合川县武斗，"革大"（与反到底同派）撤离，"红大"（与八一五同派）占领全县。

△南桐矿区支左办公室派去制止万盛街上两派武斗的解放军连长被绑架。

11 月 21 日　两派在 242 部队（解放军后勤工学院）武斗，死一人。

11 月 22 日　永川驻军 7784 部队奉命调离，因得到该部队支持、保护的永川红旗派（与反到底同派）担心其调走后永川专联司派（与八一五同派）会重新占上风，发动上万群众卧轨阻止军列开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至次年 1 月 13 日止）的"卧轨留军"活动。

11 月 23 日　继 8 月 1 日成都军区决定成立永川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之后，本日成都军区和重庆驻军又决定成立江津专区（专署驻永川县）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从此永川县城内出现两个支左小组并存局面，各办各的公，各支各的"左"，各爱各的民，两派造反派也各拥各的军。甚至两个支左小组各批各的革委会，永川县 50 个农村公社中就有 30 多个公社建立了两个对立的革委会。

11 月 27 日　八一五派在人民大礼堂召开声援全川专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

至 11 月不完全统计　仅北碚区即发生大小武斗事件 20 多起，死 175 人，武斗造成该区直接经济损失 2300 多万元，粮食 8 万多斤，粮票 18 万多斤，中小学校产估计损失 142 万元。

12 月 1 日　八一五派《山城战报》（革联会机关报）第 38 期、《815 战报》（重大八一五主办）第 47 期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次年在"三一五指示"中周恩来说："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蹋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此后，八一五派被迫宣布"撤销"这篇文章并进行自我批判。

△两派在市人民交通公司武斗。

12 月 6 日　梁兴初到北碚区主持两派负责人谈判，无结果。

12 月 10 日　反到底派在体育场召开"排除干扰，反对迫害"大会。

12 月 11 日　两派在望江机器厂武斗，八一五派占领全厂。反到底派 4000 多人撤到涪陵（次年 1 月 29 日由成都军区送回）。

△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陪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分别接见两派代表各 300 人。

12 月 13 日　两派在（北碚）解放军 424 部队武斗，数十人受伤。

12 月 14 日　因武斗导致煤炭供应紧张，重庆市中区居民用煤实行凭证定量、限量供应。

12 月 15 日　因有群众举报“反到底在大阳沟（菜市场）持枪抢白菜”，重庆驻军派部队包围了反到底派在市中心的唯一据点：设于解放碑东侧友谊商店（“文革”中改名为人民商店）楼上的财贸井冈山总部及“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要求反到底派人员交出枪械。反到底派则认为驻军“支一派压一派”，只收缴反到底派的枪而不收缴八一五派的枪（此前该广播站与附近的八一五派痛打落水狗广播站已从广播对骂发展到不时用枪对射），拒绝部队入内搜查，形成对峙。部队包围至次年 1 月底（春节前夕）才撤走。“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每天在商店楼上窗口挂出大幅标语“非法武装包围××天”（日期逐日更换），墙上还挂满各地支持反到底派的群众组织送来的声援标语、布幅、大字报，引来大批群众围观。成为重庆城内武斗期间一大奇特景观。

12 月中旬　反到底派大批离厂离校，逃往内江、达县、宜宾、涪陵、成都、贵阳等地。

12 月 21 日　璧山县两派武斗，“东彪卫士”（与反到底同派）撤离。

12 月 23 日　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等到八一五派控制的长江电工厂视察，表示对八一五派的支持，称赞该厂是“抓革命、促生产较好的一个厂”。

12 月 23 日至 24 日　两派在云阳县云安、江口大规模武斗，死 2 人。

12 月 27 日　重大八一五将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的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同时宣告该校毛主席塑像落成。支持八一五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主任李世英、首都红代会“八一五兵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鬼见愁”、专县代表、五十四军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战斗英雄陈代富等到会发言祝贺。大会结束时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指挥全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

12 月 30 日　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革筹组挂牌被砸，工作人员多人被打伤。

1968 年

1 月 1 日　因武斗导致煤炭供应日趋紧张，重庆全市自即日起实行煤炭凭证定量、限量供应。

1 月 4 日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长江航运系统实行全线军事管制的决定，重庆驻军进驻长航重庆分公司、重庆航道区、港务局、东风造船厂等单位、实行军管。

1 月 7 日　反到底派 25 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大会。会前反到底派赴会途中多处与八一五派冲突；会后游行至市中心第二十九中学校外时，与八一五派二十九中学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冲突，发生枪战，反到底派以聋哑学校武斗人员为前锋向校内进攻，死 6 人，伤数十人。游行队伍包围二十九中学不散，更大规模冲突爆发在即，直到刚从成都回来的反到底派工总司负责人邓长春到现场附近（原《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外）发表了“省革筹支持我们”的简短演说后才将队伍劝说撤走。

1 月 8 日　反到底派在市体育馆召开“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后抬尸游行。

1 月 9 日　重大八一五武斗人员将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毒打成重伤，致使已返校的反到底派人员再次出逃。

1 月 16 日　市革筹、重庆警备区司令部转发省革筹、成都军区《关于动员群众组织不要武斗》的指示。

1 月 19 日　云阳县红卫兵云阳部队（与反到底同派）撤往万县市。

1 月 26 日　荣昌县武斗严重，永川县和隆昌县之间已停开 11 列火车。

2 月 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时称《二六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 月 9 日　两派在永川大规模武斗，永川专联司派武装打回永川，永川红旗派近万人撤至内江、自贡、成都一带，流落在外长达 7 个月之久，由省革筹给每人每天发粮票 1 斤、钱 2 角 5 分维持生活，当时称为“吃一二五”。

2 月 16 日　重庆警备区在人民大礼堂召开全市公安干警大会，宣布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和重庆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成立。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会上发布了第一号通令。

2 月 28 日　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中央召集重庆两派代表到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

3 月 3 日　两派在长寿云台川东北石油钻探处处本部武斗，持续 6 天 7 夜，死 42 人。财产损失 31 万元

3 月 15 日　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所作讲话时称《三一五指示》），讲话中主要批评了提出“打刘、张”（打倒省革筹副组长刘结挺和组员张西挺）的一派群众组织（成都地区的红成派和重庆地区的八一五派等）。谈到武斗时，江青说：“小青年嘛，爱玩枪。”“不过打一打也好，练习练习。”康生说：“可以改进技术。”

3 月 18 日　两派在四川外语学院武斗。

△两派在市中心大阳沟菜市场武斗，手榴弹炸伤多人。

3 月 19 日　两派在西南农学院武斗，伤数百人。

△两派在长寿县武斗。八一五派撤离。

3 月 20 日　《山城战报》50 期、《815 战报》60 期合刊发表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关于坚决拥护中央首长“3 •15”指示的声明》，公开承认自去年 10 月以来错误提出“打倒刘、张”的口号是“偏离了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时发表两报编辑部关于撤销《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一文并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的声明。

3 月 22 日　在京学习的重庆两派代表发出《就重庆两大派达成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给重庆两大派的公开信》。

△位于市中心解放碑旁边的八一五派痛打落水狗广播站与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互相射击，反到底派死 1 人。

△嘉陵机器厂八一五派占领厂区制高点。

3 月 23 日　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从成品车间抢走枪 172 枝、子弹 23 万发。

△八一五派重庆机校、石油校武斗队在大坪、杨家坪等地拦截过往车辆强行检查，致使全城电车、汽车停驶。

3 月 24 日　两派在建设机床厂武斗，死 1 人，八一五派攻占厂区周围及厂区高地。

3 月 25 日　江陵机器厂八一五派冲击该厂驻军，抢走大批武器，部队宣传制止无效，被迫开枪，打死 1 人，打伤 6 人。

△二钢厂两派武斗，死 10 余人，反到底派撤离，全厂停产。

3 月 26 日　八一五派在重钢三厂拦截了从江北方向开来的 12 辆运送大米卡车和军区从达县拉回粮食的 10 辆卡车。

△反到底派占领了市邮电局电讯大楼，该局战备台、长报台、长话台已不能工作。

△两派在嘉陵江南桥头武斗，死 3 人，冶金局大楼被烧毁。占据嘉陵江南桥头边“特园”（历史上有名的“民主之家”）的八一五派新六中 32111 战斗团武斗队在撤退时，因焚烧传单资料引起火灾，致使曾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的特园主体建筑达观楼化为废墟。

△下午，市中区所有煤店全部脱销。

△两派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主持下达成《立即全面停火、制止武斗的协议》。当晚，八一五派即在反到底派工总司所在地团市委大院对面的市革筹大院里准备进攻工总司。

3 月 27 日　午后 2 时八一五派攻占位于市革筹对面的反到底派工总司所在地团市委大楼，打死 2 人，抓走数十人。

△两派在邮电学院武斗，反到底派撤离。

△长安机器厂八一五派冲击驻厂部队，抢劫部队武器。

下旬　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激烈，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中断，市场粮食、煤炭供应极度紧张，出现抢购现象。重庆警备区组建粮煤专门运输队，以军车带民车突击抢运。

本月　因武斗影响，重钢炼焦炉自本月起停炉。

4 月 2 日　涪陵红联司计划打回涪陵，与“忠实”派在新妙地区对峙。

4 月 4 日　万县地区革筹、军分区发出《给云阳县广大革命群众的信》，称“几个月来，云阳李廖死党的爪牙、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以及混进革命组织内的少数坏人……妄图把云阳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变成李廖死党在下川东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为武装围剿云阳“11·27”派（与八一五同派）作舆论准备。

4 月 5 日　市公安局两派在市局大楼武斗。

4 月 6 日　重大八一五祭扫武斗“烈士墓”鸣枪致哀时打死过路行人 1 人。

4 月 6 日　云阳县两派负责人在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学习，在万县地革筹、军分区、云阳县人武部主持下签订了关于保证流落在外的红卫兵云阳部队一派回县“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

4 月 7 日　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钢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糖果厂，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一中学（今巴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

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一些房屋被毁。

△两派在长安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和大炮，全厂停产。

4 月 9 日　因受武斗影响，八一五派控制的《新重庆报》发布《告读者》，称因纸供应不上，从 4 月 11 日起暂停出版。至 5 月 15 日恢复日出半张（两版），只发新华社电讯。

4 月 10 日　綦江松藻矿区两派武斗，数百人受伤，数千人出逃。

4 月 11 日　重庆铁路分局九龙坡机务段两派武斗，成渝铁路一度中断。

△两派在新华印刷厂、长江橡胶厂、公安消防总队、二轻工业局、儿科医院等地武斗。

4 月 12 日　两派在电力学校武斗，因反到底派在校实习工厂红旗电厂烟囱顶上安有广播喇叭，烟囱被八一五派炸毁。武斗中另有学生宿舍 6 幢被烧毁，自备发电厂被毁，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

△两派在江陵机器厂武斗，死 3 人，反到底派武斗队从装配车间抢走“三七”高炮弹三箱，手榴弹一箱。

△重庆钢铁公司两派在停火谈判会上武斗，当晚事态扩大，死 1 人。

4 月 13 日　两派在长江航运局武斗，死 2 人，港口运输瘫痪。

4 月 14 日　两派在江陵机器厂武斗，死 2 人。

△嘉陵机器厂八一五派武斗队从总装车间抢走子弹一卡车，并抢走驻厂部队枪支 10 枝。

△两派在长安机器厂武斗，驻厂部队遭射击。

4 月 14 日—15 日　两派在长安机器厂武斗，死 3 人，机器、厂房严重受损，全厂停产。

4 月 16 日　四川省革筹组组长、解放军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对制止重庆武斗作出三点指示。

4 月 18 日　万县地革筹、万县军分区批准“主力军”派成立万县市文攻武卫指挥部。

4 月 23 日　重庆两派分别在嘉陵江大桥北岸的长安机器厂、江北区委、华新街和南岸的第六中学等地以轻重机枪、迫击炮、“三七”高射炮等进行对射。

4 月 24 日　大坪地区八一五派连续抢夺驻该地区部队武器；反到底派抢夺市公安局手枪 70 多枝、市革筹组小车一辆和警备区司令部运粮专车二辆。

4 月 25 日　江北区公安局两派武斗。反到底派公安红一方面军江北区人民警察总部被抄砸。

4 月 26 日　通用机器厂和三十二中八一五派抢夺驻厂部队和嘉陵机器厂武器；江陵机器厂反到底派抢夺驻厂部队武器；河运学校反到底派抢夺部队武器并在两路口抢走警备区小车一辆。

4 月 26 日　忠县三代会文攻武卫司令部改名为忠县文攻武卫司令部，由县革委和人武部直接领导，对所有武器登记造册，清缴散失武器。

4 月 27 日　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强调省革筹和军队内部要搞好团结，批评了在刘结挺、张西挺支持下“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把矛头指向军队的一派群众组织（成都地区的八二六和重庆地区的反到底等）。这次讲话被称为《四・二七指示》。至此，“三一五指示”与“四二七指示”对四川、重庆的两大派“各打五十大板”，形成两派“你有三一五，我有四二七”，各有所恃的局面。

4 月 28 日　八一五派武斗队两次冲击 351 仓库抢夺武器，并用手榴弹炸死解放军战士和群众各 1 人，炸伤解放军战士 4 人、群众 8 人。又抢走 405 团大批枪支，打伤团长及 125 人。

△周恩来于 16 时指示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找重庆八一五派负责人谈话，指出他们抢枪是违犯“九五”命令的，直接影响战备和援越抗美的任务，是非常错误的。为此：一，要他们立即停止抢武器的错误行动。二，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三，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严办，中央马上向全国通报肇事的为首分子，是盗窃国库的坏分子。

△市消防大队奉公检法军管会命令于晚 9 时 25 分去长安机器厂救火（厂办公大楼失火），途经重钢三厂时，遭该厂反到底派武斗队截击，消防干警死 9 人、轻重伤 17 人（其中解放军战士 2 人），被抓走 23 人，消防车被打坏 3 辆。

4 月 29 日　周恩来 10 时 30 分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 4 点强硬指示，要求对 28 日发生的八一五派抢夺 351 仓库武器和长安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两件事必须严肃处理，否则通报全国；八一五抢 405 团的枪要交回；强调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办，这是中央的意见，军委的意见。下午 3 时 40 分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 10 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4 月 30 日　重大八一五总团负责人率八个单位的八一五派武斗队到驻军某团上缴武器并作检查。

5 月 2 日　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中央《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和周恩来 4 月份两次指示，严令各派武斗组织于 5 月 7 日 18 时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将予以强制取缔。

△八一五派发出《关于立即全面停火，上交武器的紧急命令》，宣布将于当日 18 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7 日 18 时前上交全部武器，但又宣称“如再有开枪等类似事件发生，我八一五革命派应积极协助警备区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制止。”

△占据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儿科医院的八一五派与占据市体育馆的反到底派展开枪战，市体委大楼遭燃烧弹和六 O 炮袭击。

5 月 3 日　两派在嘉陵江两岸和南山上黄葛桠地区展开炮战。

△重大八一五发表坚决拥护重庆警备区“五二”通告的紧急声明，决定在 5 日 12 时前把全部武器弹药、爆破器材、军事物资上交警备区。并决定从即日起解散一切武卫组织，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恢复。

△达县、开县、开江县和万县市造反派联合组成的“开江战役联合指挥部”与开江“二一０”派驻永兴场武斗队激战一天。双方共死 57 人。

5 月 4 日　重庆市公安局两派武斗。

5 月 5 日　两派在南桐矿务局武斗，动用了机枪、高射机枪、迫击炮，重伤 3 人。

△两派在中梁山煤矿武斗。

5 月 12 日至 14 日　长寿县武斗严重，群众纷纷外逃，国家粮库被抢，11 万多斤粮食被私分。

5 月 14 日　在北京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学习的重庆两派代表发生武斗。

5 月 17 日　两派在大足县高坪公社武斗，死 8 人，经济损失约 80 万元。

5 月 18 日　万县地区“主力军”派在军分区支持下开始进行围剿云阳“11·27”派的“武装解放云阳”大规模武斗。

5 月 19 日　忠县革委会发出《关于贯彻地革筹〈进一步贯彻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的意见》，称该县文攻武卫司令部为保卫忠县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很大成绩，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他们的行动，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5 月 20 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党政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全国煤炭会议代表等，其中包括重庆两大派在京学习班的代表。

5 月 26 日　涪陵红联司攻打蔺市镇。

5 月 30 日　云阳县两派负责人在北京学习班再次签订保证在外一派回县“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

5 月 31 日　重庆两派分别举行庆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后游行途中，两派在两路口等地发生武斗。

△万县市四代会与万县、忠县、梁平、开县、奉节、巫溪、巫山、城口三代会，万县市、忠县、梁平、奉节、巫山文攻武卫指挥部（司令部），开县野战民兵师、万县直属民兵营等发出《就云阳问题的再次联合声明》，宣称将武装护送红卫兵云阳部队一派返回云阳。

本月　重庆市四周专县武斗激烈进行，通往重庆的水陆交通仍然断阻，1 至 5 月各地计划调往重庆市粮食 2.395 亿公斤，实际只调入 1.26 亿公斤。至月底，全市粮食库存仅 4000 万公斤，其中大米仅够 7 天供应，有的粮店脱销。驻渝部队紧急成立调粮办公室，以军车突击抢运粮食，保证供应。

本月　市革筹和五十四军联合设立的干部集训队（设于大坪交通学校内）开始陆续收押市、区级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先后关押了前市委书记处书记孙先余、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廖苏华、市妇联主任（前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夫人）华逸、市中区委书记王墨林、市委办公厅主任王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友凡、副市长兼市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余跃泽、副市长马力等 34 人，昼夜进行“斗、批、打”的法西斯审讯，并辅以劳改折磨。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王颂咸被迫害致死。该集训队至次年 4 月底结束。

6 月 2 日　所谓“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支持八一五派的五十四军政委蓝亦农任主任，两派负责人各数十人（其中一些是直接指挥和参与武斗的负责人）进入革委会担任了委员职务，担任副主任的两派负责人有黄廉（反到底工总司）、袁金梁（八一五革联会）、李木森（反到底工总司）、熊代富（重大八一五）。成立庆祝大会上，二轻兵团部分成员抬一尸体冲击主席台，与值勤士兵发生冲突。从主席台上下来帮助值勤士兵维持秩序的反到底派负责人李木森、邓长春在混战中被打伤。

△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嘉陵机器厂武斗。

6 月 3 日　万县地区万县市、万县、梁平、开县、忠县、巫山、巫溪、城口、奉节、云阳九县一市武斗队数万人分

五路进攻云阳县，与云阳县“11·27”派武斗队展开大规模武斗。

6 月 4 日　市革委负责人布置对“钻进两派”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清查。随后，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即市公检法军管会）布置对全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摸底排查，列出逮捕、拘捕、集训、管训名单。

6 月 6 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维护革命新秩序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必须解散武斗组织，召回武斗人员，拆除武斗工事，在 6 月 12 日 18 时前将所有武器弹药无条件上缴。逾时不交者，以窝藏军火论处。

6 月 12 至 13 日　两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学（今兼善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 6 人。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身亡的猛虎团负责人王树良等 3 人被暴尸街头示众三天。八一五派实行戒严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6 月 13 日　两派在大足县青坪公社斗碗寨武斗，死 10 余人，经济损失约 80 万元。

6 月 14 日至 17 日　北碚区连续发生支左办公室和驻军部队武器弹药被抢事件，被抢走枪 887 枝，子弹 9 万多发。

6 月 18 日　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开展“对敌斗争”，由武斗队将原校党、政领导及教授 50 余人逐户抄家后挂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等黑牌子批斗、毒打、游校，会后关入“劳改队”，宣布“不服从管教要放血放气”等《入队须知》，对被关人员强迫交待“罪行”，强迫进行重体力劳动，并以罚跪、捆绑、吊打等武斗手段实行法西斯专政。至 1969 年 2 月止，该“劳改队”共关押 70 人，其中迫害致死 2 人，致残 10 人。

6 月 27 日　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原重庆市公检法机关的副处长、副庭长，区、县公检法机关的副局长、副院长、副检察长、副政委（含副教导员），省二监狱副监狱长以上干部及相应职务干部 143 人送往巴县跳石公社黄泥湾市公安局战备档案库房集中隔离审查。其中一些干部遭到残酷批斗。

6 月 30 日　鉴于市内各处出现抢夺解放军武器弹药，抢劫各种车辆，酝酿大规模武斗的迹象，市革委、重庆警备区联合发出《紧急通令》，严令禁止武斗。

△长江电工厂两派下午 5 时至次晨 6 时武斗，八一五派占领全厂，随后从厂内运走大批子弹。

△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抢夺驻工业学院部队枪枝，与反到底派对射。

△重庆师范学校、市第一中学、光明中学等单位八一五派武斗队和市第十五中学、煤炭学校等单位反到底派武斗队分别抢夺部队武器。沙坪坝区几所大、中学校及工厂的八一五派下午抢夺了区武装部汉源路武器库后，因发现武器大多是从群众组织收缴上来的不能用的破旧枪支，晚上又去区文化馆内武装部办公楼抢夺武器。在冲击大门时，有人欲抢夺一卫兵手中的半自动步枪，争夺中枪走火，打伤二人，打死第一中学学生一人。

△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武斗。八一五派在该地区戒严抓人，抢夺了江陵机器厂试验靶场的三七炮 4 门及炮弹若干发。深夜八一五派攻占重庆搪瓷厂。

上半年　重庆四大煤矿（天府、南桐、松藻、中梁山）因武斗严重减产，产煤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从而导致全市用煤极度紧张。由于缺煤，全市冶金系统用煤的生产几乎全停，火车无法启动。近郊 221 个民用煤供应点，脱销 147 个，其余的也是时断时续供应。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　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水陆两用坦克、野炮、履带

火炮牵引车、轻重机枪等，八一五派攻占全厂，随后从厂内运走大批枪枝。

6月30日至7月2日　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八一五派攻占全厂。

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的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颁发《布告》（时称　《七三布告》）。

7月4日　八一五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实行戒严，抄家抓人。

7月5日　市革委副主任、反到底派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区支左办公室刘政委一起主持江陵机器厂两派谈判达成立即停火、上缴武器、调查处理抓人问题等三条协议，转眼即被破坏。

7月6日　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120榴弹炮、火箭筒等，江陵机器厂4个车间和中心计量室、厂内家属区、街上居民区遭连续炮击，若干精密机床、计量仪器遭破坏，厂内203小学和一些家属区房屋及石门街上民房被打坏。伤亡多人。驻军领导召集两派负责人谈判，达成于11日20时停火的协议。但签字1个多小时后（次日凌晨）武斗又重新开始。

7月7日至9日　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四管联发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八一五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重医一院药房、库房、材料科被抢劫一空，大量贵重医疗设备遭到破坏。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月8日　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和江北区支左办公室代表到江陵机器厂主持丙派协商，于当晚22点30分再次达成立即停火协议，1个多小时后武斗再起。

7月9日至12日　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水陆两用坦克、高射机枪、三七炮、八二炮、120榴弹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一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八一五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上旬　重庆两派在大坪、杨家坪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群众死伤惨重，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线网被打坏，导致全线停车一年余。

7月16日　重庆八一五派及邻近几县同一派的群众组织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并在石燕桥及李市镇、安富镇等地先后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一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不论哪一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坚决按中央“七三布告”办事。

7月17日至18日　重庆两派在交通学院武斗，八一五派攻占全院，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7月中旬　由于武斗，又有大批群众外逃。全市7月份计划调入粮食8900万斤仅完成28％，全市粮食供应又趋紧张。

7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陕西地区连续发生抢劫银行、烧毁仓库、中断交通、抢夺武器等事件颁发《布告》（时称《七二四布告》）。

△南桐矿区两派在红岩煤矿工人村武斗。

7 月 28 日　毛泽东与林彪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陪同下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毛泽东在讲话中专门谈了制止武斗问题，严厉指出：“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重庆长安机器厂与东风造船厂两派武斗，死 2 人，伤 3 人。

7 月 31 日　两派在大足县三驱、宝兴、城南、城西等公社同时武斗，死 100 余人，经济损失约 200 万元。

8 月 3 日　下午 6 时左右，潼南县武斗组织从涪江对岸向城内发射迫击炮弹，其中一发炮弹在县粮食局职工食堂门前爆炸，炸死 13 人，炸伤 5 人。

8 月 6 日　万县地区“主力军”派九县一市武斗队攻克云阳县城，抓捕“俘虏”341 人（其中县委正、副书记 3 人，副县长 1 人，部、局长 7 人），枪杀“俘虏”32 人。云阳县“11・27”派撤离前于 7 月 15 日夜锯开县人民银行国库门锁，强行提取现金 72.5 万元，随后经巫溪、城口翻越大巴山逃往陕西平利县。在这场持续两个月的大规模武斗中，发生了江南“穿心战”集体枪杀 38 人，祖师观武斗打死 156 人，江口大会堂棍棒打死 18 人，巫溪朝阳追歼杀害和冻死 67 人等罕见惨案。自 1967 年 8 月开始武斗至此次武斗结束，云阳全县共被打死 1021 人，其中抓捕后杀害的 622 人。云阳成为“文革”武斗重灾县。

8 月 8 日　万县地区九县一市“主力军”派武斗队在云阳县云安镇召开“庆祝云阳解放庆功大会”。

8 月 9 日　白斌、唐兴盛代表重庆市革委会在成都与反到底派外逃人员代表座谈，动员回重庆抓革命促生产。

8 月 10 日　重庆警备区召开支左领导小组碰头会，传达林彪关于“制止武斗是当前的战略部署”、“当前谁离开制止武斗，谁就是离开中心”的指示。

8 月 11 日　李大章、刘结挺代表四川省革委会接见反到底派外逃人员代表，动员返回重庆。

8 月 22 日　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 4500 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9 月 5 日　重庆两派分别举行纪念《九五命令》下达一周年大会，并分别到警备区上缴武器。许多武斗人员在缴枪途中最后“过把瘾”，肆意对空鸣枪，山城上空一时枪声大作，震耳欲聋。

9 月 9 日至 12 日　永川红旗派在省革筹组织的护送下陆续返回永川县。

9 月 13 日　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建立了管训队和集训队（集训队于 1969 年 2 月合并到管训队）。

9 月 14 日　全市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牛鬼蛇神”实行大逮捕，逮捕 62 人，拘押 326 人，集训、管训 234 人。市革委人保组管训队以严刑逼供，追查所谓“刘少奇黑根黑线”、“武斗幕后指挥”、“潜伏电台”等，将以民革中央委员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候补委员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为首的一批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打成所谓“反到底派黑高参团”，于 10 月中旬炮制出重庆“一号专案”（即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大冤案。在管训队中，迫害致死夏仲实等 20 人，致残裴昌会等 3 人，以“反革命罪”逮捕 7 人，管制 6 人，戴“反革命”帽子 20 人，交单位或街道审查批斗 130 人。

9 月 16 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国防工业工厂和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部分代表，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重庆望江机器厂两派武斗问题。当周恩来谈到该厂武斗中打了两万多发炮弹，该厂八一五派代表坚持说他们一炮也没有打时，江青说："打也不是打了吗？暴露了敌人，锻炼了小将"。

9 月 23 日　重庆市革委、警备区作出《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决定〉的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必须于 10 月 15 日前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10 月 15 日　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自即日起撤销八一五派的重庆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包括重庆机关造反联合指挥部、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农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兵重庆警备区；反到底派的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重庆市农民革命军反到底司令部、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重庆中学生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重庆机关反到底司令部、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同时宣布撤销的还有，八一五派：重庆八一兵团总部、重庆二七战斗团总指挥部、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二分团；反到底派：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一支队、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财贸井冈山总部。群众组织的市一级各总部撤销后，一些基层组织也就无形中解散了。余下的一些很快也在"归口大联合"中不复存在。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10 月 28 日　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市公安局直属单位的 921 名干警集中到大坪公安学校进行"揭、批、查"，规定"五不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出校门，平时不准回家）。同时将巴县黄泥湾集中审查的处以上干部也集中到公安学校，一部分继续武装看押，一部分交原单位揭发、批斗。

11 月 7 日至 8 日　在北京召开的国防工业工厂"八一五会议"上，重庆反到底派武斗头头、四川省革委常委邓长春和八一五派武斗头头、重庆市革委常委方文正被逮捕，与会代表揭发了二人指挥武斗、枪杀俘虏等罪行。

11 月 9 日　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召开"全面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公布了邓长春、方文正的罪行材料。此后，一些重大武斗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和杀人凶手陆续受到清查处理。在这次大会上，重庆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讲话中宣称："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邓长春背后有一个黑高参团"，由叛徒、特务、走资派组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组成的将官集团"相勾结。讲话中并将前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于克书、前中共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路斌武等干部公开点名指责为操纵反到底派的"黑手"，将重钢公司以中层干部为主的反到底派群众组织《遵义红旗》称为"坏组织"，诬称这些干部"挑动两派武斗"，在武斗中"出谋划策"，甚至"赤膊上阵"等，从而为重庆文革中的"一号专案"等许多冤案的炮制出笼定下了调子。

11 月 11 日　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在巴县陈家桥炮兵学校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学习班负责培训省革委、成都军区作为"彻底改造公安机关的新生力量"而从农村招收的 1190 名复员军人。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代表市革委、警备区作砸烂公检法的报告。学习期间将原重庆市公安局长刘佑东、副局长王一押到学习班批斗、毒打。

11 月 20 日　市公检法军管会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事件（枪击军车致解放军死伤）的直接责任人、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队负责人朱登明逮捕（1979 年 12 月 11 日，市中区法院以枪击军车致解放军死伤罪判处朱登明有期徒刑 18 年）。

11 月 26 日　按照毛泽东部署，重庆驻军于 10 月开始换防。重庆市革委会本日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 20 万人"热烈欢迎十三军光荣进入四川和重庆大会"。

11 月　到本月止，南岸区共收缴武斗枪支 1267 支，子弹 29 万发。

1969 年

1 月 5 日至 8 日　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三天中在公安学校组织大、小会批斗了被集中审查的公安干警 38 人。市公安局二处干部张永恭、公安学校医生韩珍被迫自杀。

1 月　坐落于沙坪坝区沙坪公园内，群众自发修建的武斗死难者公墓结束了最后一批墓茔的修建。从 1967 年夏以来，此地先后建起了 113 座墓茔。其中现存碑文资料可考的 92 座墓中安葬了 345 人。死者多为武斗直接参加者，少数为无辜遇难者。在有职业身份资料可考的 299 位死者中，最多者是工人，占 176 人，其次是学生，占 104 人（其中又以普通中学学生最多，占 82 人）。在有年龄资料可考的 196 人中，最多者是 20 岁以下，占 69 人，其次是 21—30 岁，占 66 人。年龄最小者 14 岁，最大者 60 岁。因武斗中沙坪坝区为八一五派占领区，此地安葬的死者多为八一五派成员。这是全国至今保存完好、颇具规模的唯一的武斗死难者公墓。

2 月 4 日　重庆军民 15 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欢送首批 1.2 万名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自此，大批中学生被赶到农村，其中一些人继续参加了当地已处于尾声的两派武斗。

3 月 25 日　重庆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建立"群众专政大军"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建立"群众专政大军"和"群众专政指挥部"。到 7 月止，全市"群众专政大军"人员已有 30 余万人，大量出现乱抓人关人，乱搜查抄家，刑讯逼供等武斗行为和违法乱纪事件，被群众骂为"专政群众大军"。

5 月　干部集训队解散，部分人员转到设于市委党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接受批判。原市委办公厅主任王若在学习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

7 月 7 日至 8 日　万县地区开县两派分别抢夺了县人民武装部和县警备中队的枪支弹药。于 21 日、26 日再次发生武斗，死 6 人，伤 60 人。

7 月 13 日　涪陵地区垫江县"勤务站"一派（与八一五同派）8300 人组成"万人上京告状团"，要求中央承认其为革命群众组织，经长寿乘船于本日上午到达重庆，进占重庆火车站内重庆—北京特快列车，造成 20 次特快列车停运 18 天，7 月 17 日重庆站发出的各次列车全部停运一天。重庆站收入损失 60 万元，毁坏铁路车辆、电器设备，毁坏、丢失卧具，抢走食品等各项损失共计 639586.84 元。

11 月 17 日　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刘结挺、张西挺、谢家祥、徐驰、何云峰、郑志士联名发出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全省所有的群众组织所办的小报、刊物和有线广播（站）一律撤销"。

1969 年以后，重庆除去个别地区和单位还不时发生因派性冲突而引起的打、砸、抢、抄、抓一类武斗外，武斗从总体上转变成为所谓"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人保组"、"专案组"、"清队办公室"、"批清办公室"、"群众专政大军"等机构对被清查、批斗、关押、审讯的人员进行人身摧残的形式，其间又有一大批干部、群众被毒打折磨致死、致残、致病，并造成大量冤案。

1971 年

5 月　重庆市革委会委员、长安机器厂反到底派负责人吴凤岭因在 1967 年 8 月 21 日率武斗人员从人民银行江北城分理处强行提走人民币 67 万元，经四川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由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逮捕（1976 年 8 月释放回厂）。

6 月 5 日　四川省人保组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全市共发生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 22 起，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 1737 人，作案凶手 878 人，已拘捕 239 人。

1975 年

7 月 17 日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市委报告称：武斗杀人案件已处理罪犯 88 名，其中判处 5 年以上徒刑 14 名，免于刑事处分 44 名，释放 30 名。

几点说明：

一，本文编写中参考了《重庆市志·大事记》（重庆地方志办公室编）、《重庆市市中区志》（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南岸区志》（重庆市南岸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共江北区地方史大事记》（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南岸区地方党史大事记》（中共重庆市南岸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党史大事记·第二集》（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市沙坪坝区志》（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共北碚地方党史大事记》（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市九龙坡区志》（重庆市九龙坡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大渡口区志》（重庆市大渡口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共重庆市万盛区委历史大事记》（中共重庆市万盛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大足县党史大事记》（中共大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綦江县党史大事记》（中共綦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忠县地方党史大事记》（中共忠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云阳县大事记》（中共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万县市历代战事和灾害》（万县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委政研室、市农经委编）、《涪陵市志》

（四川省涪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大学校史》（重庆大学出版社）、《重庆公安 1949—1997 大事记》（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李衡之《重庆武斗琐记》（载重庆市南岸区《南山风》杂志 1999 年 2、3 期）、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等书刊和文革时期的传单、小报，还参考了友人俞琦先生（已故）编写的《1967 年重庆武斗大事记》、《1968 年重庆武斗残记》，文革报收藏家张瑞华先生编写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等，俞、张二先生还无私提供了他们收藏的文革资料给笔者查阅，云南周孜仁先生提供了他收存的全部《8.15 战报》给笔者参考，天津南开大学江沛先生也在百忙中协助查找了有关资料。还有其他一些当年的知情者提供了有关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二，万县、涪陵等地区的市、县在文革时与重庆市一样属四川省，重庆直辖后才归属重庆市。考虑到其文革武斗与重庆武斗互有关联，故将已接触到的有关资料一并收录。

三，文革中的武斗，大致可分为三类：初期在各级党委和工作组领导下批“黑帮”、“破四旧”中对批斗对象进行体罚、殴打、抄家及社会上砸毁文物等行动；群众组织建立后不同观点派别间的斗殴、征战；“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及其所属整人机构（如专案组、清队办公室、群众专政大军等）对被审查人员进行的刑讯逼供。本大事记主要记载群众组织间的武斗。

四，因资料欠缺，本文记述尚不完备。加上武斗问题十分复杂，除去个别明显事例外，对于两派在武斗中的责任，一般不作判定。怎样表述更准确，有待研究。恳请有识之士提供宝贵意见。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编辑部。

请注意学生和工人造反派的差别 老田

一、学生处在相对年少的阶段，思前想后的意识较为薄弱，与工人相比这是政治上的一大缺点，特别是中学生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更差些，武汉文革期间拿枪打死人的几起事件，都是中学生干的，这是年龄和个人心里成熟与否，在政治上的不同表现和落差。

二、大学生处于相对不稳定状态，在搞完运动之后注定要分配，挪地方，因此对当权派的对立和冲突有一个调和与缓冲余地，在政治竞争意志上前期往往很激进（因为较少考虑后果），后期往往要相对软弱或者右倾（因为实现冲突有转移与缓和的可能空间）。这是当权派说工人有野心的依据所在，工人和当权派的冲突发生之后，多数人还要在物理空间上继续与当权派共存，这是工人在运动早期要求稳重（看重后期风险），在运动深入之后坚定要求足以与个人政治安全相适应的主导权的原因（要求适当的政治保护）。

工人和大学生的政治分化是全国性的。重庆处在分化的一个极端上，而且分化很早发生，也很深刻，学生因此被当权派利用，政治裂痕一经产生，就会形成竞争态势，敌对程度会自动放大。在另一个极端是武汉的情况，工人和学生合作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没有发生表面分裂，武汉钢二司和新派学生组织，都在政治上跟随和支持工人直到最后。但是政治上的落差还是存在的，在 1969 年反复旧运动期间，学生领袖普遍在私下不赞成这个运动，因为在清队期间主要受打击的是工人造反派，而且当权派这么做也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学生终究可以通过毕业分配和下乡运动分散和离开本地，在本地的政治影响最终会“自然”消失；而对付工人造反派只能是从政治上硬性清除。这个在感受上的落差，也明显体现为政治分化，武汉钢二司和新派学生领袖对反复旧，只是一种道义支持，私下里并不赞成。

学生和工人在政治上的落差，全国都有体现，长沙最后发展到“湘江风雷”要在政治上批判和教育“长高司”的地步，长沙工人组织和学生组织的分化程度，可以说是处在武汉和重庆中间的位置上。

对本身政治处境和安全的体会，当权派对学生和工人的不同处置，是工人和学生在政治上分化的客观条件，全国都是存在的。

三、至于当权派能够利用学生与工人中间的落差，制造事端，最终把一派拉过去，这一个方面说明当权派在政治上的成熟，政治手腕高明；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和优越的历史背景，多数是为人们所普遍尊重的老革命；以及与革命经历相联系的政治经验和手腕；此外当权派普遍政治竞争意志十分坚定，这是他们队自己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冲击的强烈不认同，以及对自己把握局势、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信心，政治经验和智慧也明显会强化他们对造反派的蔑视和对自身优越感的强化。

而在群众组织中间，工人想要主导学生运动是极其困难的，黄廉的感受是符合现实的，至于重庆的武斗，我个人的看法，反到底基本上没有落太大的下风，反到底的谨慎是对的，如果反到底急剧升级武斗，肯定军队要组织民兵甚至正规军参战的，这个不能低估当权派的政治竞争意志。换言之，这个问题的确不是反到底能够在重庆解决的，反到底的谨慎最终是减少了两派群众在武斗中间的牺牲的。

在重庆案例的个别处置上，周恩来的“和稀泥政策”前提是给军队出路，等待他们回头，如果军队不回头，这个政策就是有错误的，开始就应该象 1968 年 315 指示那样态度鲜明，最终要达到足以瓦解 815 的程度。确实在重庆的案例中间，周的政策一个方面无助于学生改正错误回头，一个方面助长了 54 军的骄横气焰，无法收拾，最后是在 1968 年底，把 54 军换防云南了事。结果重庆武斗的进攻一方，没有得到中央的有效抑制。

在四川 50 军是起义部队，虽然人马早就换了多少遍，但是政治上的谨慎传统确保留着，他们基本上是支持造反派并执行中央政策的，因此成都地区的武斗就不是特别突出；54 军是一个英雄部队，第一任长官是黄永胜，在政治上也是一支骄兵，他们与继任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战功卓著梁兴初一样，都更多的是随心所欲行事，自认为是有藐视中央权威的资格。54 军的早期首长后来进入军委办事组，更是有所依仗。

四、造反派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组织严密性，达不到足以主导地区形势或者运动形势的高度，不要说无法主导对立面，就是主导组织内部也是困难的。黄廉谈到他们组织内部的分歧，就是这样一个在组织成本方面难以克服、当时没有

解决前途的困境。造反派一方面无法在觉悟和政治意识上统一，也无法采取强制管理手段来整合内部，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思潮，更是在现实中间无法建立政府管理秩序、或者在内部使用强制管理手段，借以引导或者消弭各种内部分歧和冲突，从而实现一致对外。

这实际上也是客观政治条件决定的，如果造反派是革命时期那种“哀兵”——造反的风险和成本为零，则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问题恰恰在于造反派的造反风险和成本不为零，因此造反派中间的大多数，不感觉到有把个人目标放弃掉、把个人努力 100％融入集体奋斗的需要，而这恰恰是平民阶层能够完成政治整合的前提，也是毛泽东革命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强大敌人的原因。因此文革期间造反派实现高度政治整合的客观条件确实没有，在难以运用各种强制管理手段的情况下，组织内部的整合也是无法完成的；这个政治现状转换成为外部条件，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当权派并没有达到让造反派和老百姓彻底绝望的程度，这个政治形势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文革无法演变成为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也决定了造反派内部整合的困难。

实际上直到今天，在重庆的造反派内部，当年的政治分化还在起作用，815 派的一些人士所写的文章，一看就知道他们还是当年的 815。815 战报主编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与我》，反映的其实就是对政治完全没有感觉，对过去所作所为完全无法反省的政治无意识状态，这个政治无意识状态，反映的是他不认为自己非要主导政治、并有独立把握自身政治命运的需要，是一种“可以仰仗官老爷”意识的不自觉状态，所以他那个长文章基本上还是处在“生命不息，派性不止”的层次上，停留在当初与反到底进行政治竞争时期的感受上，这个文章可以在网上搜索到。这个人的存在和表现，是客观政治条件所决定的政治现实的一部分。815 无法控制政治局面、没有政治主导意识的结果是：他们自己是从否定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起家造反，最后是他们自己成立 815 革委会后，也走到批斗管制教授才能标榜自己革命、以执行资反路线结束，政治上的无知导致政治上的自我否定，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处处表现出一种毛泽东把他们从襁褓中拖出来的强烈怨恨。读一下周孜仁的文章，也是很有价值的。

五、对于四川和重庆的现实

在实际的重庆武斗中间，反到底即使没有全力进攻，也大致上处于略占优势的程度。牺牲要多些，这是军队支持 815 和武器分布情况决定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缺少子弹，因为生产子弹的长江电工厂控制在 815 手里，这也与他们没有全力进攻有关，防守的牺牲总是要大一些。总体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消极坐等。

周家喻这个人也做过访谈，没有充分展开，他也没有授权上网，他本人的情况比上海的安文江一流要好些。815 还真谈不上很特别的收买，他们早期是很正宗的造反派，大致上可以看作是政治无知者加上了一点自己的私心，误入重大历史关头的事实起了决定性作用，无法按照事态的长远发展去主导自己的政治站队过程。一经站错队之后，系列事实错误都是早期一点点小错误的僵持和发展。

确实如你所言，百万雄师之类的危害有限，而 815 的问题仍然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很无辜，因此“死不改悔”的程度就很高。周家喻说他们夺权也没有实际上掌权呀，但是他至今没有看到他们支持了谁掌权，他们参与了压制什么人，他只觉得自己很无辜，得不到理解，这其实就是为什么学生组织容易误入歧途的原因。缺乏政治远见和实际的政治家素质，在重大关头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在事后也缺乏调整错误的明确政治意识，一切跟着感觉走，这样的人如果不被利用，还有谁是被利用的理想对象呢？815 里面如熊代富这样的人，可能是有问题的人，根据我个人的判断，周家喻和周孜仁这样的人，大概还不是接受收买的人，粉碎四人帮之后，周家喻也被判刑 15 年。

王茂聚攻打泸州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说他是“刘张王国”的人，泸州的驻军是支持保守派的，把造反派都打出去，跑到宜宾等地，三次武装支泸主要力量都是宜宾的造反派，正规部队基本上没有去，有一个 54 军（该军驻广元的一个师是支造的）的作战科长张竞参与造反派指挥工作。王茂聚自杀的原因是周恩来不肯承担责任，当时的说法是周恩来指示给造反派发了三百条枪，武装支泸之前周恩来也是同意的，省革筹也同意。在北京会议上，省革筹和周恩来都不出来说话，他才感到自己非自杀不可的，这个时候全国的大背景是要开始恢复秩序，各地当权派都借消除混乱的时机，开始系统清算造反派。四川在北京学习班自杀的地委书记级别的人，还有陈沐，他也是真心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也确实有武斗控制局面的现实例子，例如郑州，根本原因也是有刘建勋等人能够掌握住局面，上面是武汉军区改组。即使是在这个现实下，二七公社内部的“火线指挥部”（就是主张文攻武卫的人）一派代表人物，在 1968 年反对多中心、反对分裂势力的时候，就被抓入狱。

在政治上永远存在一个“树荫效应”，在相对前锋的位置上的人，多数在现实政治中间总有大批坚定的对立面，因此他个人就常常是政治整合的一个障碍，是管理成本上升的刺激因素，常常难以被体制吸纳，处于受排斥状态。总是有人选择站在树荫下，最后反而是这些人掌握局面，受到扶持和栽培，所以投机分子在政治上永远有市场。

所提工人造反派和学生造反派的差别也许并无典型意义作者:李宪源日期:2004-09-2512:35

当然我们可以不排除这一很有创意的、有待各地更多老造反同志举例验证的假设。

但就无锡和江苏的情况看,是非被军方成功收买的界线，却根本不是按工人和学生来确定的。

27 军镇压无锡造反派的初期，很精明地把两个嘴有威望的学生老造反派组织拉在一起；每砸一个“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派）下面一个“主力军”基层组织时，“长征大学（无锡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和“抗大（无锡无线电机械学校）红色造反团”的大旗迎风飘扬，为杀气腾腾的镇压作包装。

后来越砸越厉害，“六二六兵团”的大学生们就不干了，提出“严正抗议”，指出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是“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红反团”的中专生们，却一头扎进“枪杆子”的怀抱，积极扮演起重庆八二五的角色来。

27 军还拉拢了几个默默无闻的“红总”基层工人“主力军”组织，作重新集结保守派队伍的旗帜。

可见，这跟工人学生身份之差没关系。据我所知，著名的新疆红二司，也是以新疆大学红二司为主干，依托更多的工人造反派跟“军内走资派”鼎力对抗的。

把上述接受分化和拒绝背叛的差别，归结为“学生处在相对年少的阶段，思想意识较为薄弱”，或“自控能力更差些”，也说不通。事实上，无锡这两个学生组织背后，都有成年老师在拿主意。无线电机械学校的那名老师，在 1967 年就干脆跳到了前台，后来还当上了“九大代表”和市革委副主任。如要进行具体分析，各自都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深刻背景。

事实上，当时“六二六兵团”的大哥哥就专门写过“抗大红反团”小弟弟为何背叛造反派的长篇大字报，至今我还有印象，例如无线电机械学校（为新兴电子军工产业培养人才）入学家庭条件很严格，容易接受工人中“造反无好人”的“四一四思潮”典型观念，从而一开始就难免对曾经鼎力支持过他们的“红总”内心有疏离感；造反起家时又是全校一哄而起，没有经过“六二六兵团”从孤立少数经数月苦斗逐渐成长壮大的革命意志磨练等，至今看来还是挺有道理的。

这些情况，大部分我都改写入《干枯风流情》书稿中了，看来真得抓紧改完贴出来，以供朋友们跟各地文革情况作对比。

南京的情况，也是一部分大学生造反派组织坚决不认同许世友在“二月逆流”基础上搞的“大夺权”，称之为“好个屁”，自命为“屁派”。

学生和工人在政治上的落差，在全国范围都是“重庆模式”还是恰恰相反，需要做更多调查研究。你对我错我对你错都有可能；还是老话，不要匆忙作结论。

同意“当权派在政治上的成熟”之判断，也同意“工人想要主导学生运动极其困难”之判断，在无锡，明显就是造反派文人在主导工人运动。

至于重庆的武斗，造反派在 54 军不敢相信情况下有能力把嘉陵大桥打下来，如有决战决心，弹药厂同样能够打下来。

关键要搞清支持造反派的几个军，是什么时候入川的。如果是在“大武斗”时期，即使“反到底”急剧升级武斗，54 军要直接参与的可能其实并不大。“组织民兵”之类则更谈不上，武斗一起，所有的民兵，就以各自组织归属身份参加武斗了，不存在统一的组织形式可以另起队伍。

54 军的骄横气焰根子还在上层,叶剑英"孙女"之死和几大卡车军队紧急出动就是一个注解。

特别是在“武汉事件”后的情况（黄廉的口述似乎缺了这极为重要的一大块，应该请他详细补述），在北京“声讨大会”开过后，“反到底”仍然“保持谨慎”的政治愚钝，虽然“减少了两派群众在武斗中的牺牲”，实际上却是错失了瞬息即纵的、54 军根本不敢轻举妄动的 20-30 天之天赐良机，全国造反派似乎均丧失了极为宝贵的二十多天一举扫荡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之“新保守派”的历史机会。

最终代价，则是造反派在全国范围被逐步排斥清洗，为走资派重新掌握实权扫清道路，并导致当今工人阶级利益的总牺牲。

二七公社内部的“火线指挥部”（就是主张文攻武卫的人）一派代表人物，在 1968 年反对多中心、反对分裂势力的时候，就被抓入狱，是因为全国造反派就总体而言，大势已去的必然结果。

你最后这段话讲得很深刻：

在政治上永远存在一个“树荫效应”，在相对前锋的位置上的人，多数在现实政治中间总有大批坚定的对立面，因此他个人就常常是政治整合的一个障碍，是管理成本上升的刺激因素，常常难以被体制吸纳，处于受排斥状态。总是有人选择站在树荫下，最后反而是这些人掌握局面，受到扶持和栽培，所以投机分子在政治上永远有市场。

来自四川宜宾基层群众的申诉与求助

我们是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一批干部、工人、农民，只因观点不同，就被抓捕判刑劳改，自判刑那天起一直不服，几十年有理有据的申诉未得解决，今年三月我们十一个“反革命”到京上访，被宜宾市当局接回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我们说:省高等法院讲：“不能开这个口子”。

’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是有错必纠，对以上中院告知我们的那些话又怎么解释呢？市辖各县“文革”的案件全解决了，只有翠屏区没有平反纠正，这都是事实。

案例一：去年 10 月翠屏区法院审理复查”文革”中彭光荣一案,就是审鉴庭李忠如法官亲自审理后并写出终结报告。彭光荣无罪为什么法院依旧维持彭光荣，有罪判决呢？下面是当时的中央文件摘要，按文件规定就必须纠正冤假错案给我们平反和生活出路。

宜宾市受害人：邓耀光、李顺伦、吴鸿东、谢英富、邓子云、

周福全、李世金、方腾霄、彭光荣、陈元中

中央文件摘要：

中发[1987]78 号

中共中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

……认定反革命案件，必须遵照毛主席教导：'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因出生不好文革中说过错话、做了错事或与干部群众打架斗殴被当作阶级报复而被判刑的案件。

……对申诉有理由，经调查确实属于冤假错案的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也不管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都应平反纠正，不要留尾巴：抓辫子。"

中发〈1982〉9 号

"要判刑的，只限于对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要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防止派性干扰。

(中办发号 1983)9 号

一、转发公，检，法三党组《关于进一步复查平反政法系统经手办理的冤、假、错案的意见的报告》

二、凡是：据以判决、处理的主要事实失实的，或者定性错了的，都要平反。

三、对于'文史'？的案件，要进一步彻底复查，不要半途而废。至今还没有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要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方针政策，逐件复查，坚决平反纠正，留有尾巴的要坚决去掉……

四、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都必须实事求是地平反纠正?"

四川省宜宾市落实中央政策上访五人小组

2005-11-10

2006 年宜宾审判工人上访代表一案

日期:2006-03-2221:09

近日四川宜宾即将开庭审判上访代表，希望媒体界的良知人士能够给予关注，力所能及地给那些弱势的曾经为国家

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工人群众一点帮助。谢谢。

谁能为人民说真话

——国家信访局川访[2005]55 号文上访纪实——

——这是讨要工龄补偿招来的横祸——

——宜天工诉[2006]0312 号

国家主席：

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

人大吴邦国委员长：

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中共中央纪委吴官正书记：

中共中央政法委罗干书记：

国家公安部周永康部长：

《天天读报》文传：2005 年大大小小不如人心的对抗性事件，全国有八万多起，就在我们宜宾 2005 年 11 月 29 日发生了，动用干警，“打手”1200 多人和四太推土机强占五香村耕地和抓捕农民 27 人的事件。我们讨要“身份补偿金”的事也上告了几年，现在抡到我们要蹲监狱了；不得不向你们最高层反映。并且请求：法理大师贡献田教授和这一类的志士仁人，以及一切敢于坚持真理的舆论和媒体帮我们说一句真话：刑侦大师李昌钰专家和这一类敢逗硬的、正值的法警进行调查，替辩方举证；请在中央和他们的调查基础上：重新处理。

一、基本情况

我们这个案子，是老板，2005 年全国劳模罗云在收买宜宾天原化工厂过程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据文件，宜宾市委 2004 年已经批准把工厂卖给了罗云集团。天原化工厂，现名天原集团，天原股份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了。全民所有制。2004 年的固定资产 10 亿多；产值 15 亿多。

二、肆虐工人的依据

“宜宾市委发【2003】26 号文件”，是罗云肆无忌惮的靠山。其核心内容是：

（1）国有资本百分之百的退出企业，管理层持大股（即曲线 MB0）；今后不准再建设国有企业。

（2）百分之百的转换国企工人身份为合同工身份；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工人称它为工龄经济补偿金）。

（3）实现企业法人（老板）治理。根据该文件，市经贸委另作规定：天原下岗工人拿了生活费，就不准再拿工龄经济补偿金。

三、罗云2004年的镇压手段

(1)不签内退协议的工人（即争取工龄补偿金的工人），扣发2004年5月1日至11月份，共7个月的生活费（后来在11月底补发了。）有天原公司【2004】255号文为凭。

（2）2004年3月22日，以阻碍交通，抓捕提过意见的6名工人，分别关押7－12天；并指使工会、保卫处威胁在押工人家属交出《上访材料》；

（3）2004年6月将敢于讨要（扣发生活费）的两名下岗工人关押数日。

（4）不签内养合同的工人作为自动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四、宜宾天原7.26事件真象

（A）市委四位主要领导集体签名下令抓捕工人

●2005年4月11日，四川省委信访办【2005】第103号“文转”国家信访局用访【2005】55号文“请宜宾市委查处：罗明忠等上访未拿到2003年改制工龄经济补偿765元/年的待遇问题。

●2005年5月11日，在未作任何查处的条件下，宜宾市委即以“突群办【2005】24号文”上报四省委信访办和国家信访局：“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责成企改小组调查处理；现已结办。”

●2005年5月17日，罗明忠等持“国家信访局”访转用字【2005】4号文；回到宜宾请求解决。市委信访办李主任回答：“没有收到国家信访局文件。”

●2005年6月14日，市公安局局长成富明接见6名工人代表说：“天原罗总很重视。愿意把钱拿给大家，已经准备号了两千多万元……”

●2005年6月27日，在市委信访办，李秘书长主持国资局长，社保局长，市工会领导，太原付总邓敏，工会主席谢支明等出席的会上，罗云当众表态：“一定把经济补偿金发给大家。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即：发钱期限不超过7月26日。会后，公司即核对下岗工人工龄，登记造册，作发钱准备。

●7月20日左右，不断有人传出：“厂里变卦了，不发钱了！”人心惶惶，有人说：“不发钱，就堵厂!”罗明忠等指出：“我们办事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可授人以柄！”⑶保卫处长冯、工会主席谢立即向罗云反映：“不要变卦，要考虑大家生活困难和心情……”

●7月24日，整天见不着领导。

●7月25日，工会主席叫罗明忠到办公室，借与其他工人谈话为由；让罗明忠空等半天。当天下午和晚上都有人守在、睡在西大门右侧。

●7月26日早上，有十多名工人抬着“还我工人合法权益”的横幅，去厂西大门办公楼，找罗云讨说法。9：00左右，公安局防暴警察200多名进厂，并各处拍照；同时追赶东、西厂门拍照工人，拉出胶卷曝光；用以销毁工人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的证据。整个上午，罗明忠被公安付局长堵在家里。13：40宣布市政府公告：“为维护正常生产，决定抓人。”其混乱残暴情景惨不忍睹。看究竟谁人酿成【7.26事件】？！工人无依无靠敢对抗吗？！

●7月27日，厂区一片阴森。下岗工人如惊弓之鸟，纷纷外逃。有10多人去市公安局请求放人。有美联社向公安

局采访 26 日捕人情况。李秘书长说："看你们里通外国。美联社的电话都打到这里来了！"美联社是在中国注册的合法新闻单位，他们找公安局了解情况，又没有找工人。政府发言人尽可理直气壮发布消息！何来"里通外国?!"官小了，没有材料，想通还通不成，谈何容易？！

●7 月 28 日上午 11：00 左右，在上江北捕获罗明忠。

（B）刑拘所里的苦难

抓捕与搜捕共进行了三天，共捕 23 人，拘押时间不一，宣布逮捕 4 人。关押时间长短不一。罗明忠、詹先富二人从 2005.7.26 被关押至 2006.01.25。共同待遇是：承认扰乱秩序、破坏生产；承认罗明忠领头；承认不翻案；统统被勒令在《悔过书》上按指纹。这种逼、供、信、在法律上有效吗？唯独罗明忠是强项转业军人。那就特殊待遇，给你开单份。

●治安尹大队审讯罗明忠："罗明忠！你以为你还能放出去？休想！国安局整你里通外国!我们整你聚众扰乱治安！你还要告我们公安局，公安局是告不倒的！刑事犯！做死你！审讯下来，唆使牢头，毒品犯马 XX 多次毒打罗明忠，叫吃"穿心连①"；吃"回锅肉②"。最后马 XX 看到那伤痛处说："其实，我是不忍心打你的。"出刑拘所时，罗明忠面黑黄瘦，体重减轻 25 斤（12.5kg）。

●骆惠全拘押 37 天，10 多天被扒光衣服，享受"淋水观音③"洗礼。骆惠全从刑拘所出来，就申请困难补助金，用来吃药。至今未痊愈。

（C）"破坏生产"做成了，聚众扰乱秩序罪自然水到渠成

《起诉书》退回公安局两次。在罗明忠等"取保候审"放出来之后，才把《原始生产记录》、《产品进库单》等做好了。这是全厂尽人皆知的，于是《宜翠检刑诉（2006）90 号起诉书》出笼了。近日，三八妇女节左右，工会支部书党委委员得意忘形地对 XXX 说："谁敢找人出来证明没有停产？！"试问：政府没有错，为什么要买单？！这是罗云灵魂的自白。其实罗云心中早就有鬼。从小事看大节：连下岗工人 XXX 的姐姐住医院也要送礼。给这个或那个下岗工人私下送钱。生活费扣了又补发。"破坏生产犯"牢中伙食全包了。尤有甚者，还沸扬着：要送 XXX，XXX 套房。阴风吹：用三十万元摆平。这难道是红色资本家的菩萨心？！抑或是延安老干部的爱民如子？！今天这一类部题不是腐败，而是腐蚀。

（D）这是一着败笔

11 月份有人泄露天机："没有停产，也要判罗明忠五年劳改，判詹先富三年老改。判错了五年后政府来赔偿。"好大的口气!这是拉大旗，蒙虎皮吓唬老百姓。你怎知政府要买单？！可真是把我们吓坏了。2005 年 12 月我们飞奔北京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说："你们天原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要找去找省委信访办！"省委信访办听说是国家信访局的指示，无可奈何地把 2005 年 5 月 11 日宜宾市委突群办发的"联席会议【2005】24 号文"连同附件全给了我们。文件赫然写着："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责成企业改制问题工作小组调查处理，现已办结。"这个败笔说明了瞒上欺下和包藏的祸心。五我们可怕而光荣的结局

●公安局强迫我们"停访息诉"还没有宣判；我们又上诉了。肯定是罪加一等！

●出了狱，还会不服气：那就该"做死你"了。这种事还少吗？就在宜宾市，2001 年 1 月 22 日就出过这类事：宜宾建筑机械厂付厂长卢文庆抵制集体资产流入私人腰包，被杀在离公安局门前 100 米处。还挖去一只眼，割去双耳，挑断双足足筋。这是告诉人们："今天，谁胆敢反对，老爷，这就是样板。"该厂党、政、工、团和职工签名，按上指纹，写上家中电话号码，申请缉拿杀人犯。几年过去了谁人认真理睬？！至今苦难无处申冤。罗明忠你太认真，太顽固，太不识时务了。要谈就谈钱的事，胡扯什么国有资产流?!你知道多少？在私有化的潮流中，你告得准谁？！

你和詹先富，周少芬，骆惠全等这么一折腾，万一错过了国企私有化的浪头，老板没有买到工厂；你就不怕卢文俊的下场？！如果你不怕死，那你就做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准备吧!如果老板真没买到这十几亿的工厂，那是全民的喜庆事！人们会感谢你们的：象感谢宜宾大塔电站保卫者、五香田保卫者、黄山茶场保卫者一样，尊敬你们！当你们从监狱里走出来时，我们会齐放鞭炮欢迎你们！因为这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改革派的胜利，是马列主义原则、科学发展观的胜利!！此致

敬礼

宜宾天原下岗工人

2006.03.13

四川宜宾“7.26”事件——是地方官僚权贵特殊利益集团镇压迫害工人的大冤案

我们是四川宜宾天原集团，天原股份公司 1 千多名内退下岗职工，因反对地方特殊利益集团“国企改制不评估资产，截留、侵占职工经济补偿金”，多次依法逐级上访却遭到地方特殊利益集团的联手镇压与迫害。

●2004 年 3 月 18 日，宜宾市经贸市体改办主任刘宗勤代表市政府在天原公司向内退职工宣布：“资产评估不适合天原公司”，遭到与会职工强烈反对，一职工（罗明忠转业军人）当场做了“保卫国有资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演讲。第二天就被公安局传讯告之，市直属分局国保向大队长直言不讳地告诉该职工：“你的演讲工人们拍掌欢迎，但你要知道，这是政府行为，要枪打出林鸟。”（此后两年来大量便衣盯稍、跟踪、摄像、监视。被剥夺了权益的工人成了 1924 年国统时期的地下党）。3 月 22 日，出动大量便衣公安，光天化日之下，像土匪绑架一样，四处强行抓捕向领导提过意见，表示要上访的 6 名职工分别关 7-12 天，并威胁家属交出上访材料给公安局成局长：“不交资料不放人。”其中一位便衣警察在把抓捕的女职工推向看守时说：“抓了一个卖淫婆，把她丢到男监去。”直接侮辱我被抓女职工的人格和清白，被抓职工统统被诬为“妨碍交通罪”。

●2004 年 6 月，将前去讨要因拒签“霸王协议”被停发生活费的 2 名职工强行关押 7－12 天，被诬为“冲击厂门，造成停产”罪。

●2005 年 3 月 10 日，将中央“两办”通知，责令地方政府和天原公司签字承诺：“人要接回，问题要解决处理好。”后接回的 5 名上访职工代表关进拘留所，先关人，后发传票，又强行办了该 5 名职工的“守法学习班”2 天，说是北京警方通知宜宾关押的，此事后来为我被关押职工再次上访北京，经国家信访局证实，系宜宾公安局伪造北京警方通知实施的非法关押。

●2005 年 5 月 20 日，我内退职工根据上访代表归来后国家信访局和宜宾市委信访办指示，欲回公司退委会集中学习“新信访条例，事前经请示退委，社区主任和公司保卫部长同意，表示届时出席指导，但却遭到公安局出动大批人马强行干预，不许我内退职工到场，公开扬言要以非法集会来镇压，并于当天有意安排布置大批运货车辆停堵厂门外公路，做实内退职工非法集会堵塞交通。

●2005 年“7.26”事件，是典型的钱权勾结，地方官僚权贵特殊利益集团对工人进行的政治迫害。

●2005 年 7 月 26 日，天原公司管理层临时反悔，拒绝兑现发放内退职工的经济补偿金的承诺，对前来领钱，要说法的职工不理不问，领导不见职工的面，不答复职工的正当诉求，利用运料汽车停堵，炎炎烈日酷暑，群众都在家中午休，无人看见，出动防暴警察 200 多人，大打出手滥施淫威——

●抢去我内退职工相机两部和拍摄现场的胶卷，销毁他们施暴抓人的证据。●强行抓捕内退职工 23 人关押，取保候审 7 人。

●将我上访职工罗明忠等 2 人刑拘关押 1 月后又转为逮捕关押半年之久，于 2006 年元月 25 日取保候审，限制自由。

●所有被抓职工统统被诬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强迫签字承认堵了厂门，影响生产造成损失，并被强迫写了悔过书，保证书。“安处理正确，自愿停访息诉。”

●抓人第二天，有美联社记者电话向公安局了解抓人情况，公安局成局长和市委李秘书长对在场要求放人的内退职工讲“电话都打到这里来了，给美联社通消息，是里通外国。”

●公安局治安大队长尹贤杰对被关押的职工罗明忠说：“你以为还会放你出去呀，休想，你还想告我们公安，告诉你我们公安是告不倒的，国安整你的里通外国，治安整你的扰乱秩序，做死你！”这话出自公安的口，暴露的都是宜宾官僚权贵特殊利益集团的“良苦用心”。

●对不服其无理逮捕关押又取保候审，表示要上告的职工（罗明忠等 4 人），公安和天原管理层勾结，共同完成了修改生产原始记录，原材料进出库单，生产报表等一系列假证、伪证后，于 2006 年 3 月 3 日起诉到法院，3 月 7 日送达本人，叫等候开庭判刑。

●此前一直爆出官僚权贵利益集团的旨意（大众皆知）。没停产，也要判罗明忠五年劳改，判詹先富三年劳改，判错了，五年后政府赔偿。

●真是岂有此理：和谐社会是靠镇压迫害工人来打造的吗？“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是这样来体现的吗？对法律的监督严重缺乏，中央政令，国家法律被地方官僚权贵特殊利益集团肆意践踏，还谈什么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司法人员的终身负责制岂不就是一句空话？！人权，生存权，话语权，我们都被剥夺殆尽，这难道也是“三个代表”应有的体现？

●我们要问：（1）天原自 2004 年以来，抓捕关押工人的系列事件，完全是因为总裁罗云等企业管理层贪污腐败，被工人告发，心怀不满，去年 6 月在市委当众表态要发“补偿金”后又反悔，严重违反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稳定和谐的一系列政策；本应追究罗云的刑事责任，为什么反抓工人，审判工人群众呢？

●（2）罗云调动电石车堵厂门反诬工人堵厂门，难道工人有权调动电石运料车吗？工人是去见领导要钱，要说法的，罗云等 25 号，特别是 26 号根本就一直不见职工的面，不出来解答职工的问题，这职工们在厂门口不愿离去，越聚越多，本就是罗云们的责任造成，要抓就该抓罗云，追究罗云们的刑事责任，为什么反抓工人坐牢，要判工人的刑呢？

●（3）罗云等下令修改生产分厂生产原始记录报表，制造伪造假证，并威胁相关人员不准泄露其“秘密”，诬陷内退职工，已触犯刑律，本应逮捕罗云，追究罗云的诬陷他人罪，为什么反抓工人坐牢，要判工人的刑呢？

●（4）本来是人民的公、检、法，但如此枉法审判工人群众，把宜宾公、检、法变成了罗云们的私家“公、检、法”，请问宜宾市委，市政府的掌印官们，何时将宜宾的“公、检、法”改制卖给了罗云，使其成了罗云操控的私人公安局，私人检察院，私人法院？现在的审判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是代表了人民群众？还是代表了罗云们的官僚权贵特殊利益集团？！

●宜宾官方一贯维护官僚权贵特权阶级的利益，瞒上欺下，与胡总书记和全国“两会”的精神背道而驰，公然审判无辜工人，肆虐弱势群体，这只会更加激起我们工人的愤怒与仇恨，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来镇压只能说明他们自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民的敌人！

●开庭在即，我们拼死一呼，啃请党和国家最高层派员调查四川宜宾天原“7.26”事件真相。

●欢迎一切舆论媒体前来参与开庭，调查采访、曝光。

●我们也曾向胡总书记，吴委员长、温总理、中纪委员吴官正书记、最高检贾春旺检察长反映和举报过地方特殊利益集团的腐败，均如石沉海，无人问津，问题没有解决却遭到地方权贵势力的合力镇压与迫害。于今，不法分子们的违法行为被人为合法化，我们岂敢希望——谁执法律公平、公正的牛耳？还我工人清白、人权？！只不过，在我们重新戴上脚镣、手铐、穿上劳改号服时，能让社会诸公玩味一下我们工人的“小康”（普通职工干一百年抵不了罗云一年的收入)、“和谐”。虽囚徒、乞丐也与官太爷大富翁们共享这“改革开发的成果”。天可怜见我们死难瞑目。注：因每次签名上访被批转，遭受地方打击报复，请媒体暂不要发放签名。

四川宜宾天原工人

2006.3.16

四川宜宾黄山茶场 2 亿国有资产仅卖 340 万

作者：陈世界

黄山茶场是由四川省农业厅于上世纪 50 年代投资创办，1980 年由宜宾县代管的四川省最大的国营农垦企业，现共有土地 1.05 万亩，国有资产总值 2 亿元以上，被宜宾县政府强行以 340 万元的价格于 2003 年 9 月卖(送)给私人老板，黄山茶场的国有资产就这样完全流失了。

宜宾县银伍公司老板冉银伍曾用 800 万元现金来购买茶场，县府不同意。

五粮液酒厂曾来人，愿以 3000 万价格购买茶场，县府不同意。

为什么这位私企老板 340 万元就能"买"走茶场呢?官商勾结是最通行的方式，这笔交易也不例外。职工们都清楚，这位私企老板同宜宾市某常务副市长关系太深了。据说，这位副市长三次出国(美国、加拿大等)访问，该私企老板都派专人陪同负责住宿、吃喝、购物、买机票等全部费用。为了回报这位老板的恩情，这位副市长大人曾下令宜宾市属九县一区茶叶出口交由该私人公司总负责。为了能够服众并稳获这一特权，就要使该公司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样的公司必须为宜宾茶业龙头企业，二是按规定该公司必须自己拥有万亩以上茶园。在这位副市长的督战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他指示宜宾县委一主要领导将黄山茶场强行改制，黄山茶场 1.05 万亩茶园就这样轻易变更了主人。"改制"成了名副其实的掠抢！

图示：这是四川宜宾县工会大楼，楼上的横幅上写着“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门栏上的横幅写的是“向劳模学习，向劳模致敬！”。办公楼已完全商业化，楼对面是下岗工人排队待客载人。不知道劳模究竟是何许人士。

时任县农业局的熊局长并不同意这样的"改制"，在他来茶场发现"宜宾县黄山茶场"的牌子已经改换门庭成了一家私人公司的牌子时，当即发话："黄山茶场没有卖嘛!把它的牌子给我取了！"(我亲自在场)青年工人们当即执行。没过几天，县府即下令撤销了这位县农业局局长的职务。黄山茶场党委和董事长不同意卖茶场，县委书记于 2003 年 4 月 29 日带领上百名公安兵来茶场宣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谁不卖，是党员的要按党纪处分……"县公安局长在会上宣布："我们是来保驾护航的！"大有谁不卖就抓谁的架式。四川省最大的国营农垦企业就这样变成了个别官商

的囊中物。

宜宾县黄山茶场是上世纪 50 年代由省农业厅投资开办的，那时规模不大，经过三代工人五十年的艰难创业，含薪茹苦、刀耕火种、流血流汗开创了这份基业，今天却被这群狼心狗肺的官商勾结葬送了、抢劫了。广大职工实在心有不甘。多么希望中央能按胡总书记说的--"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求"的指示，为民做主啊！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本文编辑自宜宾县黄山茶场退休职工的上访材料）

宜宾七九九厂职工群众给胡总书记的信

胡总书记：您好！

宜宾国营七九九厂系中央国防企业，主要生产陶瓷尖端产品。由于体制改革中实行厂长负责制，重大决策由少数个别人说了算，工人群众被蒙在鼓里，一切为了赚钱，将产品质量弃之脑后，不知对国防事业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厂总工程师兼 109 分厂厂长龚金容决定（经厂长尹祥文同意）：用（50 多万元/吨）代替 99 瓷（140 多万元/吨）进行生产，以次冲优、牟取暴利、中饱私囊、置国防产品质量于不顾。去年下半年 109 分厂职工朱德均向中央反映了此事，引起了你的重视，亲自批示"……一查到底"，由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牵头成立了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到宜宾当晚，就直接到 109 分厂拿了各种原料，并召开了厂长等人的紧急会议，拘走总工程师龚金容等 5 人，当晚厂里的气氛很紧张。谁知十多天后，厂里秘密对中央调查组每人发了五万元"辛苦费"，调查组才撤走，此事就不了了之。请总书记看看，国家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还有，厂里个别人给自己定工资，厂长：月工资 2400 元，外加年薪 20 万；分厂厂长：月工资 2400 元，外加年薪 10 万；而工人加班加点能关 8、9 佰就不错了。和厂长等 人比，十倍！这也是职工群众 极为不满的。也是生产关系在分配上的大倒退。说明少数人权，就。请中央派人调查。

七九九厂：职工群众

2005 年 9 月 3 日

四川宜宾建机厂副厂长揭官商勾结鲸吞集体资产被挖眼割耳杀死

我们是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建筑机械厂职工，现再次向上级反映，我厂副厂长卢文庆因揭发官商勾结使厂里资产大肆被人鲸吞，而惨遭歹徒杀害一事。

卢文庆，男，被害时年 48 岁，任副厂长期间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卢文庆因代表广大职工心声，抵制并整理材料

上报中央、省、市有关部门，揭发宜宾市翠屏区个别人利用职权打着对企业改制、整活的幌子与社会上个体户勾结，疯狂鲸吞集体财产、使集体财产流入个人腰包。一旦这些揭发材料得到上级重视、查处，个别人不但被罢官，还有刑惩之灾。估计，这些揭发材料转回地方。卢文庆正义之举成了个别人捞大钱、发横财、搞腐败的眼中钉，并遭致个别人的极度愤恨。终于在 2001 年 1 月 22 日早上 6 点左右，卢文庆被人杀死于市中心，被杀地点距市公安局 100 米左右。卢文庆后脑被击碎，眼被挖一只，耳朵被割去，足筋被挑断。

谋杀者们妄图以杀死卢文庆来警告全厂职工必须听他们的话，否则下场与卢文庆一样。卢文庆被杀害震惊了全厂职工，但职工们心知肚明卢文庆为啥会被杀？卢文庆被坏人杀死一年余，家属多次书面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杀人事件。至今四川宜宾市翠屏区有关部门未作任何答复，妄图绝化了事。

试问：人命案关天关地，不追究不认真查处、不查个水落石出行吗？一些人违反党纪国法、靠搞恐怖能维持得住巧取豪夺的利益吗？我们再次向上级反映，并只有上级亲自查处，方可查出杀害卢文庆的前因后果。我们坚信，卢文庆被害查清之日，便是为谋杀者们敲响警钟之时。（我们还整理有个别人与个体业主勾结违法鲸吞集体财产的确凿材料，请上级提取。）请答复为盼。

前任厂长兼书记侯国清

彭世礼厂长、党支委

二 O0 二年三月十八日

彭世礼 0831-8214060 厂长、党员

钟传英 0831-8235635 受害者家属

蔡江平 0831-2324025 厂办公室主任，党员

李代群 0831-8233700 职工

代华英 0831-8245170 职工

王明松 0831-3558295 职工，职代会常委

天灾？地难？人祸？——四川宜宾灾民呼唤社会主义大家庭

日期： 2006-01-14 20:50

[乌有之乡编者按]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分散的小农户面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很弱，如何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党中央又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么其中一定包含如何组织分散的小农户增强抵抗各种灾害的能力的命题，这是关心三农的各界人士务必认真思考的

问题。我们发出这个呼吁，既是让大家对这个问题能够进行关注研究，又是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四川宜宾灾民呼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救援支持

春节来了，受灾农民的生活怎样？又有谁能够理解我们的遭遇和苦难。

我们是四川宜宾市翠屏区思波乡农民，地区条件差，经济十分困难，处于贫困状态。2005 年我乡三百多户农户种的杂交水稻种“冈优 336 和川丰七号”两个品种造成严重减产绝收，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劳动，一年的唯一希望变成了失望，生活无着了。

灾难发生了，我们先后找了乡农技员，他说造成这种现象是“该品种抗病能力差，不适合我们山区种植”。农民代兰萍今年种的“冈优 336”同往年一样，往年 3 亩半田要收 4000 斤左右，今年 3 亩多田只收了一百来斤谷子，其中一块田未栽满，去别人田里找来几个秧苗，为什么同一块田，那几个秧苗谷子没受损失，这显然就不是管理问题。

2005 年 8 月 8 日，宜宾晚报记者赶到现场，调查采访，情况属实，农民都是严格按照该品种的技术规程操作的。当我们找到翠屏区政府时，政府领导避而不见，支我们找农牧局，区农局的农技师对此做了鉴定，结论为该品种是穗颈瘟，通过特治农药防治，也无法挽救。农民相信科学种田，但一年就靠这几亩保命田维生，而面对这样的灾难无人问津，胡总书记讲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要我们找谁去落实？地方政府能够袖手不管吗？

在毛泽东时代，有公有制的保障，遇到这样的灾难有集体负责，还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后盾，而现在谁来支援我们？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我们怎么就不能分享？为此，我们特向上级各级人民政府请求，向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请求，帮助我们灾民度过难关，给我们一条生路。

像这种类似情况有很多，我们期待人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予以关注。

四川宜宾市翠屏区思坡乡八个组：

英雄组、新民组、大历组、茶林组、

顺利组、同心组、白社组、超额组

三百多户全体受灾村民

2006 年 1 月 11 日